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反恐怖行动写真录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畅销书摘》月刊

《畅销书摘》是江苏人民出版社主办的综合性书摘类月刊，以“一卷在手，可知多本精华百本信息”为宗旨，坚持“选得精彩，摘得精练，编得精心”的“三精”方针，广收博采最具权威性、代表性、时效性的中外畅销书，以选登、介绍、摘编中外优秀社科、文艺、文史类图书为主，既介绍已面世的畅销佳作，又引荐即将出版的畅销新品，也选摘曾经畅销但己为今人生疏的畅销名著。它既是丰富知识，获取信息。愉悦身心的读物，也是读书、购书、藏书的指南。

本刊所选介图书主要为文艺、纪实、社科、人物四大类，其常设主要栏目有：长篇短读、社会纪实、人物大观、风云历史、社科之窗、经济话题、译苑新作、秘闻轶事、文化沙龙、美文品读、五味斋、书林折枝等。

本刊邮发代号：28—216

全国各地邮局（所）均可订阅，本刊编辑部同时办理邮购（破月破季均可）。

本刊地址：南京中央路 165 号江苏人民出版社《畅销书摘》编辑部。

邮政编码：210009

电话：（025）6638215

反恐怖行动写真录

恐怖克星
——秘鲁藤森政府的反恐怖行动
“这次终于轮到我了”

当代秘鲁最著名的舞蹈表演艺术家兼指导卡利多刚刚搬进利马市苏尔基约区第一大街459号，就成了这一街区最令人瞩目的女性。这也难怪，天生丽质和后天的艺术修养造就的不凡气质，令她超凡脱俗，靓丽多姿，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成为人们注视和谈话的焦点。

不过，卡利多没有想到，这一次向她注目的人大多不是欣赏她秀美的体态与倾城的姿容，他们用笔记下的也不是她的三围，而是她采购的面包的数量，购买的男衬衫的尺码，抽的香烟的品牌，所使用的药品的名称……更奇怪的是，他们对她倾倒的垃圾也颇青睐，经常是整包取走。当她外出时，这些人更是虎视眈眈，唯恐错过任何细节。当然，他们也注意到，女主人那辆绿色小卧车的车窗涂的是深颜色。看来卡利多是不喜欢过分招摇的，否则哪一个美丽的女性愿意这样深颜遮掩过闹市呢？

她更不会想到，所有与她有关的材料每天经专人分析后都准时送到了秘鲁反恐怖局局长的办公室。刚开始几个月，卡利多似乎除了那辆小卧车有些出奇外，其它都显得很平常。8月中旬之后，情况明显不对了。卡利多购物的数量与品种和她的实际需求不吻合。她买的男衬衫，尺码比男主人身材大得多；她买的治牛皮癣的药，她的家人也用不上；她倾倒的垃圾中有温斯顿牌香烟头，这也不是她享用的。最大的破绽是，她每天购买的面包数量足够10个壮汉享用，纵使卡利多无减肥之忧，她也吃不下这些面包的一个零头。看来，好胃口的人不可能是卡利多，只能是另有其人。而最大的可能是那个喜欢抽温斯顿牌香烟、患有牛皮癣的阿维马埃尔·古斯曼——秘鲁最大的恐怖组织“光辉道路”的首脑人物。

秘鲁警方是如何盯上本国最有名的艺术家的？原来，几个月前，一个偶然的机会，警察找到了一盘录像带，录像中有古斯曼与卡利多两人跳舞的镜头。音乐声中，两人相拥相依，如痴如醉。警察大喜过望，一张围绕卡利多的蜘蛛网张开了。装扮成小贩、行人、电工、水暖工、抄表员、油漆匠的侦探遍布卡利多的二层小楼附近，通往该楼的各个路口都有专人把守。这一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古斯曼这条“大鱼”恐怕难以逃脱了。

1992年9月12日星期六，平日里在第一大街来去匆匆的上班族大都呆在家中享受一周一次的家人团聚时光，卡利多的小楼前突然变得空旷起来，在小楼附近游来逛去的侦探目标一下子显得突出了许多，如果继续进行监视，可能会引起古斯曼的怀疑。可不能让到手的“鱼儿”溜掉了，警察决定晚上便收网捉鱼。

夜幕降临时，一场别开生面的烧烤晚会在459号附近的一个院子里进行着，身着各式服装的红男绿女三五成群地汇聚在一起，纵情欢娱。在卡利多小楼对面的街道上，也似乎不经意地停着一辆小汽车，一对热恋情人正在里面相拥相亲。实际上，这些寻“欢”作“乐”的人们都是便衣警察，他们堂而皇之地靠近了古斯曼，抽紧了收网绳索，可“鱼儿”丝毫没有感觉。

突然，459号的大门开了，里面走出一位年轻的女子，那对“沉溺爱河”的便衣警察及时向正在吃烧烤的秘鲁反恐怖局局长、本次行动的总指挥发出了暗号。30余名特工人员从各个隐蔽的角落跳了出来，迅速把她架到一旁，

一拥而入，一刹那就控制了整幢楼房。

楼内所有人都被这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弄得措手不及。待听到警察的鸣枪声时，一个身体肥胖、耳鬓已有花白头发的人手里拿着的书还未来得及放下，几名显然是保镖的人迅捷地围住他。这位镇定自若的读书人平静地伸出双手，自言自语道：“这次终于轮到我了。”

指挥这次行动的安东尼奥·维达尔·赫莱拉将军在确证对方的身份后，不无激动地说：“在你的一生中有赢的时候，也有输的时候，如今就是你输的时候。”就这样，全秘鲁甚至整个南美洲人闻之色变的恐怖巨头——古斯曼落网了。在几十名特工人员的严密监视下，他被迅速送上囚车，与他“同行”的还有他那暴跳如雷的妻子、“光辉道路”第二号人物埃莱娜·伊帕拉吉雷以及该组织其他八名领导成员。

古斯曼的落网轰动了全世界，它被视为“秘鲁反恐怖斗争最伟大的胜利”。消息传出之后，秘鲁举国欢庆，世界舆论也为之震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对这次行动的成功，我们向秘鲁政府表示祝贺。”智利、阿根廷、巴西、古巴等拉美国家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充分肯定了它在国际反恐怖战争中的积极意义。正在为大毒梟埃斯科瓦尔越狱潜逃而大伤脑筋的哥伦比亚政府不无羡慕地表示，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取得与秘鲁同样的成就。玻利维亚总统亲自向秘鲁总统藤森表示祝贺，并命令加强对玻利维亚—秘鲁边界的控制，防止“光辉道路”的漏网之徒把玻国作为避难所以及反扑的根据地。国内舆论甚至认为，抓获了古斯曼使藤森总统在4月份联合军方发动“自我政变”、中止宪法、解散议会和最高法院的“疯狂举动”有了一定的“合理成分”，由此看来，古斯曼这条“大鱼”实在太大了，人们只求能绳之以法，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

古斯曼真的这么重要吗？

拉丁美洲的“红太阳”

现年57岁的阿维马埃尔·古斯曼是秘鲁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是名震遐迩的秘鲁游击队组织“光辉道路”的首领，也是秘鲁国内最值钱的首号通缉要犯，秘鲁当局为他的项上人头开出了100万美元的高价。就连藤森总统本人也称之为“残忍的天才”。有人说在秘鲁只要一提及古斯曼就足以让人心惊胆战。曾有这么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一个来自美国的观光客问当地小孩拉丁美洲什么最有名，回答令他大为吃惊。孩子首先提到了“古斯曼”，见对方一脸疑惑，又补充说：“还有亚马孙河。”

绵延6000多公里的亚马孙河抵不上一个古斯曼，这并非危言耸听。在过去的22年中，亚马孙河在秘鲁境内的河段仅仅淹死过几百人，可古斯曼的“光辉道路”成立22年来，它所进行的武装破坏却有上万次，由此造成的死亡人数高达3万人，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5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秘鲁外债的总和。与古斯曼的赫赫“武功”相比，喜怒难测的亚马孙河毕竟是逊色多了。

古斯曼于1934年12月3日出生在秘鲁阿雷吉帕省一个巨商之家。但是，他并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他是一个私生子。这个迥异于常人的秘密自他懂事起就折磨着他，并对他后来走上反社会的道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5岁的时候，他母亲死了。他先由舅舅们抚养，后来他的父亲承担了自己的责任，收养了他，他被送入一所基督教教会学校接受教育。过惯了寄人篱下生

活的古斯曼不爱说话，但意志坚硬如铁，又博闻强识，天资过人，熟悉他的老师和亲戚都说，他最适合读书，如将来能在学海遨游，一定前途无量。中学毕业后，古斯曼果然顺利地进入了圣奥古斯丁大学学习哲学和法律，此时的他对学业用力甚勤，给不少人留下了“读书种子”的好印象。没有人想到，古斯曼在此期间最着迷的却是当时流行的激进思想。在他的眼中，镇压过反对派、搞过大清洗的斯大林是一名“不彻底的革命者”。有幸领教他的固执的人也根本未曾料到，以后笼罩秘鲁长达 22 年的极左恐怖组织“光辉道路”的完整的理论思想体系在这个时候就已在古斯曼心底酝酿并抽枝展叶了。大学毕业后，古斯曼接受了阿亚库乔大学校长的聘请，成为该校的哲学教授，不久即蜚声校园。他的滔滔不绝的口才，他的坚毅、执著，在同事、学生中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对他的口才佩服得五体投地，称他为“香波”，意为只要沾上一点，大脑马上就会被“洗得清彻透明”，而且永远散发出让人难以忘怀的“余香”。古斯曼在校园中广结同道，他虽然没有把阿亚库乔大学建成秘鲁的哲学中心，却成功地把它变成培养信徒的摇篮。也正是在阿亚库乔大学，他结识了芳龄十六、貌美如花的少女奥古斯塔·拉托里。她是当地共产党领导人的女儿，其时尚未走进大学校门。拉托里一开始并不喜欢这个大她 10 岁的“教授”，一直在躲避他那肆无忌惮的追逐目光。可古斯曼却并无后退之意，为了赢得拉托里的芳心，他每天坐在她的家门口，让她在无可躲避的目光下进进出出。拉托里先是被这位古怪执拗的“静坐者”弄得心烦意乱，可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她也就从不习惯到习惯，并为他的爱所感动，最后还疯狂地爱上了他。不久，古斯曼终于如愿以偿，同奥古斯塔结成连理，成为当地人们艳羡的一对佳偶。事业与爱情的丰收使古斯曼从小潜伏的自命不凡的性格得到“发扬光大”。他深信，自己不仅是一个忠贞的情人、伟大的导师，而且是秘鲁未来社会的当然领袖，“肩负着民族和世界革命的重任”，要解救秘鲁人民于水火中。凭着这种幻想点燃的理想之火，1964 年，古斯曼加入了秘鲁当时最大的左翼组织——“红旗”。凭着他丰富的理论素养和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古斯曼很快在“红旗”里崭露头角。1967 年，经过几番明争暗斗，他成为“红旗”组织的中央委员会主席。但是，古斯曼本人对“红旗”的行动纲领并不满意，因此，登位后立即着手改革，于 1970 年用“光辉道路”取代了“红旗”，他自己仍然任最高领袖。

古斯曼对“光辉道路”情有独钟，这根源于他对秘鲁共产主义运动创始人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的崇拜。所谓“光辉道路”就是“走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指引的光辉道路的共产党”的意思。它主张建立“印第安式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恢复古印加的自然农业生产模式，政治上建立一种类似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应当说，古斯曼这些理论主张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极强的针对性和诱惑力的。秘鲁是印第安人的故乡。古代，印第安人曾在此建立过印加帝国，创造过璀璨的印加文明。但是，自 1533 年起，西班牙殖民者就入侵印加古国，征服了秘鲁。秘鲁人民为争取自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一直到 1821 年，他们才从西班牙殖民者手中赢得了独立。但是，独立后的秘鲁并没有走上一条康庄大道。秘鲁的政局长期动荡不宁，特别是进入现代以来，秘鲁的军人政变屡有发生。长期的动荡影响了秘鲁经济的发展。到 90 年代，秘鲁的经济已经趋于崩溃，国家的外汇储备已经枯竭，外债高达 200 亿美元。70% 的国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在秘鲁的 800 万劳动人口中，有 100 万人长期失业，另外的 50% 处于

半失业状态，而月通货膨胀率则高达 30%。10 个 6 岁以下的儿童中，有 6 个营养不良。而古斯曼所在的阿亚库乔山区又是秘鲁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该地区位于秘鲁中部，曾是古印加帝国的中心，当地的居民绝大部分是印第安人的后裔，他们的耕种方式落后，风俗习惯奇异，常常是人们打趣嘲笑的对象。到了 60~70 年代，虽然现代文明的春风也徐徐吹进了这片土地，但它对当地仍是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的经济基础撼动甚微，相反，涌进来更多的是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名目繁多的盘剥。因此，古斯曼的这些主张极大地迎合了当地贫困的印第安人和农民渴望摆脱歧视和剥削的心理，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光辉道路”很快就在这里扎下根来，并不断发展。

古斯曼具有极强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艺术。他依托阿亚库乔大学，将触须伸向了秘鲁的各个大学，建立起“光辉道路”的各个支部和外围组织，又依托阿亚库乔山区，在万卡韦利卡和阿普里马克等省的农村中也建立了基层组织，逐步形成了一个由农民、大学生、工人等各个社会层次参加的严密网络。古斯曼对成员要求极高。首先，他要求每个参加“光辉道路”的青年男女必须一方面参加艰苦的农业劳动，培养对印第安农民的感情，一方面聚在一起探讨社会问题，分析时弊，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只有经过这两重锻炼后，他才有资格加入“光辉道路”的外围组织。此后，再经过长期的“实践”，能完成组织交给的各种任务，如绑架、勒索、爆炸、暗杀、传递情报等活动，证明自己的忠诚和能力，才能正式加入“光辉道路”的核心小组，成为“战士”或“斗士”。古斯曼认为，只有这样，发展的成员才能做到思想成熟，立场坚定，为“光辉道路”献身。

按规定，核心小组的成员白天照常生活和工作，只有到了晚上才从事组织委派的秘密活动。每个核心小组成员一般是五至九人，其中一人为组长，两人负责行动，一人负责培训和发展成员，还有一人负责思想教育。小组与小组间单线联系，没有任务时不相来往。小组成员一般不允许在自己居住或工作的地区活动，这一方面是避免暴露身份，另一方面是防止他们由于亲情与家乡观念，执行任务时下不了手。另外，组织内部的纪律也非常严明，对那些行为不检点、不服从命令的人，古斯曼从来都是不手软的。

“光辉道路”的各级组织都要接受军事与政治双重领导，奉行“党指挥枪”的原则，一般以政治领导人为正职，除非有大的军事活动，军事领导人才能暂时升为正职，每个小组以上建立有不同层次的组织，最高层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常务委员会。古斯曼本人兼军事与政治组织的双重领袖职务。

“光辉道路”的主要资金渠道是“税金”，它通过向其控制的众多农民和收购古柯叶的毒品贩子征收“产品税”，每年可获得 200 至 400 万美元的高额利润。这笔资金的管理很严，一般用于组织内部成员的生活、活动，偶尔也用作成员的司法诉讼费，无关人员很难启动这笔巨额资金。

无论是从外观还是内部构造来看，“光辉道路”都如同古斯曼精心设计的“常山蛇阵”，击尾头迎，打身肢动，各个环节攻防应变灵活自如，令进攻者防不胜防，因此人们都称“光辉道路”是秘鲁社会中最有组织的一个集团。

其实，领教过“光辉道路”厉害的人都知道，古斯曼控制“光辉道路”靠的不仅是他超一流的组织能力与手段，那令人叹为观止的蛊惑性宣传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只要你加入这个组织，就无时不在接受他那浓浓“香波”的沐浴与洗礼，他的组织成员人手一本《沿着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的

《光辉道路前进》的小册子，每个人除了记住其中的基本观点外，还必须背诵出其中每一句话。这种领导艺术牢牢地控制着成员的情感世界、思维方式，使广大的追随者成为其随心所欲的应用工具。一旦他们丧失了自身的判断能力与思维功能，古斯曼的言论就成了至高无上的“圣旨”，靠着这种独特的本领，古斯曼稳稳地安坐在“光辉道路”的“教皇”之位，每日接受着“善男信女”的顶礼膜拜。他们尊称他为“贡萨洛主席”，是拉丁美洲的“普卡·因蒂”，意为“红太阳”。这种类似宗教的“洗脑”工作可以说是彻底的，以至一些被关进监狱里的“光辉道路”成员每天在服完类似中世纪的劳役后，还要无休止地背诵“贡萨洛著作”。

南美最大的恐怖组织

应该说，“光辉道路”最初的宗旨是反映了印第安农民的要求的，古斯曼希望推翻秘鲁现政权，按自己的“主义”来治理秘鲁，把秘鲁治理成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因此，“光辉道路”在成立后的几年间，主要的行动方针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这种方针与当年中国革命的实践有相似之处。古斯曼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学到”什么，现在不得而知，但是，他的思想与当年流行的左派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一点看，“光辉道路”并不是天生就是一个恐怖组织，古斯曼也不是生来就是一个魔头。没有他在阿亚库乔大学的哲学基础，古斯曼不会凭空构想出他的改革社会的蓝图，没有阿亚库乔地区落后的经济基础与尖锐的阶级矛盾，古斯曼的思想也不会找到信徒。因此，“光辉道路”最初应该是一个反政府的游击队组织，而不是后来人人切齿痛恨的恐怖组织。

“光辉道路”最初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山区省份，这些省份经济落后，主要是印第安农民，“光辉道路”在这里可以找到支持者。他们在这里伏击政府军，夺取武器，袭击地主庄园，洗劫银行和工商企业，为进一步活动筹集经费，弥补因组织迅速扩大而出现的入不敷出的财政局面。

1980年，秘鲁结束了长达12年的军人统治，首次举行了自由选举。对于饱受军阀统治的秘鲁人民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可古斯曼却错误地估计了这件事的意义，认为自由选举是资产阶级搞的老一套，这意味着秘鲁会加速资本主义化，对革命运动是一种危害，因此必须迎头痛击，以切断资本主义对秘鲁的渗透。“光辉道路”的战略重心立即转移，古斯曼率领他的勇士们从乡村走向城市，宣布对秘鲁政府全面实施“人民战争”。他们在阿亚库乔捣毁了一个投票站，以破碎的瓦砾与燃烧的大火揭开了城市暴力活动的序幕。

1982年3月，古斯曼指挥200名武装人员打开了阿亚库乔的监狱，放走了200多名犯人。在秘鲁朝野一派喧哗声中，古斯曼代表“光辉道路”宣布，这不过是牛刀小试，武装斗争将进入第二阶段“游击阶段”。此时的“光辉道路”，一方面利用前几年在安第斯山区和亚马孙贫困地区建立的根据地与地方政权组织，向政府频频出击，攻城略地；一方面又将土地分给群众，广泛施恩于民众，向秘鲁的下层组织渗透，使全秘鲁25%的县一级政府都受到了古斯曼的影响与控制，一些边远地区的县政府甚至由“光辉道路”的“人民委员会”取代，秘鲁中央政府在那里根本无法行使权力。

此外，“光辉道路”还在境外广结盟友，与德国、法国、瑞典和墨西哥

等国家的恐怖组织结成伙伴，并拉拢其他一些国家的恐怖组织。8 个国家的 39 个组织建立起“光辉道路”的支持网络，为“光辉道路”的恐怖活动提供国际援助。至此，“光辉道路”实际上成了国际性的左翼行动组织。

随着力量的不断壮大，古斯曼又宣称“光辉道路”的武装斗争转入了“战略均衡稳固阶段”。这意味着古斯曼认为他的武装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与秘鲁政府正面对抗了。此后，“光辉道路”的暴力活动步步升级，“武装斗争”实际上就是爆炸、暗杀、破坏经济设施、袭击公共场所，打击的对象已经不分青红皂白，使用的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恐怖组织，活动范围也从乡村扩展到首都利马等大城市。仅 1986 年 8 月，秘鲁经济和财政部、能源和矿业部、劳动部就先后发生多起爆炸事件，接着首都利马的一些高压输电塔也相继遭到破坏，使秘鲁的社会财产和公民的人身安全受到极大威胁。截至 1988 年 6 月，这类暴力活动已经导致 9000 人死亡，其中包括政府官员、执政的人民党成员和反对派阵线左派联盟成员、政府军军官、警察以及“同政府军进行合作”的农民。如果说，“光辉道路”在萌生的时候还不乏一定的反剥削、反苛政的合理性的话，那么，此时的“光辉道路”就完全扯去了自己身上披着的体面外衣，堕入了恐怖主义的泥淖了。他们唯“左”为上，唯“左”是从，认为只要能对秘鲁政府产生威慑作用，就没有什么事不可以做。极左恐怖组织的理论被古斯曼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古斯曼看来，他们的行动不仅要消灭政界、军界和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及政府军的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在秘鲁制造一种恐怖气氛，使公众丧失起码的安全感，从而对政府失去信任，以便为武装夺取政权创造条件。如果政府无力控制恐怖活动，那当然正合其意。如果政府为了控制局面而采取镇压措施，那么随着双方刀对刀、枪对枪的血与火的较量，政府将被迫采取严厉、残酷的手段，从而暴露其反民主、反自由的真实面目，这样也能唤醒更多的人拥护“光辉道路”，从而实现其武装夺取政权的目的。为了实现其目标，走火入魔的古斯曼对一切怀疑和阻碍其左倾极权的人都痛下杀手，连他“静坐”两年才苦苦追求到的奥古斯塔都不放过。开始几年，他还能容忍作为“光辉道路”二号人物的妻子提出的不同意见，可当他发现后者对他的政策问题提出批评时他就忍不了了。他迅速地为她指明了“光辉道路”：人们发现她在自己住处无缘无故地自杀身亡。不久，埃莱娜·伊帕拉吉雷便取代了奥古斯塔的位置。

自“光辉道路”成立以来，秘鲁政府就一直对其采取围剿，但都未能奏效。这个结局助长了古斯曼刚愎自用的气势，数年的暴力行动虽然连连得手，但是离最后胜利总有一步之遥，这也使古斯曼日渐急躁，再加上藤森总统对恐怖分子毫不留情的打击，刺激了古斯曼傲慢而脆弱的神经，使他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光辉道路”的战略反攻阶段到了。由此，“光辉道路”的恐怖活动有增无减，首都利马更成为其攻击的首选对象。1992 年 2 月 11 日，“光辉道路”一天之中就在利马制造了 36 起爆炸事件，其中一起就发生在美国驻秘鲁使馆旁，当场炸死了两名守卫使馆的警察。7 月 16 日，古斯曼又成功地导演了利马大爆炸。在利马繁华的米拉弗雷斯商业区，“光辉道路”引爆了两辆装有 300 千克炸药的汽车，造成 21 人死亡，200 多人受伤，300 多座建筑受损，创下了自 1980 年以来由暴力事件造成伤亡的最高纪录。一时间，国外游客视利马为“死亡之域”或“恐怖之城”，以至秘鲁参议院安全委员会主席伯尔也无可奈何地说：“利马现在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每天都有恐

怖事件发生，‘光辉道路’正在将国家带入一个黑暗时代。”6月5日凌晨，“光辉道路”将一辆装有600千克炸药的汽车引爆，炸毁了利马的一家电视台，炸死炸伤20余人，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估计。

丧心病狂的古斯曼眼中似乎再也没有一块平静的地方，无论是军事部门、警察机构、外交使团，还是研究单位、商业中心、工厂企业、民宅学校都成了他的眼中钉，他千方百计地要将它们铲除干净，就连中国驻秘鲁大使馆也挨了他的两枚炸弹。仅1992年上半年，“光辉道路”就制造了近700起暴力事件，造成4000余人死亡。在一系列的爆炸声中，秘鲁成了世界上恐怖活动最密集的国家之一，患了“恐怖癌症”的秘鲁让古斯曼与“光辉道路”这个血腥的恐怖组织名扬世界。

古斯曼看来与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他甚至已经做好了接管政权的准备，但是，他高兴得太早了。在他的夺权道路上出现了克星。他就是秘鲁新总统藤森，一个颇有“武士道”精神的日裔秘鲁人。

走下神坛的古斯曼

秘鲁警方从来就没有轻视过古斯曼与“光辉道路”，可以说“光辉道路”的崛起过程就是秘鲁警方的围剿过程，但是面对古斯曼首尾结合、攻防自如的组织体系和游击战术，秘鲁警方的行动却每每以失败告终。自1984年起，秘鲁政府对“光辉道路”加大了围剿力度，几万大军长驱直入“光辉道路”的老巢阿亚库乔，但因为走漏了风声，“光辉道路”整个组织及人员在一夜间销声匿迹，全副武装的秘鲁警方仅仅抓获200多个什么也说不清的“外围”成员与一大堆古斯曼来不及带走的“贡萨洛著作”。1986年，秘鲁警方虽首战告捷，抓获了“光辉道路”的军事领导人奥斯曼·莫洛特，但随之发生的每天都有政府官员死于非命的事件却使警方的脸面尽失，只能马不停蹄地疲于奔命，卫护党政要员。没想到，以莫洛特为首的300名“光辉道路”成员进行了监狱暴动，待警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镇压下去后，古斯曼又利用此事大做文章，煽动起当地人对政府的仇恨；并且“光辉道路”的武装力量借此壮了一倍。因此，在秘鲁当局看来，古斯曼完全是一个“天才蜘蛛”，随时随地都会补织起破碎的“蜘蛛网”。

古斯曼的厄运是从1990年阿尔伯特·藤森上台才开始的。这位先祖来自东洋小国的秘鲁总统，骨子里还是流着日本人的鲜血，很有些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藤森1938年7月出生于秘鲁，但其父亲是30年代才移居秘鲁的日本人，因此，日本文化对他的影响是可以想象的。但奇怪的是，这位日裔秘鲁人虽然会四种语言，唯独不会讲日语。藤森在秘鲁接受高等教育后又出国留学。由于学有所长，1984年，他出任国立利马莫利纳农业大学的校长，1987年担任全国大学校长协会主席，是一个典型的农业专家。藤森虽然是一介书生，但对政治很感兴趣。看到秘鲁的混乱局面，他也是痛苦不堪，有心从政，用自己的思想把秘鲁治理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他准备竞选参议员，但他姐夫告诉他：“如果你想为秘鲁出力，最理想的道路就是争取当总统候选人，登上权力之巅。”藤森认为姐夫所说有理，于是就着手进行这项工作。他联络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全部是高级知识分子，组成了“改革90独立运动”，参加1990年的秘鲁大选。大选过程中，很多人都准备看藤森的笑话。他们不相信一个书生气极浓的人能在大选中胜出，成为秘鲁总统。

但是，选民们用自己的行动表达了对藤森的信任。文人藤森在大选中胜出，成为 1990 年秘鲁的最大新闻。

藤森本质上是一个文质彬彬的文人，尽管他已经当选为秘鲁总统。但是，他就任后放的第一炮却让人大吃一惊。在其施政纲领中，藤森把目标指向秘鲁最大的恐怖组织“光辉道路”，明确指出，“光辉道路”是危害秘鲁民主政治的大敌，扫荡这个恐怖组织是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同时，藤森开出了 100 万美元的高价，悬赏古斯曼的人头，声称无论是谁，只要捉拿到古斯曼，立刻就可成为百万富翁。他向国民发誓，要在他 1995 年第一届总统任期期满之前还秘鲁以安宁，打击恐怖组织及其成员，并连续发布许多命令，给予秘鲁警方和军方充分的行动自由。藤森的举动，着实让人吃了一惊。一直停滞不前的反恐怖行动，由于藤森的推动，从此顺利地开展起来了。人们不得不对这个戴着眼镜的前大学校长刮目相看。

更令人吃惊的还在后面。藤森虽然担任了秘鲁总统，但国会和最高法院仍然掌握在反对派手里。他们对藤森大刀阔斧的改革举动处处掣肘，因此，行政当局与立法、司法机构经常发生冲突。藤森认为，这种局面如果继续，他的改革措施将无法贯彻下去，届任期结束，他无法向选民交待。因此，这个文质彬彬的总统冒出了一个念头：发动一场政变，把干扰改革的立法与司法当局赶下台去，放手进行改革。征得军方的同意后，1992 年 4 月 5 日，藤森发动了政变。在向全国国民直播的电视讲话里，藤森公开指责国会和法院腐败，干扰了他的改革和打击“光辉道路”的行动，助长了恐怖活动的猖獗。他说，现行的民主体制是骗人的，其服务对象是特权阶层，因此，他不得不暂时终止宪法，解散议会和最高法院，将国家军、政和立法、司法大权独揽一身，建立一个临时政府，推进全面的改革。藤森一声令下，秘鲁军警紧急行动起来。他们逮捕了一些反对派人士，软禁了议会议长，接管了议会大厦、大学和新闻机构以及各个政党、工会的总部所在地，4 月 5 日的报纸开出了“天窗”，学校全部停课。通过这场“政变”，藤森集国家大权于一身，成为秘鲁的铁腕人物。7 月 24 日，藤森还宣布：“将采取严厉的措施打击恐怖活动。从即日起，凡造成人员伤亡的各类恐怖活动均视为背叛祖国的行为而受到严惩。”8 月 16 日，藤森再次强调：秘鲁政府的头等任务就是同恐怖分子作斗争。

在藤森的推动下，秘鲁的情报、军事、警察及其它执法机构以前所未有的高速运作起来了，多年来这些没有起色的反恐怖组织很快便一改老态龙钟、老眼昏花的形象而变得耳聪目明、身矫形健。7 月下旬，秘鲁警方接到密报：“光辉道路”的最高领导人古斯曼和另外几位首领又在策划一场比利马大爆炸规模更大的恐怖活动。藤森闻讯后马上取消了预定的西班牙之行，宣布首都的紧急状态再延长 60 天，亲自率领反恐怖部队控制首都局势，并成功地抓住了古斯曼情报网中的 16 位情报人员，切断了他的耳目，让古斯曼成了一个聋子、瞎子。

耳目尽失的古斯曼仿佛嗅到了什么特殊味道，马上龟缩到他在阿亚库乔的根据地。任凭反恐怖部队在军事管制中将利马翻了个底朝天，他始终坚守偏隅，一动不动。

8 月，一向慎思诡行、神出鬼没的古斯曼耐不住寂寞了。他准备在下一月即将到来的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 500 周年活动上再动动脑筋，策划一个比利马大爆炸更“辉煌”的行动，以打击藤森政权的气势，扭转自己的颓势。

急于求成的古斯曼此时犯了他一生中再也无法挽回的错误。他不仅乐观地判断了形势，对藤森政权展开全面攻击，使自己的力量全部暴露，还完全忽视了自己的群众基础，没有料到多年来几近疯狂的血腥屠杀已使“光辉道路”人心尽失，而且也使它失去了它的左派盟友。连他最好的朋友之一，秘鲁正统左派的代表罗伯特·桑特也指斥他：“‘光辉道路’篡改了左派为之奋斗的所有目标，以恐怖替代了秘鲁工人和农民运动。”这时的古斯曼在利马已经是过街老鼠，可他还以为有人会在危急时为他通风报信，就如同1984年那次为他传递情报，从而使秘鲁警方扑空一样。

可是，这一次没有人再向他通风报信了，反而是他的行踪与计划都被“线人”及时报告到秘鲁反恐怖局。秘鲁特别警察秘密行动起来，拉网式的“世纪大搜捕”开始了。古斯曼在天罗地网中终于锒铛入狱。

一度几近神化的“杀人魔头”、“革命领袖”被投进了秘鲁反恐怖局总部卡亚俄海军基地看守所，成了那里的第1509号犯人。古斯曼的入狱，不仅大大提高了藤森本人及秘鲁政府的威信，也给“光辉道路”及秘鲁的另一个恐怖组织“图帕克·阿马鲁运动”以巨大震撼，恐怖分子或是远避他乡，或是转入地下，许多惶惶不可终日者则向政府投诚。在古斯曼被抓两天后，就有100余名恐怖分子向警方自首。

为了乘胜追击，秘鲁最高法院还于10月9日公布了一项新的决定：将恐怖犯罪的最高惩处刑罚从原来的25年徒刑提高到无期徒刑，将恐怖组织的头目送交军事法庭审判，以叛国罪来处罚颠覆组织的头目及对凶杀案有直接责任的追随者。这样，按藤森自行修改的宪法，有凶杀责任的恐怖分子可以同有叛国罪的政治犯一样，被判处死刑。

新的惩处规定具有更大的震慑力，也使许多了解恐怖组织内幕的知情人坚定了与政府合作的决心，有关恐怖分子犯罪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警方手中。根据这些举报的线索，10月19日，警察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搜捕活动，逮捕了“光辉道路”第三号人物拉米雷斯与其他8名领导人及12名成员。28日，反恐怖活动再传捷报，“光辉道路”另一位领导人马西瓦尔·瓦曼，即媒介曝光中出现的“孔多尔同志”，在阿亚库乔省与其他32名同谋一起被保安部队抓获。

“光辉道路”显然是碰到了克星。自1992年4月5日秘鲁政府执行藤森新的打击恐怖行为和反颠覆措施以来，秘鲁军队和警察特勤队共抓获恐怖分子2479名，有70余名恐怖分子被判处无期徒刑。

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古斯曼在戒备森严的高墙里也不得不咀嚼多年来他自己种下的苦果。多年来，为了避免功高盖主的情况出现，他已将那些最有能力的人排斥在领导机构之外。20多年的个人崇拜令他的任何接班人都无法控制局面，更不能指望他们把自己救出监狱。要让他们像自己过去那样，两三个月就能恢复元气，那是不可能了。连藤森总统也认为“光辉道路”现存领导人都不具备接任最高职位的“政治水平”。看来，这一次古斯曼是走投无路，死到临头了。

9月份的一个星期天，在库斯科省的安迪恩城监狱里，监狱长临时宣布取消固定的探监日活动，安排一个特殊节目。他把所有在囚的“光辉道路”成员集中在一个大房间的电视屏幕前，电视打开后，身着1509号囚衣的古斯曼出现在电视画面中，他神情沮丧，沉默地随着警官的命令一件件把衣服脱下，然后转过身来让人们看清楚，他的身上并没有受酷刑的痕迹。继而，他

又驯服地按警方命令，行了个“光辉道路”内部的军礼。

警方让古斯曼表演“节目”并非只是为了羞辱古斯曼，而是要让他在众教徒面前露出其真面目。刚开始，在得知他们顶礼膜拜的领袖沦为阶下囚时，古斯曼的信徒觉得天塌下来了。正如一名长期在监狱里为囚犯们提供宗教服务的比利时牧师所说：“这就好比教皇突然宣布说上帝没有了，请想象一下上帝的消失对全世界教徒产生多大的冲击力！”受古斯曼影响多年的人根本不相信古斯曼会落入警方手中，他们是他们顶礼膜拜的上帝，上帝怎么会被凡夫俗子抓到呢！这一次，古斯曼的追随者们才第一次开了眼：原来他们的古斯曼并不是上帝。

为了让所有的人正视古斯曼是个囚徒而不是神，摧毁古斯曼的偶像形象，警方也将录像向全国进行了长时间的滚动播出。

警方这一招无疑在“光辉道路”的老根据地产生了极大影响。惊诧于古斯曼居然也会被捕的人们看到电视中的“天才领袖”，在警察的口令下作出各种不伦不类的动作之后，才蓦然发现：原来古斯曼也可以被人任意驱使。一位妇女说，她坐在电视机前看了一夜，一直到最后，她都希望自己看到的不是真的古斯曼。在利马市郊的维亚萨尔瓦多小镇不久就爆发了反对恐怖暴力、要求和平的示威游行，而维亚萨尔瓦多历来是古斯曼对利马发动攻击的老根据地。似乎是一夜之间，这里的居民才弄清楚，他们本是为了躲避各地的暴力才藏身于维亚萨尔瓦多的，可没想到他们认为最安全的地方，暴力事件比其他任何地方都严重。在确证了古斯曼并非法力无边后，这些居民生平第一次喊出了“不要恐怖”的呼声。

但是，“光辉道路”的恐怖道路并没有走到尽头。从古斯曼入狱那天起，“光辉道路”的报复行动就没有停止过。3个月时间内，“光辉道路”就在秘鲁制造了600余起爆炸和枪击事件。12月26日，哥斯达黎加和中国驻秘鲁大使馆相继遭到汽车炸弹的袭击，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建筑物却严重受损。仅隔一天，一辆装载炸弹的汽车又在距日本使馆大门不到30米的地方轰然爆炸，使馆周围建筑受到严重破坏，20人受伤倒地。事件发生时，利马到处都插上了带有“光辉道路”标志的旗帜，猎猎舞动的旗帜犹如一面面招魂幡，搅得秘鲁人心神不宁。

当然，警方最不放心的还是潜伏在阿亚库乔山区崇山峻岭中的那一个个重新开始游击战的“光辉道路”的几千名成员。正如一名警官说：“我们砍掉了该组织的脑袋，但是它的整个躯体还是完整的。”极左思潮在秘鲁的边远贫穷地区的影响还是很大。十几年来，“光辉道路”控制了一些学校，在学校中开设宣传“光辉道路”的课程，影响遍及秘鲁的整个教育系统，甚至在利马的一些大学校园里都出现过“光辉道路”的标语口号和古斯曼的巨幅肖像。为了隔断“光辉道路”对教育系统的强大渗透趋势，藤森总统在1992年11月还专门下令，对进行叛乱宣传的教师处以无期徒刑。但是，长期被“光辉道路”灌输的极左思想并没有由此消除。在古斯曼被捕后，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告诉记者：“老师对我们说，古斯曼主席的被捕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我们的事业是无法阻挡的。”一位将军在秘鲁中部的一所丛林学校视察时，学生们对他的“欢迎”即是高唱歌颂“光辉道路”精神的歌曲。12月，警方又在首都利马查出6名教师，他们一直在一所大学的预科生学院里操纵一个“光辉道路”的活动小组。看来，藤森并非小题大作。一时后继乏力的“光辉道路”完全可以依赖他们成就斐然的教育成果，谁也不敢说这批对“光

“光辉道路”有着强烈好感的孩子中间不会产生出类似古斯曼的“恐怖天才”。呆在监狱中的古斯曼也并非死老虎。虽然警方费尽心机，践踏他在信徒中的偶像形象，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即使是对古斯曼深表失望的“光辉道路”成员也表示：“他在警方面前会如此驯服，这是对我们的沉重打击，我们很难过。看到‘光辉道路’的代表人物会失败，我们也很伤心。我们的组织是个大家庭，因此古斯曼的被捕就好像使我们失去了一家之长。但是大家庭还是要继续存在下去，一定会有别人来承担起领导的责任。使我们组织团结的是思想。我们崇拜古斯曼，但是指导我们行动的准则是贡萨洛思想。”这也就是说，即使警方能证明古斯曼是一个凡夫俗子，但是这个凡夫俗子却代表了至高无上的思想。上帝的代言人可以更换，但是上帝制定的法则却永远不可能被人打破。因此，如何处置古斯曼也是一个棘手的难题。本来判处古斯曼无期徒刑是为了加强“光辉道路”的挫折感，让崇拜他的人逐渐忘却其神圣的光环，但藤森没有料到，濒死的古斯曼，身上仍有“永生”的“贡萨洛”思想。即使按照新通过的秘鲁宪法判处古斯曼死刑，他也会成为一个不朽的英雄和偶像，被后继者所崇拜和敬仰，就如同古斯曼崇拜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一样。因此，无论古斯曼是被送往太平洋上的圣洛仑索孤岛上囚禁，还是被判处死刑处死，他所代表的极左恐怖主义幽灵仍在秘鲁到处游荡，打击恐怖主义仍是秘鲁面临的长期的任务。 献给天皇的“特别礼物”

1996年12月17日，秘鲁首都利马。

太阳西沉，夜色逐渐笼罩了利马这座充满南美风情的城市，晚风中处处洋溢着木薯酒馥郁甜美的浓香，利马这座现代都市开始了它的夜生活。

日本大使馆灯火辉煌，庭院里，各式日本宫灯闪烁着迷离醉人的光彩。大厅里，献筹交错，笑语欢声，完全是一派热闹景象。

日本驻秘鲁大使青木森久正在官邸款待八方宾客。12月17日是日本天皇的命名日，每一年的这一天，日本驻外大使都要在驻在国举行一年一度的盛大招待会。今年庆祝天皇63岁生日的招待会规模更为空前，出席宴会的人数高达800余人，被邀要人中除了秘鲁总统藤森以及他的众多亲眷外，还有不少国家驻秘鲁大使、秘鲁政府多位部长以及秘鲁的各界社会名流。青木森久穿梭于人群中，以特有的日本礼仪将晚会一步步地向前推进。尽管在晚会开始前，日本大使才得知，藤森总统因这几天要外出视察，这一次破例不能前来参加他每年都亲临的庆典会，但藤森的母亲、弟弟、妹妹及众多秘鲁内阁大员的来临同样使晚会声势不减，宾主都沉浸在日秘亲善的友好气氛中，青木森久的遗憾也很快消失了。从宾主乐意融融的笑脸与笑声中不难判断：晚会正步入佳境。

8点30分，似乎是为了使晚会的气氛更加热烈，官邸花园的围墙处突然连续响起6声巨大的爆炸声，硝烟弥漫处，只见一群头戴用五颜六色旗帜做成头套的蒙面人从洞口冲了进来，他们手提自动步枪与AK—47冲锋枪，喝令人们原地卧倒，同时投掷烟雾弹，迅疾逼近了宴会厅。与此同时，宴会厅里的几个侍者也变戏法般从蛋糕里取出武器，对企图抵抗的警察和保安人员发起了攻击。里应外合，这群人在15分钟内便控制了官邸两层楼所有出口。

爆炸，钻洞，射击，扣人，一连串动作干净利索，让人眼花缭乱。宴会厅里的宾客被这突如其来的情景惊呆了，他们还没有分清这是庆典精心安排的表演节目还是飞来横祸，就沦为蒙面人的阶下之囚。

500 余名宾客沦为人质！这是秘鲁人献给日本天皇陛下的“贵重礼物”。青木森久愣在那里，八方宾朋愣在那里，藤森总统的亲属愣在那里。他们都没有想到，本来是件喜事的庆典，转眼间成了一场祸事。而他们，本来是日本大使馆最尊贵的客人，现在成了绑架者手中最贵重的筹码了。

这是本世纪最大的一次人质事件。它是继 1979 年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占领后又一次外交使馆被占。与伊朗人质危机不同的是，那次事件中沦为伊朗人人质的仅限于美国使馆人员 54 名，范围也仅限于美国一个国家，而这次危机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劫持要人案件中，涉及高层人士数量最多的人质风波。身陷囹圄者有秘鲁政府的两位内阁官员，其中包括外交部长图德拉，农业部长穆尼亚斯特；还有最高法院大法官萨略·奇里诺斯，反恐怖主义警察司令，国家安全机构的将军，他们都是藤森政权的栋梁人物。此外，藤森总统的母亲、妹妹与弟弟也成了恐怖分子手中的筹码。除了中国、墨西哥、美国等国的大使因公事提前十余分钟退场外，前来出席招待会的德国、法国、巴西、玻利维亚、古巴、委内瑞拉、韩国等十几个国家的大使被一网打尽，日本驻秘鲁大使青木森久自然也不例外。在献给天皇的“贵重礼物”中，130 位日本人和日裔秘鲁人也“有幸”作陪。

美洲 33 国、全世界许多国家以及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里约集团纷纷发表声明和讲话，强烈谴责这起恐怖主义行为。12 月 18 日，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对秘鲁武装分子占领日本大使官邸事件发表声明，谴责这起恐怖行动，呼吁武装分子释放人质。安理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起恐怖事件，并称这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一次攻击”。在得知人质中没有美国人后，美国白宫发言人立即要求秘鲁不要与恐怖分子谈判。克林顿总统 18 日两次与藤森总统通话，表明他对事件的“关心”和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帮助解决这一危机的决心。美国政府已明确表示，它正在研究派出一个训练有素的“反恐怖突击队”。美国国务院说恐怖分子不仅是对秘鲁的威胁，而且也是对整个世界的威胁。自 1981 年以来，美国驻秘使馆已遭到 10 次爆炸和武装袭击。

日本政府对人质危机作出的反应最快。毕竟，事件发生在日本大使馆，被扣的大多为日本人，而且有迹象表明，恐怖分子这次是冲着日本来的，因此，日本各界对此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成立了针对此次事件的对策总部。桥本首相亲自挂帅，日本外相池田行彦 19 日乘专机飞往秘鲁，亲临前沿“阵地”，一方面与秘鲁政府进行协商，一方面与各国外交使团及当地日裔进行协调。从危机爆发开始，日本各主要电视台都把正常节目搁在一边，全力转播利马的情况，有的传播媒体一直在跟踪转播人质危机的全过程。被扣人质中日本人的名单、简历、职务都在电视屏幕上一一列出。仅确证人质数量就折腾了好几天。一向对自身安全很少担忧的日本人一夜间似乎成了惊弓之鸟，日本驻世界各国的大使馆都加强了警戒。

自然，受人质危机影响最大的还是秘鲁。秘鲁政府的日常工作完全陷入了停顿，国会两个星期内停止了活动，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件事上。这次人质危机引发了秘鲁的经济危机与政权危机。从 12 月 18 日开始，秘鲁股市快速下跌，去秘鲁旅游的人数迅速减少。正对自己在反恐怖主义战争中取得的成就志得意满的藤森真是吃了一闷棍，政治形象严重受损。1997 年 1 月份的民意调查显示，藤森的支持率已经从人质风波前的 70% 下跌到 40%。在秘鲁对 2000 年总统候选人的民意调查中，藤森的支持率跌到了利马市长阿尔贝托·安得雷斯之后，仅有 26%。

“打破沉默”

策划这一震惊世界的人质事件的是秘鲁的“图帕克·阿马鲁运动”，它与“光辉道路”是秘鲁两个最主要的游击队组织，后来也成为著名的恐怖主义组织。

“图帕克·阿马鲁运动”的源起远晚于“光辉道路”，其影响也要小得多。如果不是因为这一起人质事件，人们大概不大可能想起还有“图帕克·阿马鲁运动”这个恐怖主义组织，毕竟，连“光辉道路”都快被人们遗忘了，更何况这小小的“图帕克·阿马鲁运动”。影响虽小，但“图帕克·阿马鲁运动”与“光辉道路”是同一个祖先的产物，走的也是同样的道路。

“图帕克·阿马鲁运动”源起于1983年。其时，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早已消失，古巴革命也正经历着巨大的困难。因中央情报局的追杀，“游击战”理论的鼻祖、古巴革命者切·格瓦拉也已作古。60年代那种火热的左派时代，已经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但是，这个时候秘鲁却诞生了“图帕克·阿马鲁运动”。

“图帕克·阿马鲁”这个名字来源于印第安人何塞·曼努埃尔·孔多尔坎基。18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已经完成对印第安人的血与火的征服。何塞·曼努埃尔·孔多尔坎基率领印第安人揭竿而起，发动了反对西班牙殖民当局暴政的起义。他的母亲来自图帕克·阿马鲁一世家族，图帕克·阿马鲁一世曾是比尔卡班印加王国的君主，后来在反对西班牙的征服战争中为西班牙当局所害。何塞·孔多尔坎基仰慕先人无畏强暴的精神，因此自号图帕克·阿马鲁二世。不过，他的命运与他的祖先一样。1781年，起义失败了，他也死于西班牙殖民当局之手。图帕克·阿马鲁成了印加人无畏强暴、反抗强权的象征，因此，当维克多·波莱·坎波斯和他的战友们在为新组织命名时，自然想到了自己光荣的祖先，因此，“图帕克·阿马鲁”也就成为新组织的名字。

“图帕克·阿马鲁运动”自称以“马克思主义—格瓦拉主义”为指导。与绝大多数左派组织一样，“图帕克·阿马鲁运动”并没有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也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最终目标，而是根据秘鲁的“实际”，随心所欲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发挥”与“嫁接”，从而形成了一种非驴非马的怪物。它主张暴力革命，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实际上，除了在主张改变现状与马克思主义有所吻合外，其他地方根本看不到半点马克思主义的影子。即使是极左的格瓦拉主义，“图帕克·阿马鲁运动”也没有照搬。格瓦拉主张“游击战”，这一点它继承了。格瓦拉主张以农村为中心，在农村开展游击战，“光辉道路”也是这样主张的，而“图帕克·阿马鲁运动”为了标新立异，显示自己不同于“光辉道路”，却主张“城市中心论”，在城市搞“轰动性的游击战”，实际上就是搞恐怖主义。由于“图帕克·阿马鲁运动”主张改变现状，在秘鲁消除帝国主义的影响，因此，它对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下层人士、青年学生有一些吸引力。不过，“图帕克·阿马鲁运动”的吸引力远不如“光辉道路”，后者在全盛期曾达到1万人，而“图帕克·阿马鲁运动”充其量不过600人。为了扩大影响，坎波斯曾想把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的游击队组织联合起来，成立统一的“拉美游击队”，但没有成功。

俗话说，“宁为鸡首，不为牛后”，这句话用来形容“图帕克·阿马鲁运动”是再恰当不过了。据统计，秘鲁在80年代至1992年有3万余人死于暴力，平均每年达1800余起，但是这诸多的暴力行为，99%是“光辉道路”所为，能记到“图帕克·阿马鲁运动”名下的大约只有1%。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不过，“图帕克·阿马鲁运动”的恐怖活动，数量虽然不多，但确实也有几件干得轰轰烈烈。如1984年，它袭击了美国驻秘鲁大使馆，从而一战成名。1988年1月7日，它占领了“利马人民之声”广播电台和美联社驻利马办事机构。1989年10月4日，它绑架了秘鲁某广播电视经理埃克托·德尔加多·帕克尔。三个月后，它又暗杀了前任国防部长恩里克·洛佩斯·阿尔扎尔。为了抗议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它又向美国大使馆发射一枚火箭。看得出，“图帕克·阿马鲁运动”的矛头是指向秘鲁的达官贵人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

常在河边走，难免水湿鞋。初期的“图帕克·阿马鲁运动”并没有引起秘鲁政权的重视，直到其羽翼渐丰，秘鲁警方才对它警惕起来。1989年2月，在安第斯地区万卡约省的一家旅馆里，化名“罗兰多”的“图帕克·阿马鲁运动”最高领导人坎波斯在睡梦中被破门而入的警方抓获，此时的坎波斯还是舆论不太熟悉的“罗兰多同志”，但他很快就让秘鲁各媒体刮目相看了。

坎波斯被关在坎多·格朗德监狱，这是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有“秘鲁最安全监狱”的美称。它地势陡峭，围墙皆以坚实的花岗岩砌成，许多花岗岩有几吨重。监狱除了派重兵驻守外，还拥有各种现代化的监视装置和应急装备，秘鲁警方声称其固若金汤。然而，“图帕克·阿马鲁运动”的军师奈斯特·塞尔帕·卡托列尼却把坎波斯从固若金汤的监狱中救了出来，这次人质危机的策划者与实施人也是他。在“图帕克·阿马鲁运动”中，他的地位虽然比不上组织创始人坎波斯，但“图帕克·阿马鲁运动”的几次较大的武装活动都是由他精心组织并付诸实施的。“图帕克·阿马鲁运动”如果离开了卡托列尼这颗冉冉上升的恐怖“明星”，那它的影响显然要大打折扣。而且，自坎波斯被捕后，他已经名正言顺地成了“图帕克·阿马鲁运动”的领导人。

卡托列尼1953年出身于利马一个工会积极分子的家庭。1970年他父亲失业后，他即子继父责，担起了赡养家庭的重任，在一家智利人开的丝织厂当工人。没过多久，他非凡的组织才能就在厂中崭露头角，很快他当选为工会主席。1978年，智利资方私自裁减员工，卡托列尼带领250名工人进占工厂。这场劳资纠纷僵持了近一年时间。1979年2月，700名警察采取强硬行动，冲进工厂，卡托列尼率领工人与警察大打出手，警方开枪打死了六名工人，罢工事件以失败告终。此后，卡托列尼以涉嫌谋害警察被关进了卡亚俄监狱。卡托列尼领导的这次工潮虽然时运不佳，但是他已经让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曾经出面调停劳资纠纷的秘鲁国会议员约维尔·迪亚兹·坎塞科在谈及卡托列尼时，还心有余悸地说：“他意志十分坚定，又好斗成性，真是个闹事的主。”

对于卡托列尼而言，这次工潮惨痛的教训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他不再信赖依靠工会去斗争的和平手段，很快从一位工会领导人转变为“以暴易暴”的激进反政府分子。同年12月，他因大赦获释。几个星期后他就策划了一场占领联合国驻利马办事处事件，并且领导了一场绝食抗议活动，最终迫使秘鲁政府释放了其它在押人员。

在利马期间，卡托列尼结识了“图帕克·阿马鲁运动”的龙头老大坎波斯，此时的坎波斯正在筹划着把四个左派组织拼凑成一支统一的反政府武装，卡托列尼与坎波斯惺惺相惜，趣味相投，不久卡托列尼就成为“图帕克·阿马鲁运动”的马前卒、坎波斯忠贞不二的谋臣与斗士。

由于卡托列尼抢劫银行、轰炸肯德基快餐店等一系列显赫“战功”，卡托列尼甚至先于坎波斯成为警方的通缉对象。为了避风头，卡托列尼躲到秘鲁圣马丁省偏远的塔拉波托镇，在那里，他将由哥伦比亚的“四·一九运动”、厄瓜多尔的阿尔法罗和“图帕克·阿马鲁运动”共同组成的国际恐怖组织“美洲营”改建成“图帕克·阿马鲁运动”的东北支队，拥有数百位手持AK—47冲锋枪、身着迷彩服的信徒，大大增强了“图帕克·阿马鲁运动”的武装力量。这一阶段，可谓卡托列尼事业与爱情喜获丰收的好时光。他的好友劳尔·吉尔瓦尼奥的妹妹南希·吉尔瓦尼奥与他刚刚相识，就倾心于他那独特的男性魅力，很快与他共浴爱河。后来南希干脆放弃了在利马某大学读书的机会，跟他走进了深山密林，成了他的“压寨夫人”。结婚后，南希为卡托列尼生下了一男一女，却无暇照料他们，因此把孩子交给自己的妹妹照顾，她自己则责无旁贷地走街串镇为卡托列尼搜集情报，后来还为了卡托列尼的“事业”被判处终身监禁。很难说清卡托列尼究竟有多大的游说能力。一个专门研究南希·吉尔瓦尼奥的记者说：“她曾经是个爱玩的小姑娘，但自从加入‘图帕克·阿马鲁’后她就把这一切抛至脑后。尤其是她的两位兄长遭逮捕后她俨然变成了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南希的巨大变化除了其兄妹情、夫妻情及阶级恨外，恐怕还得在卡托列尼身上寻根觅源吧。

卡托列尼从圣马丁省的深山老林走向城市后，愈加如鱼得水，他所代表的最残暴、最激进的政治路线在“图帕克·阿马鲁运动”中得到强化。1990年1月秘鲁退役部长恩里克·洛佩斯·阿布扎尔被暗杀就是卡托列尼“出山”之后的一次“杰作”。当时阿布扎尔身中15枪，还未来得及辨明枪声来自何处，就命赴黄泉。当然，真正使卡托列尼扬名的当属营救坎波斯的行动。这一次卡托列尼的策略是使坎波斯从“地下”走上前台。他派出几十名部下在坎多·格朗德监狱下挖了一条长达250米的地道，通向关押坎波斯的牢房，在趾高气扬的秘鲁监管人员的眼皮底下把人救走了。此后，坎波斯与卡托列尼名声大振，“图帕克·阿马鲁运动”的声势也日益壮大。他们更为频繁地出击，抢劫银行，绑架企业主，甚至袭击秘鲁军队。在自己的大本营里，他们还设有“人民的监狱”。这些监狱一般狭小逼仄，肮脏龌龊。许多企业家被绑架后都被投入这个监狱，在其家人拿出巨额款项后才能解除审判。审判期间，他们还常对“被审”对象滥施刑罚，并“赏之以饿，赐之以渴”，而他们唯一的罪恶就是过于有钱。有一位商人就这样被活活饿死。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坎波斯与卡托列尼对自己实力的过高估计，点燃了“图帕克·阿马鲁运动”衰亡的导火线。为抢夺地盘，他们不断与“光辉道路”火并，由于双方力量过于悬殊，“图帕克·阿马鲁运动”主力尽失，元气大伤。除此之外，不时见诸报端的恐怖活动也使人们认清了它的真面目，使他们丧失了长期处于蒙骗下的些微群众基础。此时，又正值藤森用铁腕手段彻底围剿恐怖组织、消灭恐怖主义的关键时期。1992年，坎波斯为他的名声付出了代价。藤森总统宣布“图帕克·阿马鲁运动”与“光辉道路”一样为恐怖组织，并专门修改了刑法，把两组织的恐怖活动列为“背叛祖国罪”。根据秘鲁宪法第159条，恐怖分子的惩处可以是无期徒刑，还可以是死刑。

与宪法的巨大威慑力相辉映，议会通过了《悔过自新法》，劝诱两大恐怖组织成员投诚。在藤森“胡萝卜加大棒”的夹攻中，大批游击队员离开了“图帕克·阿马鲁运动”，坎波斯一蹶不振。在秘鲁军队的缉捕中，坎波斯再次被擒，旋即被关进了秘鲁某海军基地一个坚固无比的钢筋混凝土地下掩体，与他的老对手、老伙伴——“光辉道路”的创始人古斯曼成了一对同命鸳鸯。1993年4月3日，坎波斯同先期被捕的“图帕克·阿马鲁运动”二号人物彼得·卡德纳斯一同被判处无期徒刑。这意味着“图帕克·阿马鲁运动”在重新创造奇迹救出坎波斯之前，不得不选择新的领导人。1994年初，米格尔·林孔和卡托列尼成了该组织的新头目。

林孔和卡托列尼走马上任后的第一件要事就是营救坎波斯。这一次他们没有准备挖地洞，也没想搞空中营救，而是选择了一条更方便、更简捷也更保险的捷径：扣压人质，以要挟政府释放坎波斯及其同伙。这次，他们选中的筹码是全体国会议员。卡托列尼深知，非这些国会议员不足以让藤森让步。

1993年11月30日10时，秘鲁国会大厦与往常一样庄严肃穆。在其入口处，照例簇拥着一群记者，众多须眉中有两位女子，自然特别惹人注目。一位皮肤黝黑，身材窈窕，她的名字叫南希·吉尔瓦尼奥，她就是卡托列尼的妻子，与她的丈夫一样铁石心肠，可是她现在的身份是某通讯社的记者。另一位是美国人，金黄卷发的洛丽·布伦森。两位女子看起来势单力薄，但抢新闻的阵势却让众多男记者相形见绌。她们当仁不让地挤靠在最前面，试图率先进入国会大厦。没有料到的是，大门开后，她们没有抢到独家新闻，自己却创下了一条特大新闻：10时30分左右，两个女恐怖分子在国会大厦作案时落网，其中一位是“图帕克·阿马鲁运动”现任领导人的夫人。第二天早上，刊登这条消息的报纸还没有付印，秘鲁反恐怖部队又扩大战果，顺藤摸瓜，端了“图帕克·阿马鲁运动”在利马的一个老巢。经过11个小时的激烈枪战，秘鲁反恐怖部队打死四名恐怖分子，抓获了新近担任“图帕克·阿马鲁运动”要职的米格尔·林孔与21位骨干分子，卡托列尼本人因躲在利马的另一个据点而侥幸逃脱，不过，这一次他是真正赔了夫人又折兵。

警察在生擒南希·吉尔瓦尼奥后如获至宝。他们对她软硬兼施，甚至动以重刑，想撬开她那张铁嘴，但最终一无所得。南希·吉尔瓦尼奥和布伦森、林孔被军事法庭判以终身监禁，收押在秘鲁南部安第斯山脉中一座海拔4000米高处的坚固监狱里。

卡托列尼撤出“图帕克·阿马鲁运动”在利马的最后一个据点。但蜷缩一隅、四面楚歌的卡托列尼并没有偃旗息鼓，更没有金盆洗手，相反，他迅疾开始了新的策划。1996年2月，秘鲁一份左派反对派报纸《共和国晨报》收到卡托列尼的一盘磁带，磁带中卡托列尼以低沉而沙哑的嗓音宣告：“图帕克·阿马鲁运动”将继续用扣押人质的方式来使其组织成员获释。这无疑向秘鲁警方进行赤裸裸的挑战。遗憾的是，凯歌高奏的秘鲁情报部门却认为这是丧失恐怖能力的“图帕克·阿马鲁运动”领导人的痴人说梦，理由很简单，这个组织已经彻底瓦解，根本不可能再组织任何恐怖活动了。秘鲁声名显赫的反恐怖机构负责人马克西姆·蒂亚斯将军在9月份公开表示：秘鲁国内的恐怖主义活动尽管存在，但已不再对国家构成威胁。秘鲁当局低估了卡托列尼的能量，在12月17日之后漫长的126天里，他们将不得不品尝卡托列尼的“瘦马余威”，个中滋味，只有他们自己才能言说了。

被宣布业已灭亡的卡托列尼静静地蛰伏在他的老巢中休养生息，在追昔

抚今的感触中，他似乎感到“图帕克·阿马鲁运动”这几年来过于“沉默”了，以至于如今几乎被人遗忘。中国有一位老人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他卡托列尼不爆发就罢了，一爆发就必须让秘鲁，让藤森，也让世界地动山摇，重新认识什么叫“图帕克·阿马鲁运动”。他开始了新的谋划，并将这项行动取名为“打破沉默”。

至于为何选择日本大使馆，卡托列尼也有自己的见解。他在大使馆得手后曾向新闻机构发送过传真，向秘鲁政府提出了四项条件：一、提高大多数国民的福利，藤森政权要保证重新研究现行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二、释放关押在狱中的“图帕克·阿马鲁运动”成员450余人；三、护送进入日本大使馆的游击队员，到其大本营所在地亚马孙地区，并保证其安全撤离；四、政府向游击队方面支付“战争税”，主要指在1990年藤森总统上任后对“图帕克·阿马鲁运动”发动全面围剿中战死的游击队员的抚恤金；此外，卡托列尼还声称“日本一直对给秘鲁大多数人民带来悲剧的藤森总统给予支持”，对日本大使馆的占领也是对日本政府错误行为的“严正指责”。19日中午，“图帕克·阿马鲁运动”还通过秘密电台发表了一则公告，谴责日本多年来干涉秘鲁的内政，以及日本对秘鲁经济的摧毁性改革。看来，选择12月17日在日本大使馆发难是早有预谋，其用意也昭然若揭。卡托列尼预计能在这里抓住秘鲁总统藤森，以其作为与秘鲁政府讨价还价的重要砝码，最终使其同伙被释放，以便东山再起。

日本大使馆被卡托列尼慧眼相中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不满藤森政府现行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贫富悬殊差距拉大的社会现实。藤森上台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恐怖主义，使秘鲁的社会秩序明显改观，为此藤森自豪地宣布：“秘鲁反恐怖主义已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在经济发展上，藤森的经济政策也卓有成效。秘鲁的通货膨胀由1990年的7600%下降到95%，经济增长率由5.4%达到7.7%，1994年曾创纪录地达到12%，与那一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奇迹遥相对应，成为当年世界经济发展中一颗耀眼的“新星”。藤森本人也赢得了“恐怖分子的克星、穷人的救星”的美誉。1995年藤森第一届总统任期结束后，以高达64.42%的得票率获胜，成为秘鲁历史上第一位连选连任的民选总统。踌躇满志的藤森准备在新的任期内充分展示其才华，进一步实现其远大政治抱负，但积弊过深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却接踵而至。在藤森发动“自我政变”后，舆论进行了严厉谴责，许多西方国家均中止了对秘鲁的经济援助，秘鲁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慢，即使藤森寄予厚望的1996年，预计增长率也只能是2%。而秘鲁每年超过20%的失业率却在等待藤森政府去妥善处理，此时，藤森把解决诸种问题的砝码押在与他有“血亲”关系的日本身上。实际上，自从藤森出任秘鲁总统以来，日本一直是秘鲁最大的经济援助国，1991年日本对中南美的援助中秘鲁所占比例最高。就在西方停止对秘鲁的援助后，日本对秘鲁仍是“不改初衷”。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秘鲁对日本的各种依赖关系也逐年加深了。藤森担任总统六年以来，几乎每年都要访问日本。日本驻秘鲁大使青木森久在秘鲁的影响之大、涉足之广、插足之深，也是其他国家的大使不可望其项背的。他是藤森总统的座上宾，秘鲁的重要庆典活动他都会参加，而且会作代表性的讲话，青木的这种地位，即使是美国大使也不能与之比肩。要知道，秘鲁是拉丁美洲的一员，与日本相距千山万水，而拉丁美洲却历来是美国的后院。当年，美国总统门罗通过一纸宣言把头号殖民帝国英国逐出拉美，它又怎能容忍日本对秘鲁的染指？

可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华盛顿对日本的所作所为一直隐忍不发。这对那历来喜欢发号施令、对别国事务指手画脚的美国来说，已经是够大度的了。

但是，华盛顿可以对藤森政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秘鲁人自己可忍不住了。在日本的经济援助问题上，秘鲁国内有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一派认为，日本的援助有助于秘鲁的经济振兴，秘鲁的繁荣离不开日本的经济援助。另一派认为，日本的援助只是使秘鲁国内少数人受益，大部分秘鲁人依然贫穷，秘鲁原有的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就这样，日本的经济援助分裂了一个完整的秘鲁，或者说使一个本来就不完整的秘鲁分裂得更厉害了，亲日派拥护藤森总统，视之为秘鲁的救星、秘鲁新时代的希望；反对派的态度正好相反，认为亲日派总统不能解决秘鲁国内的问题，反而会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镇压国内的反政府武装。为了对抗政府的亲日政策，反对派甚至拿日本人出气。1990年以来，秘鲁已经发生了12起袭击日本大使馆和日本企业事件。1991年7月，甚至有3名日本技术人员在利马被杀，杀手是谁不得而知。历来善于蛊惑人心、蒙蔽视听的卡托列尼显然是抓准了秘鲁人广泛但隐秘的深层心理，将“反帝国主义”的“图帕克·阿马鲁运动”的“革命”大旗从美国大使馆移到了日本大使馆。从这一点来说，卡托列尼不仅是一个军事奇才，还是秘鲁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家。

卡托列尼攻击日本大使馆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日本被世界称为最容易在恐怖分子面前屈膝的国家。面对如洪水泛滥的恐怖活动，许多明智的国家早已达成共识：满足恐怖分子的要挟，只能导致更多的恐怖事件，“绝不向恐怖主义屈服”成为全世界针对恐怖活动的通行做法。但是，世界上这么多国家，不可能在一个问题上的看法总是一致的，链条总是在它最脆弱处被击碎。日本，就是这根链条中最脆弱的一段。恐怖分子总能在日本人身上频频得手。1974年1月，一批恐怖分子冲进日本驻科威特大使馆，将日本大使和其他28人扣为人质。日本政府马上遵从恐怖分子之命，调用一架日航喷气式客机飞往科威特，再到新加坡接回作案未遂逃入公海的5名同伙，将他们一起送到了南也门。1975年8月，日本恐怖组织“赤军”派出五人突击队到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一举占领了美国领事馆和瑞典大使馆，要求以50名外交官的生命换回7名关押在日本的“赤军”分子，并派一架DC-8型飞机将所有人员一起送往利比亚。最后，他们也如愿以偿，一个折扣都未打。1977年，美国第一流的银行家、卡特总统的密友约翰·卡布里尔在乘坐巴黎飞往东京的日航DC8型客机时被“赤军”劫持，150名乘客与机组人员也同时被囚。事后日本政府乖乖地按“赤军”提供的名单释放了九名犯人，并交出了600万美元赎金。1986年11月，日本三井物产公司马尼拉公司经理在菲律宾遭绑架。136天后，恐怖分子从他身上勒索到了250万美元。日本一名高级警官曾无可奈何地总结道：“我们就像一群驯服的马驹，而鞭子却操在恐怖分子手中。”这句话颇具讽刺意味。曾几何时，面对在南京大屠杀中死于非命的30万冤魂，日本某些政客可以矢口否认；对日本当年的侵略行径，日本政府也可以轻描淡写；对受害者要求赔偿的要求，日本政府可以大声说“不”，可是，对恐怖分子的要求，日本政府却不敢说半个“不”字，恐怖分子只要挥挥鞭子就可以任意驱使了。就在秘鲁人质危机发生前四个月的1996年8月10日晚，日本三洋电气公司美国公司的总裁金野卫在墨西哥蒂华纳参加了一场棒球赛后，返回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寓所时遭绑架，九天之后他毛发未损获释。不是恐怖分子对日本人特别人道，而是因为日本

人痛快地掏出了 3200 万美元。钱财是身外之物，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只要有一口气在，还怕有“经济动物”之称的日本人赚不到钱？

对这些往事，作为恐怖分子的卡托列尼也是烂熟于心的。他心里最清楚，袭击日本大使馆意味着什么。这一次，卡托列尼又高高举起了鞭子，让日本朝野去折腾吧，仅这一点就够藤森受的。

126 天的意志考验

人质危机发生后，大使馆附近的街道俨然成了堡垒森严的作战前线，武装直升机在低空盘旋，坦克炮直指大使官邸，官邸周围由沙包、铁簇篱交织成严密的封锁线，身着防弹衣、头戴钢盔的军警将大使馆围得水泄不通。使馆附近的制高点上，秘鲁警方的狙击手枕戈待旦，注视着使馆内的一举一动。

这一夜，藤森总统更是难以合眼。事件发生后两小时，他即与三军司令和其他重要阁员进行了磋商。会上，主张用武力迅疾解决的强硬派与主张“和平谈判”的温和派争执不下，就是藤森本人也摇摆不定。他想起了哥伦比亚 1985 年的一次事件。那一次，恐怖组织“四·一九运动”占领了司法大厦，300 名政府官员沦为人质。哥伦比亚政府决定采取暴力手段解决危机，两小时后军警发起猛攻。恐怖分子以为，众多人质落在他们手中，政府不敢轻易动手，思想极度麻痹。政府的行动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因此，营救人质的行动取得了成功。藤森觉得，攻其不备，虽不失为解决人质危机的“速效胶囊”，但仍是一个险招，而且付出的代价可能极为惨重。当时的哥伦比亚总统贝但库尔一边品尝 30 余名恐怖分子被歼灭的胜利果实，同时也不得不接受死伤 28 名政府要员的惨痛现实，包括最高法院院长阿方索·雷那斯在内的 28 名高级官员在枪战中死于非命。他们是死于恐怖分子之手，还是死于哥伦比亚政府军之手？相信阿方索·雷那斯至死还在询问这个问题，但谁能给他一个答案？何况，藤森的胞弟、胞妹和母亲都落在恐怖分子手中，一旦政府军发起强攻，难保恐怖分子不会拿他们出气。更严重的是，这次人质危机，不仅仅是秘鲁的内政问题，被囚人质中，涉及 14 个国家的大使，这个分量可不轻啊。万一这些国家的使节有个三长两短，他能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吗？如果惹出什么国际纠纷，他藤森可就成了千古罪人了。

如果满足恐怖分子的要求，放了坎波斯等人，情况会怎么样呢？他自上任以来，就推行严厉镇压恐怖活动的政策，而且取得了不少成绩，其政绩蜚声秘鲁国内外。如果他在压力面前屈服，那不啻是自打耳光，肯定会严重影响其政治形象。藤森是无论如何不愿出现这种结局的。

可是，如果不低头，那就要采取武力解决，派突击队进攻大使馆。但是，根据国际法，大使馆是日本领土的自然延伸，秘鲁政府要采取任何行动，事先都必须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而日本向来是情愿妥协的。再说，恐怖分子要求释放的犯人与日本没有关系，而恐怖分子扣留的人质却大多是日本人，要让日本政府同意秘鲁的要求，确实是难上加难。

一夜未眠。藤森思前想后，反复比较与权衡各种可能的后果，还是难以最后的决心。但时不待人。天就要亮了，恐怖分子还在等着政府的答复，而政府阁员还在等着总统的决定。无奈，藤森想出了一个“拖”字术，尽量与恐怖分子周旋下去，不让他杀人，能拖多久就拖多久，慢慢想办法。卫生部长多明戈·帕莱罗莫出马，作为政府的谈判代表，具体实施这项战术，争

取和平解决危机，保证人质生命安全。

藤森竟然不亲自出面参与谈判，而只让一个无足轻重的卫生部长出面，这种姿态让卡托列尼十分气愤。现在人落在我们手里，你藤森竟然还这么强硬！卡托列尼气坏了。他气急败坏地说要首先处决外交部长，以示惩戒。后来，这个“惩戒”活动没有付诸实施。毕竟，双方都在僵持之中，都在摸对方的底，过早地亮出底牌，对自己不利，因此，卡托列尼隐而不发。

藤森遇到了麻烦，卡托列尼似乎日子也不好过。他没有想到这次出击会抓到这么多人质。人质多也有烦恼，十几支枪对着 500 多人，万一人质骚动起来，他们可应付不了。一旦枪杀人质开始，人质见没有生还希望，那肯定是要与他们拼个鱼死网破的。到那时，局面将难以收拾。而且，他们此次行动的目的不是杀人出气，而是为了营救关在狱中的坎波斯和南希。杀了人质，藤森还会让坎波斯他们活着走出监狱？思忖再三，卡托列尼决定，忍耐一下，不要冲动。他向急于杀人的同伴解释说：“我们的目的不是杀人，而是通过谈判释放我们的战友，所以不能执行死刑。”

关的人太多了，使馆里难以容纳。而且，此次落网的有 14 国大使，卡托列尼不想树敌过多，因此，18 号上午，卡托列尼首先释放了德国、希腊、法国和加拿大四国大使，一名秘鲁外交部的资深外交官也获得释放。他们获释的条件是组成一个“谈判团”，负责把卡托列尼的四项“建议”传达给藤森政府，实际上是让他们充当信使。8 时 40 分，加拿大大使手举一张白纸，与他的四位同道走出了日本大使馆。他们立即被新闻记者包围了。迎着耀眼的镁光灯，他们宣读了卡托列尼草拟的声明。声明要求与政府谈判解决危机，并表示尽量不流一滴血，但这一切主要取决于藤森的态度。午夜时分，德国大使在国际红十字组织两名成员的陪同下重返使馆，带回了秘鲁政府“放下武器，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的“反建议”。这个“反建议”又一次惹恼了“图帕克·阿马鲁运动”武装分子，他们再次发出死亡威胁：“如果今晚藤森不来谈判，我们将拿秘鲁外长图德拉开刀。”

19 日中午，秘鲁当局不得不让卫生部长多明戈·帕莱罗莫与卡托列尼指定的谈判代表进行秘密会谈。谈判结束，双方都声称已就如何释放人质及一些谈判规则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此后，国际红十字会的调停人在日本大使馆进进出出，穿梭协调。他们还为人质送去 3500 份食品、20 台电风扇、一大堆卫生纸、10 副象棋和一些药物。卡托列尼还允许红十字组织派一个医生给人质做检查，并让他为一个受伤的“图帕克·阿马鲁运动”战士作了手术，此举大大缓和了使馆内的紧张气氛，很多人质都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这一切似乎预示，这场人质危机有望得到解决了。

卡托列尼对此并没有掉以轻心。他一边命令敢死队员们把手榴弹与其它爆炸装置挂在身上，并在官邸内的重要位置安置更多的地雷与饵雷，以便能在警方的突然袭击中导致“规模空前的大爆炸”，一边也在寻求解决人质危机的“捷径”。他采取的方法是“视藤森态度”而不定时地释放人质。这既可以让国际社会看到自己谈判的“诚意”，让一些国家去向藤森政权施加压力，争取“和平解决”，也可以缓解众多人质给自己带来的巨大看管压力，放掉一些与秘鲁当局关系不大的“小虾米”，而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人质中的“大人物”们身上，最终让秘鲁当局在国际压力下，为了保护显要人物的生命安全而选择长期等待而不是试图使用武力。

20 日上午，卡托列尼又释放了第三批人质，让四名步履蹒跚的老弱病残

者获得了自由。中午时分，秘鲁电视台宣读了藤森总统在人质事件后的首次公开讲话。藤森表示：“人质的安全是我考虑的首要问题，我将尽最大努力争取危机的和平解决。”电视台还宣读了藤森给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一封信。信中说，目前他不会采取草率的军事行动。虽然已有一些外国的特种部队抵达利马愿意主动提供帮助，但这一危机将完全由秘鲁政府自己来解决。20日下午，秘鲁政府内阁会议作出决定：拒绝恐怖分子提出的释放“图帕克·阿马鲁运动”全体被囚人员以换取全部人质的先决条件，但可以继续展开谈判，并为被关押的“图帕克·阿马鲁运动”若干成员提供一些宽松条件。

21日，卡托列尼释放了38名人质，其中包括巴西、韩国、埃及大使和秘鲁国会议员哈维尔·坎塞科。坎塞科还带回一份卡托列尼的声明，声明敦促秘鲁政府加快谈判速度，以便人质危机能尽快得到解决。在双方“愿意坐下来谈判”的前提下，秘鲁政府与卡托列尼就“释放谁”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是恐怖分子先释放人质，还是政府先释放被囚的“图帕克·阿马鲁运动”武装分子？22日上午6点16分，卡托列尼从日本驻秘鲁大使官邸一幢楼的窗口中丢出一个纸团，上面有“图帕克·阿马鲁运动”武装占领人员所使用的便携式对讲机的频率，同时还要求与利马电视台4频道建立“热线”联系。在“热线”接通后，卡托列尼说：“今后的几天内我还将继续释放一些与秘鲁政府没有多少关系的人质，至于如何处置与秘鲁政府有关的人质，要看秘鲁当局的态度。”他重申，只要关押在监狱里的伙伴获释，他们愿意放下武器。从这个声明可以看出：卡托列尼虽然放弃要藤森亲自出面谈判的条件，但要求用人质换取其在押成员的立场没有任何动摇，这也是他本次行动的根本目的。被关押的秘鲁外交部长和日本大使青木森久也通过对讲机要求秘鲁政府慎重考虑劫持者的条件，并婉转批评了秘鲁政府不与恐怖分子直接见面而只是依赖几个被释放的外国大使作中间人的谈判方式。被胁迫的部长与大使语调平静、稳定，仿佛是在进行日常的广播发言一样。

藤森总统迅速对“对讲机谈话”作出反应。12点，他突然出现在国家电视台，但此次公开谈话的内容却与20日大相径庭了。他态度坚决地表示，秘鲁政府决不与人质劫持者讨论和平与协议，人质在枪口下是无法商讨和平的。只有恐怖分子将武器交给一个专门委员会并释放所有人质，才有可能排除政府采取武力手段的可能性，才能研究如何给他们一条出路。秘鲁政府不能接受一支恐怖队伍强加给2300万秘鲁人的暴力行为。

藤森的这番讲话与卡托列尼的期望显然是南辕北辙。卡托列尼气急败坏，立刻给法新社驻利马的办事处发出一份传真：“如果秘鲁总统下令武力解决人质事件，游击队也将下令对整个秘鲁国上上的军事和非军事目标发动袭击。”显然，卡托列尼又一次向秘鲁当局发出警告：“图帕克·阿马鲁运动”的力量并不只存在于日本大使馆，在秘鲁的各个地区仍有一批游击队员们在伺机而动。

此时，被释放的人质先后已达二百余人，可是使馆中剩下的三百多人质的生活环境却严重恶化了。他们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共用一个卫生间，而供水却不能按时保证，日本大使馆内许多房间都成了临时卫生间，卫生状况极差，随时可能爆发如霍乱之类的传染病。住房也拥挤不堪，闷热异常，胃病、心脏病等各种病症严重威胁着人质的健康。食品也不够，有时得四个人分一份食品。被扣押的人质纷纷从窗户中打出用日、德、英、西等文字写的标语，要求外面的人多送水和食物，恢复照明，恢复通风，让他们与家人联系，同

时要求秘鲁方面允许日本记者进入使馆采访游击队员。在大使官邸外，一些人质的亲属试图自己将食品、药品及衣物带给亲人，他们的呼唤声和警察的威吓声混成了一片。不少人质的亲属甚至走上街头游行，要求政府正式声明放弃武力解决人质危机的想法。

迫于卡托列尼与人质亲属的双重压力，秘鲁政府重又通过对讲机声明：只要恐怖分子不枪杀人质，秘鲁政府愿意就和平解决一事进行进一步谈判。

这次“硬碰硬”的谈判风波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晚上9点左右，日本大使官邸的大门突然打开了，由秘鲁前劳工部长领头的四个人质出现在大门口。大约过了5分钟，二百多名人质排成一列也缓缓地走出了大门，三辆大巴在夜幕中接走了这批喜极而泣、惊魂难定的人质。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普遍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即利马医生称之为“利马效应症”的“怪病”，他们一边哭泣一边诉说绑架者待他们怎么好，似乎道不尽说不完的是对绑架者的不杀之恩的满腹感激之情。

当然，卡托列尼的“恩典”依然是有条件的。他说释放这批人质是圣诞节之际做出的一个友好姿态，是鉴于秘鲁政府22日发表声明的新态度。他同时指出：秘鲁政府必须安排他们前往某个拉美国家，并将扣押的人质作为其俘虏与他们一道行动。除非他们被关押的同伙得到释放，他们将不再释放人质。至此，被扣在日本大使官邸的人质主要是秘鲁政府的几位部长和司法军警要员，以及拉美、亚洲国家的外交官和若干日本商业、企业界人士，藤森总统的胞弟也在其中。

随着大批人质的获释，藤森总统的压力更大了。通过释放人质，卡托列尼已经在这场危机中先得一分。在危机之初他是人人咒骂的恐怖魔头，但随着其频频摇动“橄榄枝”，他在公众舆论中俨然成了可以放心地与之协商解决问题的和平天使。不少公众对于“和平解决”秘鲁危机更寄与厚望。而对藤森来说，在危机发出之初，他本来是倾向于用武力制服的强硬派。他对《时代周刊》记者反复地诉说：“你怎么能让我去与这些罪犯谈判？我不会放过这些人的，永远不会。”但随着卡托列尼施展连续释放人质的怀柔政策，藤森却深感问题棘手。他不断警告国内外倾向于“和平解决”的人们：“如果你们熟悉恐怖分子，就不会对他们抱有幻想。”他反复强调不与恐怖分子妥协，声称要与恐怖分子打持久战，直至其疲惫时出其不意地制服他们救出人质。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地对卡托列尼作出让步，从开始不谈判的强硬态度过渡到派出卫生部长去交涉；从开始决不与恐怖分子作交易转向公开表示，如有哪个国家愿意接纳恐怖分子，他可以让他们平安离境。他甚至亲自充当说客，出访玻利维亚，想劝说玻利维亚接受这批“出口”的恐怖分子，并责成秘鲁军方制定一个“紧急空运计划”，让恐怖分子安全离境。

藤森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实际上是国内外“强硬派”与“温和派”不断施加压力的结果。日本政府从一开始就不主张藤森采取任何激烈的、后果“可能是严重的”军事行动。桥本首相和池田外相一再表态，首要问题是保证人质的安全，因为人质所面对的是一群有刀有枪有炸药的恐怖分子。在卡托列尼多次释放人质之后，东京政府更是直接表示，希望秘鲁政府与卡托列尼达成幕后交易，释放被囚游击队员，确保他们重返森林地带，但藤森强硬的态度却使日本说客铩羽而归。池田几次与秘鲁方面进行商谈，但最后都是不欢而散。日本政府发言人尾三静六在20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也说：东京和利马就如何处理秘鲁人质危机的立场相距甚远，这些分歧拖延了危机解决的进

程。除此之外，日本与其他国家之间就如何解决这场危机也存在着微妙的分歧。尾三静六所称的“其他国家”显然是指美国。美国政府在对待人质危机的态度上与日本正好相反。危机之始，美国就把解决危机视为挽救美国对秘鲁影响渐趋式微的一个良机，从克林顿的口头发话到美国派遣的“安全专家小组”和从巴拿马迅速调动60名“三角洲特种部队”官兵待命，无不显示美国政府对此次危机异乎寻常的关心。值得一提的是，“三角洲”部队是1979年美国驻伊朗使馆被占领之后创建的，其任务主要是反劫持。自从1979年伊朗学生占领大使馆后，美国驻外机构一直太平无事，“三角洲”部队无所事事，没有想到18年后却在利马日本大使馆派上了用场。美国国务院在确认人质中没有美国人以后，就不断向秘鲁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藤森政府不要向恐怖分子低头，并称美国将是秘鲁打击恐怖主义的坚强后盾。而对美国在人质危机上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的气势，日本政府曾公开告诉秘鲁当局“日本政府反对外国进行军事干预”，此指向再明显不过。

在秘鲁国内，藤森政府中的文官们大都倾向“和平解决”。他们认为藤森上台后秘鲁经济虽出现过快速启动，但是其经济改革并未能真正改善下层人民的贫穷状况。据官方保守的统计数字，47%的秘鲁人生活在贫困环境中。按秘鲁的平均生活标准而定，每个秘鲁人每月的基本衣食住行开支应为400美元，但秘鲁某些人的最低工资仅175美元，劳工阶层尤其入不敷出。正因为贫富悬殊，“光辉道路”与“图帕克·阿马鲁运动”才能够争取到相当一部分劳动人口的支持。这次“图帕克·阿马鲁运动”死灰复燃就是明证。其更直接的后果是把秘鲁经济驱赶到死亡的绝境。因此，文官们认为应尽快地“和平解决”危机，使经济复苏与恢复政治稳定是藤森的当务之急。但是，秘鲁军方对危机的态度又与文官们完全相反。他们的立场一直十分强硬，不主张向卡托列尼作丝毫的让步，对于他们的态度，藤森也不敢掉以轻心。无论是他七年前登上总统主座，还是五年前发动“政变”，军方一直是藤森的得力帮手。可以说没有军方的支持就没有他藤森的昨日辉煌。但是在危机爆发前一个月，藤森与军方的紧密关系出现问题。当时他赦免被起诉私通民兵组织的前将领罗布尔斯，引起军方的强烈不满，军方一度与政府处于严重对峙的局面。藤森正待时机去弥补这一裂缝，不料，屋漏偏逢连夜雨，人质危机爆发了，又在他与军方之间立起了一块试金石。

无论人质危机何去何从，藤森的前面可以说是危机四伏，征途漫漫。不过，这种巨大分歧的相互掣肘也是有效果的，藤森与卡托列尼的谈判在一次的妥协与对抗中延宕下来。藤森犹如手拿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时而应用日本名将东乡平八郎“如果你的剑不够长，那么，请向前跨一步”的名言，与卡托列尼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时而他又将这原则灵活变通为“如果你的剑不够长，那么，请后退一步”，以真诚得几近虚伪的态度与恐怖分子虚与委蛇。人质危机的谈判就这样一次次走向僵持，直到所持弓弦欲断时，新的妥协又出现了。进攻与防御、抵触与对抗、断然拒绝与主动求和使僵持实际上演变成一场斗智的持久战，一场狮子与狼之间的较量。

12月28日，秘鲁教育部长已勒摩直接进入日本大使馆与卡托列尼进行了3小时15分钟的面对面交谈。这是双方自危机以来的第一次直接谈判，有关细节秘鲁政府与卡托列尼都避而不谈。但是到了29日，已经声明不再释放人质的卡托列尼又释放了包括马来西亚、多米尼加大使在内的29名人质。这一举动发生在新年的钟声敲响之际，许多人都有理由把它视作和平的呼唤。

1997年的开局也不错。卡托列尼又与秘鲁政府几度举行秘密会谈。此间，卡托列尼反复强调，“图帕克·阿马鲁运动”准备以谈判方式来解决这场危机，从占据的日本大使馆撤退，“我们愿意看到在秘鲁实现全面与持久的和平，为此，我们愿意负起责任，行动起来。”他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秘鲁新闻界冠之以“恐怖分子”的称谓十分恼怒，说他们这样看待他是绝对错误的，“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人。”

3月份，藤森在国内的支持率降到了他上任以来的最低点，但他与卡托列尼的交锋却略有所获。谈判出现了一线曙光，卡托列尼一度答应不以“图帕克·阿马鲁运动”成员的全部释放为首要条件，但在秘鲁政府拒绝释放坎波斯与南希等“图帕克·阿马鲁运动”的骨干分子时，谈判又告破裂。这一结局令藤森形容憔悴，但在公开露面时，他仍然不失其誓不罢休、决意与卡托列尼周旋到底的本色。

在马拉松式的谈判中藤森终于迎来了他寄予厚望的4月份。4月历来是藤森高奏凯歌的月份，他就是在1990年4月和1995年4月两次胜出，成为秘鲁总统的。今年的4月份，藤森希望有所建树，为布满荆棘的政治前途扫除最大障碍。他决意与卡托列尼分出个胜负，结束这场马拉松式的心理煎熬。

“查文-德万塔尔”行动

4月22日正午，对于仍关在使馆内的人质来说，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126天的囚禁已经让他们从一有风吹草动就躁动不安的惊弓之鸟慢慢变成了麻木不仁、百无聊赖的看客，整天只能或坐或卧的姿势也使他们厌倦了宝贵的午睡时光。在一座古色古香的挂钟单调的嘀嗒声中，人质们照例又开始了他们称之为“松弛法”的节目——聊天。

被集中在二楼的人质谈兴正浓。他们从法律、政治谈到烹饪技巧，从私有化改革谈到体育比赛，常常是某一问题刚刚展开，就卷入了白热化的争论中。人质们争先恐后地参加辩论，往往是一方话音刚落，另一方宏论又起，当双方争执不下时还有人用即兴演讲来调和矛盾，赢得或多或少的一些掌声。时针这才走到了15点，时间漫长得如同过了半个世纪。

本来还对私有化话题颇感兴趣，间或也“贡献”宝贵意见的五个看管人质的恐怖分子打起了哈欠。他们向卡托列尼打了招呼后就到一楼的大厅里踢室内足球去了。126天的时间，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段不短的日子，每日24小时的监视使他们比人质更为疲乏。生命在于运动，要想保持足够的体力，打赢这场持久战，适当的运动是少不了的。

他们走后不久，秘鲁前海军少将路易斯·詹彼得却像得到什么信息似地紧急行动起来。他诡秘地对身边的人质耳语着什么，所有人质惊诧却顺从地匍匐在地。待所有人质准备就绪，他又快速走到室内的一个十字架前，对其大声地说道“可以行动”。

15点27分，只见使馆大厅、餐厅、花园的三个隐蔽角落一阵阵白光窜出，随之就传来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五个正在踢室内足球的“图帕克·阿马鲁运动”游击队员还没有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被炸得身首异处。只见硝烟弥漫处，露出了五个大洞，二百多名全副武装的突击队员仿佛从地底下鱼跃而出，冲进了官邸大厅与餐厅，三名恐怖分子还没来得及拿出枪，就被从餐厅地道口冲出的突击队员当场击毙。猝不及防中，卡托列尼慌忙集

中起仅剩的六名恐怖分子，与正面闯入大使馆的突击队交起火来，但是突击队员的MPS冲锋枪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更不用说上楼去枪杀人质了。藤森的“拖”字术此时为人质赢得了最宝贵的生存机会。长期的疲倦消磨了卡托列尼的耐心，也使他失去了狼犬般灵敏的嗅觉与兔子般的谨小慎微。他忘了将一再声称的爆炸装置披挂在身，曾让人惊恐万分的使馆“空前大爆炸”就这样错失“良机”了。15分钟后，卡托列尼及六名恐怖分子横尸大厅，人质营救仅花了38分钟就获得了成功。72名人质中，除秘鲁最高法院法官阿库尼亚因受伤流血引起心脏病突发，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外，其余人质安然无恙。日本大使青木森久面带微笑，走出了大使馆，他与其他25名因轻伤和身体状况不佳的人质一起被送往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

这次营救行动代号叫“查文-德万塔尔”行动。它是由特种警察部队的司令安东尼奥·克汀将军负责的。但是，这次行动的最高领导则是藤森总统，自始至终，总统参与了行动计划的制订。“查文-德万塔尔”是印加帝国之前一个著名的文化时代，取这个名字除了出于保密的因素外，还因它与“图帕克·阿马鲁”一样带有印加文明的神秘气息，因而安东尼奥·克汀将军认为它也许能成为克制后者、出奇制胜的法宝。也许真有神灵保佑吧，一开始藤森对这项行动并未寄予厚望，只是作为“和平解决”的辅助手段，在不得已采取武力解救时才采取的应急措施，但随着拖延战术赢得宝贵的126天，“查文-德万塔尔”行动也就紧锣密鼓地展开并一天天地完善起来。最初，安东尼奥·克汀将军把计划的重心放在训练狙击手上。他在利马郊区搭建了一座日本大使馆的模型，一次又一次地指挥士兵掌握营救人质的基本技巧：在恐怖分子松懈或者睡着时袭击；在袭击的头几秒钟用炸药造成混乱；训练有素的狙击手准确无误地判断恐怖分子的方位并干净利落地将他们消灭“所有步骤井然有序地进行着，但一个致命的难题是：这一次人质数量多而且集中，任何论证详细的正面袭击都难免出现漏洞。但是，四个多月的准备时间为安东尼奥·克汀将军提供了新思路：既然卡托列尼能掘地250米从插翅难飞的坎多·格朗德监狱解救出坎波斯，那特种部队又何尝没有能力挖几条地道通往大使馆呢？从3月份开始，特种部队开始朝大使馆挖地道。这些地道共5条，深3米，最长的达80米，地道内有照明、空调和通信设备，供人在里面呆几天。毙命的卡托列尼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在几年前天才般的“创作”会被“还治其人之身”。

卡托列尼无法想到，在他眼皮底下居然还真有詹姆士·邦德式的特工人员在活动。本来，在人质危机发生后，有一个恐怖分子脚踝受伤，根据他的要求，秘鲁方面为他准备了一副拐杖，并在里面安装了一个精巧的窃听器。这个窃听器为秘鲁当局在人质危机发生后了解使馆内的动态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这个恐怖分子脚伤好了，拐杖也就给他扔了。秘鲁警方又成了睁眼瞎。后来，秘鲁警方在国际红十字会送进使馆的诸多应急与慰问物品中又藏匿了一个窃听器，让路易斯·詹彼得利用它直接和秘鲁情报机构联系。一开始，路易斯·詹彼得并不知道窃听器藏在哪里，他只能趁恐怖分子不在时不断地对着鲜花、灯具甚至便桶说话，想检查究竟是什么东西里装有“机关”，可是始终一无所获。就在他几乎要放弃时，一名人质让他试一试十字架，十字架里传来了“福音”，里面安装的麦克风把他的声音及时传了出去。人质与秘鲁警方的“秘密联络通道”沟通了。就在此时，卡托列尼仿佛对连续一星期在使馆外一个扬声器内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军乐声有所怀疑了。他时

不时地站在窗户前屏息聆听，躁动不安。这一反常举动非同寻常，路易斯·詹彼得赶紧通过“热线”将“信息”传递出去，附带着告诉对方他的寻呼机号码。很快，扬声器中借以掩盖地道挖掘声的高音量军乐换成了欢快高亢的墨西哥民歌。这些优美的曲调平息了卡托列尼的不安，也消除了他对军乐声的疑惑。就这样，幸运之神与卡托列尼擦肩而过并一去不复返了。

21日清晨6点30分，当所有突击队员进入地道待命时，藤森也准时守候在大使馆附近的一所住宅里。进攻时间定于下午3点50分，只见藤森时而走到窗前，对着不远处的大使馆凝神沉思，时而走到指挥台前用手指慢慢地摩挲着扬声器上纵横密布的金属丝。这已是100多天的较量中的最后冲刺阶段了。为了这一天，藤森和整个秘鲁等待得太久太久了，以至每一秒钟在他看来都似乎慢得让人难以忍受。等待，唯有等待才有机会。终于，机会来了：安装在地道内的高灵敏度窃听器测出，恐怖分子正在踢足球。机不可失，藤森马上命令向路易斯·詹彼得的寻呼机传出进攻的信号，几分钟后路易斯·詹彼得的答复传送回来。3点37分，进攻命令比计划提前13分钟发出。藤森在较量中赢得了至关重要的时间差。

历经四个月煎熬的藤森首次露出了由衷的笑意。他身穿防弹衣，快速抵达大使官邸，站在庭院内的一把椅子上，志得意满地向参与行动的士兵和没被送进医院的人质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秘鲁不接受恐怖主义，秘鲁给国际社会作出了榜样，不允许恐怖分子进行讹诈。他说，这次胜利是一次人民的胜利。滑稽的是，就在藤森慷慨陈词时，使馆内又响起了爆炸声，原来是卡托列尼布置的饵雷被触及，发生了爆炸。随后，在德国避难的“图帕克·阿马鲁运动”的发言人拉科斯还打电话给巴拉圭的亚松森“卡迪纳尔”电台，指责日本违反《维也纳公约》有关大使馆享有治外法权的规定，允许秘鲁军队进入其官邸。当然，这无伤藤森的一根毫毛。

对于给予秘鲁警方进入大使馆权利的日本，藤森也表示不买帐，这是史无前例的。在“查文-德万塔尔”行动正式实施时，藤森将行动计划通知了克林顿总统，而日本首相桥本是在行动开始后才被告知的。人质危机解决之后，藤森在向日本记者的发言中还余怒未消，指责日本为“胆小鬼”。他说没有一个日本人提出解决这次危机的具体建议，仅仅要求和平解决“意味着我们应该向恐怖分子让步”。同时，他还指责日本公司在过去发生的绑架案中只知道掏钱的作法。看来，藤森终于能挟解决人质危机之余威，吐出郁积心中已久的一股恶气了。

自然，藤森有理由出气。人质危机的圆满解决提高了他的声望，虽然秘鲁宪法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次，但雄心勃勃的藤森显然在寻求第三度登上总统宝座的机会，由执政党控制的国会已经通过法案，重新解释宪法，允许藤森争取第二次连任，因为藤森第一次当选是在新宪法生效前，所以不应将其首次任期计算在内。藤森最终能否如愿以偿，还要取决于选举委员会，但如果他当选了，卡托列尼无疑功不可没，是他使藤森“反恐怖克星”之称号更加名副其实。这么大的功劳没有理由不为藤森争取到几张选票。因此，藤森似乎应该是这场危机的最大受益者。

危机的间接受益者可能是世界各国的反恐怖组织。对他们来说，秘鲁的成功无疑是一个光辉的范例。借助于秘鲁的经验，他们可能打赢反恐怖主义这场跨世纪的战争。国际反恐怖组织高度评价了“查文-德万塔尔”行动。曾经多年担任美国国务院反恐怖活动领导人的保罗·布雷默说：“我认为这

个行动非常了不起——堪称样板。”秘鲁警方营救人质的大胆行动得以成功，是因为他们从世界其它地区发生的人质事件中吸取了教训，同时采取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创新做法，这就是创造性地将地道战应用于反人质劫持上，其辉煌战果可与以色列 1976 年从乌干达恩培德机场救出 105 名人质的行动以及西德 1977 年从索马里摩加迪沙救出 86 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行动相媲美。“查文-德万塔尔”行动表明：政府的领导人在与恐怖分子打交道时需要耐心，不管要求迅速采取行动的压力有多大，即使泰山压顶也须记取：谁拖到最后，谁就能笑得最好。

“天堂”里也不太平 ——发生在美国的恐怖主义活动 黑色星期五

星期五在美国不是一个吉利的日子，自1929年那个发生了经济危机的星期五以来，美国人习惯用“黑色星期五”来形容他们不喜欢的日子。不过，自从上帝为人们规定了星期之后，星期五总是一个客观存在，是不以美国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美国人唯一能做的就是祈求上帝格外施恩，让星期五是别的什么颜色，而不要是黑色。1993年2月26日，又是一个星期五。这个星期五会是什么颜色呢？

2月26日中午，其时正是一天中最忙的时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里，人们正忙着办公。世界贸易中心，倒不是喜欢夸大的美国人的故作夸张，而是它的真实写照。整个中心由两座高达411.48米的主楼和一些辅助设施组成。它的高度在美国虽然算不上第一，次于芝加哥的西尔斯大厦，但是，它确实确实是世界第二高楼，其重要性远非西尔斯大厦可比。它有90万平方米的办公面积，共有千余家商号在此设点办公。鉴于美国是世界经济中心，纽约又是美国的经济中心，因此，各国金融机构和工商企业都把进入世界贸易中心作为进入美国的象征，纷纷在此租地办公，中国也有数十家公司在此办公。因此，在世界经济圈中，世界贸易中心实有华尔街第二的地位。

世界贸易中心高达400余米，登上楼顶可以俯瞰全纽约，在高楼大厦林立的纽约市，如果你登上它的最高层，那么肯定会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因此，世界各地的游人都把登上世界贸易中心的最高层作为到纽约观光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果到纽约不到世界贸易中心，那就像没看到“自由女神”一样遗憾。因此，每天世界贸易中心游人如织。

2月26日虽然天气不太好，气温较低，外面还下着小雪，更重要的是，这一天还是一个星期五，但这一切因素都没有影响游人的兴致。中午时分，在整个大楼里办公、游览的人达到十万之众。然而，12点18分，一声爆炸惊天动地，原本坚如磐石的贸易中心大楼顿时摇摇晃晃起来……

爆炸声过，大楼里顿时一片漆黑。事后检查，爆炸发生在大楼地下二层的停车场，炸弹炸出了一个长60米、宽30米的大坑，把大楼的地下层都炸穿了。停车场内的汽车大多被毁，混凝土碎片飞得满地都是。巨大的冲击波使整个大楼的动力系统全部切断，大楼与外界的联系立即终止，电话中断，电梯停驶，不少人被困在电梯内。大楼内多处起火，浓烟一直冒到400多米的顶层。

由于事发突然，再加上通讯联络中断，许多人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8个残疾人被困在94层的电梯里绝望地呼救，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鸣。很多人见电梯中断，于是徒步下楼，准备走下高达400米的高楼，但他们多数被浓烟逼回，但也有不少有逃生经验的，知道烟从下面传上来，说不定下面楼层起火，因此转而向上，逃到顶层平台上，等候救援。

世界贸易中心发生爆炸！整个纽约市被震惊了。消防队紧急出动，一半消防人员集中到世界贸易中心，数百辆消防车、救护车和几十架直升飞机赶到现场，进行灭火、救人。消防队员搭起了云梯，直升机则在大楼顶层盘旋，将那些困在顶层的人们救出。由于指挥有力，虽然被困人员成千上万，但世界贸易中心内未出现太大的混乱，这为抢救工作带来极大的方便。因此，九

个小时后，直升机救出了最后一批人员，他们是困在电梯里的八个残疾人。经检查，这次爆炸造成5人死亡，2人失踪，1000余人受伤。如果仅从人员损失来说，这次爆炸损失甚微，同发生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恐怖案件造成的伤亡相比，简直不能相提并论。但是，从物质损失上讲，损失谁大就难说了。大爆炸摧毁了世界贸易中心大楼的整个动力系统，主楼已经无法进行正常办公，而且，清理现场需要一段时间，恢复动力系统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因此，大楼被迫关闭。据估计，爆炸造成了6000万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商业损失高达3亿美元，如果再算上停止开放一个月带来的损失，那么，这次爆炸造成的损失将超过10个亿。

对于财大气粗的美国人来说，10个亿并不算什么，只当是国会多掏出几个亿对某国反政府武装进行了援助；但是，这次大爆炸造成的精神损失对心高气傲的美国人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长期以来，美国以天堂著称，虽然恐怖主义肆虐天下，但美国人总认为炸弹不会扔到美国，现在，这个美梦一下子化为镜中花、水中月。纽约州州长寇姆惊呼：“这是恐怖分子有史以来对我们的首次袭击，从现在起，美国也无法逃脱这一灾难了。”

实际情况当然不是如此。由于美国到处伸手，到处树敌，国际恐怖组织早就把美国当作一个袭击的目标了，1984年3月16日，美国中央情报局中东情报站站长威廉·巴克利在贝鲁特被数名阿拉伯人绑架，一年后他被撕票。1988年12月21日，泛美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客机，在英国小镇洛克比上空坠落，虽然经过数年调查，美国人还是未能弄清真相。再往前，还有阿拉伯人驾车爆炸美军驻黎巴嫩兵营的事，数百名美军士兵成为异国的孤魂野鬼。事实是，美国从来不是世外桃源，对恐怖主义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免疫力。至于说由美国人自己制造的、在美国本土上的恐怖行动，那就更多了。

1963年11月22日，正当年轻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满怀豪情，准备带领美国人民奔向新生活时，就在得克萨斯的达拉斯，李·奥斯瓦尔德向他开枪了，肯尼迪总统当场身亡，鲜血溅了总统夫人一身。凶手虽然当场抓获，但奇怪的是，就在当天晚上，另一名杀手，杰克·卢比在众目睽睽之下，射杀了奥斯瓦尔德。事后虽经多方调查，但肯尼迪遇刺之谜至今难解。有人说，因为肯尼迪与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搞对抗，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恼羞成怒，因而命令克格勃派出杀手将肯尼迪除去。也有人说，肯尼迪得罪了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因而胡佛下令将他除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一个事实是，肯尼迪的死因至今未明。他是美国历史上第四位遇刺身亡的总统，在他之后，罗纳德·里根也差点命赴黄泉。

1968年3月，同样是在天堂美国，一名杀手向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开枪，这位享誉全美的黑人领袖就这样饮弹身亡了。

1970年3月6日，非法组织“地下气象员”的三名成员在纽约格林威治村试制炸弹时失手，结果当场毙命。同年，一名极端分子因为反对美国政府的越南政策，在威斯康星大学的陆军数学教学中心放置了一枚炸弹，结果造成一名研究人员死亡。

1975年12月29日一枚藏匿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环球航空公司办事处锁柜中的炸弹爆炸，造成11人死亡，75人受伤。

1981年5月16日，纽约肯尼迪机场泛美航空公司办事处的男浴室发生爆炸事件，当场炸死一人。

当然，这些事件中，有些事件具有世界影响，大部分还只是在小范围内

形成震动，许多美国人对此漠然置之。可是这次世界贸易中心的爆炸影响就不同了。爆炸一发生，美国各界立即作出强烈反应。正在日本作工作访问的纽约市长，听说世界贸易中心发生爆炸，立即与克林顿总统通话，讨论善后事宜，并中止访问回国，善于捕捉新闻题材的美国舆论界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对爆炸案进行大炒特炒。有的媒介说，大楼的安全系统本来就不符合纽约州的安全规定，有关部门几次提出整改措施，但主管大楼的纽约市和新泽西州港务局就是充耳不闻，因为它们并不属纽约州管辖。也有人说，中央情报局早在 70 年代就把世界贸易中心作为重点目标，认为它具有重大的打击价值。据说，曾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英曼指出过：“如果有人想搞一次令全球瞩目的恐怖活动的话，那么，世界贸易中心是最佳目标。”为什么？“因为你只要看看谁将是遇难者就明白了。”可是，中央情报局的警告被当作了耳旁风。世界贸易中心并未采取特别的反恐怖措施。

在天堂里进行“圣战”

谁是这个爆炸案的元凶？难以想象。纽约市警察局在爆炸发生后的 24 小时内竟接连接到 19 个电话，均声称对此事负责。接电话的警察不敢怠慢，每一个电话都进行了录音，并逐字逐句进行处理，指望从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或者从中找出真凶。结果当然是令人失望的。联邦调查局紧急行动起来，开始了美国历史上空前的调查活动，其规模足以令联邦调查局此前的任何一次行动黯然失色。塞欣斯局长亲自坐镇，在华盛顿成立了指挥中心，并向全国发出了标志着最高行动状态的“红色密码”，要求各地协同提供线索。联邦调查局当天即向纽约增加警力。中央情报局的反恐怖中心也行动起来，热线立即开通，并向世界各国发出求援急电，要求各国提供各恐怖组织的最新动态。此外，电脑专家、心理学家、爆破专家也紧急行动起来，协助破案。

当然，警方深知，恐怖分子以世界贸易中心为爆炸目标，一定是与美国及纽约有着“深仇大恨”，否则，是不会下此毒手的。那么，当今世界，谁与美国有着如此“深仇大恨”呢？破案人员首先想到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由于美国在前南斯拉夫的冲突中拉偏架，袒护克罗地亚和波黑穆斯林，对塞尔维亚族大打出手，早就在塞族引起公愤。南斯拉夫激进党领导人塞塞约就曾对美国发出过多次威胁，而布什政府也把塞塞约列为“战争罪犯”，塞塞约多次表示要复仇。塞族军事指挥官姆拉迪奇就说过，他要把战争引到美国去。当然，姆拉迪奇此言只能是说说的，当真要与美国打仗，只怕也不容易；不过，如果他派出一些恐怖分子，到美国兴风作浪，制造混乱，那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波黑驻联合国大使就说，塞族完全可能采取一些行动迫使美国人少管闲事。再说，第一个打进电话声称对爆炸负责的就是一个自称为“塞尔维亚解放阵线”的人。不过，这一说法立即遭到塞裔美国人组织的反驳。该组织的发言人称：“随便哪个傻瓜都可以拎着电话声称对此事负责。”美国人拉偏架，塞族人恼火，这是事实；但是，如果此事真系塞族人所为，塞族人还会这么傻，故意引火烧身吗？

警方重点怀疑的第二个对象是伊拉克人。其时正是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两周年之际。早在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就扬言要对美国采取恐怖行动，但事后证明是一场虚惊。这一次，萨达姆会不会来真格的呢？说来也巧，科威特在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下层正好租了一间房间，萨达姆

会不会拿科威特人出气呢？不得而知。此外，纽约州州长的市内办公室也在世界贸易中心，他的停车点离爆炸现场不远，萨达姆会不会拿他开刀，搞一场蓄意谋杀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警方只能“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了。3月2日，《纽约时报》收到了一封署名为“解放军第五连”的信件，这封信使破案者觉得恐怖分子可能来自中东，因为信中扬言，除非美国答应他们的要求，包括终止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不干涉中东国家的内部事务，否则，他们就要对美国的军用和民用设施继续进行攻击，连核设施也不能幸免。

证据很快就拿出来了。现场清理的结果表明，爆炸发生在地下第二层停车场，面积达1800平方米。如此之大的爆炸面积，专家认为，可能不是普通炸弹所为。专家分析，此次爆炸，恐怖分子极可能使用了一种名为塞姆泰克斯的高能炸药。这种炸药体积虽小，杀伤力极大，且便于携带。1988年洛克比空难中，恐怖分子使用的炸药仅一个盒式录音机那么大，但泛美航空公司的波音客机因此而粉身碎骨。它原先主要在捷克斯洛伐克生产，虽然现在已经停产，但据捷克总统哈维尔说，库存量足够恐怖分子用上150年！

爆炸专家又想到，要在世界贸易中心炸出这么一个大坑，恐怖分子使用的炸弹量必不在少，恐怕有500磅—1000磅。如此数量的炸弹，要带入美国，只怕也非易事。那么，恐怖分子能否就地取材呢？五角大楼的武器库中就有这么一种产品，它的性能极似塞姆泰克斯，深受北约及美国备矿业公司的欢迎。恐怖分子极可能从美军的武器库中偷一点出来。

清理现场最有价值的发现是警察在现场找到了几盘录像带，其中一盘录像带显示，有一辆福特牌汽车从车库中急驶而出。这引起侦探们的兴趣。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汽车的车速是不可能有这么快的。调查人员由此推断，这辆小车可能就是装了巨量炸药进入世界贸易中心的那辆小车。作案者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此外，两位调查人员还在现场清理出一块扭曲的黄色铜牌和十几片碎片。经鉴定，那块铜牌是一辆福特货车的残片，号码为XA70668。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调查人员开始按图索骥，进行全面的调查。他们找到了这辆小汽车的主人——与纽约州一河相隔的新泽西市肯尼迪大道1558号赖特卡车出租公司。该公司证明，这辆汽车确实是它的，但已在一周前租给了一个名叫穆罕默德·萨拉马的男子，而且，萨拉马还三番五次来公司纠缠，说他的汽车被盗，要求退还他的400美元押金。萨拉马丢车之说，无法得到警方的证明，因此，赖特公司也无法退还他的押金。调查小组在获悉这一情报后立即设下圈套，等待萨拉马再次前来索款。3月4日，萨拉马果然打来电话，这次，公司职员没有拒绝他的要求。原来，伪装成公司职员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在电话中告诉他，虽然没有警方的证明，但他仍然可以取回一半押金，让他随时来取。萨拉马不知其中有诈，兴冲冲地赶到赖特公司，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有意与他周旋，询问了一些有关丢车的情况，萨拉马不疑有诈，只想取回自己的押金。他取钱后准备乘出租车离开，正在这时，一群联邦调查局特工截住了他。

打开联邦调查局的电脑资料库，电脑显示，穆罕默德·萨拉马原是位约旦籍男子，今年26岁，1967年出生于约旦河西岸，1987年合法移民美国，一直居住在新泽西州泽西城。萨拉马文化程度不高，因此来美后一直只能从事体力劳动。他对现状不满。他的母亲曾对人说过：“他到美国是想找份好工作。他要去学习，去创造自己的未来。”但是，没有证据证明萨拉马是一位狂热的伊斯兰教徒，尽管他常去泽西一所由激进的原教旨主义教长奥马

尔·阿卜杜拉·拉赫曼传教的清真寺作礼拜。随后，联邦调查局对他的住所进行了搜查，结果，尽管警犬在他的房间中嗅到了强烈的炸药气味，但特工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没有找到炸药，只是找到了一些与制造炸弹有关的材料，如天线、电路图、接线说明书。这些材料不能证明萨拉马与炸弹直接有关，但已经足以将他列为重大嫌疑犯了。警方认为，如果爆炸真与萨拉马有关，那么，萨拉马绝对不会单枪匹马，因为爆炸世界贸易中心是一件举世震惊的大事，而萨拉马却为他那区区几百美元押金斤斤计较。因此，萨拉马背后必定有一条大鱼。因此，警方随即围绕萨拉马进行了周密的调查，凡是与萨拉马有接触的人都脱不了干系。

在爆炸案发生的前一天，有人发现萨拉马与其他几个人一起出入泽西市的一间仓库，并向一个名叫尼达尔·阿亚德的人打过电话。于是，警方对那个仓库进行了突击搜查。这次搜查发现了不少物证，仓库里有几包尿素、数瓶硝酸，还有一些烧瓶、试管和引信。这些东西已经足以制成炸弹了。至于那个阿亚德，警方也根据萨拉马提供的线索，找到了他。原来他是一名有巴勒斯坦血统的科威特人，不过，他目前已经向星条旗效忠，归化为美国公民了。他与萨拉马不一样，来美后取得了化学工程学位，现供职于某信号公司。警方认为他的专业知识已经足以制造一枚炸弹了。他和萨拉马关系极佳，两人认识已有一年，且共同拥有一个帐号。在萨拉马租车后，他也开着一辆红色的汽车与其同行。这样，3月10日，联邦调查局直奔阿亚德的寓所，从被窝中请出了阿亚德，并对他的寓所进行了搜查，结果在他的个人电脑里发现了一封信，信中他对第一次行动表示不满，并准备再次行动，炸毁世界贸易中心大楼。他在信中说：“很不幸，这次我们的计算不精确，不过我们可以保证，下一次行动将非常精确。除非我们的行动成功，否则世界贸易中心将始终是我们在美国的目

标。”信末还附有“解放军第五连”的签名。联邦调查局将此信与《纽约时报》接到的信件相比，发现两者有相似之处。再对《纽约时报》那封信的信封和信纸进行化验检查，结果发现，这封信就是阿亚德所写。真凶终于露面了。

联邦调查局还发现，阿亚德和萨拉马制造炸弹所需要的钱，都是由一个外国组织资助的。几个月来，至少有8000美元从欧洲汇到阿亚德和萨拉马的帐户里，使用这笔经费的，除了萨拉马和阿亚德外，还有四个人，结果就引出了穆罕默德·阿布哈里马。

阿布哈里马原籍埃及，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萨达特总统遇刺后，埃及政府开始镇压穆斯林兄弟会，阿布哈里马眼看就要落入法网，因此，他悄悄地飞到德国慕尼黑，那里有一个伊斯兰中心，他就在那里住了下来。他向德国政府申请政治避难，但申请被驳回。德国政府的理由是，如果阿布哈里马真如他所声称的那样，没有从事过任何非法活动，那他就没有必要害怕埃及政府。因此，德国政府勒令他两个星期内离开德国。就在走投无路之际，他又结识了一位34岁的老姑娘索卡。索卡是一位护士，有过酗酒史，感情上受过挫折。阿布哈里马就向她发动了进攻，结果两人很快结婚了。这样，阿布哈里马也不用回埃及了。索卡对阿布哈里马还是满意的。她的评价是：“他非常有礼貌，待人和善，从来没有凶神恶煞、咄咄逼人的样子。”阿布哈里马每天要作一次祷告，这一点也让她很感兴趣。不过，两人之间谈不上有感情。按照《占兰经》的圣训，一个男子得有四个妻子，于是他又娶了一个女

子玛丽娜，并建议索卡和他们两人一起居住，组成一个“幸福的家庭”，结果当然可想而知。两人吵翻后离婚。但是，阿布哈里马终究还是遇到了知音。他与后来的妻子玛丽娜一起来到美国，在纽约定居下来。与萨拉马和阿亚德等人相比，阿布哈里马的记录可是不太好。在纽约他以开出租汽车为生。闯红灯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在记程器上做手脚也是常有的事。为此，他的驾驶执照被没收过十多次。他丝毫不隐瞒自己极端的宗教热情，并积极投入了当地穆斯林组织为“兄弟的阿富汗穆斯林”进行的募捐活动，并亲自到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交界处的一个军事基地接受军事训练，成绩绝对优秀。在那里他结识了拉赫曼教长，教长的两个儿子也在那里受训。后来，他还跑到阿富汗去，与阿富汗的伊斯兰同胞一起从事反苏斗争。他的一位同事至今记得阿布哈里马“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员，曾在阿富汗各地打过仗”。回到纽约后，阿布哈里马经常身穿旧军装，脚登军靴，到处走来走去，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不久，他又成了拉赫曼的私人保镖兼司机。因此，联邦调查局一发现阿布哈里马与爆炸案有牵连，立即就认定，阿布哈里马可能就是那个在幕后出谋划策的人。爆炸案发生后的3月6日，他携妻将子回埃及探亲，而后又到麦加朝圣。但是，这一点难不了联邦调查局。求助信立即发到埃及，请求埃及警方协助，逮捕这个重大嫌疑犯。由于阿布哈里马本来就是一个令埃及警方头疼的人物，因此，埃及警方通力合作。3月24日，埃及警方在阿布哈里马的老家将其拿获，然后交由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带回美国审讯。阿布哈里马表面上强悍，实际上是个软蛋。警方没有费很大的劲，就撬开了他的嘴巴。他交代说，还是在阿富汗参加圣战的时候，他和他的一些同党就酝酿了这么一个惊天动地的计划。这个计划得到了参加圣战的阿拉伯退伍军人的赞同，事先也征求了泽西市的拉赫曼教长的意见。当时约定，从事爆炸活动的人可得到“伊斯兰团体”的资助。这个组织以真主的名义从伊朗商人、流亡欧洲的反政府人士那里募捐，也可以从支持伊斯兰复兴事业的沙特阿拉伯政府和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那里得到援助。审讯表明，来自国外的伊斯兰复兴势力策划了这次爆炸。联邦调查局认为，起码还有两个人应该列入侦查范围。一名是27岁的比莱·阿凯西，他怂恿和支持爆炸；另一名是兰吉·优素福，有人看到过他与萨拉马一起出现在仓库里，而且阿亚德身边有一张他的信用卡。但这两人被拘捕后，只有阿凯西承认与爆炸有关，优素福拒不认罪。

他是真正的凶犯吗？

现在，除了那位伊斯兰教长拉赫曼以外，所有与爆炸案有关的人物均已亮相，并落入法网。接下来就是对凶犯进行审判。为了筹划这次审判，美国司法部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从5000名应征者中组织起12名陪审员。根据美国的司法制度，陪审员负责给罪犯量刑，而法官必须根据陪审员的意见判决，因此，陪审员的意见至关重要。但是，陪审员未必就是学富五车的法学博士，他可能对法律一无所知，这就是美国法律的奇特之处。司法部当然不愿意让罪犯逍遥法外，但也不愿意让人指责美国司法审判有这样那样的歧视。因此，要挑选出为各方接受的陪审人员，司法部着实费了一番周折。最后的结果是，陪审团由12名人员组成，8名男子，4名女子，这样，不会有性别歧视之嫌。这12名陪审员中，白人和有色人种各占一半，这样，又可以有效地避开种族歧视的嫌疑。

为了保证主控官和陪审员的人身安全，警方这次采取了特别严密的保安措施。从9月起，两名主控官就和他们的家人一起移居一处秘密地点，据说有人对他们进行了威胁。负责审理此案的曼哈顿下城法院制定了严密的安全保卫措施。法院内有双层金属探测仪和X光仪器设备，外有层层警卫。12名陪审员和6名候补陪审员都隐去了姓名，仅以号码识别。

10月4日，法庭开庭审理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助理联邦检察官季尔莫·柴尔德斯进行了冗长的发言。他说，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是发生在美国本土的最具影响力的一起恐怖主义事件，危及了数万人的生命安全。当时有数以万计的人在大楼里从事日常活动。他向法庭出示了一系列证据，指控四个人与本案有关。他们是：阿布哈里马，他与制造炸弹直接有关；阿凯西，他持假护照进入美国，携带了制造炸弹的手册、笔记本和录音带；萨拉马，他租用仓库、汽车，储存制造炸弹的化学品，并运送炸弹；阿亚德，他策划了爆炸阴谋。1994年2月23日，临近世界贸易中心爆炸一周年，美国司法机构正式对四名嫌疑犯进行指控。起诉书称他们的行动是“非法的、蓄意的，是明知故犯的，是带有犯罪意图的”。3月4日，陪审团裁定，萨拉马等四人策划、实施爆炸罪名成立。5月24日，四名凶犯被带进法庭作最后陈述。他们都辞退了自己的律师，自己进行申辩。结果，法庭认为，他们的申辩是一派胡言。法庭出示了1000件物证，传唤了200名证人，认定是萨拉马把爆炸物运进了现场，其他人则与策划爆炸阴谋、制造炸弹有关。纽约市地方法院判处这四名凶犯每人240年徒刑，并且不得假释。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这240年徒刑只是司法机构发泄自己心中的怒气，说不上是什么惩罚，因为显而易见，没有一个人能完成这么长的刑期。

至此，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并不能说已经划上圆满的句号，因为本案还有一位关键人物没有出场。他就是移居泽西市的伊斯兰教长拉赫曼。各种证据都表明，他才是这起爆炸案的真正策划者。但是，美国当局迄今为止还找不到证据证明拉赫曼就是那个在幕后指使爆炸世界贸易中心的人。再说，拉赫曼是一位伊斯兰教长，在当今伊斯兰复兴的年代，美国对这样的人还真是十分头疼。

拉赫曼原籍埃及，他是一个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者。从表面上看，拉赫曼并无惊人之处。他是盲人，这一点就很容易引起人们同情。此外，他最大的特征就是永远戴一顶红白相同的帽子。这种打扮几乎几十年一成不变。但是，拉赫曼绝不是一个等闲之辈。据说，1981年萨达特总统被刺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埃及政府对他无可奈何，干脆把他一脚踢出埃及。拉赫曼本人是以旅游签证进入美国的，一直在泽西城的艾尔沙勒姆清真寺活动，美国警方对拉赫曼早有怀疑，认为他进入美国不怀好意。1990年，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卡哈尼被杀，涉嫌凶手纳沙尔被警方扣留。纳沙尔是一位阿拉伯人，警方认为这起凶杀案可能与阿以冲突有关系，当时就怀疑拉赫曼与此事有牵连，但因证据不足无法对他采取行动。不要说拉赫曼，就是纳沙尔，不久也因证据不足被释放了。对这样的人，如果美国警方找不到真凭实据，还真不敢对他下手。他们对巴勒斯坦哈马斯运动的创始人谢辛的情况都很了解。谢辛每进一次监狱，他的声望就增加一分，最后，以色列当局根本不敢对他下手。美国担心对拉赫曼采取行动也会产生类似的后果，因此，警方一直很慎重，不敢对他采取行动。

但是，到了6月底，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联邦调查局经过周密调查，

一举抓获 8 名伊斯兰恐怖分子，他们被控准备于 7 月初炸毁位于哈德逊河底深处的霍兰隧道和林肯隧道。经审讯，这八名嫌疑犯与拉赫曼都有联系，且听命于拉赫曼。联邦调查局这下觉得有理由对拉赫曼采取行动了。联系世界贸易中心的被炸，司法部门认定，这几起恐怖主义事件，表面上不相关联，实际上都与拉赫曼有关，拉赫曼才是这些恐怖分子的真正主使。8 月底，纽约市大陪审团正式起诉拉赫曼、纳沙尔和其他 13 名伊斯兰恐怖分子，主控官为他们定的罪名是：“发动针对美国城市的恐怖主义战争。”这个罪名是够吓人的。但是，美国司法部长依然认为，起诉拉赫曼，证据仍嫌不足。不过，由于市民都认为拉赫曼是这一系列恐怖活动的策划人，对政府迟迟不对拉赫曼采取行动表示不满，因此，纷纷提出抗议。在这种情况下，司法部门只能以违反移民法将拉赫曼拘捕。司法当局声称，虽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上述几起案件之间存在一种内在联系，但是，经过逻辑分析，已经可以勾勒出一幅阴谋图画。恐怖分子打算绑架或杀掉伊斯兰的假想敌人，被害的卡哈尼就是其中之一。此外，卡哈尼的朋友、审判纳沙尔的法官、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都名列其中。下一步，他们的目标就是轰炸一些军事目标，如纽约市的华盛顿大桥、曼哈顿的犹太人定居区。这样，拉赫曼就在劫难逃了。联邦司法机构用飞机把他从拘捕处送到法庭，与其他恐怖分子一起受审。由于在此之前，警方已经接到警告：如果拉赫曼受到伤害，他们将要报复。因此，法庭内外军警密布。

法庭上，控方出示证据，证明拉赫曼与上述几起恐怖主义案件有联系，其主要的证据就是拉赫曼与其保镖沙勒姆近 10 个小时的谈话录音。沙勒姆的真实身份实际上是联邦调查局派在拉赫曼身边卧底的眼线，他把拉赫曼与其谈话的内容都偷偷地录了下来，这成为联邦调查局指证拉赫曼的证据。拉赫曼肯定在与其谈话时暴露出自己的思想，联邦调查局指望用这些证据来给拉赫曼定罪。但辩方律师也不是吃素的。他指责政府凭借“谣言和怀疑”编织了一个阴谋神话，其目的就是在美国煽动起一股歇斯底里的、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列为美国的敌人的风潮。这样，对拉赫曼的起诉实际上也是对整个原教旨主义运动的起诉，这样打击面就太大了。律师提起“歇斯底里”，稍微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忆起 50 年代麦卡锡主义横行的一幕。当时，美国参议员麦卡锡诬指共产党钻进了美国政府，杜鲁门政府也跟着瞎起

劲，在政府内搞忠诚调查，结果使一大批正直的政府官员遭到打击。对那恐怖的一幕，大多数美国人都是心有余悸。因此，辩方律师的反驳颇为有力。此外，他还指出，联邦调查局所谓有力证据，全部来自拉赫曼的私人保镖，此人又是联邦调查局的卧底间谍，用这种手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可信，很难证实。此外，律师还指责沙勒姆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他是为了钱才出卖自己的主人的。这一击也很有力。据传沙勒姆确实接受了联邦调查局 50 万美元的酬金，为此，他策划了隧道阴谋，让其他人上当。这种人的话怎么能相信？至于说拉赫曼那些激进的言辞，根本不能成为给他定罪的依据。罗马教皇反对流产，所有反对流产的人都能得到他的支持，这些人也曾炸毁过医院，杀害过做流产手术的医生。联邦调查局为什么不把罗马教皇也抓起来？这一下击中了控方的要害之处，控方不由得感到理屈词穷。是啊，以言辞获罪在美国司法史上还没有先例，美国能因拉赫曼开这一先例吗？

但是，政府不为所动。控方声称，审判被告的法律依据是当年用于指控黑手党和毒品集团成员的《煽动性阴谋法》。根据这个法律，控方在起诉时，

只要出示阴谋者所做的或想做的事，包括那些可能与具体罪行没有关系的证据。联邦政府律师约翰逊指出：“如果政府能证明一名被告完全明白这场阴谋并干下了某些可以被认定为是参与性的事件，那么他就要同其他人一样承担法律责任。”因此，政府无须证明拉赫曼是否亲自下令他的同伙去炸毁什么目标，只要有证据证明他曾经就某些具体的恐怖行为作过“可以”或“不可以”的说明，担当过恐怖主义组织成员间的中间人，以及采取过预防措施防止执法人员渗入其组织，就足够了。因此，根据这个法律，联邦政府给拉赫曼定罪是绰绰有余了。

但是，也有法律专家对政府对拉赫曼采取行动的法律依据表示怀疑，因为它的根据是1909年的《煽动性阴谋法》，这个法律本身就不很严密，作为法律也有不够精确之处。当然这并不是因为它是1909年颁布的，美国宪法迄今已有200年历史，但仍然有效。关键是，这条法律本身的表述就很含糊，存在很多漏洞。比方说，到底什么是“煽动性阴谋”，这个提法就很难界定。拉赫曼对他的信徒所说的东西，包括被沙勒姆偷录下来、作为联邦调查局给他定罪的证据的内容，到底属于言论自由，还是属于煽动性犯罪，这一点就很难说清楚。联邦调查局必须证明拉赫曼就发动针对美国城市的恐怖主义战争向其党徒发过足够多的明确的指示。但是，拉赫曼真的发过这种指示吗？恐怕没有。或许是拉赫曼有先见之明，他所说的一切，与1909年的《煽动性阴谋法》一样，从来就是含糊不清的。他从未下过什么指令，要他的伊斯兰信徒去炸毁世界贸易中心或者林肯隧道。因此，拉赫曼的辩护律师反诘说：“你能想象出还有什么比指控拉赫曼策划阴谋行动更荒谬的事情吗？你们难道真的相信这位教长对什么事情都有最后的表决权吗？”两个反问问得司法当局目瞪口呆。

对拉赫曼的处理让司法当局十分犯难。没有明确的证据，司法部门无法对拉赫曼定罪；但对他不作一点处理，就让他逍遥法外，似乎也说不过去，联邦调查局也心有不甘。于是，有人想出一个放逐的方法。拉赫曼原先不是埃及人吗？干脆让他还回埃及算了，让穆巴拉克去头疼吧！殊不料，穆巴拉克知道这块骨头不好啃，因此，也不愿意接纳拉赫曼。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美国政府才说得埃及政府回心转意，但司法专家却发现，根据美国的法律，拉赫曼还不能被驱逐出境，这一下，轮到联邦调查局为难了。

不管拉赫曼与世界贸易中心是否有牵连，不管他的最后处理到底如何，世界贸易中心的一声巨响，把美国人从梦中震醒了。美国不是世外桃源，恐怖主义一样会光顾美国。美国人，等着吧。很快，另一声爆炸将再次证明美国梦的幻灭。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曾指出：“我们不能让美国人受到恐怖分子的威胁，不能使美国成为另一个中东，另一个北爱尔兰，另一个巴尔干。”是的，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变成一个受恐怖威胁的国度，只是，要做到这一点太困难了。美国能使自己成为世外桃源吗？

1994年3月26日，纽约州州长和大多数世界贸易中心的工作人员都来到大楼附近的圣彼得教堂，追悼死者。世界贸易中心主任麦克逊说，在被这场灾难波及的每个人心上，留下了“巨大”的伤痕。港务局执行主任布里斯诺夫说：“在有形的建筑物方面，我们能够恢复旧观，但爆炸发生一年后，经常涌上心头的还是那些远离我们而去的人们。我们希望正义能得到伸张。”但是，伸张正义谈何容易！

震惊世界的俄城大爆炸

1978年，美国曾出版过一本红皮小册子《特纳日记》，它的作者是西弗吉尼亚州反犹太人运动全国联盟组织的领袖威廉·皮尔斯。从外表上看，皮尔斯是一个谦谦君子，外表文质彬彬，颇有些学者风度。但皮尔斯写的这本书可不谦和。这部颇具想象力的著作设计了这么一幅场景：美国政府正在为犹太人所控制，反政府的“恐怖抵抗运动”成员用一辆装满炸药的卡车，于某日上午9时15分袭击了联邦调查局总部，结果，700名特工人员被炸死。这本书出版后，在美国黑道流行了十余年。书中皮尔斯策划的战斗计划被黑社会奉为作战计划的经典。正经书店因为考虑到此书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一直不愿销售。但是，人们能从街头的地摊上、枪支商店里买到这本书。十余年下来，这本书竟然也销出了二十余万册。皮尔斯自己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教唆人们去犯罪，也并非出于娱乐目的。我只是想表达自己的思想。”但实际上，皮尔斯设计的这一场景却经常在美国出现，恐怖分子根据皮尔斯制定的“作战计划”，上演了一幕幕惨剧。

俄克拉荷马城，一个有“古老的小牛仔城”称号的小城，一向平和、宁静。这里是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首府，全城共有44万人口，这与国际性大都市纽约的千万人口当然不能相比。但是，由于这里是俄克拉荷马州的首府，因此还是有不少联邦机构在这里办公。尤其是位于市中心第五街的俄城联邦大楼更是该城的要害地方，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特工处、药品管理局等政府机构在这里办公，每天的客流量大约有500人。同样，这个规模与每天有万余人进出的纽约世界贸易中心也不能相提并论。但是，1995年4月19日上午9时的一声爆炸，却把这座牛仔小城与纽约世界贸易中心联系起来，而且，它对美国人身心的伤害，更是远在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之上。

9时零4分，坐落在市中心的联邦大楼突然发出一声震天巨响，爆炸的声波一直传到50公里开外。在巨大的气浪冲击下，这座高9层的大楼顷刻间便倒掉三分之一。大爆炸产生的气浪挟着碎石和残肢断臂四处飞舞。由于爆炸发生在楼下，当时停放着许多汽车，因此，爆炸发生后，这些汽车一辆辆被掀翻，未来得及下车的人或是被烧死，或是被炸死。更悲惨的是，由于大楼里有很多政府职员，他们为了方便，将小孩带到大楼上班，因此，大楼的二层实际上是个托儿所。这些活蹦乱跳的花朵，转眼间也遭到摧残。小小的俄城，转眼间便被血雨腥风所笼罩。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悲惨、死亡人数最多的爆炸案，这次大爆炸，共造成168人死亡，其中包括19名儿童，850余人受伤致残，财物损失大约在5亿美元以上。

当电视把这副惨景传到千家万户的时候，美国震惊了，一向自大、自得的美国人这次也禁不住发抖了。恐怖分子已经把黑手伸向这些孩子，是可忍，孰不可忍？克林顿总统愤怒地指责凶手是“邪恶的懦夫”，并说这是对美国及其生活方式的攻击。世界舆论也纷纷谴责这一丧失人性的恐怖主义行动。连科威特原教旨主义组织的一名成员也说：“这是一种极端的犯罪行为，任何宗教和法律都不会允许这么干。许多平民和儿童被炸死，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接受的。这种行径违背人权，毫无理性。”4月20日，美国举国为死难者哀悼，政府部门降半旗志哀。此后，克林顿总统又宣布4月23日为全国哀悼日。在葬礼上，人们手捧着鲜花或受难者的遗像以示哀悼，受难者的亲属则

相互拥抱，以示安慰。许多人戴着白、黄、紫、蓝相间的彩条。白色是对死者的追思，黄色代表对失足者的谴责，紫色是对儿童的悼念，蓝色则代表这一惨剧发生的地点俄克拉荷马城。俄城大爆炸一周年之际，俄克拉荷马城专门举行了悼念活动，美国副总统戈尔专程前往致辞。他说：“恐怖主义不会胜利。在我们国家，我们是以对话和辩论的方式来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我们不以盗取宝贵的人类生命来表达我们的不满。”

踏破铁鞋无觅处

这个惨无人道的罪行是谁犯下的呢？美国人急于找出这个“外国魔鬼”，虽然还没有一点证据证明这件凶案是外国人所为，但美国人已经认定，文明的美国人自己不会犯下这种滔天罪恶，只有那些极端分子，比方说信仰真主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才会干这种伤天害理之事。两年前，他们不是就爆炸了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吗？俄城大爆炸肯定也是他们所为。因此，尽管调查还没有开始，凶犯的影子也没有见到，但美国人已经认定是伊斯兰极端分子制造了这种骇人听闻的爆炸案。一名约旦裔美国人（他也算是美国人，只可惜是约旦血统）在伦敦希恩罗机场被捕，并被押送回华盛顿，理由当然是可能与俄城大爆炸有关。在这里，西方法律界流行的无罪推定原则失效了。此外，美国人还想到，这件事可能是国际贩毒组织的杰作，药品管理局就在联邦大楼里办公，或许他们想借此泄愤。

像大部分美国人一样，克林顿总统也气极了，以致乱了方寸。他发誓一定要把这个坏家伙揪出来。他还征求幕僚的意见，是否应暂时关闭俄城机场，别让这个坏种逃了；同时，他又问是否应请以色列帮忙。在对付恐怖分子方面，以色列特工可能比联邦调查局还要厉害。以色列总理拉宾倒是自告奋勇，主动提出让以色列有关部门参与破案。但是，克林顿的幕僚警告说，千万不能让以色列插手。以色列一旦介入，美国人就等于明白无误地向世人宣告，此事系阿拉伯人所为，这样打击面太宽了，有损美国的国际形象。克林顿这才如梦方醒，因此谢绝了拉宾的好意。总统接受了幕僚的劝告：谁也别相信，就让联邦调查局去干，养着他们就是为了今天的事。于是，克林顿下令，让联邦调查局火速破案。

对付这种事，联邦调查局可谓驾轻就熟。劫机、爆炸、犯人越狱，这些案件联邦调查局均称之为特别重大的案件。对付这种特别重大的案件，联邦调查局的特别行动队员都经过多次专门训练。就在俄城大爆炸之前几个小时，特别行动队员还进行过对付恐怖分子的演练，因此，接到总统的命令后，联邦调查局迅速组织起一支阵容强大的破案队伍，其中包括四个证据反应小组和爆破机械小组。这些小组当中，有五名特工具有侦破此类爆炸案件的经验，另外还有来自波士顿、芝加哥、迈阿密、旧金山等地的炸弹专家。有关部门还动用了受过专门训练的警犬及机器人。破案人员携带着各种器具迅速赶到现场，对现场进行勘察。对他们来说，当务之急是寻找证据。因为不管犯罪分子多么狡猾，他总会在现场留下种种蛛丝马迹。有了证据，破案人员就可以顺藤摸瓜，揪出凶犯。一般而言，他们并不相信所谓证人的证词。尽管这些证人在法庭上会手抚《圣经》对天起誓，但谁知道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因此，联邦调查局最重视物证。

现场勘察有了结果。爆炸发生在联邦大楼楼下，巨大的爆炸在地面上留

下了一个深 8 英尺、直径 20 英尺的深坑，调查人员估计，恐怖分子可能动用了上千磅的炸药，用汽车运到楼下，然后引爆。一个调查人员沿着马路仔细寻找，突然在距现场两个街区的地方发现一块碎铁片，经鉴定，这是一辆卡车的车轴的残留物，肯定是被炸飞的。调查人员想到，这根车轴被炸得飞出这么远，很可能就是那辆运炸药的汽车上的，因此立即把注意力集中到这块碎铁片上。铁片上刻有机动车辆识别号码，调查人员如获至宝，立即将它送到联邦调查局电脑指挥中心，将这一号码输入全国联网的机动车辆识别中心。与此同时，一盘录像带又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俄城联邦大楼对面是一家银行的自动提款机，提款机上的录像设备记录下了一辆赖特租车公司的卡车停在联邦大楼前的场景。机动车辆识别号码在电脑中心查询的结果表明，车轴就是从这辆卡车上飞出来的。于是，调查人员立即赶到赖特租车公司，该公司证实该车确系他们所有，是一辆 1993 年出产的福特车，但目前已经分配给堪萨斯州章克欣城的艾略特租车公司，该城距俄城 270 英里。调查人员当即赶到艾略特租车公司，得知车子是爆炸案发生前两天由两名男子租用的，但经检查，这两名男子留下的身份证和驾驶执照都是假的。这不由得让调查人员泄气。好在租车公司的老板还能大致描绘出这两个人的形象，因此，联邦调查局的肖像专家马上根据他的描述画出这两个人的头像，称之为“一号”和“二号”嫌疑犯，并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此时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心中还是惴惴不安，不知道老板描述的肖像是否会牛头不对马嘴。能否根据这两张肖像拿住嫌疑犯，心里实在没有底。

不过，对凶犯的大致政治倾向，联邦调查局也不是一点判断没有。调查人员发现，驾驶执照虽然是假的，但执照上填写的日期 1993 年 4 月 19 日却可能是真的。调查人员想起，那一天是联邦调查局扫荡韦科庄园、剿灭邪恶的大卫教派的日子。大卫教派是美国 600 个极端主义教派中的一个，创建于 1934 年，是安息日会教派的分支。它的教主是弗农·豪厄尔，自称考雷什。他宣扬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而他是耶稣转世，只有加入大卫教派的信徒才能在末日来临之际进入天堂。这种极端荒谬的言论在美国这个信仰自由的国度竟然也有不少人相信。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大卫教派不断发展，信徒越来越多，考雷什的影响甚至越出了美国本土，到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扎根。考雷什利用大卫教派欺压教众，践踏少女，聚敛钱财，引起了公众和政府的注意。1993 年 4 月，联邦调查局对大卫教派采取了行动，由于考雷什在他盘踞的韦科庄园备有很多武器，在劝降无效的情况下，联邦调查局发动了进攻，结果考雷什自焚，整个韦科庄园化为灰烬，40 名信徒陪着考雷什殉葬。这件事在美国反响很大，很多极端分子因此对政府不满。由于考雷什自称为“耶稣转世”，因此，4 月 19 日也就成了“耶稣受难日”，最近，一些极端分子不正在电台等新闻媒介里大肆鼓吹要纪念韦科庄园事件吗？这个驾驶执照伪造者在作伪的过程中，是不是下意识地想到要为大卫教派、为考雷什复仇呢？极有可能。

不管怎么说，罪犯的肖像已经描出来了，是不是准确现在谁也不知道。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联邦调查局也只能将就这些条件，尽力去寻找凶犯了。于是，章克欣城里密布联邦调查局特工，他们手持“一号”和“二号”的模拟像，四处散发，并向人们打听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人。功夫不负有心人，调查人员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就在距城半英里的一家名为“梦境”的旅馆里，老板娘认出了“一号”。她说，他叫蒂莫西·麦克维，是 14 日住进来的，18

日，也就是俄城大爆炸发生前一天，他退了房。老板娘说，这个“一号”长得眉清目秀，不像爆炸联邦大厦的凶犯。在她心目中，制造如此爆炸案的，必是一个凶神恶煞之徒。

麦克维！这个名字是真是假？谁也不敢下结论。他的驾驶执照是假的，当然他的名字也可能是假的。但不管怎么说，调查人员总算找到了一点线索。那个该死的麦克维在哪里呢？不管他是不是制造大爆炸的凶犯，联邦调查局都要先找到他再说。联邦调查局悬赏 200 万，缉拿这个神秘的麦克维。无数个举报电话打了进来，其中有一个人竟然是麦克维以前的同事。他从电视屏幕上看到，这个嫌疑犯正是自己的昔日同事麦克维，因此打了电话进来。他说，麦克维是一个退伍老兵，对政府十分仇视，对政府根本没有任何幻想。他还提到，麦克维对考雷什被剿一事耿耿于怀，曾亲自到韦科庄园去凭吊过考雷什的阴魂。联邦调查局大喜过望。原来还真有这么一个麦克维，联邦调查局的猜测竟然是对的！看来，以前的努力没有白费。

既然麦克维是真名真姓，联邦调查局就不愁他飞上天去了。打开电脑库一查，联邦调查局大吃一惊：原来麦克维已经落入法网，正关在佩里县的拘留所里，而且，再过一会儿，他就要被释放了。这还了得！于是，一纸传真发到了佩里拘留所：我们要找的那个人正在你们手上。这下子，麦克维栽了。

那个麦克维是怎么落到警方手里的呢？他怎么会在拘留所里的？这还得从两天前说起。

那天，俄城大爆炸发生后 90 分钟，麦克维正驶在俄城北部 I-35 公路上。一路上他兴奋异常，就差没有放声高歌了。就在这时，一队巡警将他截下。原来是一群州警察。看到警察，麦克维并不心慌。他停下车来，问警察为什么截住他。警察告诉他，他的车没有牌照，他属于无牌驾驶。一位巡警透过车窗看到了他鼓鼓囊囊的衣袋，觉得可疑。于是，他出其不意地将手伸进麦克维的衣袋里，当场搜出一支半自动手枪，枪膛里已经压满了子弹。这个举动显然出乎麦克维的意料，他一脸惊讶，但还是故作镇静地问：“这里出了什么事？”然后又安慰对方：“不用怕。”他当然知道这里究竟出了什么事，他说这句话只不过想把对方打发过去，自己好赶快脱身。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美国，无牌驾驶和无证持有枪支都是一种犯罪，警察完全可以将他抓住关上几天。警察没理由照顾这个小伙子，这样，麦克维就被带回警署，拘留两天，外加 500 美元的保释金。这都是小意思，麦克维也没放在心上，因此，他在监狱里无忧无虑地过了两天。在拘留所的警察眼中，麦克维是个规规矩矩的老实人。他整天挂在嘴上的话就是“是，长官”和“不，长官”。身子挺得笔直，像一个军人。

狱方的判断没有错，麦克维确实曾是个军人。他今年 27 岁，是纽约州人，1989~1992 年在陆军服役，曾参加过海湾战争，当时他是机械工。他在纽约度过了郁闷的学生年代。10 岁时，他的母亲离家出走，心灵因而受到重创，从此他变得孤僻、古怪，喜欢怨天尤人，同学们曾挖苦他为“最健谈的人”。这种个性即使在他参军后也没有改掉，他的战友也认为他是个孤独者。退役后，他的思想进一步右倾，加入了抗税反政府的极右团体——密执安民兵组织。

对大多数读者而言，如果提到美国的黑手党、三 K 党抑或光头党，可能还比较熟悉。在美国，三 K 党组织已经有近 100 个，光头党组织近 40 个。这些黑社会组织在美国兴风作浪，是美国国内恐怖活动的主要源泉。但是，民

兵组织在美国也绝不是一个新鲜名词。它是美国独立战争留下来的产物。当年美国争取民族独立的时候，正是康科德的民兵打响了独立战争的第一枪。应该说，这些民兵组织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独立战争胜利后，民兵组织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民兵的组织者认为，组建民兵和拥有枪支，是美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因而不愿意放弃。冷战时期曾出现过一名为“生存者”的民兵组织，目的是探讨在核战争条件下的生存机会。现在，冷战结束了，但这类民兵组织依然存在，而且，成员越来越多。目前已经有40个州拥有民兵组织，他们都拥有枪支，且接受军事训练，水平不低。它们的观点日趋右倾，日益走向它的反面。这类民兵组织差不多是由清一色的白人组成，许多成员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其中还有不少越战老兵，他们憎恨政府，认为联邦政府已经由一小撮代表犹太人利益的集团操纵。他们认为，美国的敌人不是俄罗斯，也不是共产主义，而是白宫的主人。他们以爱国者自居，反对政府的各项政策，尤其是说收政策和枪支管制政策。现在，民兵组织已经让美国政府十分头疼。

联邦调查局从佩里拘留所取走了麦克维，并从他的身上搜到一些可疑的证件，从中发现了另一个嫌疑犯特里·尼科尔斯。警方包围了密执安州康克地区的一所民宅，宅主正是尼科尔斯的哥哥詹姆斯·尼科尔斯。根据詹姆斯的交代，特里在堪萨斯州的特林顿落网。与麦克维一样，特里也是密执安民兵组织的成员。这样，联邦调查局的“一号”和“二号”嫌疑犯均已落网。但是，继续调查发现，特里和麦克维可能还有同案犯，这就是“三号”。密执安州的一位地产商回忆说，一年前，麦克维和特里以及另外一个人曾与他有过接触。当时，麦克维守在门外的汽车里，特里和一个名叫罗伯特·杰奎斯的人走进店中，与他攀谈。特里不怎么说话，而那个“三号”则是滔滔不绝，像是一个头目。于是，根据他的描述，联邦调查局又绘出了“三号”的肖像，在全国通缉。这是一个身体壮实的年轻人，短发、方脸，可能有印第安血统，也可能是夏威夷人。存在“三号”的可能性也得到另外几条线索的证明。章克欣的一位居民说，他亲眼看到麦克维和一个人（不是特里）来这里租车，而这辆车就是爆炸前麦克维租的那辆车。有一位老板回忆，爆炸前不久，有三个人光顾了她的店，点了咖啡。这三个人就是麦克维和特里，以及那个不知名的“三号”。联邦调查局给她看了“三号”的肖像。结果她肯定他说，很像这个人。

“三号”在哪里？麦克维和特里一言不发。从他们的口供中，联邦调查局无法找到“三号”。通缉令发出一年多，“三号”还是不见下落。也许，这个“三号”就像美国存在的许多疑犯一样，不会有下落了。《洛杉矶时报》曾统计过，从1886年至俄城大爆炸，美国共发生过13起重大的爆炸事件，其中7起有凶犯漏网。

恶有恶报

1997年3月底，经过两年时间的准备，麦克维和特里终于在丹佛受审。这是一场艰难的较量，这从审判地点就可以看出。照理，麦克维是在俄城造下的孽，因此，他应该在俄城受审。但是，麦克维的辩护律师偏说，俄城大爆炸死伤太多，小城居民的情绪太过激动，因此，麦克维不可能在俄城受到公正的审判，坚持要让他到千里之外的丹佛受审。仿佛换一个地点，麦克维

的罪孽就会减轻似的。被告律师强词夺理，但也能自圆其说，麦克维如在俄城受审，说不定，俄城的居民就会要求绞死他，这不利于司法公正，于是，检察机关同意了他的要求，麦克维被防弹汽车送到了戒备森严的丹佛市联邦法院。为了防止极右民兵组织再次生事，警方把联邦法院大楼用混凝土障碍物隔开，大楼四周禁止停车，连垃圾箱也搬走了。

挑选陪审员又是一件难事。根据辩方的意思，在俄城受审已经妨碍司法公正，如果陪审员对案情过于熟悉，或是有亲人在爆炸中遇难，麦克维恐怕难逃厄运。因此，在他看来，陪审员离俄城越远越好，最好对俄城大爆炸一无所知，此外，他们最好对联邦政府和执法人员没有好感，这样，他们在审讯中能照顾到麦克维的利益。而检方的意见正好相反。挑选陪审员时，最好他们有亲人在爆炸中遇难，或者有亲朋在联邦政府机构中服务，他们本人最好是具有爱心的教师、护士，或是有同情心的人。这样，只要他们想到俄城那血淋淋的一幕，就不愁麦克维不被判处死刑。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决定，从 1000 名科罗拉多市民中挑选出 64 名陪审员候选人，他们将接受问卷调查，然后经过反复面试和盘问，从中确定 12 名正式的陪审员和 6 名候补陪审员。12 名陪审员，绝大多数是白人，其中 5 位是女性。他们的职业五花八门，有画家、护士，也有教师。他们中，年龄最小的 20 岁，而最大的已是 70 岁的老人了。

麦克维和特里被关在丹佛市联邦法院的地下室里，地下室的临时监狱里有厨房、厕所和淋浴间，麦克维在这里享受的待遇与巴拿马的军事强人诺列加相仿，只是，他们的命运是否一样呢？控辩双方都把希望寄托在陪审团身上。

31 日，审判正式开始。联邦大法官理查德·梅茨仔细介绍了案情，要求陪审团全体成员严格按照证据定罪，切不可带有偏见和恻隐之心，从而妨碍司法公正。检察官莱里·麦基在其起诉书中指控麦克维为右翼极端分子，他之所以制造俄城爆炸，是因为他仇视联邦政府，并想为两年前覆灭的大卫教派复仇。检察官说，已经有多项证据表明麦克维就是制造大爆炸的凶手：首先，当俄城发生那场悲剧后，附近所有的人都赶往现场营救，唯独麦克维一个人驾车外逃。麦克维被捕时，警方曾发现他的衣服上有与案发现场相同的爆炸物残余，在购买炸药化学品的单据上有他的指纹。而且，麦克维曾在事发两周前告诉他朋友，他准备装置卡车炸弹，袭击联邦大楼。而俄城联邦大楼之所以遭殃，是因为在大楼里的人员有十几位参与了围剿大卫教派。发生爆炸案当天，又正好是韦科庄园事件两周年……麦基最后说，麦克维既有犯罪的动机，也有犯罪的证据。俄城大爆炸的凶手，确定是麦克维无疑。

听完莱里·麦基滔滔不绝的指控，麦克维坚决否认。法庭上的他面带倦容，但有时又故作轻松，以显示自己有足够的信心证明自己能打赢这场官司。他的辩护律师史蒂文和罗伯特则口若悬河，为麦克维开脱罪责。他们说，麦克维是冤枉的，真正的凶手已经在大爆炸中死亡。清理现场时，警方曾发现一条无人认领的大腿，那就是凶手留下的，否则，怎么会没有人出来认领这条大腿呢？关于麦克维留在炸药化学品单据上的指纹，律师认为，那是警方实验室根据控方的要求捏造的，而麦克维朋友的所谓证词，则是他的捏造。他想编造一则故事，拿到警方提供的百万赏金，成为一个百万富翁。总之，在史蒂文和罗伯特看来，麦克维是无罪的。

6 月 1 日，经过几个月的听证，陪审员终于达成一致意见。9 点 30 分，

面带倦容的陪审员走进了法庭，他们谁也没正眼看一下麦克维，而是径直走到自己的座位前，麦克维本人表现出些许紧张，不敢正眼看一眼旁听席上的听众。毕竟，这涉及到他的生死问题。

梅茨大法官毫无表情地念起了陪审团的判决结果：控方指控麦克维阴谋推翻政府、利用一种武器进行大规模破坏等 11 项罪名全部成立。法庭上出现一种难以置信的沉寂。麦克维只说了一句“这很好”，就被送出了法庭，而坐在旁听席上的受害者家属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激动。宣判麦克维有罪又怎样，他们的亲人反正是一去不复返了，留在他们心头的创伤将永远无法抚平，痛苦将伴随他们一生。旁听席上传来了压抑的啜泣声。

根据美国法律，陪审团的判决是法官量刑的根据，但是，正式的判决必须由法官来做。因此，13 日，法庭正式宣布，麦克维罪名成立。坐在旁听席上的麦克维的妹妹詹尼佛哭了。而麦克维本人则坐在那里，双手紧握，一言不发。没有人能从他的脸上看出他此时的心情。从旁听席后排的受害者家属席上传来相互握手与拥抱的响声，有的人脸上绽开了笑容，也有的人流下了眼泪。当判决的消息传到法庭外边时，大部分人保持沉默，只有一人因喜极而鼓掌。当坐在轮椅上的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出现在阳台上时，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麦克维被判处死刑，这是美国自 1988 年有些州恢复死刑以来第 14 例死刑判决。如果麦克维不能上诉推翻判决，他将被注射毒药死去。相对于砍头和枪毙的刑罚来说，这种做法可以说是“文明”到了极点。美国人已经考虑到死刑犯伏法时的痛苦，但是，麦克维并没有想到死在他手里的那些无辜者的悲惨，更没有想到他留在人间的苦难。根据美国的司法制度，麦克维可以有几次上诉机会，每次上诉都要经过重新取证、陪审团裁决、法官宣判等一系列程序，因此，要真正执行死刑，还早得很呢。只要麦克维不放弃上诉机会，只要最高法院不作出终审判决，麦克维就可以太太平平地活在他专门准备的监狱里，不过，麦克维被判有罪，总算让受害者家属出了一口气，正义得到了伸张。

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发生后，美国对国内的恐怖活动有所警惕，并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措施。1994 年 7 月 28 日，美国众议院表决通过了一项议案，规定凡使用炸弹或其他恐怖手段伤害人命以及劫机、破坏飞机或其他交通工具，暴力攻击受国际间保护的人物，利用生物、化学、核武器造成人员伤亡的罪犯，就可处以死刑。这是多年来美国联邦政府第一次提出恢复死刑，尽管在此之前美国已有若干州有过死刑，但众议院这个议案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俄城大爆炸发生后，美国政府更是加紧了反恐怖立法。1995 年 1 月 24 日，克林顿总统在他的国情咨文中再次提到这个问题，并于此后不久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建议。国会也一反过去的消极态度，对政府的主张积极配合。4 月 25 日，参议院以 97 票赞成票一致通过决议，以“最强硬的措辞”谴责俄城大爆炸，支持总统和司法部门严惩罪犯的立场，并表示要迅速通过立法加强打击恐怖主义的力度。克林顿政府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反恐怖主义措施，包括增加 1000 名联邦执法人员，建立一个由联邦调查局领导的国内反恐怖活动中心，在出现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恐怖活动时，允许军队参与打击活动，允许联邦调查局拥有某些事先调查恐怖活动的权力，等等。这些措施无疑会加大反恐怖主义的力度，但是，美国能铲除恐怖主义活动的根源吗？那些右翼的民兵组织和黑社会势力如何处置？美国国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如何

解决？这些都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任务。只有找到了罪恶的根源所在，才能采取行动清除罪恶。

震撼英伦三岛的爆炸声 ——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活动 令人震惊的暴力行动

一向诡谲的爱尔兰海那一天变得如此宁静，已经熟悉它的凶险的英国人纷纷拥上海滩，一睹宁静的大海风采。富豪之家则乘上游艇，在碧波荡漾的海面上泛舟。

洋面上，一艘豪华游艇。艇上有七八个人，看来他们是一家子。他们一边用望远镜观察着海滩上的人群，一边不时地发出一阵阵开怀的大笑。

他们不是普通的游客，他们来自一个特殊的家庭——统治英伦三岛和北爱尔兰的英国皇室。游艇的主人就是那个满头银发的老人，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蒙巴顿勋爵。他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表兄，也是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的叔叔。不过，蒙巴顿之所以青史留名，并不是因为他的皇家血统，他确实为大英帝国浴血奋战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围困英伦三岛，日本肆虐东亚和南亚，均已威胁到大英帝国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蒙巴顿临危受命，出任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为反法西斯战争，也为大英帝国的生存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后，作为盟军东南亚战区的统帅，他曾在新加坡接受过日本的投降，又主持过印度的独立，此外，他还担任过英国海军元帅、第一海务大臣、海军参谋长和国防参谋长等要职。可以说，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现在，他已经79岁，英雄暮年，但依然精神矍铄。现在，大英帝国风平浪静，也用不着他再出山了，他该享福了。望着身边的女儿、女婿和两个小外孙，他的心头涌起一股爱意。

“轰”的一声巨响，顿时打破了洋面上的宁静。爆炸！爆炸引起的冲击波形成了一股冲天水柱，伴随着一股血腥味。是蒙巴顿勋爵的游艇发生了大爆炸！他的身体被炸得飞了起来，然后重重地摔入水中。

救生员火速赶到，可他们只看到了勋爵的尸体，看不到那个几分钟前还谈笑风生、有血有肉有思想的勋爵了。与勋爵一起遇难的除了他的外孙外，还有他的亲家、同样出自皇家的多琳女士，女儿、女婿虽然也被炸得血肉模糊，但幸喜还有一口气在。噩耗传出，举国震惊。女王陛下闻讯如遇雷击，正在法国诺曼底赛马场上搏杀的菲利普亲王闻讯立即赶回英国。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代表政府发表讲话，高度评价了蒙巴顿勋爵的一生。她说：“英国人民感谢他的一生，并为他的遇害而感到悲痛。”前首相威尔逊也发表讲话，说：“这是战后世界最大的悲剧。”另一位正在亚洲访问的前首相希思，也中止访问，赶回英国，参加勋爵的葬礼。此外，世界各国政要也纷纷发表声明，谴责这一恐怖主义行径。

制造这起恐怖事件的凶手在事发几个小时后发表了声明，承认这起凶案是他们所为：“爱尔兰共和军对今天处死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一事负责。”人们这才明白，蒙巴顿勋爵原来充当了英国国内矛盾的牺牲品。

那个自称为“爱尔兰共和军”的组织究竟为何物？它为何要处死蒙巴顿勋爵？

殖民者自酿苦酒

蒙巴顿事件是英国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的产物。它涉及两个

民族、一个宗教的两大教派。

今天，大英帝国的全称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它由位于不列颠群岛的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三个部分加上爱尔兰岛的北部6个郡组成。爱尔兰岛的南部26个郡则是爱尔兰共和国的组成部分。因此，实际上今天的英国是由两大民族组成，一个是英吉利民族，另一个是爱尔兰民族，而前者在英国占有多数地位。这是英国民族矛盾的根源所在。这种矛盾应该追溯到800年前。

公元4世纪，凯尔特人登上爱尔兰，开始与当地的土著居民共同生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他们逐渐融合成爱尔兰民族，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但是，爱尔兰人的平静生活在12世纪时被打破。当时一海之隔的英格兰人作为殖民者登上爱尔兰岛。1170年8月，英王亨利二世出兵占领了爱尔兰，并自封为爱尔兰领主。爱尔兰成了英国的第一块殖民地。爱尔兰人民在各方面都深受殖民者的压迫。但是，爱尔兰人并没有就此屈服，他们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反征服斗争。这种斗争在以后的岁月中从未停止过。从某种程度上说，今天爱尔兰共和军的活动与这种斗争在性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斗争手段、斗争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英国征服爱尔兰后，为了达到永久占领的目的，同时也是为了缓和国内的人口压力和阶级矛盾，于17世纪开始向爱尔兰大批移民。这些移民后来成了所谓阿尔斯特人的祖先。他们大量掠夺当地人的土地和财产，并称之为“十字军运动”，这实际上与“十字军运动”风马牛不相及。因为爱尔兰人和英国人信仰的是同一个上帝，只不过英国人信仰的是宗教改革后的英国国教；而宗教改革之风从未吹过爱尔兰海，爱尔兰人信仰的始终是天主教。因此，殖民者在爱尔兰大搞种族歧视和宗教压迫，推行民族同化政策，镇压爱尔兰人民的反抗。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英国护国主克伦威尔就曾亲自统兵进入爱尔兰，镇压爱尔兰人的反抗，并大批屠杀爱尔兰人。据说，死在克伦威尔手下的爱尔兰人占当时爱尔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1801年，根据英爱同盟条约，英国又把爱尔兰并入大英帝国，正式成立“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但是，爱尔兰人不畏强暴，反抗殖民者的斗争从来没有中止过。1905年，爱尔兰人也出现了自己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新芬党，他们代表爱尔兰人，提出了民族独立的政治主张。1913年，爱尔兰又建立起自己的武装组织爱尔兰义勇军，1919年，爱尔兰义勇军改名为爱尔兰共和军。因此，今天的爱尔兰共和军实际上是爱尔兰反抗英国统治的延续。1918年世界大战结束后，爱尔兰在英国大选中，选出的议员大多是新芬党人。他们在都柏林成立了爱尔兰议会，1919年1月，宣布成立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削弱，大英帝国本身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对爱尔兰的民族独立运动，英国政府无力阻拦，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被迫于1921年12月与爱尔兰临时政府签订了协定，承认天主教占优势的爱尔兰南部的26郡为自由郡，后来又独立为爱尔兰共和国。至于说北部爱尔兰地区的6个郡，由于由英国移民的后裔组成的阿尔斯特人占有多数，因此，经过公民投票表决，北爱尔兰继续留在英国。阿尔斯特人的政治代表是阿尔斯特统一党，他们支持英国对北爱尔兰的统治。既然多数人愿意留在英国，那么作为少数的天主教徒的权利也就微不足道了。因此，北爱尔兰继续作为英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存在，在这个地方，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族成了绝对的少数。

虽然说英国素有民主传统，现行的英国政治制度也是反对专制政治的产

物，但是，对北爱尔兰地区出现的这种“多数人暴政”现象，英国的民主制没有提供什么药方。如何保障少数人的权力在西方法律制度史上也是一个争论过的问题，但在北爱尔兰地区却从来没有引起过英国人的重视。政府执行的是多数人的意志，少数必须服从多数。至于说这种多数派的民主制是否会走向极端，导致一种多数派的暴政，英国当局似乎有意回避了这个问题。在英国继续统治北爱尔兰的岁月里，新教徒利用在人数上的优势，大搞多数派专政，在北爱尔兰掌握政权，并拒绝与天主教徒分享权力。在政府部门中，新教徒的人数竟达到天主教徒的四倍。天主教徒在各方面都受到歧视，不仅政治上无权，在就业上也不能与新教徒一视同仁。他们成为政府职员的可能性极小，甚至连当一个熟练工人也不可能。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政治上无权，经济上被压迫，因此，他们与新教徒基本上属于两个不同的阵营，在看待问题的方式上也与新教徒迥异，与那个统治北爱尔兰的英吉利民族，也很难产生民族认同感。显而易见，如果你让一个个申请住房 20 年而不可得的天主教徒去爱他们的“国家”，这不是笑话吗？天主教徒心中只有一种受压迫的感觉。因此，尽管北爱尔兰是大英帝国的组成部分，但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却向爱尔兰共和国的三色旗效忠。这就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祸根。

尽管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从来就没有屈服于英国当局，但北爱尔兰进入动荡、成为一个世界热点，却是本世纪 60 年代以后的事情。相对而言，在 60 年代以前，英国经济处于繁荣时期，此外，工党政府要建设一个“福利国家”，社会保障相对完善，因此，北爱尔兰地区天主教徒在就业、收入等方面的问题相对要少一些。但是，随着大英帝国逐步衰落，英国日益染上一种“英国病”。这种病症使英国经济持续萧条，整个英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危机对原本就比较落后的北爱尔兰地区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北爱尔兰的失业率高居全国首位，而失业大军中，又以天主教徒最多。如 1968 ~ 1969 年，英国的失业率是 8.1%，而天主教徒占多数的伦敦德里地区竟高达 20%。英国政府几乎把所有的投资项目都放在新教徒地区，企业一般很少雇用天主教徒。这样，北爱尔兰地区的天主教徒就难免产生怨愤之心。

尽管联合国国名中有一个“北爱尔兰”，但这个“北爱尔兰”绝不是天主教徒的，而是英国人的。天主教徒在经济上受歧视，政治上也被剥夺参政的权利。70 年代，伦敦德里地区的天主教徒占地区人口的三分之二，但在市议会中天主教徒却只占有 40% 的席位。卢尔根市的天主教徒更惨，虽说他们占全市人口的 40%，但在市议会中，连一个代表也没有。没有一个天主教徒会说这种现象是合理的。但是，新教徒大权在握，天主教徒能有什么办法？1967 年，新教徒在议会选举中再次取得了压倒性的多数，更是强化了自己的统治，对天主教徒进一步实行排斥。绝望之中，伦敦德里地区的天主教徒也奋起抗争，而新教徒掌握的警察部门竟然进行干涉。1969 年 1 月，警察驱散了从贝尔法斯特到伦敦德里地区的人民民权进军队伍。这下子更让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看清了自己在联合王国的地位。长期郁积在心中的怨气一下子爆发出来，大规模的骚动爆发了。8 月，伦敦德里地区的天主教徒筑起了街垒，阻止新教徒进入博格赛德区，并成立了“自由德里”。为了镇压天主教徒的骚动，英国政府又向贝尔法斯特和伦敦德里地区派去了万名军队，以维持秩序，也就是维持新教徒的统治。这更激怒了天主教徒，他们拿起武器，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权利。部分天主教徒选择了这条道路，北爱尔兰从此失去宁静。枪声和爆炸声响成一片，鲜血、眼泪和汗水交织在一起。爱尔兰共和军也就

在这种背景下崛起了。

爱尔兰共和军继承了爱尔兰民族反抗英国殖民压迫的传统。它主张通过武装斗争使北爱尔兰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由于英国政府的镇压，长期以来，共和军在北爱尔兰并不成气候。但是，时势造英雄，60年代末英国独特的政治气候为爱尔兰共和军的重新崛起提供了条件。人们发现，几乎在一夜之间，共和军壮大了许多。

共和军原先分两个派别，这就是所谓临时派和正式派。正式派主张应该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斗争，光靠暴力不可能达到目的。因此，群众集会、工人罢工都应该参加。它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爱尔兰工农共和国，在全爱尔兰打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很明显，正式派与当时的国际大气候是分不开的。但是，它的这种主张在北爱地区却是行不通的，老百姓根本不相信通过政治手段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历史经验告诉他们，新芬党当年就是主张搞政治运动，结果在现实面前碰了一鼻子灰，他们当然不能重走老路。面临时派的主张比正式派简单了许多。它没有政治目的，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独立，回到爱尔兰。是否成立“工农共和国”，它根本没想过。它的手段也只有一条，那就是：暴力，通过暴力迫使英国政府让步，让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统一起来。在他们看来，只有暴力才能产生轰动效应，才能达到目的。临时派的主张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有根强的示范性和说服力，因此，正式派很快让位于临时派，今天我们提及爱尔兰共和军，实际上就是指临时派。临时派大行其道，北爱尔兰的爆炸声也就此起彼伏。

1972年1月，北爱尔兰地区的天主教徒在伦敦德里地区再次举行民权游行，驻守在北爱尔兰地区的英军向示威群众开枪，结果导致13人死亡，史称“血腥的星期天暴行”。几个月后，共和军还以颜色，一天之内在贝尔法斯特制造了26起爆炸事件，炸死11人，炸伤130人，被称为“血腥的星期五事件”。仅1972年一年，它就炸死了460余名英国军警和平民，而在过去的20余年中，为英国军警逮捕的天主教徒亦达8000余人。北爱尔兰地区的警察局长安涅斯利表示，过去的五年内有2500名天主教徒被捕。这么多天主教徒不可能都是共和军的恐怖分子，英国警察滥施暴行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共和军当然也不会示弱，这样，就有了路易斯·蒙巴顿勋爵遇难事件。

实际上，蒙巴顿绝不是第一个死于共和军的达官显贵。爱尔兰共和军一方面向新教徒开刀，另外一方面也忘不了他们苦难的根源所在。在他们看来，英国政府的头面人物应对英国的殖民政策负责，因此，拿他们出气完全合理。在蒙巴顿之前，他们已经杀了伊丽莎白二世的一个侄儿。1976年，又杀了英国驻爱尔兰共和国的一个大使。就在1979年3月蒙巴顿勋爵遇难之前，共和军的杀手竟然追到海牙，除掉了英国驻荷兰大使理查德·赛克斯，接着又在伦敦炸死了撒切尔首相的顾问、保守党北爱尔兰事务发言人艾雷·尼夫。可能觉得除掉这些人还不够解恨，因此，他们设计炸死蒙巴顿，以产生一种轰动效应。仿佛蒙巴顿之死还不足以让他们解气似的，两个小时后，他们又用两枚炸弹炸毁了英国伞兵乘坐的军车，当一架直升飞机赶来救援时，他们又用火炮将其击落。共和军认为，只要它能杀死足够多的英国士兵，英国的公众舆论就会迫使政府坐下来与共和军谈判，最终解决从北爱尔兰撤军的问题。为了加大打击力度，共和军不仅在北爱尔兰地区从事恐怖活动，还把它的触角伸到整个英伦三岛，甚至欧洲大陆也能感受到共和军的存在。一名共和军的高级代表曾说：“英国佬不会在乎他们的士兵死在北爱尔兰，但是当

这些士兵死在自己的家园时，这就不得不使英国政府作出反应。我们希望英国士兵明白，他们的危险不仅在于北爱尔兰，在西德、荷兰同样也有危险。”在此后的10年时间里，北爱尔兰地区的爆炸声几乎天天不断，天天有人为此流血。据统计，从1969年至1982年，英国共发生了8000余起爆炸事件，给英国造成的损失高达110亿英镑，2000余人因此而丧生。

铁女人

但是，共和军的炸弹攻势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新教徒依然在北爱尔兰独掌大权，天主教徒的经济状况依然不见好转，更重要的是，在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的统一问题上，没有取得一点进展。英国政府和爱尔兰政府为此进行过多次协商，但收效甚微。1973年，英国政府曾就北爱尔兰的归属问题进行过一次公民投票，但投票结果让共和军沮丧。多数人赞同留在英国。有大多数人的意见撑腰，英国政府说什么也不会向恐怖分子的炸弹屈服。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军又在策划更大的行动。

1981年3月，贝尔法斯特上空乌云密布，一场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3月1日，关在梅兹监狱中的爱尔兰共和军战士桑兹等4人宣布开始绝食。他们的目的很简单：要求英国政府给予被俘的共和军战士以“政治犯”待遇，而不是现在的恐怖分子待遇。他们认为，他们是力争取民族独立而被英国当局逮捕的，他们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与那种对社会不满的刑事犯罪分子不同。因此，他们是政治犯，应该享有政治犯的待遇。具体地说，也就是在监狱中不穿囚衣，不参加监狱里的体力劳动，囚犯之间可以相互交谈，等等。但是，桑兹等人的要求被英国政府拒绝了，在政府眼中，他们哪里配称政治犯。政治犯有理想，有目标，而共和军除了暴力外，又有什么理想呢？因此，狱方拒绝了桑兹等人的要求。北爱尔兰事务大臣迈克尔·艾利森冷地对记者表示：“如果绝食的犯人想死，那就让他们去死吧！”英国政府如此态度，让共和军恼羞成怒。既然你不怕压力，那我们就试一试吧，看你能否顶住各方面的压力。这样，桑兹等人就开始绝食。消息传出，北爱尔兰地区的天主教徒群情激愤，他们纷纷走上街头，声援共和军分子在狱中的行动。桑兹的母亲和姐姐也出现在游行的队伍中。他母亲称：“我儿子已经作好死的准备，我们全力支持他。”在他们的心目中，不管共和军干的是什么勾当，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祖国的统一，是民族英雄，支持他们理所当然。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桑兹等人绝食40天后，在北爱尔兰的弗马纳-南缔龙地区的补缺选举中，身为囚犯的桑兹竟然被补选为英国下院议员。这种现象让英国政府手忙脚乱，惶恐万分。一个囚犯，竟然能成为国家的下院议员，要对国家大事、政府的决策品头论足，成何体统！议会赶紧立法，禁止犯人参加议员竞选。但是，由于桑兹当选已是既成事实，议会电无办法。好在桑兹刑期未滿，谅他不会翻天。至于说有一个议员是囚犯，一个议员在狱中绝食是否会影响英国的国际形象，那就顾不上了。反正即便桑兹是议员，他还是一个囚犯。他是否绝食，还是艾利森那句老话：如果他想死，那就死去吧！而桑兹的意见是：既然已经当选为英国议员，那他就不会放弃他的议员席位，也不会放弃绝食。要么大获全胜，成为一名政治犯，要么就作为一个议员光荣地死去。其他途径一概不考虑。

英国政府决意不顾桑兹的死活，可国际社会、新闻媒介和社会公众却不

能无动于衷。人命关天，哪能看着一个人就这么死掉呢？新闻媒介好不容易抓到一个重大题材，说什么也不会轻易放弃，于是各种传媒大炒特炒桑兹的狱中情况，桑兹的每一个细节、他的身体状况，全都成了报道的热点。国际社会也表现出异常的热情，各种组织、各个国家纷纷派出说客到英国调解。美国的特使来了，罗马教皇的特使来了，欧洲人权委员会的特使来了。他们或是去白厅劝说撒切尔夫人网开一面，答应桑兹的要求；或是去狱中劝说桑兹放弃绝食。但是，对他们的劝说，英国政府一步不让，最后，各位说客全部无功而返。

绝食进入 50 天，由于缺乏维生素，绝食者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几名到监狱看过桑兹的爱尔兰议员断言，桑兹只能活五六天了。在监狱外面，共和军开始了新一轮暴力行动，旨在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他们扬言，如果桑兹死去，共和军将发动全面进攻。而撒切尔夫人依然硬着头皮说：“他们既然自愿求死，那就让他们死吧。当局尊重其个人意愿，但他们的要求，当局一概不能接受。”撒切尔夫人一句话，决定了桑兹等人的命运。1981 年 5 月 5 日，在绝食 66 天之后，桑兹终于死去。愤怒的天主教徒立即走上街头。妇女们猛敲垃圾桶，用这一独特的方式把消息传遍整个北爱尔兰。愤怒的天主教徒开始捣毁房屋，焚烧汽车，围攻警察。英国政府紧急空运 600 名士兵，到北爱尔兰地区维持秩序。撒切尔夫人在下院发表演说，声称：“对共和军囚犯让步就是给他们颁布屠杀无辜的许可证。”“今后不管有多少人绝食，政府永远不会给共和军囚犯以政治犯待遇。”此言一出立即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应。包括英国的盟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发生了抗议活动，而爱尔兰的抗议者甚至用石块向英国大使馆发动袭击，此举如果发生在北爱尔兰，无疑会被当局认定为恐怖事件。美国的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甚至宣布抵制英国船，12 小时内不为其卸货。新泽西州议会甚至通过了谴责英国、赞扬桑兹的决议。法国人喊出了“撒切尔夫人是杀人犯”的口号。但是，英国政府仍不为所动。一周后，第二名绝食者死去；又过了九天，第三名绝食者也步其后尘，撒手人寰。5 月 21 日夜 11 时 29 分，首批参加绝食的共和军战士全部死亡，又有一批囚犯自愿接替了他们的位置，开始了新的绝食。

由于英国政府的强硬态度，共和军的声望空前提高，共和军在北爱尔兰地区如鱼得水，成员急剧增加。与此相对应的是北爱尔兰地区的爆炸活动成倍上升。这也不奇怪，因为已经落人法网的共和军战士还在狱中战斗，仍然自由的共和军战士有什么理由苟且偷生呢？唯有加紧战斗，才能报答狱中的同伴。这样，英国政府的日子就难受了。北爱尔兰天天有炸弹爆炸，天天有人流血死亡，且向英国警察发动袭击的并不全部是共和军歹徒，平民百姓甚至妇女、儿童都参加了向英国人复仇的战斗。他们拿着自制的燃烧瓶，勇敢地向英国军警开火，以致英国军警实在无法分清谁是共和军歹徒，谁是平民。撒切尔夫人表面上坚硬如铁，实际上被搞得焦头烂额，心神不宁。但是，她的铁女人的本性在这个关键时刻表露无遗。对于共和军的要求，她一口拒绝，不肯放松半点。她深知，此时她只要稍微心软一点，共和军的计划就会得逞，此后他们还会故伎重演，英国政府将难以招架。拼着在国际社会留下骂名，也胜于成为大英帝国的最后一个掘墓人。英国政府不愿屈服，共和军也不愿让步，监狱里的共和军战士就成了牺牲品。绝食仍然在继续，当绝食坚持了七个月的时候，共和军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此次绝食，前后已经死去了 10 个人，其中包括两个国家的议员，一个当然就是那位带头绝食、并在监狱中

当选为英国下院议员的博比·桑兹，另外一位是爱尔兰共和国的议员基米·多尔蒂。他大概是为了向英国政府和爱尔兰政府施加压力，自愿参加绝食的，此刻也已命赴黄泉。上天有好生之德，大量的犯人在狱中死去，还有更多的人等着死去，北爱尔兰的天主教会看不下去了。独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斗争也得分步走，这么死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因此，它说服犯人家属，在犯人进入昏迷状态时，把他们送到医院紧急救治。这样，尽管犯人的身体已经毁坏，但起码可以保住一条生命，将来好看着英国政府屈服。不过，这样一来又带来了另外一个后果。绝食本来就是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英国政府不怕犯人死去，我就死给你看，看你的心肠有多硬。由于天主教会的举动，人是不会再死了，绝食的目的也就不会达到，从而绝食也就失去了目的性。最后，犯人同意放弃绝食。英国政府和撒切尔夫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在长达七个月的绝食过程中，撒切尔夫人的铁石心肠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铁女人”的外号不胫而走。对一个母亲和女人来说，这个外号肯定不雅，但对于大英帝国的首相来说，这个外号是绝对需要的。大英帝国昔日的辉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谁能力挽狂澜？看来非这位铁女人莫属了。恰好一年之后又发生了马岛战争，阿根廷出兵占领了马尔维纳斯群岛，危及了大英帝国在南大西洋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又是撒切尔夫人力挽狂澜，向阿根廷水域派出特混舰队，一举“收复”了马尔维纳斯群岛。撒切尔夫人成了大英帝国的救星，“铁女人”的外号叫得更响了。

不过，在这场由绝食引起的交锋中，我们却绝不能简单地认定，以铁女人为首的英国政府就是胜利者。表面上看，绝食者最后自己放弃了绝食，英国政府并没有承认他们为政治犯。但实际上，通过绝食行动，共和军的威望空前提高了，共和军的队伍壮大了，桑兹等人以其铮铮铁骨，在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心中树立起民族英雄的形象。因此，共和军的行动得到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共和军的发言人曾对记者称：“我们新增加了足够的人力，起码可以再打10年。”从这个意义上说，爱尔兰共和军无疑是这次斗争的胜利者。

再从绝食的直接目的而言，共和军也是当之无愧的胜利者。不错，绝食期间，英国政府是没有答应共和军的任何条件，但是，绝食结束没多久，英国政府就宣布了改革监狱制度的一揽子措施，其中包括，犯人可以不穿囚衣，可以作有限的交往，劳动的时间也减少了。这实际上就是爱尔兰共和军当时的要求，只不过英国政府死要面子，死活不肯承认罢了。与其把这些优惠条件给予共和军一家，不如施予全体犯人，也好让国际社会对英国的人权状况说两句好话。

对于撒切尔夫人的强硬态度，不用说，爱尔兰共和军是恨之入骨。于是，一起起直接针对撒切尔夫人的行动就出笼了。

1984年10月11日，英国保守党的头面人物云集苏塞克斯郡的布莱顿饭店。这天晚上保守党年会将在这里召开，保守党领袖、首相撒切尔夫人也将出席这次年会。由于保守党是执政党，因此，内阁中的13名大臣也将出席这次会议。可以说，英国政府的所有政要今天都将在此亮相。保安部门为此进行了细致的工作。年会召开之前，保安部门已经对大楼进行了严格的安全检查，警犬已经把大楼的每个角落都嗅遍了，没有发现任何情况。

凌晨2点50分，撒切尔夫人冲完淋浴，走出卫生间，来到办公室，坐到了书桌旁。她刚刚拿起手边的文件，只听一声巨响，大楼里发生了爆炸。爆炸过后，整个大楼一片漆黑，人们争先恐后地逃出大楼。不过，忙乱之中，

也有责任心较强的保守党员，他们担心大乱之后有人会趁火打劫，把重要文件抢走，因此，一直坚守岗位，半步也不敢动。闻讯赶来的救生人员则开始救援行动。他们借助微弱的电视摄像机的光线，扒开残垣断壁，抢救受困人员。事后检查，此次爆炸共有4人丧生，34人受伤，其中不乏一些保守党的头面人物，连撒切尔夫人内定的接班人、贸易和工业大臣诺曼泰比特也在受伤的人员中。救援人员发现，大爆炸发生在五楼首相的卫生间，爆炸过后，整个卫生间不知去向，爆炸的目标是谁可想而知。人们这才惊呼：“首相在哪里？”忙乱之中，撒切尔夫人在菲利浦亲王的陪同下出现在慌乱的人群前面。她依旧衣冠楚楚，只是面带些许怒色。她说：“我们非常幸运地还活着。天亮后，让我们照常开会吧！”

上午9点50分，保守党年会如期举行，撒切尔夫人在人们的欢呼声中，登上了讲坛。她首先谴责了半夜发生的恐怖行动。说：“炸弹袭击，是一种最不人道的、不加任何区别地对无辜者进行的残害，这种想改变政府意志的行为，是永远不会得逞的。”但是，这次事件的策划者爱尔兰共和军却不管它能否得逞。当天下午，共和军的发言人称：“我们装在饭店里的那枚100磅重的炸弹，今天给了英国内阁和保守党的战争贩子一个教训。撒切尔夫人现在将意识到，英国不能占领我们的国家，折磨我们的被俘人员，在街头枪杀我们的人而不受到惩罚。”他直言不讳地说：今天的目标就是撒切尔夫人，但今天“不走运，但要记住，我们只要有一次走运就行了，而你们却必须总是走运。只有给爱尔兰以和平，才不会有战争”。

不过，共和军实在不算走运。1988年6月，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共和军又策划了一次针对撒切尔夫人的行动。他们准备在撒切尔夫人会议结束离开加拿大时，用萨姆-7型导弹把她的座机击落。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共和军还派去了杀手，就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会场附近下手。但是，由于情报泄露，美国中央情报局提前一步了解到这个重要情报，于是采取了十万火急的措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保安人员联合行动，一起承担保卫英国首相的任务。加拿大空军也进行紧急演练，派遣战斗机护航。如果有必要，它将发射干扰装置，使共和军的导弹失灵。一向沉着冷静的撒切尔夫人，此次再也沉不住气了。她连忙将座机换成装有导弹防御装置的飞机。而英国侦探无意之中又发现了共和军的一个杀手，并将其捉拿归案，三国的情报人员这才算松了一口气。爱尔兰共和军这次虽然飘洋过海，但功亏一篑。但是，它仍不死心，放出风来：“下一次，撒切尔夫人就不会这样幸运了。总有一天，我们会把她收拾了。”

“屋大维”行动

在北爱尔兰进行的这场恐怖与反恐怖行动，共和军是步步进逼，次次主动，而英国政府则是步步防御，消极应变，明显反应不力。因此，共和军的势力甚嚣尘上，英国政府无能为力，眼看着共和军成长为欧洲第一大恐怖组织。特别是随着德国“红军派”、意大利“红色旅”、法国“直接行动”和西班牙的“埃塔”等恐怖组织被剿灭后，北爱尔兰问题及爱尔兰共和军就显得尤为突出了。人们纷纷对英国政府提出批评，英国政府也深知北爱尔兰问题久拖不决，影响英国的形象。尤其对共和军这样的恐怖主义组织，英国政府束手无策，这与英国的大国地位是很不相称的。

应该说，英国在反恐怖方面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论资历，英国的特勤总部可以说是世界上资格最老的警察机构，英国的两大情报组织——军情五局和军情六局，也是历史上资格较老的情报机构。美国的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法国的对外安全总局、领土监护局，算起来只能是他们的后辈，可是，为什么他们在反恐怖方面能取得突破，而英国却一直裹足不前？有识之士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对照爱尔兰共和军的几次行动，英国反恐怖组织存在的局限就更明显了。

1988年12月22日深夜，呼啸的寒风肆虐着英伦大地。伦敦南部克拉彭地区的人们早已进入梦乡，这个时候却有一个人在大街上踟躅独行。他看上去很年轻。从他行路的特征看，他并没有什么目的，只不过是一个在大街上打发时间的流浪汉。

突然，他发现一幢大楼前面停着一辆汽车，眼睛不由得一亮。他走上前去，啊，是辆绿色的法国产雷诺车，车子还真不错，看上去同新的差不多。他立即动心了。看看四下无人，他毫不犹豫地敲碎了汽车的挡风玻璃，将手伸了进去，准备拧开车门。突然，车厢里的毛毯下跳出一个人，举手对着流浪汉就是一枪。流浪汉手捂胸口，倒了下去。车厢里的人拉开车门，急速奔回大楼。几分钟后，他与另外一个人飞奔出来，跳上汽车，一溜烟地开走了。

枪声引来了巡夜的警察，路上除了一具还有微温的尸体外，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有那幢楼的底层还亮着灯。警察找上门去，楼里空无一人。但是，他们从大楼里发现了100磅塑料炸弹、引爆器和定时器等物件。此外，警察还看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列着制造一枚迫击炸弹大约需要多少炸药。大楼主人的目的，一望可知。警察这才明白，他们撞到了爱尔兰共和军的军火库里来了。多亏了流浪汉，他的冒险行动使恐怖分子仓皇逃走了，要是平日里他们误撞上来，只怕躺在大街上的就不是那个流浪汉了。

继续搜查没有发现什么线索，除了知道这里是共和军的秘密军火库及共和军正在组装迫击炸弹，还有这两个恐怖分子名叫希伊和艾林顿外，没人知道共和军的具体行动目标。线索中断了。这是众多无头案件中一起，反正那个流浪汉也不会从地下爬起来向警察索命，因此，警察也放弃了调查。这幢房子很快也有了新主人。两周后，房主决定换掉地毯。他掀起地毯的一角，意外地发现了一本护照，护照的主人就是希伊。警方闻讯后赶了过来，再对房子搜查了一遍，但依然一无所获。一个月后，房主决定把客厅里的暖气片换掉，结果又发现了一本《名人辞典》和一份名单，名单上开列着几十个人名，全部是英国的各界名流。显而易见，开列名单的人对名单上的名字并不熟悉，以致必须借助于《名人辞典》。同时发现的其他文件还有制造迫击炮的计划和一本偷来的美国护照。很明显，这还是与希伊和艾林顿有关。这下子，警察着急了。希伊和艾林顿很明显想拿这些社会名流开刀，其阴谋一旦得逞，影响可就大了。如果事发后追查下来，他们知情不报，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于是，他们马上将这一个月来的发现原原本本地向上司报告。英国政府决定，给名单上的人提供特别的保安措施，于是，“屋大维”行动出笼了。警方派出数以千计的警察向共和军可能攻击的目标进行24小时的全方位监控，并把2000多有可能遭到共和军暗杀的各界名流严密地保护起来，警察住进了他们家花园里的小屋或是其他什么房间。但是，几个月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正当警察庆幸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时候，意外的情况出现了。一天晚上，

汉普郡蒂特伯里爵士的住宅附近出现了两个可疑的人。他们身穿厚大衣，随身带着枪，其中一人负责警卫，另一个负责检查汽车。三名负责警戒这座住宅的警察听到声音后，迅速走了出来。警官命令手下人准备射击。宁静的夜空中，枪栓声格外清晰，可疑人被惊动了。他们跳上自己的汽车，急速离去。警方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溜走而无可奈何。随后，警方开始追查这辆汽车，最后在威尔特郡找到了它。威尔特郡的警察立即与伦敦取得了联系，伦敦方面要求他们跟踪这辆车及车内的人员，以摸清情况，找到其他可疑分子。这本是反间谍中常用的手法，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威尔特郡的警察并不听命于伦敦，他们自行一套，逮捕了两名嫌疑犯，并将他们关入布里克斯顿监狱。不可思议的是，这两个嫌疑犯竟然与监狱外边的人串通一气，把武器运进了监狱，然后两人持枪逃跑。越狱在英国并不是新鲜事，当年震动英国的间谍王布莱克就是与监狱外边的人串通好越狱，并逃往苏联的。但像这种拿着武器公然越狱，在英国狱政史上还是闻所未闻。共和军的活动更是肆无忌惮了。1991年2月7日，共和军竟然向首相官邸发射了三发迫击炸弹，气急败坏的警方进行了严密的搜查，但什么也没有找到。尽管如此，英国政府还是声称，在对付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活动方面，政府已经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绩”。但明眼人一看就知，政府这是在吹牛，共和军的活动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更厉害了，简直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共和军已经做到想什么时候出击就什么时候出击，想向谁出击就向谁出击的地步，根本不把英国政府放在眼里。在任英国首相也几度遭到刺杀，幸喜爱尔兰共和军的阴谋没有得逞。为了对付共和军的炸弹，政府只得加固大楼和军营，并为此支付了数亿英镑的加固费。尽管英国政府在对付恐怖分子方面也“不遗余力”，但几年中抓到的共和军恐怖分子寥寥无几。他们只搜到了15吨土制炸药、40余支枪和3000发子弹，但这对于享誉世界的“炸弹专家”爱尔兰共和军而言只不过是九牛一毛，根本不会有什么影响。在捉拿恐怖分子方面，英国政府的收获更少，他们只起诉了25名与爆炸事件有关的嫌疑犯，只有8人受到正式起诉。这种成绩，怎么说得上是“相当出色”？

应该说，共和军在遭受几次有限的挫折后及时转变了作战方针。过去，共和军习惯于“大兵团”作战，一有作战计划，大家一起行动。这种方针威慑力大，易于产生较大的震撼力；但是，一旦失手，造成的后果也较为严重，容易全军覆没。1988年3月6日，在英国殖民地直布罗陀，共和军就遭到过一次这种挫折。当时，共和军的三名骨干齐集直布罗陀，准备采取行动。其中，30岁的麦克凯恩是最优秀的枪手，24岁的塞维奇是个出色的爆破专家，31岁的玛丽·花拉尔更是出了名的“恐怖皇后”，她四处活动，与其他恐怖组织联络，是共和军的“外交部长”。但是，由于英国警方事先接到了情报，得知他们要在直布罗陀行动，于是精心组织力量，将三人一举击毙。共和军遭到了少有的挫折，而英国警察则难得出了一次风头。这次挫折后，共和军就改变了做法，不再派高级恐怖分子一起行动，而是组织飘忽不定的“行动小组”，分别负责侦察、后勤和行动，专门在英国及欧洲大陆从事恐怖活动。这种“行动小组”往往几人一组，由一人负责，小组成员相互之间并不熟悉，只有负责人才掌握本组成员的人数和姓名，而其他人一无所知，甚至与他们的上司也没有什么联系。他们的信念是只要有机会就下手，尽一切可能去大打出手。此外，小组之间也不产生横向联系，这样，一旦一个小组暴露，也绝对不会危及整个组织的生存。而对付这种灵活机动的“行动小组”的英国

反恐怖力量，却依然分成几大块，各自为战，互不通气，互不帮助，甚至相互拆台。在英国，负责反恐怖措施的是所谓特勤部队。特勤部队成立于 1883 年，论资格是够老的了，它就是大名鼎鼎的苏格兰场。但是，它的人数总共只有 2000 人，专门对付爱尔兰共和军的只有 500 人，其他人员分布在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按职责，皇家北爱尔兰警察总部专门负责对付在北爱尔兰的共和军分子，很难说清它与特勤部队之间到底有何区别与联系，职责分工也不明确。另外，与反恐怖事务有关的还有大名鼎鼎的军情五局和军情六局，这是两个情报机构。前者负责在英国国内的反间谍事务，它听命于内务部。后者是英国的主要情报搜集机构，负责在海外搜集与英国安全利益有关的情报，它的上司是外交部。这两个机构在情报搜集方面都很出色，但是，根据有关规定，它们并无权直接从事反恐怖活动。军情五局虽然负责反间谍事务，但它并不具备警察的职能。也就是说，它的主要任务是确定间谍，但如果要对一个间谍采取行动，那就必须由警察机构执行。军情五局尚且如此，军情六局就更不用说了。

应该说，英国各个警察机构都是精兵强将，但是要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非要各方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但这种合作事实上在英国警界根本就不存在。

为了对付神出鬼没的共和军，英国政府也绞尽脑汁，如成立专门对付恐怖分子的 S013 快速反应部队，无论何处有恐怖行动，它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现场，但是，这个组织在英国警界却遭到了令人吃惊的冷遇。虽然自己在对付恐怖分子上无能，但说真的，谁也不愿意让别人跑到自己的地盘上指手画脚。因此，在克拉彭事件发生后，英国警方三次搜查都找不到共和军活动的证据也就不奇怪了。在案件分析会上，各方不是总结经验教训，而是相互谴责，相互扯皮。这种体制下，各家机构很难进行真正的合作，而没有合作，英国又怎能在反恐怖事务上取得进展呢？

1992 年 5 月 9 日，英国终于在反恐怖事务的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内政大臣贝克宣布，今后英国本土的反恐怖活动将由军情五局牵头。军情五局终于获得了它梦寐以求的反恐怖事务领导权，这种权力，它的美国同行联邦调查局是早就获得了的。不料，贝克的决定一宣布，立即引起轩然大波。特勤总部首先就不乐意。过去，特勤总部与军情五局是平起平坐，如果贝克的措施真正落实，特勤总部岂不是要听命于军情五局？这是苏格兰场绝对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在内阁会议上，特勤总部就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认为军情五局在搜集情报和反间谍事务上可能有一些经验，但在对付爱尔兰共和军方面，军情五局可能还嫩了点，因此，贝克的决定充满了书生气。真正有经验对付共和军的，只有特勤总部。但是，由于贝克的决定已经宣布，特勤总部也无法改变。于是，它就采取了一系列的对抗措施，如向媒介透露军情五局过去的种种“劣迹”，让军情五局在世人面前丢人出丑。军情五局岂是好惹的，你说我的坏话，我就不能窃听你的电话？于是，双方就上演了一出闹剧，最后，军情五局甚至要改组特勤总部。

军情五局与特勤总部之间的扯皮还没有结果，共和军可等不及了。它正好利用这段混乱时间，好好干一番事业。1993 年 4 月 24 日，共和军决定在伦敦闹市中心放置一枚 1000 磅的炸弹，按惯例，共和军提前一个小时，于 9 点 20 分用众所周知的代号向伦敦警方发出了警告。共和军此举当然不是什么好意，它只不过是為了显现一下自己的威力，也为了制造更大的混乱罢了。

警方反爆破小组马上发出警报。按规定，他们应该在 10 分钟内赶到现场，可是，几名反爆破专家这次都不在岗位上。一名正在伦敦北部某地检查一枚没爆炸的二战时留下的手榴弹，另一位因病外出休养，还有一位在伦敦郊外的家中。反爆破小组急忙通知这位在家办公的老兄，可没等他赶到现场，炸弹却按时爆炸了，结果造成一人死亡，四十余人受伤。这次爆炸的成功，对共和军来说无疑是一大胜利，而对英国警方来说无疑是一大打击。政府高层更加痛切地感到，必须加强各个机构之间的协调，否则，英国无论如何不可能打赢这一场反恐怖之战。政府开始考虑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机构，把各个机构里有特长的成员集中在一起，以便更有效地打击恐怖活动。这个机构的总部将设在伦敦，其领导人将与情报机构的领导人平起平坐，可以直接见到首相和内政大臣。但是，这就能避免各家机构之间的扯皮吗？天晓得这一招是否有效。

永远的背影

在长期的反恐怖斗争中，英国警方也摸到了共和军活动的一些规律。各家机构尽管老死不相往来，但吃亏的次数多了，大家都认识到，要有效地对付共和军的恐怖活动，非得在共和军内部安插内线不可。于是，军情五局、北爱尔兰皇家警察总部和苏格兰场都出动了各自的资深特工，要他们打入共和军内部。要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这就像培养一个间谍一样，非得下血本，放长线才能钓大鱼。

谁最容易取得共和军的信任？当然是那些在北爱尔兰土生土长的天主教徒。起初，英国警察认为所有的天主教徒都是恐怖分子，最起码也是共和军的同情者。但事实是，并不是所有的北爱尔兰天主教徒都铁了心为共和军卖力，除了“独立”与“统一”这些看起来很重大的事情外，他们还有一些自己的切身利益，这些利益是共和军无法满足的。加入共和军，固然是为了泄愤，但同样也是为了解决自身的生存危机。如果可以通过另外的途径解决这种危机，那么有什么必要去从事共和军那种高风险的“职业”呢？因此，很多天主教徒随遇而安，得过且过。这样的人，你只要诱之以利，他是会给你卖命的。英国警方看准了这一点，并选准对象，进行投资。很快，这些投资得到了回报。

1983 年 7 月 20 日晚，伦敦多米尼昂剧院座无虚席，2000 名观众正在等待着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出席今天的晚会。很多人渴望一睹年轻王妃的风采。今晚会的主题是为查尔斯基基金会筹资，因此，王妃将出席这次晚会。

8 点钟，查尔斯和戴安娜准时出现在大剧院，顿时，大剧院里掌声如潮，人们用热烈的掌声来表达自己对王子和王妃的敬意。那时的查尔斯和戴安娜刚刚结婚两周年，两人的“蜜月期”还没有过去，表面上还沉浸在卿卿我我之中，威廉王子也才 13 个月，因此，两人手挽手出现在观众面前。王妃还时不时地向观众挥手致意。

演出按时开始。杜兰·杜兰和迪尔·斯特雷茨两个流行乐队果然身手不凡。观众们如醉如痴，沉浸在演出中。然而，他们都不知道，如果不是一个名叫肖恩·奥卡拉汉的共和军战士及时提供情报，共和军今天晚上将把大剧院炸掉，让英国王位继承人在爆炸声中升天，让戴安娜王妃在观众眼中消失，让威廉王子成为孤儿，也让观众成为殉葬品。英国将遭受有史以来最大的恐

怖事件的袭击，其影响绝对超过共和军处死蒙巴顿勋爵，英国的君主制也将被撼动。

当肖恩十多岁时，他就成为一个共和军战士了。这也难怪，在当时北爱尔兰种族冲突的大背景下，不知有多少个像肖恩这样的青年，由于家庭的熏陶或社会的影响，小小年纪，心里已经充满对英国政府的刻骨仇视。因此，不用共和军多加劝说，肖恩毫不犹豫地入伙了，成为一个嗜血的恐怖分子。他年龄不大，但已经于过两起谋杀勾当，其他类型的恐怖活动不计其数。在共和军眼中，他是一个坚强的战士，一个能担当重任的人。因此，当共和军参谋长凯文·麦肯纳决定，策划一次惊天动地的行动时，肖恩就成了一个最合适的人选。肖恩受命与另一名共和军战士米歇尔·海斯接头，策划暗杀查尔斯和戴安娜的具体细节。随后，肖恩使用一本假护照，在一名妇女、两名儿童的陪同下，从北爱尔兰抵达威尔士。在人们看来，这是一个恩爱的家庭。不久，肖恩就收到了海斯运来的炸药，包括 25 磅烈性炸药、25 磅高爆塑胶炸药以及一个定时器，他将把这些炸药安放在多米尼昂剧院的卫生间的地砖下面。卫生间离皇室包厢仅一墙之隔，炸弹的威力足以使整个卫生间化为齑粉，顺便把在皇室包厢里就座的查尔斯和戴安娜送上西天。

幸运的是，肖恩已经与共和军离心离德。他已经与英国警方接触，成为苏格兰场的卧底间谍。因此，他一方面实施这些恐怖计划，另一方面，他又把他的所作所为报告了苏格兰场，共和军的谋杀阴谋落空了。但是，肖恩也知道，如果他的身份暴露，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共和军对叛徒是绝不留情的。一旦阴谋败露，共和军怀疑的首先就是肖恩和海斯这些计划执行人，因此，他有被共和军处死的可能。为了能继续在共和军里埋伏下去，他与自己的控制人合演了一出逼真的假戏。5 月 27 日，苏格兰场向全国发出通缉令，捉拿肖恩这个至今仍逍遥法外的恐怖分子。新闻媒介此次也作了紧密配合，报纸、电台连篇累牍地报道了肖恩的恐怖行动，说他是飘忽不定的共和军行动小组的骨干，即将在 6 月 9 日的英国大选中暗杀政府要员。而在此前一天，肖恩已经用假护照乘公共汽车到达巴黎，一天后再次返回北爱尔兰，向共和军负责人报告，他不能再返回英格兰，那样太危险了。几天之后，他也借助于新闻媒介，“驳斥”了苏格兰场对他的指控，说他这几年一直没有到过英格兰，何来这么多恐怖行动？

由于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共和军负责人也没有意识到会出现这种问题，因此，无法临时派人去顶替肖恩的位置，此次暗杀计划只得放弃。但尽管如此，英国警方还是如临大敌，7 月 20 日，警方出动大量的警察，将剧院围得水泄不通，警犬被带进剧院，四处乱嗅，剧院上空甚至还有直升飞机盘旋。

肖恩的身份还是暴露了，为了保命，他只得向警方求救。为了打击共和军，破坏它的形象，警方决定对肖恩进行公开起诉。1988 年 4 月，在贝尔法斯特的法庭上，检察官指控肖恩犯下了 42 项罪行，其中包括两起谋杀，但是，检察官没有指控他图谋暗杀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他被判处 539 年徒刑，此生他是注定无法活着走出监狱了。只有呆在监狱里，他才有一点安全感。也许，这就是一个共和军叛徒所能得到的最好结局。

马丁·麦加特兰出生于西贝尔法斯特的巴利墨菲地区。与肖恩一样，他从小就接受了新芬党和共和军的教育。他的两个亲戚甚至是新芬党的重要成员，因此，对共和军麦加特兰是熟悉的。不过，当时他并没有想到今后自己也要成为一个共和军战士。虽然独立和统一对每一个天主教徒来说都是一件

美好的事，但是，统一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如果统一能不费力气，甚至只需要自己举举手，呼呼口号，那么统一确实是一件可贵的事情，如果要自己也要为之出力，甚至要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那就不是所有天主教徒都乐于干的了。麦加特兰就属于这后一种人。他向往统一，但并不愿意为之全身心地投入。因此，他算不上那种狂热的共和军支持分子。他同情他们的事业，但只愿意成为一个看客，而不愿身体力行。要不是他后来家境发生变故，他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共和军战士。

天有不测风云。15岁那年，麦加特兰的家庭发生变故，他被迫中止学业，流浪街头。对于他这么一个不想为共和军献身的人来说，这是危险的一步。因为流浪街头意味着他被社会抛弃，意味着他已经成为共和军的同情者。不管他自己是怎么想的，反正人们看到漫无目的在街上闲逛的麦加特兰，就意识到，一个共和军战士又要诞生了。

麦加特兰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以为警察都去管那些持枪抢劫杀人的凶案去了，而对他这种小偷小摸，警察是不会看上眼的，抓到了，最多不过挨一顿训斥，警察不会拿他怎样。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有一位名叫费利克斯的警察对他格外关心。每次这位和蔼的警察总要问他几个问题，有时甚至一天要问上几次，因此，麦加特兰心里也颇为纳闷，弄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怎么惹上他的。后来他才知道，在北爱尔兰皇家警察部队服役的费利克斯是奉上司之命有意与他套近乎。他回忆道：“他们不只是想利用你几个星期，而是要寻找一种长期的关系。他们知道，在我生活的那个地区，人们是很容易加入共和军的。”因此，警方的真正意图是把他培养成亲英分子，最终打入共和军，为维护大英帝国的统一效劳。于是，每一次警察传讯他时，总要给他提供一些爱尔兰共和军积极分子的照片，让麦加特兰提供有关他们的情报。麦加特兰每提供一次情报，警察就给他几十英镑，这比在街上乞讨或偷窃好多了，麦加特兰很乐意这么干。由于他干得出色，警方后来甚至给他提供了一辆汽车。麦加特兰干起来就更起劲了。本来作为共和军后备力量的麦加特兰就这样被北爱尔兰皇家警察部队收买了。不过，警方并不是想单纯让麦加特兰充当密探，那太容易了。它想让麦加特兰利用他的有利身份，打入共和军内部，从内部破坏共和军组织。

1989年，警方向麦加特兰提出了这个要求，但麦加特兰并没有立即答应。他知道这件事的风险。当了北爱尔兰统一事业的叛徒不说，这件事的风险太大了，搞不好会丢了性命。共和军对付叛徒是不会仁慈的，一些共和军成员仅仅因为没有顺利完成任务就遭到了上司的严厉惩罚。一些人的膝盖骨甚至被击穿，成为废人，更何况是对那些有意打入共和军内部的奸细。因此，麦加特兰犹豫再三。但是，这件事的利益也是巨大的。如果他顺利成为一个共和军分子，那么，他将作为英国警方的密探，从英国政府拿到大笔金钱。这些钱，也许他一辈子也挣不到。诱惑力太大了，只是他不知道这些可能带来的收益是否会抵消这件事的风险。何去何从，麦加特兰实在很难选择。

就在麦加特兰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帮助他作出了决定。一个共和军成员，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欺负了麦加特兰，这让他气愤万分。麦加特兰将此作为奇耻大辱，因此答应了北爱尔兰皇家警察部队的要求，同意加入共和军，成为大英帝国的密探。由于他生活的地区是共和军活动的大本营，因此，对哪些人是共和军，如何与他们接触，他还是知道的。他整天在共和军战士出没的酒吧附近逗留，寻找与他们接头的机会。终于有一天，他

看到了一个熟人，此人正是共和军成员。麦加特兰一看时机成熟，立即向他表白，自己愿加入共和军，为打击英国的殖民利益而奋斗。看到有人愿意为共和军的事业出力，那人也答应为麦加特兰充当介绍人。一天，麦加特兰被带到贝尔法斯特安德森斯敦区的一所房子里，共和军的负责人将对他进行考察。对此，麦加特兰并不担心，因为，他的出身、他的经历是他的护身符。根据共和军精选战士的条件，麦加特兰天生就是一个共和军战士的料。共和军的负责人告诉他，加入共和军，就意味着要尽一种可能被捕入狱或丧失生命的义务，他考虑好了吗？虽然共和军以矢志统一爱尔兰为己任，也要求全体北爱尔兰天主教徒理解、同情共和军的事业，但它并不要求全体天主教徒都是共和军战士，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麦加特兰回答说：“我已经考虑清楚了，我要为爱尔兰的统一事业尽自己的义务。”这样，麦加特兰就成了一名共和军战士。在老战士的陪同下，他举起了拳头，进行加入共和军的宣誓仪式。

麦加特兰成了共和军某个行动小组的成员。这是共和军最低的一个职位，老战士是不会成为特别行动小组成员的。一是老战士大多身经百战，英国警方多有他们的资料，如果他们出动，那么英国警方必定会全力缉拿，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二是这些身经百战、久经考验的老战士也是共和军一笔珍贵的财富，可以说，没有他们，也就没有共和军，因此，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这笔财富不会轻易拿出来使用。三是像麦加特兰这样的新入伙者，虽然经过严格的甄别，但是，他的可靠性到底如何，是否有行动能力，这些还得以在实践中检验。加入行动小组就是最好的检验手段。行动小组会时不时地出击一下，其成员随时都有丧失生命的可能。如果麦加特兰能经受住这种考验，那么，他的忠实性可以保证，他的行动能力也无庸置疑。

麦加特兰很快成了行动小组里最出色的一个成员。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司机，而且因为他机智、勇敢、灵活，严守纪律。因此，麦加特兰很快就成了行动小组里最可信赖的成员。行动小组很快就发现离不开麦加特兰了，该行动小组也因而成为共和军在北爱尔兰地区最活跃的一个小组。

麦加特兰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虽然他表面上效忠于共和军，但实际上他一直没有与费利克斯中断联系。每次他们成员聚会，平时难睹真容的共和军战士，无论他的身份高低，此时都摘下面罩，因而，麦加特兰认识了不少共和军人物，他把这些人物的真实情况都报告了费利克斯。至于说每次行动的内容，他更是提前报告。这样，共和军就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一天，一群英国士兵在班戈的一家酒店里举行舞会，共和军想利用这个机会对英国士兵采取突然袭击，把他们全部杀死。麦加特兰及时把这一消息报告了费利克斯，结果，两名共和军战士在搬运武器的时候被警察逮捕了，共和军的恐怖活动没有得逞。还有一次，他向北爱尔兰皇家警察总部报告了一处共和军的军火库地点，警察紧急出动，结果查获了 1500 磅炸药，另有 15 名共和军战士因而被捕。

一连串的失败引起了共和军高层的注意。在以往的行动中，共和军很少失手，可自从共和军里增加了一个能干的麦加特兰后，失败就接踵而至。而且，每次失败的行动，麦加特兰总是不在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新入伙者难道是英国警察打进来的探子？不敢肯定。麦加特兰所在行动小组的成员几乎都死光了，就剩下麦加特兰了。这个告密者不是他又是谁呢？因此，疑点集中到麦加特兰身上。终于有一天，麦加特兰接到通知，要他到西贝尔

法斯特新芬党总部康诺利大厦去与一个名叫帕特里克的人接头。一听到这个消息麦加特兰就魂飞魄散，因为他知道康诺利大厦既是新芬党总部，也经常被用作共和军的审判大楼。这个帕特里克是共和军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对待那些吃里扒外的叛徒，帕特里克从来没有手软过，而被他认定有问题的人，也几乎没有生还过。麦加特兰认定，这一次大难临头，他是难逃厄运了。现在怎么办？逃走吗？没有机会。共和军看中的人，几乎没有一个能逃脱它的追捕。麦加特兰在共和军里几年，对共和军的心狠手辣已经不是耳闻，而是目睹了。而且，在接受审判之前逃跑也等于是自我暴露。毕竟，共和军现在只是怀疑他，但是否能真正抓到他的把柄，现在还说不准。说不定他有机会挺过去呢？倒不是麦加特兰铁心为英国警察卖命，他也没那么高的觉悟。要不是英国警察对他的悉心关照，特别是那个仁慈的费利克斯的培养，麦加特兰说不定早就是一个共和军战士了。如果有机会挺过去，以后他就不怕共和军的审查了。

逃走是死路一条，硬挺下去可能也是一条死路，但毕竟还有百分之几的生还可能。麦加特兰仔细盘算了一下，决定充一次好汉，硬着头皮顶下去。于是，他壮着胆子，向康诺利大厦走去。

来到康诺利大厦，出乎意料的是，他没有见到令人胆战心惊的帕特里克，出来接待他的是新芬党的两个人。他认识他们，一个叫吉姆·麦卡锡，另一个叫保罗·汉密尔顿，外号叫“刺头”。麦卡锡在1977年曾因私藏军火被判过五年徒刑，出狱之后，他的身价倍增，现在是康诺利大厦里的红人。比之于麦卡锡，汉密尔顿更是共和军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以前在贝尔法斯特为共和军重要人物开车，1977年因谋杀罪被判处12年徒刑。当时，他被指控谋杀一位英军少校。在英国女王视察贝尔法斯特期间，有一支车队在经过福尔斯路时被拦截下来，后又被放火焚烧了。少校所在的陆军部队负责清理废墟，结果少校中弹身亡，而谋杀者就是汉密尔顿。有了这份经历，汉密尔顿在共和军的地位就更耀眼了。他被认为是比麦卡锡更忠于共和军的事业。

现在，接待麦加特兰的就是这么两位人物。他们告诉他，帕特里克在贝尔法斯特郊区的一处居民点等他。麦加特兰心想，我的身价不低啊，这么多头面人物都出动了，看来今天是难逃此劫了。这个时候他不再抱幻想了，而是想如何逃走了。他四处张望，指望能看到一个警察，这样好把他救走，但是他失望了。

“请吧，麦加特兰先生。”看着麦加特兰的神态，汉密尔顿心中知道他在想什么。一个对共和军忠心耿耿并坐过12年牢的人，心中最恨的就是吃里扒外的叛徒了。如果不是有纪律，他马上就想结果这个家伙。

麦加特兰被挟持着上了一辆白色的福特车。汉密尔顿干起了他的老本行，而麦卡锡就陪麦加特兰坐在车的后座，监视着他。麦加特兰发现，车子一直在兜圈子，在十字路口绿灯将熄未熄的时候，汉密尔顿突然加速，福特车一溜烟地冲了过去。身为司机的麦加特兰当然知道，汉密尔顿这是在甩掉跟踪的车子。他心里完全绝望了。

几分钟后，小车停在特温布鲁克居民区的一幢大楼前，看着这灰蒙蒙的大楼，麦加特兰的肠子都悔青了。不该为了一点钱就加入共和军，这下子要赔本了。

他被带到三楼一间房子里，里面的设施齐全，与普通民居没有两样。麦卡锡转过身来宣布：“共和军临时派宣布，你被捕了。”说完，他们抽下他

的鞋带，捆住了他的手腕和脚踝，然后又把他拟倒在地，用毯子蒙住了他的脸。麦加特兰立即陷入一片黑暗之中，他明白，死神可能随时光顾他，帕特里克就不一定见到了，他也没有了申诉的机会，而戴着头盔的共和军内部安全小组随时可能前来执行死刑。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外面突然传来马达的轰鸣声和喧闹声。麦卡锡和汉密尔顿立即转向窗外。麦加特兰请求两位看守让他去一下厕所，麦卡锡不假思索就同意了。于是，他爬起来，艰难地向厕所挪动脚步。等他从厕所里出来，他发现麦卡锡和汉密尔顿还盯着窗外。原来，很多警察出现在这一片居民区，把居民都惊动了，而这两位看守，都在担心警察随时可能闯进来。

天赐良机。一定是费利克斯发现我失踪了，于是派警察前来找我。此时不逃，更待何时？于是，他奋不顾身地向窗外蹦去。由于脚踝还被绳子捆着，因此，他的跳动实在与青蛙没有什么差别。窗口到了。麦加特兰没有犹豫，向窗玻璃奋勇撞去。虽然不知道外面的情景，但麦加特兰肯定，这是他最后的逃生机会了。也许他会一头栽在地上死去，也许他会缺胳膊少腿，但也许他会活下去。

顾不得了。麦加特兰跳了下去，而后面的麦卡锡和汉密尔顿也清醒过来了。但是，已经太晚了，麦加特兰已经落了下去，窗玻璃破碎的声音、他落地时重重的撞击声以及女人的惊呼声交织在一起。他们赶紧冲下楼去，发现麦加特兰虽然头部开裂，身上鲜血直流，人已经昏了过去，但还有一口气。他们匆匆地把他拖走，但更多的妇女赶了过来。她们惊叫着，麦卡锡和汉密尔顿不敢继续拖下去了，他们放弃了麦加特兰，自己逃走了。

妇女们叫来了救护人员，麦加特兰被送进了医院抢救。真幸运，手脚都被捆着的麦加特兰从三楼坠下，竟然没有死亡，医生们也啧啧称奇。麦加特兰大难不死，为了防止共和军的追杀，英国警方把他转移到马斯格雷夫帕克的军事医院作进一步检查。

苏格兰场这次表现得很够义气。他们没有抛弃麦加特兰，为他买了一幢住宅，让他居住。但是，共和军也没有忘记麦加特兰，因为据说有40个共和军战士死在他手里，他们要找他复仇。于是麦加特兰不得不隐姓埋名，四处躲藏。他的未婚妻回老家探亲的时候，共和军立即找上门来，要她说出麦加特兰的住址。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让她受够了，最后她也离开他走了。麦加特兰的弟弟约瑟夫也成了共和军追击的目标。有天早晨，他与女友坐在家聊天，突然有两个人闯进门来。他们自报家门说是“爱尔兰共和军”，然后用他的袜子把他的嘴堵起来，用胶带蒙住他的脸，把他吊在栅栏上，用铁棍不断地抽打他，最后把他扔进一辆货车里。经检查，约瑟夫被打断了四根肋骨、两条腿、一条手臂。约瑟夫受到这种待遇，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是麦加特兰的弟弟，血管里流着与麦加特兰相同的血液。一天抓不到麦加特兰，共和军一天就不会放松。26岁的麦加特兰将不得不适应这种生活。

征程漫漫

自1969年共和军正式恢复恐怖活动以来，近30年的时间过去了。这30年里，北爱尔兰地区炸弹声不断，几乎每天都有人在流血，为此，冲突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30年的武装冲突中，有3000人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这其中部分是英国军警、共和军成员，但是，更多的是北爱尔兰地区的

平民百姓。今天的北爱尔兰乡村布满了深沟高寨，活像中世纪的城堡。不同的是，今天毕竟不是中世纪了，传统的城堡上布上了电网。这哪里像是庄园，倒像是一座监狱。实际上，生活在城堡里的人，与监狱里的人感觉可能没有多少不同，他们的情绪甚至还没有犯人那样稳定。毕竟，呆在监狱里的犯人只要遵纪守法，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人找他的麻烦。但是，今天的北爱尔兰人不知道哪一天会碰到炸弹，因此，他们整天惴惴不安。这种恐怖气氛，如果人的心理素质不好，那是很难适应的。共和军的炸弹炸得北爱尔兰人人自危，炸得北爱尔兰满目疮痍，炸得英国政府坐卧不安。

出路何在？没人知道。英国政府一方面加紧武力镇压，一方面又打出和谈旗帜，企图把共和军引到谈判桌上来。大英帝国本来就沉痾不起，每年还要向北爱尔兰提供 40 亿英镑的财政补贴，另外支付 10 亿英镑的军费开支。如果能去掉这些负担，毫无疑问对大英帝国将是一种解脱。国际社会也在作这方面的努力，这方面美国表现得尤为积极。美国有 4000 万爱尔兰后裔，他们是共和军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共和军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源源不断的援助。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竞选时就对北爱尔兰的“人权”状况表示过关注，当选总统后更是在发展美国与爱尔兰的关系上一马当先。他先派爱尔兰裔的肯尼迪家族成员到爱尔兰当大使，又派民主党领袖到爱尔兰当“经济特使”，并且不顾英国的反对，邀请新芬党领导人查理·亚当斯访问美国，费尽心机要把共和军劝说到谈判桌上来。

1992 年底，梅杰取代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梅杰对北爱尔兰问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灵活性。1993 年底，英国和爱尔兰共和国发表宣言，英国政府表示，尊重多数北爱尔兰人的选择，如果他们愿意，英国将提出立法，实现爱尔兰的统一。而爱尔兰共和国也表示，在没有获得北爱尔兰多数人同意的前提下，强制实行统一是错误的。如果北爱尔兰问题能实现全面的政治解决，爱尔兰也将修改宪法，不再强调自己对北爱尔兰拥有主权。在宣言中，双方还同意，只有共和军宣布永久放弃武力后，其政治代表新芬党才能加入和平进程。

30 年的军事行动，共和军没有达到目的。相反，由于滥施暴行，共和军人心丧失。在人们心目中，共和军差不多就是青面獠牙的暴徒。过去，共和军还能得到利比亚、爱尔兰等国的支持，但在国际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大背景下，共和军的外援越来越少了，共和军越来越孤立了。因此，它也迫切需要改变形象，休养生息。

1994 年 8 月 31 日，共和军宣布，自该日午夜零时起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同时要求英国政府释放政治犯、举行有各方代表参加的北爱尔兰问题谈判。长期生活在准战争状态下的北爱尔兰人民终于看到了一丝和平曙光。因此，共和军一宣布停止军事行动，立即受到各方的欢迎。爱尔兰共和国总理雷诺兹说：“这是朝北爱尔兰和平进程迈出的重要一步，和平解决北爱尔兰问题的历史性机遇已经到来。”梅杰首相对停火也表示出有限度的欢迎。美国则在 8 月 31 日当天宣布要向北爱尔兰提供经济援助。但是，对和平能持续多久，却是没有一个人敢打保票，因为北爱尔兰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死结，要解开它并不容易。从共和军方面来讲，用武力实现统一，希望不大，而用和谈方式实现统一更是不易。因为大部分北爱尔兰人都是新教徒，他们怎么可能愿意在另外一个国家充当少数民族呢？而天主教徒也不会放弃统一的愿望。因此，这个死结是无人能解开的。事实上，在共和军宣布停火的第二天，即有

一名天主教徒被新教徒极端分子杀死。9月5日，新芬党设在贝尔法斯特的办事处又遭到炸弹袭击，新教徒准军事组织“北爱尔兰志愿军”宣布对此负责。共和军当然也不是好惹的。1996年2月9日晚7时，一颗重约500公斤的炸弹在伦敦东区的多克兰爆炸，造成2人死亡，100多人受伤。而在此之前的一个小时，共和军通过一家电视台宣布：共和军极不情愿地宣布，将终止“完全停止军事行动”，新一轮恐怖行动又开始了。

1995年底和1996年初，克林顿访问英国和爱尔兰，企图进一步推动北爱尔兰的和平进程。同时，美国成立了米切尔为首的解除武装委员会。该委员会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在有关各方的协调下，提出了一份《米切尔报告》，报告中提出了北爱尔兰和平谈判的六项基本原则。报告出笼后受到各方关注。梅杰政府一方面宣布接受《米切尔报告》，另一方面又提出北爱尔兰尽快进行选举，选出参加和谈的代表，其用意昭然若揭：新教徒在北爱尔兰占有多数，选出的代表必定是新教徒无疑，而新教徒是支持北爱尔兰留在英国的。因此，新芬党表示，梅杰此举是要剥夺天主教徒的代表权，把和谈变成新教徒的天下。爱尔兰也表示，如果英国坚持这个方案，那么英爱关系将肯定受损。

1996年6月，根据英国和爱尔兰共和国作出的决定，有关北爱尔兰前途问题的谈判开始举行。由于共和军拒绝作出停火决定，因此，它的政治代表新芬党也被排斥在和谈大门之外。于是，共和军再次掀起一阵炸弹狂潮，以引起人们对它的重视。10月8日，共和军爆炸了英国驻北爱尔兰驻军指挥部，结果造成多人死亡，其中包括一些平民。共和军发表一项声明，说它对英军指挥部被炸一事负责，同时把责任推到英国政府头上，说共和军为了推动北爱尔兰的和平民主进程，在今年2月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长达17个月的停火，但英国政府并未作出回应，而是把共和军放下武装作为新芬党参加和谈的先决条件，从而失去了一次推动北爱尔兰和平的历史性机遇。声明指出，这次行动的目标主要是英国军人，因为他们支持英国对北爱尔兰的殖民统治，至于说有一些平民在爆炸中受伤，它表示遗憾。声明还说，只有通过广泛的和谈，才能找到解决北爱尔兰冲突的办法。与此同时，新芬党的领导人亚当斯也批评英国政府在1994年共和军宣布停火的时候，没有进行理智的谈判，因此，此次爆炸的责任应由伦敦承担。他还说，他时刻准备与英国和爱尔兰政府坐下来谈判，以寻求一条解决走出危机的出路。但是，这一条路他能找到吗？

狮子的愤怒 ——印度的国内矛盾与恐怖主义活动 总理府的枪声

1984年10月31日，星期三，印度首都新德里。

像平时一样，英迪拉·甘地早早起床，首先进行体育锻炼，然后浏览首都出版的各种英文报纸。8点钟，她用完早餐，但她没有像平时那样，急急赶往办公室上班。今天，她既不想像平时那样处理公务，也不想接待来访的群众，而是在家陪伴两个可爱的孙儿。前天，她的长子拉吉夫·甘地的一对儿女，拉胡尔和普里扬卡在上学途中遇到车祸，受了一点惊吓。孙子们并没有什么感觉，但她却感到心惊肉跳。不知为什么，最近她一直担心有人要绑架她这对命根子，因此，她宁愿放弃公务，也要陪伴一下孙儿。她看着孙儿用完早餐，才心满意足地离去。

当然，今天她也并不是完全空闲。秘书告诉她，早上10点钟，英国著名记者、作家彼得·乌斯丁诺夫要对她进行电视采访，为她摄制一个时长20分钟的电视记录片。她已经答应了他的要求，因为乌斯丁诺夫是她的老朋友，专程从英国赶来，也属不易；再说，这对扩大她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也很有好处。乌斯丁诺夫跟随她到奥里萨邦去了两天，今天还将在总理府拍摄几个镜头，使这个有“铁女人”之称的总理更具人情味，现在，他的摄像机已经架好，只等她到来，就可进行采访。

采访地点就在总理办公室，距总理寓所很近。虽然两个地点的门牌号码不同，一个叫沙夫达尔琼路一号，另一个叫阿克巴路一号，但实际上都在总理府范围之内，相距只有30余米。两座建筑之间有一座花园，面积不大，但颇为雅致，与总理府的整体结构也极为协调。总理府号称印度第一府第，但远远比不上一般的豪门建筑，只是占地略大，有10亩左右，而且也不是常人想象中的深宫大院。围墙很矮，行人踮起脚就可以看到里面长得郁郁葱葱的树木和爬满青藤的房屋。

通常，甘地夫人穿过一条用石子铺成的甬道去办公室上班，甬道的顶端是两个拱门，各有戒备森严的卫兵警戒。近日风声很紧，有人放风说要暗杀总理等国家要人，安全部门也作了必要的戒备。总理府周围的警戒明显加强了，门前街道的两端，竖起了“前方修路，车辆行人绕道行走”的牌子。街道旁边的树荫下，三三两两的便衣警察正在值勤。对此，甘地夫人一笑置之。倒不是她不怕死，而是因为总理府的戒备本来就很森严。印度政府保卫重要人士的蓝皮书规定，总理周围至少有三重警戒，第一道是由一些经过专门训练的贴身保镖组成，他们要忠心耿耿，机智灵活，必要时，要能以自己的身体挡住射向总理的枪弹。第二道防线由德里武装警察中的精锐分子组成。第三道由印藏边境突击队员组成，他们一个个会使用多种武器，擅长擒拿格斗。有这三道防线，甘地夫人的安全可以说是万无一失。因此，甘地夫人今天并未穿防弹背心。毕竟，就这么一条几十米长的甬道，何况她已经走了不知多少年了。

今天陪同她前往办公室的是她的私人助理R.K.达万，两名侍从和一名保镖跟在她的身后。那个身着便装、缠着大包头、蓄着大胡子的保镖名叫本特·辛格，信仰锡克教，是总理卫队的副队长，今年33岁。他是总理的亲信，跟从总理已经有10个年头，担任总理的贴身保镖也已经有8年时间，对总理忠心

耿耿。自 1984 年金庙事件后，总理卫队中许多锡克教卫兵已经被更换，但辛格仍然在位。曾有记者问：“你让锡克教卫兵留在身边是否放心？”甘地夫人看了一眼跟在她左边的本特说：“有这样好的锡克人在我身边，何惧之有？”

一行人来到拱门处。进入拱门，就算进入了总理办公室。拱门处一个卫兵持枪向甘地夫人致敬。他也是缠包头、蓄胡须的锡克教徒，名叫萨特万特·辛格，5 个月前刚刚调入卫队。现在，他向总理行持枪礼，通常，甘地夫人也会双手合十，说声“那玛斯特”，向他还礼，但今天她还没有来得及这么做，意外的情况就发生了。一直跟在甘地夫人后面的本特一见总理来到拱门边，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来到甘地夫人面前，转身从头巾中抽出手枪，枪口指向他心爱的总理。甘地夫人吃惊地说：“你这不是发疯了吗？”但没等甘地夫人闪避，本特就向总理连开 5 枪，然后，盯着站在拱门边的萨特万特，似乎在说：“你为什么还不动手？”看到同伴谴责的目光，萨特万特似乎也发了疯，自动步枪对准了甘地夫人，向着她的身体扣动扳机，3 秒钟的时间内，他射出了 25 发子弹。

事发突然，人们根本来不及作出反应，甘地夫人已经躺在血泊之中，她的肝、肺、大肠等脏器都被子弹打穿，双眼圆睁，躺在地上，血流如注，她身上的橙黄色服装被血浸透了。而此时，本特也打光了手枪里的子弹，他对着急奔而来的卫兵说：“该干的我已经干完了，来干你们所要干的吧！”在其他卫兵的枪口下，两名凶手束手就擒。但是，就在他们被押入警卫室时，本特却一跃而起，向一个卫兵猛扑过去，企图夺过他手中的枪支，萨特万特也从头巾中掏出匕首，意欲作困兽之斗。但反应过来的卫兵岂容他们反抗，一阵乱枪射去，本特被击毙，萨特万特也受了重伤。

枪声响起之时，甘地夫人的儿媳、拉吉夫·甘地的妻子索尼娅正在楼上烫衣服。听到枪声，直觉使她感到婆母发生不幸。她发疯似地冲下楼去，高喊：“妈妈，啊！上帝，妈妈！”与甘地夫人同去办公室的私人秘书达万也从惊慌失措中反应过来，他指挥卫兵们迅速将甘地夫人抬入总理专用的白色大使牌小车，风驰电掣地开往全印医学科学院医院。小车中，索尼娅把婆婆的头搁在自己的腿上，好让婆婆减轻一些痛苦。

全印医学科学院是印度最高医学学府，它的医院也是印度最好的医院，其设备最先进，集中了全印度最好的医生。平时，医院备有总理等国家要人的详细病案，并存有与甘地夫人血型相同的 O 型血。本来，医院与总理府有直通电话联系，但忙乱之中，谁也没有想到使用这部专线电话，以至于当大使牌小车到达医院时，医生根本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事情，连手术室的门也打不开。

12 名医学专家应召前来对甘地夫人进行抢救。经过初步检查，甘地夫人身中 16 弹，其中有 7 颗子弹穿透了她的腹部，1 颗击中她的心脏，还有 8 颗子弹留在她的体内。此时的甘地夫人，除了肾和肺还有轻微跳动之外，其他重要器官都已经停止工作。因此，几分钟后，意外伤亡科大夫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就写下了如下诊断：“无知觉，脸色苍白，无脉搏，下肢变冷，测不到血压，瞳孔放大，对光无反应，呼吸停止，未听到心音。”如果是一个普通病人，医生早就放弃了抢救，但由于受伤的是国家总理，因此，医生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来进行抢救。一个小时后，抢救出现效果，心电图突然出现一些间断曲线，这是生命尚未终止的征象，医生大受鼓舞，赶紧把她送往医

疗大楼的8层2号手术室进行手术。18名医生，分工负责，有的负责手术抢救，有的负责取出子弹，动用了医院最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她输了88瓶鲜血，还临时找了5名与甘地夫人血型相同的人献血。无奈甘地夫人大限已到，再高明的医生也没有回天之力。下午1时20分，医生宣布，英迪拉·甘地总理已经死亡。13分钟后，印度报业托拉斯正式宣布，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遇刺身亡。消息传出，举国震惊。

“维多利亚女皇”

英迪拉·甘地，1917年11月19日出生于德里，她是印度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独生女儿。据说，她出生时颇不受欢迎。尼赫鲁家族是印度的名门望族，自1716年起，尼赫鲁家族就奉命进京做官，此后一直备受恩宠。说实在的，大家都希望尼赫鲁家族的新一代继承人能青出于蓝，一见生了一个女孩，尼赫鲁的母亲首先就闷闷不乐，但他的父亲莫蒂拉尔则说：“我们对自己的孩子男女有别吗？不是一样疼爱他们吗？贾瓦哈拉尔的这个女儿可能抵得过1000个儿子！”相传1236年即位的印度第一位女皇莱席亚的父亲阿尔塔米谢苏丹也有过类似的说法。不过，当时他说这位将来要当上女皇的女儿“虽然是个女子，但也有男人的头脑、男人的心，要比20个儿子强得多”。莫蒂拉尔竟然说自己的孙女要胜过1000个儿子，岂不是说自己的孙女比印度第一任女皇还要强吗？当时，这终究是一句气话而已，因为他说完这话后就走开了。尼赫鲁家族的新继承人不是个儿子，显然让他十分失望。

不过，英迪拉是不会让人失望的。以后的事实证明，她确实胜过男人，岂止是胜过1000个儿子，她是全印度几亿男人的主宰。她的父亲是印度著名的民族主义者，是印度的开国总理。英国殖民者的监狱，他曾九进九出。受他的影响，英迪拉小小年纪就投身于印度的民族解放事业，英国殖民当局的监狱，她也坐过八个月。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出任印度首任总理，对英迪拉更是着意培养，英迪拉成了父亲的左膀右臂。她协助父亲处理政务，陪同父亲出访外国。1959年出任国大党主席，成为仅次于尼赫鲁的领导人。尼赫鲁去世后，她成为内阁部长。1966年1月，又当选为印度第三任总理，成为全印度叱咤风云的人物。

如果说国大党的元老重臣在刚开始推荐英迪拉出任这个职务时主要考虑到她的软弱和易于控制的话，那么，事实很快证明他们错了。英迪拉虽然是个女流之辈，但其刚毅和对权力的欲望一点也不亚于其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很快就用“带刺的玫瑰”一词来形容她。事实上甘地夫人许多措施是很强硬的，如为了巩固她的权力，她不惜与国大党元老派闹翻，并重组国大党（英迪拉派）。她的治国方略基本上源自她的父亲，但人们仍可以看到英迪拉的印记。如她坚持混合经济政策，但实际上，她对私营经济也逐渐放松，到80年代初更实施开放政策。在对外关系上，她也坚持尼赫鲁的“不结盟政策”，70年代坚持偏向苏联，80年代又向回摆，但主旨只有一个：充分维护印度的民族利益。在对待邻国关系上，英迪拉也超过她的父亲。如她发动第二次、第三次印巴战争，最终肢解了巴基斯坦，这个目标是她的父亲想干而没有干成的。由于她的成功，人们送了她一顶“维多利亚女皇”的“桂冠”。

当然，“女皇”的治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她前面，固然有坦途，但

也不乏崎岖之路。如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就是她竭力想处理好而没有成功的例子，最终她因这些矛盾而喋血总理府。

印度本来就是民族、宗教和语言的博物馆，国内民族林立。据统计，印度的大民族有 10 个，小民族有几十个。印度的主体民族是印度斯坦族，主要分布在北印度，约占全国人口的 46%，其他的大民族有泰卢固族、孟加拉族、马拉地族和泰米尔族，人口都在 9% 左右。

宗教信仰更是色彩斑斓。世界各大宗教在印度几乎都有信徒，但印度第一大宗教为印度教，信徒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 83%，此外，穆斯林占了 11%，基督徒占了 3%，锡克教徒占了 2%。由于历史原因，这些教派之间积怨很深，宗教矛盾十分突出。民族矛盾再加上宗教矛盾，就使得印度社会动荡不宁，对此，历届印度政府也缺乏良策，只好任其发展。

在印度的主要宗教教派中，锡克教和伊斯兰教是两个重要的教派。印度的宗教矛盾，归根到底，就是印度教与这些少数派宗教之间的矛盾。印度独立时，位于今天巴基斯坦的穆斯林不愿归印度教徒统治，因此，他们在真纳的领导下扯起义旗，与圣雄甘地倡导的独立运动分庭抗礼，最终成立了巴基斯坦。但尽管如此，由于印巴分家采取极其野蛮的形式，英国殖民当局用红笔在地图上大笔一划，因此，仍然把大批穆斯林留在了印度境内，不得与本族同胞聚居，他们心中的愤恨可想而知。

锡克教徒的情况更糟糕。锡克教原是宗教改良运动的结果，是从印度教中产生出来的。它与印度教之间的关系，就像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关系一样。15 世纪下半叶，印度大部分地区处于莫卧儿王朝统治下，莫卧儿王朝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印度教被排斥，宗教迫害事件层出不穷。为了弥合两大教派之间的矛盾，身为印度教徒的那纳克周游各地，在信徒中宣传和睦共处的精神，从而成了一种新宗教的开山鼻祖。他的弟子自称“锡克”，意为“弟子”。第五个师祖阿尔朱·马尔以阿姆利则为中心，将锡克人组成宗教团体，他的儿子哈尔·戈宾德则为锡克人输入了好斗精神，并力图使锡克人成为一个既不同于印度教也不同于伊斯兰教的宗教组织，第十代师祖戈宾德·辛格完成了这一进程。他规定，锡克教徒的名字中必须加上“辛格”二字，意为“狮子”。所有的锡克教徒，留长发，蓄胡须，戴发梳，佩短剑，穿短裤，以旁遮普语为本教语言。锡克教的主要经典是《格兰特·沙哈卜》，其教义主要来自印度教虔诚派，并摄取了伊斯兰教义中的神秘主义。它提倡修行，反对祭司制度，崇拜偶像。

锡克教一般聚居在旁遮普邦。他们身材高大，英勇善战，为了信仰，他们可以慷慨赴死。在殖民时代，他们是殖民当局主要的兵源，被英国殖民主义者列为尚武的民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印军队的 60% 是锡克人，到印度独立前，锡克人仍占英印军队的三分之一。

虽然锡克教是印度教的叛逆，但长期以来，这两大教派之间倒也相安无事。居住在旁遮普邦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可以通婚。在一个家庭里，一个儿子信仰印度教，另一个儿子信仰锡克教，这种现象并不鲜见。但是，随着印度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印度教与锡克教之间的和睦关系逐渐变得紧张起来。本世纪 20 年代，为了反对印度教徒的种姓制度和对宗教事务的垄断，锡克教徒与印度教徒发生过流血冲突。印度宪法甚至宣布，锡克教是印度教的一个分支，锡克人是“带胡子的印度教徒”，这等于抹杀了锡克教的独立地位，触犯了锡克教的宗教信仰。因此，到印度独立之时，锡克人就提出，

印度教徒有印度，穆斯林有巴基斯坦，锡克人也应该有自己的国家“卡利斯坦”，否则，锡克人就会淹没在印度教徒的汪洋大海中。到1951年，印度进行人口普查，旁遮普邦的印度教徒登记自己的民族语言为印地语，锡克教徒开始要求成立一个以旁遮普语言占多数的旁遮普邦，但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锡克人认为很不公平。50年代，孟买也是双语言邦，但到1960年，英迪拉就下令将孟买一分为二，分为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古吉拉特邦，而旁遮普邦的问题却一直被拖了下来。为此，锡克教徒多次闹事，几乎重现印巴分治时的混乱状态。印度中央政府出动了飞机轰炸锡克教徒聚居的村寨。锡克族的阿卡利党领导人桑·法戴·辛格宣布，如果中央政府不同意建立旁遮普语言邦，他将绝食至死。圣雄甘地留下的绝招终于取得效果，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一致通过决议，同意建立以旁遮普语为正式语言的旁遮普邦，印度教徒则另外建立一个哈里亚纳邦，矛盾得到暂时缓解。

锡克教徒的主要政治代表是阿卡利党，自印度独立以来，它一直要求建立独立的“卡利斯坦”，并为此搞过向新德里的示威游行。但1956年它又放弃了政治要求，将力量集中在宗教、教育、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其领导人塔拉·辛格甚至加入了国大党。1966年旁遮普语言邦成立，大批锡克人当上了邦议员，阿卡利党还两度与其他政党联合在邦内执政。1977年至1979年莫拉尔吉·德赛的人民党执政期间，阿卡利党人还出任过政府的农业部长。但是到1980年英迪拉·甘地重新执政时，阿卡利党失去了邦政权，党内也产生了分裂。以隆格瓦尔为首的温和派主张开展和平斗争，以争取完全自治；但是，他不主张建立独立家园。此后，该党通过《阿南德普尔萨希布决议》，要求中央政府只管理国防、外交、交通运输、货币事务，其他事务交给锡克族自治。以宾德兰瓦勒为首的极端政治势力则要求完全独立，建立“卡利斯坦”。另一股政治势力甚至在伦敦建立了“卡利斯坦流亡政府”。

据说，宾德兰瓦勒还是英迪拉·甘地一手扶植起来的。1977年阿卡利党进入政府执政，使英迪拉忧心忡忡。为了分裂该党，英迪拉决定“以夷制夷”，在该党扶持反对派。她选中的人就是宾德兰瓦勒，他原是锡克教一个普通的传教士，但他充满激情的讲道和严格按照锡克教规的苦行方式，使他博得了锡克人的好感。仅仅几年时间，他就由一个普通的传教士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质朴的语言在锡克人中广为流传。宾德兰瓦勒博得了“旁遮普的霍梅尼”的称号，只要一听这个外号就知道英迪拉这个错误有多大。宾德兰瓦勒在英迪拉的支持下，羽翼渐丰。他向阿卡利党提出了很多难以接受的要求，从而导致了阿卡利党的分裂。英迪拉的国大党在1980年的选举中获得胜利，这一目的虽然实现了，但锡克人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为宾德兰瓦勒本身就是一头勇猛的狮子，他的要求令甘地夫人更难接受。

“蓝星”行动

1980年，英迪拉再次上台执政，锡克人的独立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英迪拉支持宾德兰瓦勒的后果暴露出来。他公开鼓吹建立一个独立的“卡利斯坦”，并号召锡克人拿起武器，用暴力实现这一目标。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宾德兰瓦勒于1982年7月来到阿姆利则城的金庙，在这里建立了他的指挥部。

金庙，面积约10公顷，是锡克教第五代祖师阿尔朱·马尔所建。整个建

筑为长方形，呈乳白色，有大小 19 个贴金圆顶，故有金庙之称。它掩映在高大的菩提树和榕树丛中，远眺似一座绿色山庄，近看又像一座城堡。金庙的四周还围有高 4 米的围墙。整个金庙显得富丽堂皇，巍峨壮观，被锡克教徒尊为“锡克教圣冠上的宝石”，是锡克教的象征，它对锡克教徒的意义，就像穆斯林心目中的麦加圣地，天主教徒心目中的罗马，犹太人心目中的耶路撒冷。

可是，就是这么一座圣地，在 80 年代初却被宾德兰瓦勒当作他建立“卡利斯坦”的总指挥部，他在那里招兵买马，而政府却无可奈何，因为根据锡克教经典，军警不得进入金庙，宾德兰瓦勒得意至极，心想，英迪拉虽然知道自己图谋不轨，但你能拿我怎么办？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流血事件不断发生。从 1982 年 8 月到 1984 年 6 月，两大教徒之间发生了 1200 余次暴力事件，死伤 1 万余人。英迪拉忍无可忍，决定采取行动。1983 年 3 月，她借口旁遮普邦的“总统直接治理”期满，强令在旁遮普邦举行选举。这时，民主、自由之类的东西她都不要了，只要选举的结果符合自己的心意就行。政府出动了 20 万军队，3000 人因此死亡，30 万人无家可归。局势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更加恶化。1984 年 4 月 4 日，政府宣布，旁遮普邦为“危险地区”。6 月 2 日，英迪拉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实施军方制定的“蓝星”行动计划，配有坦克和装甲车的 10 万大军在西部军区司令拉吉尼·辛格·达亚尔的率领下包围了金庙。英迪拉向全国作电视讲话，说政府已经决定用武力对付旁遮普邦的恐怖行动。4 日，政府军发动宣传攻势，要锡克教徒放下武器投降。6 日晨，战斗开始，政府军向金庙发动了总攻势，宾德兰瓦勒负隅顽抗，结果被当场击毙，锡克教徒死伤 492 名，而政府军的伤亡人数也达百余人。大批锡克教徒被捕，军队进入了金庙。这就是震惊世界的金庙事件。

对于英迪拉来说，出兵金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可以说是下下之策，金庙的重要性她不是不知，出兵金庙的利害她也知晓，但为了制止锡克教的分立主义运动，她只好铤而走险。因此，占领金庙后，她在一次公共集会上讲，这是印度民族的一场悲剧，不能当作胜利来庆祝。金庙事件激化了印度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变得水火不相容。在一些街头巷尾，锡克教徒围上黑头巾，向过往行人和警察扔石头，焚烧公共汽车，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怒。在一些锡克教庙宇，锡克教徒挂起“卡利斯坦”的旗帜，而政府军中的锡克教士兵则成群结队哗变。比哈尔邦拉姆格拉赫锡克士兵打死了自己的团长，抢劫了军火库，驾驶军车向阿姆利则城挺进。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锡克士兵，则企图冲进机场，劫持飞机飞往阿姆利则。世界各地的锡克人也对此作出强烈反应，他们纷纷抗议印度政府亵读锡克教宗教信仰的行为。9 月 2 日，世界锡克教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政府军于 30 日前撤出金庙，否则锡克教长老将进行一次解放金庙的大进军。甘地夫人为缓和局面，同意了长老们的要求，军队在 29 日撤出，冲突暂告平息。但是，矛盾并没有解决，甘地夫人“尊重少数民族权利”和“宗教平等”的真面目大白于天下，激进的锡克教徒扬言，“一个宾德兰瓦勒倒下去，千万个宾德兰瓦勒站起来”。“卡利斯坦流亡政府”主席贾格吉特·辛格·乔汉在伦敦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发表演说，要对英迪拉一家采取恐怖行动，对英迪拉本人，乔汉悬赏 10 万英镑。锡克教徒伤心至极，对甘地夫人失去了信心。这里面就包括她的贴身卫士本特·辛格等人。

应该说，本特·辛格原来对甘地夫人确实是忠心耿耿的，否则甘地夫人也不会如此器重他，让他留在自己身边。但是，她不知道，随着事态的发展，她在本特·辛格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变了，她的本特·辛格也变了，而甘地夫人对此却没有觉察，悲剧在悄悄地酝酿着。

甘地夫人对锡克分立主义运动的强硬立场早就引起了锡克教激进主义分子的仇恨。他们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谋杀总理的阴谋在秘密进行之中，而它的策划者就是流亡国外的印度前驻挪威大使馆一等秘书艾丁德尔·帕尔·辛格。艾丁德尔·帕尔·辛格在物色着能接近甘地夫人的人物。事实上，暗杀一直在进行之中，只不过没有成功罢了。如1980年4月14日，就有一名暗杀者越过警察的警戒线，向甘地夫人投掷了短剑，但没有击中，甘地夫人的一名保镖受了一点伤。后来，帕尔·辛格又策划了几起谋杀事件，但暗杀者刚刚越过国境，就被政府军逮捕。这才使他想到，要成功地刺杀被森严戒备的总理，非得她的贴身警卫下手才行。

真是不巧不成书。正当帕尔·辛格为物色不到合适的对象而烦恼的时候，机会却送上门来。1983年，甘地夫人出访欧洲。帕尔·辛格结识了她的贴身警卫本特·辛格。他乡遇故知，分外亲热，两人交谈之中，竟然发现是老乡，两人的妻子还是同村人，算起来，两人还有一点亲戚关系，这样，他们就建立起十分亲密的关系。金庙事件后，帕尔·辛格在挪威申请政治避难，离开了大使馆，开始策划谋杀总理的行动。他拿出10万美元，要求本特伺机下手，除掉锡克人心中的仇敌，为锡克教同胞复仇。本特十分犹豫，毕竟，他已经跟随总理达10年之久，深得总理信任，要他下手，实在难以抉择。本特回到家中，遇见了很多锡克教徒，他们都是金庙事件的幸存者，他们悲愤地控诉着英迪拉的暴行，本特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宗教信仰终于战胜了感情力量，他同意刺杀甘地夫人，但10万美金他就不要了。

回到新德里后，本特开始物色同谋。他看上了刚调入总理卫队的萨特万特·辛格。萨特万特也是锡克人，两人一拍即合。大约10月上旬，萨特万特回家休假，家中的很多亲友因金庙事件的牵连，被送入了拘留营，对此，他也感到苦闷。这样，两人就决定寻找机会，除掉英迪拉·甘地，为锡克人报仇。

根据政府保卫部门的规定，警卫回家探亲回来，保卫部门必须对他的思想行为进行审查。本特和萨特万特两人回来后，极为激动。按理，不用进行审查，明眼人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就知道他们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保卫部门对他们的反常行为竟然没有觉察，也没有对他们进行这种例行的审查，这就使得谋杀成为可能。

本特和萨特万特原准备在10月14日下手，由本特向甘地夫人投掷手榴弹，萨特万特和另一个警卫开枪射击。10月14日上午，他们已经一切准备就绪，只待甘地夫人出来，就可付诸行动。但那一天碰巧总理府的卫队长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说有人要暗杀总理，总理身边的警卫添了几个，本特等人吓了一身冷汗，眼看着甘地夫人从身边走过，手榴弹没敢扔出来。

本特没有死心，第二次机会又来了，这就是10月31日。这一天，甘地夫人没有别的约会，只会见一个英国记者。本特决定不再使用手榴弹，而是近距离开枪射击。他利用职权，设法将他和萨特万特调到31日值班，而且，借口萨特万特腹泻，又将萨特万特调到距厕所较近的拱门处值勤，这样，甘地夫人就在劫难逃了。

说来也怪，那几天甘地夫人老是心惊肉跳，觉得自己的大限已到，因而说了许多不吉利的话。10月26日，她到北方邦去作竞选演说，听说比吉比哈拉一棵法国梧桐死了，这本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她却触景生情，向自己的一位老朋友感慨道：“我已经活得够长了，老树已经死了，我为什么还活在这里啊？”她还说自己是“高山的女儿，无忧无虑，自己的骨灰将撒在喜马拉雅山上”。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她已经作了安排，已经同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安排过自己的葬礼事宜，还写过手令。她还与孙子拉胡尔说，她已经做了她应该做的事情，如果她死了，不要为她哭泣，要勇敢地面对这一切。第二天，她又带着拉吉夫的一对儿女到克什米尔去了，克什米尔的秋天美丽极了，再迟几天去就看不见了。28日，她爬上圣山香卡拉查雅，会见了修道士拉克希曼乔，拉克希曼乔请她为一座小建筑物剪彩，她回答说：“如果我还活着，我会来的。”她还与修道士谈到了生死的问题，说自己已经听到了死神脚步声，寿数已尽。而她当时还不过67岁，身体健康，如果不是意外事件发生，她还有得活呢！

29日，她出现在奥里萨邦首府布巴内斯瓦尔。该邦是个印度教色彩很浓的邦，古籍中称之为“神圣之国”，是一个“可以赎身之地”。甘地夫人在这里向她的支持者发表演讲，讲到“今天我还活着，明天我可能就不在了”，但“即使我为国捐躯，我也会感到骄傲，因为我肯定我的每一滴血都将献给祖国的发展，使它具有强大的活力”。

30日晚上，她回到新德里。她感到极端疲倦，对秘书说，自己很累，明天不想工作，叫他取消一切约会。头天孙子和孙女的车祸更使她心惊肉跳，老是感到有人要绑架她的孙儿。当天晚上，她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索尼娅发现她半夜还起来吃了安眠药。第二天早上，拉胡尔去上学，她还拉住他的手，说不要忘记我早先同你讲过的话。也许，冥冥上苍真的告诉她，大限已到，要她到天国去见她的父亲了。

英迪拉·甘地死了，但是，印度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教派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虽然，她早就为自己的儿子拉吉夫接班作好了安排，但是，她留给自己儿子的远不是太平盛世，她的儿子将面临与她同样的问题，如果她预先知道这些情况，她还会那么坦然地面对死亡吗？

拉吉夫·甘地临危受命

英迪拉遇刺当日，印度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均不在新德里。当时，印度总统宰尔·辛格正在阿拉伯半岛访问，国防部长恰范也不在国内，财政部长穆克吉正在西孟加拉，总理的爱子拉吉夫·甘地也在西孟加拉为其母亲竞选总理作宣传。得知英迪拉遇刺的消息后，他们立即赶回新德里，商量善后事宜。

实际上，这一工作并没有等到他们回到新德里才着手进行。当时在新德里留守的所有政要，几乎一致同意由拉吉夫继任总理之位，理由是，只有拉吉夫才能代表尼赫鲁家族，也只有他能团结起整个国家，继续向前发展。因此，几乎没有争执，印度内阁就认可了由拉吉夫充当印度总理的候选人。而拉吉夫对此事还懵然不觉。当他驱车前往一个群众集会时，一位警察赶了上来，告诉他总理府出事，要他马上赶回新德里。拉吉夫立即与当地军方联系，军队派来了直升机，把他接到了加尔各答，然后转乘大型客机回到新德里。大选期间，为防不测，忠于政府的军队早已进入戒备状态。事发后，军方一

面加强对拉吉夫·甘地的保卫，一面派飞机将各位政府要员接回新德里。当拉吉夫走下飞机时，军队的“应变小组”立即换下了他原来的保镖。身穿黑色制服、头戴紫色伞兵扁帽的廓尔喀兵前呼后拥地把拉吉夫送往全印医学科学院医院，为防冷枪，各制高点还设置了狙击手。当拉吉夫在医院门前见到泪流满面的内阁要员时，他什么都明白了。

拉吉夫是英迪拉·甘地的次子，从小对政治没有兴趣。他最大的兴趣是当一名飞行员，这个愿望他已经实现了。他曾经当过十多年的飞行员，甚至驾驶过波音 737 客机，也当过机长。但是，他的哥哥桑佳伊在一次飞行中遇难，尼赫鲁家族在印度政坛的事业眼看后继无人。迫于母命，拉吉夫不得不放弃自己心爱的飞行事业，开始充当母亲的助手，习练政务。在母亲的扶持下，拉吉夫从政时间不长，就忸然是印度新一代领导人了。现在，英迪拉猝然遇刺，拉吉夫一下子就成为印度政治舞台上的新星。1984 年 10 月 31 日下午 6 时 40 分，拉吉夫·甘地双目含泪，跟着宰尔·辛格总统一字一句地念着誓词，宣誓就职。拉吉夫接手的并不是一个太平盛世，而是一个充满危机的烂摊子。英迪拉遇刺的消息传出后，印度出现了少有的混乱局面。大批愤怒的印度教徒走上街头，对锡克人拳脚相加。他们拦截车辆，检查过往行人，抢劫锡克人的商店和住宅，围攻锡克教寺庙。锡克教徒岂是好惹的！他们也奋起反击。枪声、爆炸声、哭声搅成一团，动乱像瘟疫一样从新德里蔓延到各邦，造成交通中断，工厂停工，银行歇业，商店关门。短短的几天内，印度就有 2200 多人死亡，仅新德里就有 600 多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到 2000 万美元。告急电报像雪片似地飞往新德里，飞到新总理面前。

面对这一危急情况，拉吉夫临危不乱，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技巧。他连夜召开会议，决定在全国 80 个大城市实行宵禁，出动军队进行弹压。然后，他发表广播讲话，说英迪拉·甘地逝世了，她是全国人民的母亲，她最崇高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统一、和平、繁荣的新印度，在国家处于危难关头，国民们要冷静、克制，不要让感情蒙蔽理智。当天晚上，他让国大党各分部的领导人、各邦首席部长、政府议员立即返回故乡，制止暴乱的蔓延，稳定局面。11 月 1 日，拉吉夫与 15 位反对党的领导人联名呼吁国民保持理智，不要把一小撮误入歧途的锡克人犯下的罪行归咎于锡克人全体，不要对锡克人进行报复，要不惜代价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财产，而不管他是属于什么种姓，什么宗教。他在一次集会上说：“暗杀英·甘地不是哪一个人干的。”“这是一个企图瓦解印度的阴谋，但是我们已经证明，几颗子弹是打不垮我们的……我们是不会向世界性势力的压力屈服的。”他没有明确说出这个“世界性势力”到底是谁，但苏联塔斯社立即接腔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与锡克教的激进主义势力有联系。这种说法尚未得到证实，但是拉·甘地把刺杀英迪拉的阴谋归咎于某个“世界性势力”而不是锡克人，让锡克人大为欣慰，也让印度教徒觉得，把气出在锡克人身上并无道理，这对平息动乱、稳定局势有一定益处。短短的几天，拉吉夫·甘地的应变能力让人称道。人们觉得，拉吉夫·甘地之所以登上印度总理的宝座，并不完全得益于尼赫鲁家族的余荫，他自己也确实有治国之才。11 月 8 日，在拉吉夫·甘地的倡导下，新德里出现了一次和平进军。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手挽手，肩并肩，前进在首都的大道上。他们高呼：“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兄弟，兄弟。”拉吉夫·甘地的声望大增，结果，在 12 月的第 8 届大选中，拉吉夫·甘地的国大党（英迪拉派）获得了压倒性的多数。

拉·甘地深知，要保持印度国内的稳定，离不开锡克教徒的合作。英迪拉对锡克教徒主要是压，事实证明，这一招并不成功，英迪拉本人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拉·甘地不能重蹈覆辙。他上台后半年，就采取了争取锡克教的温和派、打击极端分子的政策。许多在押的阿卡利党的温和派人员被释放，许多参与叛乱的锡克教青年也获得自由。1985年7月24日，他与阿卡利党温和派领导人朗格瓦尔达成了一项解决旁遮普邦骚乱问题的协议，政府接受了锡克人的部分要求，决定把昌迪加尔中央直辖区交给旁遮普邦而把该邦印地语地区移交给哈里亚纳邦，对1982年8月1日以来在动乱中死伤的人员进行经济补偿，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等。这个协议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锡克教温和派势力的要求。同年9月，旁遮普邦举行议会选举。阿卡利党获得邦议会117席中的73席和38.5%的选票，而国大党（英迪拉派）在该邦则沦为少数派。该邦两年来的总统直接治理宣告结束，阿卡利党单独执政，以阿卡利党代主席、旁遮普邦首席部长苏尔杰特·辛格·巴纳特为首的邦政府在9月29日宣誓就职，从而实现了“以锡克人治理锡克人”的理想。旁遮普邦的局势一度有所好转，拉·甘地的和解政策取得了效果。

但是，好景不长。锡克教极端分子的要求是完全独立，建立“卡利斯坦”。朗格瓦尔的温和政策为极端分子所不容，他自己也被暗杀，和解协议未能实现。1986年4月，锡克教极端分子重据金庙，并成立“卡利斯坦国”和“流亡政府”。印度政府随即出兵弹压，占领金庙。1987年1月26日是印度共和国日，锡克教极端分子在金庙召开万人大会，焚烧印度国旗，升起卡利斯坦旗。他们在阿姆利则圣城宣布成立卡利斯坦独立国，并在一些村镇组织相应机构，不断扩大活动范围。此外，他们还进行各种恐怖主义活动，在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之间制造流血冲突，爆炸、绑架、暗杀……无所不用其极。5月11日，鉴于旁遮普邦的形势已经失控，拉吉夫·甘地决定，解散该邦议会和政府，由总统实施直接治理，但这一举动又得罪了锡克教的温和派。苏尔杰特·辛格·巴纳特表示，中央政府解散了深得人心的阿卡利党政府，就是要同锡克人走对抗的道路。形势继续恶化。

“霹雳”行动

1988年5月，锡克教徒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虽然当时已经是朝觐季节，很多锡克教徒将到金庙用圣水净身，在圣殿祈祷，但是，金庙的形势却十分紧张，数以千计的保安人员在金庙大院周围设置了重重工事，几百名训练有素的狙击手也控制了附近的各个制高点，严密地监视着金庙里的动静。这是拉吉夫·甘地政府对锡克教徒实施的“霹雳”行动。

5月9日下午1时，一群占据金庙的锡克教武装分子突然跑出寺院，企图在附近的一个建筑物设立制高点，布置在金庙周围的印度政府军立即通过广播责令他们立即停止行动，退回金庙。在政府军的高压之下，锡克武装分子不得不退回庙内，但他们同时向政府军开枪，一名保安部队的军官当场被打伤。双方开始了激烈的枪战。枪战持续了七个小时，有五名锡克人被打死，其中有一名妇女；另有五人负伤。由于当时金庙内正在举行法事活动，里面还有很多信徒和记者。

两天后，中央政府向金庙增兵，印度最精锐的“黑猫”国民保安队队员也出现在围困大军中。11日夜，他们占领了金庙附近的一个制高点，从而

把金庙控制在政府军的火力之下。双方僵持了五天。15日，一群锡克教徒和一些妇女走出金庙，向政府军投降。

政府军继续围困金庙。17日，政府军失去耐心，“黑猫”国民保安突击队充当先锋，用冲锋枪和炸弹杀开一条血路，冲进了锡克教徒盘踞的地下室，击毙负隅顽抗的武装分子30余人。在政府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锡克教极端主义分子不得不从窗口挂出一块白布，向政府军投降。46名锡克教武装分子和1名妇女从金庙中走出来，向政府军投降。有两名投降者企图从保安部队划定的圈子里走开，结果被保安部队当场击毙。这样，历时10天的“霹雳行动”宣告结束，有37人在这场冲突中死亡，其中有4名平民。保安部队还从地下室搜出大量的枪支弹药和锡克教极端分子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记录。

对于拉·甘地而言，“霹雳”行动无疑是一场拔钉子的战斗。他上台伊始，就强调国内要稳定，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冲突反而愈演愈烈。不仅锡克教极端分子在捣乱，就是穆斯林、廓尔喀人也在要求自治。如果这股分立之风不能刹住，那么一个统一的印度很可能就会不存在。因此，他下决心铲除锡克分立主义这块毒瘤，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行动之前，他当然考虑到英迪拉母亲“蓝星”行动的后果，但为了国家的统一，他也顾不上了。事后，他一再强调，此次行动不同于1984年的“蓝星”行动。他说，当年中央政府的行动没有得到锡克教徒的支持，而这次行动完全不同，普通的锡克人是支持政府的行动的。当年那次行动人们都指责英迪拉褻渎了锡克教的宗教信仰，但这次就完全没有这种议论，这就是一个证明。他希望此次行动能一了百了，锡克人能放弃自己的独立行动。但是，观察家认为，这是不现实的。印度的《论坛报》在评论中指出：“一场战斗是结束了，但是战争仍在进行”，“金庙行动只不过是整个问题的小小的一部分，锡克人的问题远未解决。”只要锡克人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印度的政局就不会安定，锡克人也不会放弃恐怖主义活动。事实上，就在政府军攻占金庙的当天，一批锡克教极端主义分子就袭击了旁遮普邦的一个车站，有9名旅客被打伤。印度新闻媒介告诫人们，残存的恐怖主义分子的攻击力是“可畏的”。

如果锡克分立主义分子仅仅将目标对准印度政府官员和印度教徒，那么它可能还会得到谅解，毕竟，印度政府亏待了他们，出于报复，他们进行一些恐怖活动，虽不人道，但也可能得到人们同情。但是，1991年发生的一件事情证明，锡克分立主义分子的目标已经不限于印度政府官员和印度教徒，他们的目标已经最大程度地广泛化。不仅本国成为他们袭击的对象，就是外国人也很难幸免。

10月9日，从新德里传出特大新闻：罗马尼亚驻印度大使馆代办利维乌·拉杜在前往大使馆上班途中被身份不明的恐怖分子绑架。警察在三小时后得到情报，因而紧急出动，在新德里地区进行拉网式搜捕，但一无所获。负责侦破的印度外交部长和内政部长急得团团转。三天后，绑架分子终于露面了。三个锡克教极端分子组织声称对此事负责，它们是卡利斯坦解放阵线（潘查瓦派）、宾德兰瓦勒虎和锡克学生联合会。警方接到消息后面面相觑。绑架与锡克人有关，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竟然有三个锡克人组织同时实施绑架，这就有点稀奇，因而反而显得不太可信。到底是谁干的？警方摸不清头脑。寻找线索没有新的发现，警方只好等待恐怖分子与他们联系，看他们会提出什么要求。果然，第四天，恐怖分子送来了一张照片。这是拉杜

与他们的合影，证明绑架确实是他们所为。他们提出释放拉杜的交换条件：印度政府释放三名因暗杀印度前陆军参谋长瓦迪亚将军而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如果印度政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将处死拉杜。经过反复考虑，印度政府决定，不理睬恐怖分子的要求。因为经验证明，恐怖分子的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如果这次你让他的阴谋得逞，下次他再干这类事情就更肆无忌惮了。国际上流行的做法是对恐怖分子的要求置之不理，印度政府这次也不准备做出让步。此后，恐怖分子多次提出最后通牒，但印度政府置若罔闻，事情就这么拖了下来，拉杜的妻子卡特林娜度日如年，天天以泪洗面。但拉杜的消息一点也没有。

正当人们担心恐怖分子可能撕票的时候，11月26日上午10点，拉杜却出现在新德里火车站。他自己下了火车，在车站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回到了自己的寓所南德里约·巴格路144号。谁也没想到他会活着回来，值班警卫也没有认出他就是自己的顶头上司，竟然要他出示证件。还是他的妻子眼尖，大门开后，她一眼认出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夫君，顿时涕泪横流。

在寓所，惊魂甫定的拉杜向妻子讲起了自己的遭遇。那天他上路不久，就看到前边卢迪花园附近的丁字路口设了路障。他一停下汽车，就跑来四个蒙面人，他们持枪将他裹挟进了一辆吉普车上，并蒙上他的双眼，汽车向前开去，在新德里七拐八拐，把拉杜搞得晕头转向。

最初，拉杜没有被带出新德里，他在那里一直被关了19天。后来，恐怖分子才把他转移到旁遮普邦。每天有几位歹徒监视着他，不许他走到窗口去，也不让他与外界联络。但是，看守同意他可以看看报纸，也可以阅读锡克教经典。在警方与一名歹徒交火后，拉杜被转移到旁遮普邦，一路顺风，没有遇到任何麻烦。显而易见，一路都有人接应。后来，恐怖分子还想将他转移到巴基斯坦，但没有成功。到25日晚上11点，拉杜被带上一辆开往新德里的火车，恐怖分子失去了耐心，但终于放过了他。

拉杜被绑架震惊了印度朝野，其影响恐不在英迪拉·甘地遇刺之下。拉杜能从新德里顺利转移到旁遮普，而且一路畅通无阻，说明恐怖分子的活动范围已经大为扩大，不仅旁遮普邦和新德里有他们的同党，就是在哈里亚纳邦、中央邦和马哈拉施特拉等邦，也有不少人资助恐怖分子，帮助他们隐匿拉杜。这表明锡克教恐怖分子已经在新德里及其周围地区有了广大的基地，甚至在要人区扎下了根。这种局面让人堪忧。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印度警方的反恐怖措施不力，缺乏真正有效的手段。除了一种僵硬的立场外，印度警方在此次事件中可说是一无是处。它始终不知道拉杜被关押的真正位置，连他被转移到旁遮普，又从旁遮普乘火车回到新德里都不知道。相反，各政府机构却相互推诿，外交部责备中央调查局和研究分析处不能向它及时提供情报，而情报官员又指责警方把情报透露给绑架者。谁是谁非，乱成了一锅粥。这表明印度政府尚未有对付绑架的有效措施。

拉吉夫·甘地躲过了锡克人的子弹，但是，由于印度的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十分复杂，“霹雳”行动之后，教派冲突并未平息，反而有上升的趋势，因此，拉吉夫·甘地最终还是没能摆脱他母亲的命运。不久，另外一个民族向他射出了复仇之箭。

此起彼伏的孟买大爆炸

1993年3月12日，星期五，下午1时20分。印度西部港口城市孟买证券交易所一片繁忙，离收市还有10分钟，众多投资者和股票经纪人为博取最大的利润作最后拼搏。正在此时，一声巨响惊醒了专心牟利的人们，大楼一阵摇晃，像发生了地震。顿时，交易所内一片混乱，窗玻璃被震得粉碎，碎片飞起来，割破了人们的皮肤。人们争先恐后地向外逃窜，真是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如漏网之鱼。谁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觉得情况紧急，逃命要紧。但是，大楼外面的人们都意识到，大楼内发生了大爆炸，因为，天空中飘起了烟雾，人们嗅到了浓浓的血腥气味，被炸弹撕裂的人体残部很快落在他们身上，落在交易所四周的大街小巷。到处是飞扬的物品，到处是哭喊的人们，整个交易所大楼一片狼藉，犹如世界末日的到来。

孟买警察局的警察紧急出动，他们救人，灭火，忙得不亦乐乎。但是，还没有等到他们喘一口气，就在交易所大爆炸发生的15分钟后，在孟买其他地区，又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爆炸，警察根本来不及应付。

25层高的印度航空公司大楼在一声爆炸后被夷为平地，炸弹当场炸出一个直径约10米的大坑，损失甚至超过了交易所大楼。爆炸引起的气浪挟带着人体残部落到航空公司大楼临近的巷子内，事后，警察至少从中抬出了25具残缺不全的尸体，令人惨不忍睹；

一辆挤满乘客的公共汽车正在孟买的街上行驶，突然，汽车内响起了爆炸声，顷刻间，50余名乘勤人员死于非命；

印度最大的火车站维多利亚火车站也未逃脱厄运，炸弹在一辆驶离孟买的火车上爆炸，南来北往的旅客惊魂未定，匆匆离开孟买，将大爆炸的消息传遍整个印度；

孟买繁华地区的一家加油站陷入火海之中；

三家五星级饭店、孟买大学以及一些娱乐场所也被炸弹袭扰；

事后统计，这场大爆炸从1点15分孟买证券交易所起，直到3点54分才结束，2个多小时内发生了14次爆炸，次数之多，频率之高，世所罕见。有300余人当场丧生，1200多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5亿美元。这一场大爆炸，炸得孟买满目疮痍，炸得孟买市民心惊胆战，炸得孟买警方焦头烂额，炸得印度当局坐卧不宁。

是谁策划了这些爆炸事件？两个多小时内发生14次爆炸，很显然不是偶然因素所致，幕后必有一支神秘的黑手在操纵。为防万一，印度总理拉奥立即中断在西北各邦的视察，来到孟买，指挥抢救和处理善后事宜。政府在孟买四方部署了大量军队，并调动了大批警察，对孟买全市进行拉网搜查，企图寻找破案线索。警方悬赏100万卢比重赏提供线索的知情者，同时，与国际刑警组织取得联系，请该组织派来专家小组，协助破案。

谁是这些爆炸案的主谋，孟买警方也不是一点头绪没有。策划如此猛烈的爆炸案，如果不是与印度当局有刻骨深仇，那是不可想象的。内政部长恰范说，在繁华的闹市区策划罕见的爆炸事件，其目的是想制造混乱，在民众中引起恐怖，损害国内的投资气氛。那么，印度政府究竟得罪了哪些人、哪些组织呢？明眼人当然明白。因此，印度警方首先想到的就是锡克教徒，长期以来，印度政府不能公平处理印度教和锡克教之间的纠纷，动不动就对锡克教徒大开杀戒，在锡克教徒中已经引起公愤。他们已经杀了英迪拉·甘地总理，难道不能制造一些爆炸事件，来给印度政府添点麻烦？何况，锡克教徒从军的居多，长期以来，他们构成了印度军队的主力，应该说，他们有杰

出的军事才能，因此，他们有能力策划如此周详的爆炸案。爆炸案发生的次日，一个锡克教分立主义分子就打电话给印度报业托拉斯，声称对此次爆炸案负责。

其次，还有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伊拉姆猛虎组织。该组织虽然不在印度境内，但与印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前不久，该组织的二号人物柯里·西纳库马就死在印度政府的监狱之中，当时该组织就声称要为他报仇。如果出于报复，该组织策划这些爆炸案，也不是不可能的，而且，该组织是国际知名的恐怖主义组织，其从事恐怖活动的能量远在锡克人之上。印度警方不得不作如此怀疑。因此，3月14日，孟买警方就举行记者招待会，警方负责人桑拉称，猛虎组织是头号怀疑对象，因为他们拥有这种技术。同日，警方又发现一枚安装在摩托车上的炸弹，经过技术分析，这种炸弹与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时恐怖分子所使用的炸弹完全一致，只有猛虎组织等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才有。但是，令警方失望的是，猛虎组织的发言人狄拉克坚决否认了印度警方的指控。他在巴黎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们否认这种说法，我们与此事毫无联系。”这与一些恐怖主义组织过去的做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过去，一些恐怖主义组织在恐怖行为发生后，总是争先恐后地将罪名揽到自己头上，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引起混乱。那么，这一次猛虎组织声称没有干，当然也就是没有干。因为它并不惧怕印度政府，也不怕它的军队，没有必要否认。

印度警方心中清楚，最有可能策划这起爆炸案的，当数印度的穆斯林。因为，尽管印度政府鼓吹宗教平等，但实际上，印度各大宗教之间是不平等的。印度只是印度教徒的天堂，对其他宗教信仰者来说，印度实际上同地狱差不多。事实上，讲到积怨，印度政府与穆斯林的仇恨最深，其程度远远超过锡克人和泰米尔人。因为，早在印度独立时期，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就势不两立，连圣雄甘地都束手无策，最后导致印巴分治。但是，分家之时，巴基斯坦并没有得到所有的穆斯林及其土地，大批的穆斯林还是留在印度，成为印度的主要民族之一，人数仅次于印度教徒。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冲突也是此起彼伏。1992年12月，在一次教派冲突中，穆斯林的巴布里清真寺被毁，穆斯林死伤惨重。1993年1月初，孟买再次发生两个教派的冲突，延续九天之久，局面几近失控，造成上千人伤亡。因此，穆斯林极有可能伺机报复。爆炸事件发生后，孟买的教派冲突再次发生，20余名印度教徒在一个穆斯林聚居区放火，焚烧了两辆汽车，而穆斯林则点燃了一幢建筑物，并向人群投掷石头。

印度政府甚至怀疑巴基斯坦政府策划了此次爆炸事件。印巴分治以来，两国关系素来不睦。印度接连发动了三次对巴基斯坦战争，在1971年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巴基斯坦被肢解。从此，巴基斯坦和印度结下了血海深仇。如果巴基斯坦出于报复，策划这起爆炸案，损害印度政府的威信，破坏印度“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更何况，巴基斯坦支持的某抵抗组织负责人塞义德·萨拉胡丁曾对记者扬言，他将把独立战争延伸到印度的每一个经济目标。这次不正应验了吗？爆炸发生在孟买，这里是印度的商业和金融中心，爆炸的中心又是孟买的证券交易所，其他地点不是商业中心，就是繁华地段。因此，印度警方也想到了可能是巴基斯坦或其支持的某一恐怖主义组织策划了这起爆炸案。拉奥总理在讲话时提到，爆炸的目的是破坏印度国内新的开放市场经济，并且涉及某些国外势力，隐隐约约地将爆炸案归咎于巴基斯坦，但是巴基斯坦方面也明确否认了这 146

种说法，说印度把巴基斯坦和爆炸案联系起来，是毫无根据的。巴基斯坦外交部的一名发言人对印度动不动就把印度所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归咎于巴基斯坦表示遗憾。

当然，猜测毕竟是猜测，没有证据的指控是没有说服力的。因此，印度警方尽力寻找破案线索。功夫不负有心人，警方很快找到了一些头绪。3月12日晚，警方找到一辆被丢弃的面包车，车内有七支AK-56自动步枪、两颗手榴弹，另外还有几公斤炸药。警方怀疑这是恐怖分子爆炸后留下的遗物。根据车牌号码，警方按图索骥，找到了一幢公寓。经搜查，公寓里有40万卢比的现金、价值1000万卢比的首饰，还有一把汽车钥匙。车牌号码和这幢公寓的主人都属于梅蒙家族。梅蒙家族是孟买一个富有的穆斯林家族，拥有一家大屠宰场、一家运输公司和几家商店。但是，警方知道，梅蒙家族并不是靠做正经生意起家的，它与黑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它本身就是一个雄霸一方的黑社会组织，做过黄金和毒品生意。该家族的首领就是绰号叫“老虎”的毒品走私头子雅库布·梅蒙。他有六个儿子，小儿子伊斯梅曾因贩毒被警方传讯。

3月14日，一名医生报警，一辆崭新的摩托车在他家门口已经停了两天，车上还插着钥匙。警方立即对该车进行搜查，发现车上有10公斤烈性炸药，而引爆装置就连在摩托车的引火器上。那个医生心有余悸。好险，要是他动了一点私心，动一下这辆摩托，那么这辆摩托车当场就会让他血肉横飞。

3月16日，警方根据一辆被炸毁的汽车底盘号找到一位汽车推销商人，他说，最近他卖过六辆这样的汽车，其中有一辆就包括警方在梅蒙家附近找到的一辆。

3月17日，警方根据知情人提供的线索逮捕了两名将装有炸弹的汽车开到现场的嫌疑犯，其中有一人是梅蒙家族的雇员。两人供称，梅蒙家族给了他们每人5000卢比，让他们把车开到指定地点。那名雇员称，自2月中旬起，出入于梅蒙家族的人明显增多。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梅蒙家族，可是，梅蒙在哪里？警方立即侦缉梅蒙。可是，他们的动作太慢了。梅蒙早就远走高飞了。爆炸案发生前，梅蒙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儿子就飞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余下的两个儿子也在爆炸发生当天离开孟买，飞往迪拜。当印度警方准备向阿联酋警方引渡他们时，他们又离开迪拜，飞到印度的老对头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不计前嫌，通过巴驻新德里大使馆向印方表示，愿意在此事上与印度充分合作。巴基斯坦警方也表示，愿意与印度警方真诚合作，缉拿与爆炸案有牵连的梅蒙家族的成员。但茫茫人海，他们到哪里去找那个梅蒙家族呢？巴基斯坦警方向印度警方通报：据说梅蒙家族已经逃到阿富汗去了。这下子，印度警方傻眼了。阿富汗虽然有一个中央政府，但国内内战打得正欢，哪里有工夫帮助印度缉拿梅蒙家族呢？再说，它的手也伸不到全国所有地区。要是梅蒙与哪个游击队组织接上关系，那么，阿富汗政府即使有心相助，也无能为力呀！

最后的调查证实，梅蒙家族确实与此次爆炸案有牵连，但是，绝不是梅蒙家族单独所为。印度警方指责巴基斯坦策划了此次爆炸案，也不完全是无稽之谈，巴基斯坦确实也与此次爆炸案脱不了干系。大爆炸发生后，孟买警方通过拉网式搜查，共搜出了四吨左右的烈性炸药，如果全部使用，这些炸药足以把孟买这个国际性大都市炸平。而且，警方逮捕了80余名嫌疑犯，其

中有 20 人都在国外接受过训练，其中主要是极端穆斯林武装分子。他们于 1993 年年初在迪拜策划了这起爆炸阴谋，并在那里生产了大量的炸药。2 月初，他们搭乘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客机飞抵伊斯兰堡，下飞机后，没有办理入境手续，就被某黑社会组织接到伊斯兰堡附近一个基地进行训练。经过 10 天左右的训练，他们再搭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回迪拜，将炸药从迪拜运到孟买，从而制造了这起震惊世界的爆炸事件。4 月 21 日，印度内政部长恰范代表印度政府在议会发表讲话，说孟买爆炸案是巴基斯坦策划的，主谋是孟买黑社会头目达乌德·易卜拉欣和易卜拉欣·拉扎克·梅蒙。对这个指控，巴基斯坦自然不服，因为巴基斯坦境内也有黑社会组织，仅仅根据恐怖分子是穆斯林及在巴基斯坦受过训，就将责任推在巴基斯坦身上，当然是不公平的，毕竟，两名主谋都是孟买黑社会头目，是印度人。印度政府应从自身找原因，不能凭空指责他人。事实上，恰范承认，这起爆炸案与 1992 年穆斯林的清真寺被毁一事有关，激进的穆斯林分子为此向印度政府进行报复。印度政府为自己错误的宗教政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浴血猛虎 ——斯里兰卡的反恐怖行动 轮到了拉吉夫·甘地

1991年5月21日，晚上8点半，印度前总理、国大党（英迪拉派）领袖拉吉夫·甘地的座机抵达泰米尔纳德邦马德拉斯机场。拉吉夫匆匆走下飞机，与前来迎接的人们一一握手致意，然后，向负责保卫工作的该市警察局长提出，他此行的目的地是斯里佩鲁姆布杜镇。这个镇距马德拉斯足足有40公里，人口也只有几万。警察局长劝说他不要去了，如果一定要去也要等到明天布置好警卫工作后再去。因为那里人烟稀少，又属于该邦的边远地区，警卫工作不足；而且，据可靠情报，斯里兰卡的猛虎组织已经渗入该地区，如果拉吉夫真的想去，人身安全没法得到保障。但是，拉吉夫谢绝了局长的好意，执意前往。自1989年11月29日告别印度政坛以来，他无时不想重新回到他设在雷施·柯施路的总理官邸，这两年来他没少做努力。眼下时机已经成熟，执政的人民党已经焦头烂额，自认回天无力，同意解散议院，提前进行大选。这为拉吉夫的重新上台铺平了道路。几个月来，他一直在外面奔走，会见选民，发表演说，宣传自己的主张。每天几乎有23个小时在路上，一天要跑几个邦，常常忙得连口水都顾不上喝，手指肿得连结婚戒指也戴不上。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竞选策略取得了成功。民意调查表明，他的党将会在这次大选中获得最大多数的议席，虽然仍不足半数，但是执政是不会有问题的。他的口号是，“哪里有选民，哪里就是战场。”现在，已经到了冲刺的关头，他怎会放弃呢？

无奈，警察局长只好接受拉吉夫的建议，立即安排车队前往斯里佩鲁姆布杜镇。当他们一行人抵达这座小镇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了。热心的选民听到消息已经拥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上，等待着他们拥戴的偶像、未来的政府总理。

拉吉夫首先到当地的英迪拉·甘地塑像前献了花篮，暗暗祷告母亲的在天之灵保佑自己在这次大选中获胜，然后，来到草地，准备向他的选民发表演说。泰米尔纳德邦国大党主席K.拉马穆特先生宣布，拉吉夫·甘地先生已经来到会场，原来平静的会场沸腾了，大家站了起来，争着要一睹拉吉夫先生的风采。会场上放起了鞭炮，呼起了口号。会场上的秩序乱了，维持秩序的警察也被挤在一边，不知所措。一个小女孩从人丛中涌出，向拉吉夫先生念她写的一首诗。另一个皮肤黝黑、身穿红绿相间外衣的年轻妇女也挤上前去。她手中拿着一个花环，看样子，是想向拉吉夫献花。陪同在拉吉夫旁边的拉马穆特见到这个妇女，觉得有点面熟。他心中想到了什么，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作出反应，拉吉夫已经弯下身子准备接受这个女人的献礼，让她把花环套在他的脖子上。那个女人感激地一笑，弯下腰来。人们都以为她要向拉吉夫行印度教传统的触脚礼，正在这时，一声巨响，震天动地，人们被这巨大的响声震呆了。刚开始时，有人以为这是整个欢迎仪式的一部分，会场上的群众感到一股强烈的气浪扑面而来，随后，空中弥漫着一股血腥味，会场上顿时烟雾笼罩。随后，有人清醒过来了。《纽约时报》记者芭芭拉·克罗斯特大叫一声：“炸弹爆炸了！”人们终于反应过来，他们喊着：“领袖在哪里？我们的拉吉夫在哪里？”听不到回音。爆炸时在甘地后面20多步远的修曼·杜贝和一些国大党工作人员，开始在烟雾中寻找拉吉夫·甘地的身

影，但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到。烟雾散去，人们终于看到，在刚才炸弹爆炸的地方，躺着一具具尸体，有的断脚，有的缺手，还有的没了脑袋。这里面有没有他们的拉吉夫·甘地？他们焦急地寻找着。在 18 具残缺不全的尸体中，人们找到了两具被炸得最厉害的。其中一具男尸被炸得血肉模糊，头飞掉了一半，脸上只剩一个洞，鼻子没有了，眼睛和嘴巴只剩下一点点，胸部和背部都被烧焦了，一条腿也不知去向，但是，拉吉夫身边的工作人员认出了另一只脚上的耐克牌运动鞋，而拉吉夫穿的正好是这种鞋。

当局接到报告后立即作出反应。情报机构和警察部门立即赶赴斯里佩鲁姆布杜镇，调查事实的真相。现场勘察表明，会场上没有留下表明爆炸位置的弹坑，说明炸弹不是埋在地下，或是在讲台上，而且炸弹的威力只有几英尺。很明显，这种爆炸装置是专门设计的。调查表明，这次爆炸所使用的炸弹是美国制造的“回旋加速亚甲基三硝基甲苯炸弹”，它在爆炸时会有成千上万个直径一毫米左右的子母弹飞出，杀伤面积极大。这次爆炸共死亡 18 个人，但拉吉夫·甘地和另外一个身份不明的女人承受的爆炸力最大。18 具尸体中，唯独这具女尸无人认领，从她身上发现了金属丝、弹簧和英国制造的电池。尸检表明，她的背部承受了爆炸的全部力量，头虽然被炸飞到了 4 米远的地方，但她的脸还完好无损。显然，这个女人与爆炸案有莫大关连。一位被炸伤的国大党官员说，在爆炸前五小时，这个女人曾同一个男子和一个少女到出事地点察看。那个少女肤色较白，像个混血儿，能讲英语和泰米尔语。后来，警察在清理现场时，又找到了一盘录像带。原来，当拉吉夫抵达会场时，摄影师支好了摄像机，但就在他把镜头对准拉吉夫时，爆炸发生了。他本人被炸死了，摄像机也被炸坏，但录像带却完好无损。录像带真实记录了爆炸发生时的情景。警察因而认定，那个献花的女人就是爆炸案的制造者。当她弯下腰来行触脚礼的时候，引发了爆炸装置。

拉吉夫的遇难在印度国内和世界上都引起广泛的关注。印度人民对这起暗杀案十分愤怒。在爆炸案现场，愤怒的群众乱砸该邦首席部长的汽车，大骂首席部长无能，斥责警察总监失职。印度全国许多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骚乱，出现了焚烧汽车、捣毁商店等暴力行为。仅 5 月 22 日一天，全国就有 8 人因此丧生。印度政府不得不下令全国 100 万准军事部队立即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准备出发去北方邦勒克瑙执行任务的 11 个连也调到拉·甘地的寓所，另外一些部队被部署在一些敏感地区。文塔卡拉曼总统和留守总理谢卡尔也发出呼吁，要全国人民保持镇静，挫败反国家势力的阴谋。但是，狂怒的人们置若罔闻。在泰米尔纳德邦，拉吉夫的一些追随者甚至因不堪忍受巨大的悲痛而引火自焚。

1991 年 5 月 24 日，印度政府为拉吉夫·甘地举行国葬。悲愤的人们拖着沉重的步伐，跟着运送拉吉夫·甘地遗体的炮车来到贾穆纳河边。三军参谋长坐在前面的卡车上为拉吉夫·甘地的亡灵引路，2150 名士兵簇拥着拉吉夫·甘地的灵柩，他们的后面是无数冒着 41 度高温前来为拉吉夫送行的人群。近 30 年来，他们已经三次来到这个令人悲痛欲绝的地方，为尼赫鲁家族先后三代统治者、也是印度政府的三位总理送行。在此前，他们送别了圣雄甘地。在印度人民心目中，他们都是为了印度的独立、富强而献身的。仅仅在七年前，拉吉夫·甘地和他们一起，送别了他的母亲英迪拉，当年的情景人们还历历在目，而今，又轮到了他们来为拉吉夫送行。直升机在空中盘旋，撒下了无数悼念亡灵的玫瑰花团。悲痛的人们高呼：“拉吉夫·甘地永垂不

朽！”

火葬台上，拉吉夫的身体四周堆满了檀香，浇上了酥油。拉吉夫的儿子拉胡尔在一片诵经声中点燃了檀香木，顿时，烈焰熊熊，吞没了拉吉夫的遗体。据说，有一位星相家曾经预言，拉·甘地的时代可以说已经结束，一个国家重要人物的逝世会使印度沉浸在悲痛之中。现在，这一切都应验了。

5月21日的爆炸结束了印度“天生的统治者”尼赫鲁家族的统治。对印度政局今后的发展，人们均表示担忧。拉吉夫的竞选对手、人民党的一位重要领导人道出了人们的心声：“我们是在国家最需要拉吉夫·甘地的时候失去了他，国家将因此而面临严重的问题。”

拉吉夫·甘地已经走完了他的尘世旅程。他的儿子拉胡尔把他的骨灰撒到了恒河与贾穆纳河的交汇处，他的灵魂会得到安宁。但是，印度政府的头头脑脑以及他们属下的警察机构，却没有安宁的日子过。当务之急，他们要缉拿制造这起爆炸案、夺走拉吉夫·甘地生命的凶手。

5月22日，拉吉夫遇害的第二天，印度政府从事侦察犯罪行为的中央调查局局长维杰·卡兰就制定计划，成立“特别调查小组”进行调查。25日，“特别调查小组”正式成立，维杰·卡兰亲自指导，小组共有200名成员，核心人物都来自印度调查局，这可能是印度政府所能组织起来的最好的破案班子了。

勘察现场时，警方已经得到了一些线索，初步确定，拉吉夫·甘地是由一枚自杀性攻击的炸弹炸死的，这一点立即引起人们的联想：当今世界，最善于使用自杀性攻击来进行恐怖活动的只有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伊拉姆解放猛虎组织。23日，印度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内政部长苏博德·坎特·萨海就说，他已授权特别调查小组在印度本土及海外对各种可能性进行调查，包括斯里兰卡的猛虎组织都是怀疑对象。他怀疑是猛虎组织的一只黑虎（意为女恐怖分子）所为。她利用向拉吉夫献花的机会，弯下腰来，引爆了捆在身上的炸弹。因此，特别调查小组首先取得了斯里兰卡警方的支持。在斯里兰卡政府答应尽一切可能帮助印度政府破案后，维杰·卡兰率领一个调查小组到斯里兰卡调查，宣布悬赏100万卢比，重赏提供线索者，最后又决定让中央调查局的副局长S·K·杜塔无限期地留在斯里兰卡，以便破案。

当然，也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猛虎组织并无杀害拉·甘地的动机，因为拉·甘地也许是目前唯一可以对斯里兰卡政府施加压力、使之停止进攻猛虎组织的人物，如果杀害了他，以后还有谁敢对猛虎组织心慈手软？再说，拉·甘地与猛虎组织之间的关系已经缓和。据说，在5月5日，猛虎组织的代表卡西·阿南丹在拉·甘地的寓所拜会了拉·甘地，拉·甘地要阿南丹向猛虎组织首领布拉巴兰卡致意，并答应一旦自己重新上台执政，印度将支持猛虎组织反对斯里兰卡政府。因此，“猛虎”不仅不应该杀害拉·甘地，反而应该保护好拉·甘地，在大选中助他一臂之力。

经过3个月的追踪，1991年8月20日，也就是拉吉夫47岁生日那一天，维杰·卡兰终于向新闻界透露：“我如释重负。”杀害拉吉夫·甘地的凶手已经找到，并受到了正义的惩罚。印度人民可以告慰于拉吉夫的在天之灵了。据称，杀害拉吉夫·甘地的凶手正是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伊拉姆解放猛虎组织——一个令人胆寒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那么，拉吉夫是如何得罪了这只“猛虎”，从而引来杀身之祸的呢？

“猛虎”横空出世

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上的一个小岛，向北与印度次大陆相望。历史上，斯里兰卡就是一个名胜之地。古希腊人称之为“释门都”，意为“佛教圣典之首”。埃及人称之为“沙里克”，意为“狮子的住所”。在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天方夜谭》中，斯里兰卡被称为“塞伦底伯”，意为“珍珠之岛”。斯里兰卡人自己的称呼就更好听了。僧伽罗人称之为“兰卡”，意为“乐土”，泰米尔人称之为“伊拉姆”，意为“宝岛”。实际上，斯里兰卡这个名字是与美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的。它含有“光明的土地”和“金子”的意思。但是，近20年来，斯里兰卡已经不太像珍珠，倒有点像一块滴血的石头；也不像金子，它不会让投资者动心，相反，投资者对这块金子已经弃之如敝履，就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它；而且，它也不是一块光明的土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看不到生活的希望，想象不出美好的明天会是什么样子，他们生活在这里，只是迫不得已，没有去路，只好在这里捱日子。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宁愿远走他乡。

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昔日“光明的土地”今天成了恐怖主义的乐园。枪声和爆炸声已经打破了小岛千百年来的宁静，满目疮痍已经取代了富足和繁华。今天的斯里兰卡，已经成为“南亚的黎巴嫩”，成了恐怖主义的大本营。

美国国务院1988年8月公布了一份有关亚洲恐怖主义活动的报告。报告称，在过去的一年里，亚洲的恐怖主义事件增加了121%，大大高于全世界7%的增长水平。亚洲之所以能摘取这顶“桂冠”，斯里兰卡以及与它隔海相望的印度“功莫大焉”！如果把这两个国家的统计数字除掉，那么，亚洲总体的恐怖主义水平必将下一个台阶。

是什么因素使昔日的“光明之地”变成了一块绝望之地？

据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称，当今世界恐怖主义活动泛滥成灾，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是民族矛盾上升，宗教、种族冲突加剧的必然后果。就斯里兰卡而论，这块昔日的金子般的国土之所以沦为恐怖主义的大本营，同样是斯里兰卡国内政治、经济、宗教和种族冲突的必然结果。

斯里兰卡是一个岛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斯里兰卡，世代代居住着这样一些民族：僧伽罗人、泰米尔人、摩尔人、伯格人。其中，摩尔人我们在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中看到过，那个嫉妒成疾的奥赛罗就是摩尔人。不过，摩尔人与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关系不大。在斯里兰卡，它和伯格人是居于绝对少数的少数民族。问题的关键出在另两个民族身上。

僧伽罗人是斯里兰卡的主体民族，人口虽然只有900万，但占斯里兰卡总人口的74%。据考证，僧伽罗人源于印度西北部，是古代雅利安人的一支。他们于公元前5世纪左右渡过科伦坡海峡，来到这块珍珠之地定居。据说，它的祖先叫僧伽罗，他消灭了岛上的女妖，然后自立为王。僧伽罗源自梵文，带有鲜明的印度文化的痕迹。他们聚居在斯里兰卡的西部及西南部。这里是斯里兰卡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泰米尔人实际上也源自印度，是古代达罗毗荼人的一支。他们原居印度南部，后来渡海来到斯里兰卡。他们主要居住在斯里兰卡北部的贾夫纳半岛和东南沿海地区，人口260万，占总人口的18%。这些泰米尔人分两大部分；

一部分泰米尔人早就居住在斯里兰卡，是斯里兰卡的当然公民，但还有一部分，是殖民主义统治时期，英印当局为开发斯里兰卡从印度迁徙过来的，这部分人被称为印度泰米尔人。他们在斯里兰卡独立后，没有取得公民权。为此，印度和斯里兰卡两国政府进行了长时期的谈判，但没有任何进展。

虽然泰米尔人在岛上是少数民族，但在全世界，泰米尔人的力量却远远超过僧伽罗人。据统计，全世界共有 9000 万泰米尔人。其中，印度的泰米尔人最多，它在印度有一个邦，就是泰米尔纳德邦。

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同源于印度，又在同一个大岛上共处了上千年。但是，临近英国殖民主义撤出南亚，这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却愈演愈烈，最后简直水火不相容。原来，英国殖民主义者为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有意实施“以夷制夷”政策。他们人为地扩大两个民族之间的差异，在两大民族之间制造矛盾，让僧伽罗人组成的军队在泰米尔聚居区驻防，又让泰米尔人组成的军队在僧伽罗人聚居区驻防。

1948 年，斯里兰卡挣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取得了独立。但是，英国殖民者是从来不会甘心从一个地区撤退的，它总会千方百计地留下一些后遗症，从而种下纷争的种子，让新独立的民族主义政权忙得不可开交。在巴勒斯坦，它制造了巴勒斯坦问题；在印度次大陆，它制造了印巴分治；在斯里兰卡，它又制造了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之间的民族矛盾。它忽视斯里兰卡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以及僧、泰两大民族之间存在矛盾的现状，把政权全部交给僧伽罗人，而原来占优势地位的泰米尔人却被彻底排除在政权之外。这使泰米尔人极为不满。为打破受过良好教育的泰米尔人在政府部门和其他领域的优势状况，1956 年，僧伽罗人控制的国会还通过《语言法》，规定僧伽罗语是斯里兰卡唯一合法的官方语言，泰米尔人在政府机关、军界、警界及其他事业部门就业的比例一下子从 50% 下降到 10%。六七十年代，斯里兰卡又实施标准分制，规定泰米尔考生的录取分数要高于僧伽罗考生，进一步限制泰米尔人的发展。1972 年更用宪法确定佛教的统治地位，正式规定僧伽罗语为唯一合法官方语言，并取消了前一部宪法中有关保护少数民族利益的 29 条条款。泰米尔人沦为二等公民，心中自然不满，两大民族之间立即引起冲突，并演化为流血事件。在这种背景下，泰米尔的分离主义运动产生了。1976 年，泰米尔各派政治力量开始联合，成立了泰米尔联合阵线，提出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的、社会主义的泰米尔国”，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和平手段建立泰米尔独立国的决议，但是一些激进的青年不满阵线领导人采取和平手段的斗争方式，他们主张通过武装斗争，实现民族独立。

在这风云际会之际，有一个青年挺身而出。他聚集同伴，拉起了大旗，决心以暴力手段为泰米尔人争取利益，建立泰米尔国。他就是猛虎组织的创始人韦卢比莱·布拉巴兰卡。当年他只有 18 岁，但是已经有了两年的斗争历史。16 岁时，他就是泰米尔学生运动的中坚力量，目睹和平斗争的穷途末路，决心拿起武器，以武装斗争和恐怖手段夺取政权。1972 年，他在海外成立了猛虎组织，1975 年，潜回家乡，亲手刺杀了贾夫纳市的市长，从而拉开了以恐怖活动进行斗争的序幕。但是，在以后的十年间，猛虎组织发展缓慢。到 1983 年，它也不过 30 多个人，十余条枪。这种力量自然谈不上规模效应，布拉巴兰卡在泰米尔人心目中也没有什么影响，当然更谈不上夺取政权。

1983 年 7 月 23 日，一支僧伽罗人组成的政府军正在贾夫纳半岛执行公务，突然枪声大作，13 名政府军士兵当场被打死，剩下的一些士兵落荒而逃。

13具尸体被运到科伦坡，见者无不动容。僧伽罗人明白，此事系泰米尔人所为，因此，僧伽罗人立即把气撒到所有泰米尔人身上。一场针对泰米尔人的种族仇杀席卷整个斯里兰卡。一时间，小小的岛国为血雨腥风所笼罩。短短十几天时间，千余名泰米尔人被僧伽罗人残害致死，手段十分狠毒，令人发指。就连关在监狱里的犯人也自觉地分成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两派，泰米尔罪犯被僧伽罗罪犯处死50余人。此外僧伽罗人还袭击泰米尔人的商店，抢劫他们的财物，大有纳粹遗风。结果，泰米尔人有2万幢房子被毁，500余家商店被抢，100多家工厂被付之一炬。10万泰米尔人无家可归，饱尝了没有立足之地的痛苦。愤慨之余，一些泰米尔青年投身猛虎组织，决心拿起武器向僧伽罗人复仇。结果，没有多少时间，猛虎组织名声大噪，成员激增至3000余人。

1983年的袭击事件是斯里兰卡种族冲突斗争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过去，斯里兰卡的种族仇杀一般几年才发作一次，此后，种族冲突的规模越来越大，发作周期越来越短。此前，猛虎组织虽然也进行一些恐怖主义活动，但多系零星出击，没有多大影响，猛虎组织也没有形成气候。经过这一场惨变，大多数泰米尔人都同意武装建国的设想，猛虎组织家喻户晓。对普通的斯里兰卡公民来说，布拉巴兰卡的大名也如雷贯耳，成为一个永远揩不掉的印记。不管你承认与否，布拉巴兰卡策划的这起事件，收到了它应有的效果。

布拉巴兰卡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恐怖分子。他有思想，有纲领。他的最高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泰米尔国，实行类似于南斯拉夫的民主制度。他声称：“我的政治哲学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我要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矛盾的平等社会。”据说，他从古巴革命那里受到很大的影响，古巴革命者格瓦拉是他的导师，因此，他对格瓦拉的游击战理论烂熟于心，在战术上很有一套。他亲自为猛虎组织规定了严明的纪律，猛虎组织的成员不许抽烟，不许喝酒，不准贪污，不近女色。他曾经说过：“我可以允许我的成员结婚，但绝对不允许道德败坏。”违犯纪律者将格杀勿论。猛虎组织推崇自杀性的攻击行为，认为只有不怕牺牲自己，才能确保攻击的效果。每个成员脖子上都挂着一瓶氰化物，连布拉巴兰卡本人也不例外。

布拉巴兰卡在猛虎组织内部建立了绝对的权威。虽然猛虎组织也有一个中央委员会，但他主要依靠少数亲信。他对待异己是毫不手软的。猛虎组织的副首领马哈蒂亚是布拉巴兰卡的同乡，由布拉巴兰卡本人引荐加入“猛虎”。15年来，两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携手并进。但是，1993年8月2日，猛虎组织却突然宣布，马哈蒂亚已经被捕，罪名是企图暗杀布拉巴兰卡等猛虎组织高级成员，与印度情报机构合作，充当第五纵队。观察家认为，对马哈蒂亚的指控可能是子虚乌有，两人反目成仇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争夺和政见分歧。通过这一事件，布拉巴兰卡再次向人们发出信号：他是至高无上的，向他的权威挑战是自寻死路。正是靠这种铁的纪律和权威，布拉巴兰卡把猛虎组织训练成一支纪律严明的战斗队伍。整个猛虎组织分成政治和军事两个部分，前者分29个部门，负责处理一些民事；后者则负责军事行动，下设7个地区分部。猛虎组织在乡村、城镇、地区都设立了各级指挥官，每人都有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化名，如牛顿、尼克松等。在猛虎组织控制的贾夫纳地区，泰米尔人的独立王国俨然已经形成。

猛虎组织是靠恐怖行动起家的，至今，恐怖行为还是它对斯里兰卡政府施加影响的看家本领。加入猛虎组织的成员，个个心狠手辣，忠于自己的信

仰，必要时，他们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人肉炸弹就是他们常用的手段之一。1996年7月4日，一只“黑虎”就腰缠炸药，冲进政府军的车队，结果，包括一名准将在内的21人当场被炸死。猛虎组织靠这种手法树立起自己的权威，产生了“轰动效应”。在斯里兰卡，可以说是谈“虎”色变。当然，猛虎组织的支持者除外。

猛虎组织的主要目标是打击僧伽罗人和斯里兰卡政府，在国际上破坏它们的形象，逼迫它们同意建立一个泰米尔人的独立国家。它总是通过最有效的途径向世人展示斯里兰卡可怕的一面，让斯里兰卡在世人面前黯然失色。斯里兰卡是一个旅游大国，每年到这个岛国的游客很多，为了破坏政府的形象，打击政府的旅游收入，“猛虎”就以宾馆、铁路、航空业为目标。1986年5月3日，它炸毁了一架民航班机。很多外国政府忠告本国公民，不要到斯里兰卡旅游，否则生命得不到保证。结果，斯里兰卡的旅游业一落千丈，许多宾馆门可罗雀，五星级饭店的房间使用率不到20%。茶叶是斯里兰卡的传统出口项目，猛虎组织扬言，它已经用氰化物污染了茶叶。结果，斯里兰卡的茶叶出口量锐减，价格也一跌再跌。为了打击政府的经济，破坏斯里兰卡的投资环境，“猛虎”对一些合资项目发动了进攻。1986年，它炸毁了一座日本投资的水泥厂，结果外资纷纷撤退。“猛虎”的这些恐怖行为确实取得了轰动效应。但是，斯里兰卡政府并没有让步，民族矛盾也没有缓和，“猛虎”建立泰米尔独立国的愿望也没有实现，相反，“猛虎”在人们心目中却成了一个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组织。

面对“猛虎”咄咄逼人的攻势，斯里兰卡政府也进行围剿。无奈，斯里兰卡的国内矛盾积重难返，猛虎组织又有外援，因此，政府军剿“虎”不成，反被“虎”伤。猛虎组织越打越大，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在战争中壮大起来。以前的“猛虎”只能打一些游击战，后来，“猛虎”已经强大到可以与政府军相持、对抗的程度，这是斯里兰卡政府剿“虎”之前始料未及的。

不过，“猛虎”恐怖行为的受害者主要是普通的僧伽罗人和一般政府官员，猛虎组织并没有把暗杀国家领导人作为自己的攻击目标，因为它追求的是轰动效应，人死得越多，它的影响越大，因此，一般情况下，它很少去碰那些政府要人。

但是，拉吉夫·甘地却是实实在在地死在猛虎组织之手。“猛虎”为何要拿一个外国政要来开刀？原来，这也是母亲英迪拉·甘地留给拉吉夫的遗产之一。

拉·甘地之所以结怨于“猛虎”，是因为印度深深地介入了斯里兰卡的国内政治，成为斯里兰卡国内武装冲突的第三方。

英迪拉养虎遗患

前面说到，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有一部分是后来从印度迁徙过去的。这部分印度泰米尔人在斯里兰卡独立后没有取得公民权，成为印斯两国之间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期，印度政府见谈判无望解决，就转而扶持泰米尔分离主义分子，支持他们向斯里兰卡政府发难，“猛虎”之所以能长得膘肥体壮，与英迪拉的政策不无联系。当时，英迪拉·甘地曾指示印度情报部门专门出资数百万美元，从新加坡和香港等地购来军火，先运抵印度的泰米尔纳德邦，然后转运到斯里兰卡，交给泰米尔人。同时，印

度还专门为泰米尔分离主义分子聘请了黎巴嫩和以色列教官，向泰米尔人传授游击战经验。印度的泰米尔纳德邦成了斯里兰卡泰米尔分离主义分子的大本营。

英迪拉·甘地为何不惜重金扶持邻国的分离主义分子？她不怕国际社会指责印度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对这些利害关系，英迪拉当然心知肚明，但是，权衡利弊，她还是没能摆脱这个念头，因为如果泰米尔人在斯里兰卡掌权，对印度来说好处太多了，她无法抗拒这个诱惑。

首先，印度是一个大国，不管它多穷，但它毕竟人口众多，这注定它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影响。因此，从独立开始，印度政府就确立了大国战略，在国际舞台上十分活跃。如当年的尼赫鲁与中国总理周恩来一起倡导著名的“潘查希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埃及的纳赛尔、南斯拉夫的铁托发起不结盟运动；出兵尼泊尔，吞并锡金；向中国发动边界战争，等等。这些行动都是尼赫鲁树立印度大国地位的组成部分。他认为，只有这样，印度政府在国际舞台上才有发言权。他死了，但他的思想留给了英迪拉·甘地。实际上，英迪拉·甘地在临死前不久，还警告国人要警惕来自边境北边的威胁。比起她的父亲来，英迪拉在实施大国战略方面更有个性。比如，她发动印巴战争，肢解巴基斯坦，这就是她的父亲也没能做到的事情。印斯两国之间的泰米尔人问题同样也是尼赫鲁没能解决的。英迪拉想自己应该能够解决。如果能通过支持泰米尔分离主义分子，在斯里兰卡建立一个亲印度的政府，那么，印度在南亚的影响岂不是可以再上一个台阶？这是她的如意算盘。

其次，解决印度国内的矛盾也必须解决斯印两国之间的泰米尔人问题。如果这些印度泰米尔人取得斯里兰卡的公民权，那么，他们就不必遣返印度，印度政府也不必为他们支付一笔可观的安置费，可以减轻印度政府的负担。

再次，支持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可以为国大党的大选服务。泰米尔人在斯里兰卡虽然只有数百万，但在印度却有6000万，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在国内政治游戏中多取得6000万张选票，那么，她的国大党发言的分量要大得多。英迪拉是个聪明人，她通晓其中的利害关系。因此，她决定改变父亲与斯里兰卡政府的和谈政策，开始支持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对斯里兰卡政府而言，这绝不是一个友好的举动；但是，印度是个大国，斯里兰卡能拿它怎么样？双边关系恶化是肯定的，印度也确立了自己在南亚的地位，同时给世人留下一个干涉者的形象。

英迪拉没有看到泰米尔人建立一个亲印的国家，她死于种族冲突和宗教矛盾。她把总理宝座传给了她的儿子，同时也为他的儿子出了一个难题，现在就看拉吉夫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了。

拉·甘地上台后，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因袭了母亲的做法，印斯两国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了。1987年5月底，印度政府命令东部海军司令部所属部队进入戒备状态，印度海军的军舰在斯里兰卡附近的海域游弋，向斯里兰卡政府施加压力。随后，印度政府又宣布，将向斯里兰卡贾夫纳地区受苦受难的泰米尔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公开与斯里兰卡政府为敌。6月3日，由军舰护航的船队满载补给品和外国记者，开赴斯里兰卡，印度政府此举并没有得到主人的同意，因此，斯里兰卡政府也派出了一支特混舰队，把印度的船队拦截在斯里兰卡领海之外，双方对峙了六个小时，最后，印度政府终觉理亏，命令船队返航。

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第二天，印度政府公然派遣五架军用运输机，

在四架战斗机的护航下，侵入贾夫纳地区，向泰米尔人空投 25 吨物资，给弹尽粮绝的猛虎组织解了燃眉之急。斯里兰卡政府对印度公然干涉本国内政提出严重抗议，南亚其他国家一时间也同声斥责。印度还在南部港口屯兵 7000 人，准备直接出兵贾夫纳地区。斯里兰卡也不甘示弱，政府号召三军将士作好准备，保卫国家。印斯关系达到冰点。

在这关键时刻，拉·甘地突然改弦更张。7 月 28 日，他突然通知总统文塔卡拉曼，说自己将出访科伦坡，与斯里兰卡总统贾亚瓦德纳会谈，解决印斯两国之间的泰米尔人问题，初步的方案是斯里兰卡东北两省的泰米尔人合并，给予他们半自治的权利，大约在一年时间内举行选举，让泰米尔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他还说，印度准备派出维持和平部队。80 高龄的文塔卡拉曼提醒拉·甘地，一定要有斯里兰卡总统签署的请求印度出兵的文件，印度才能向斯里兰卡派出武装部队，否则，又要授人以柄，说印度干涉斯里兰卡内政。拉·甘地答应了。

拉吉夫·甘地为何突然改弦更张？原来，他内心深处也意识到母亲处理泰米尔人问题有一些不足之处。他从心底里赞同泰米尔人自治，但是，他并不赞同他们争取独立的斗争。因为泰米尔人在斯里兰卡过得不顺心可以独立，那么，在印度的泰米尔人过得就很舒服吗？他们对现政府很满意吗？恐怕未必，拉·甘地心里有数。民族独立是一个“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可就再也收不回去了。如果印度政府以支持民族独立或民族自决为名干涉外国内政，那么，一旦印度国内的少数民族提出同样的要求，它又该怎么办？如果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取得独立，那么，印度国内泰米尔人的分离主义倾向必然抬头，种族冲突必将越演越烈，而印度政府目前的国内矛盾已经够尖锐的了，锡克教徒的闹事已经使拉·甘地失去一个母亲，如果再加上泰米尔人，那么印度原有的复杂矛盾必将更加复杂。这是拉·甘地不愿看到的。因此，他决定改弦更张，放弃支持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的分离主义运动，并以此来改善与斯里兰卡政府的关系。

1987 年 7 月 29 日，拉·甘地访问科伦坡，与斯里兰卡总统贾亚瓦德纳就斯里兰卡国内局势与斯印两国关系交换了意见，最后签署了《关于斯里兰卡建立和平与正常状态的协议》。协议为泰米尔人争取了一些民族权利，如规定泰米尔语与僧伽罗语平等，同为斯里兰卡的官方语言，泰米尔人占多数的东北二省合并，实行半自治。协议同时规定，斯里兰卡政府军与泰米尔反政府武装实施停火。为监督停火，印度派 5 万军队进驻斯里兰卡泰米尔人居住区。拉·甘地原以为此举会给斯里兰卡带来真正的和平，印度从此可以从斯里兰卡抽身，没想到斯里兰卡的局面因此更为复杂，印度不仅不能从斯里兰卡抽身，反而更深地陷入斯里兰卡的国内政治，而自己也因此送命。

和平协议并没有为斯里兰卡带来真正的和平，长期的民族积怨不是一纸协定能消除的。更重要的是，泰米尔人的要求并没有得到实现。实际上，所有的泰米尔人都同意独立，只是方法不同而已。而僧伽罗人也不愿作出让步，因此，协议签字后，爆发了两周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和暴力行为。僧伽罗人高呼“我们要打死贾亚瓦德纳”和“甘地，滚回去”的口号，泰米尔武装组织也没有在和平协议上签字，他们在贾夫纳贴出标语：“我们不要在斯里兰卡再出现一个孟加拉，我们不要印度军队强奸我国妇女。”因此，和平协议没有带来和平，它只给这个国家带来了“痛苦、流血、眼泪和毁灭”。

由于和平协议没有满足泰米尔人的全部要求，因此，泰米尔人对协议持

抵制态度。当印军根据和平协议命令“猛虎”缴枪时，“猛虎”的反应十分消极。8月5日，猛虎组织象征性地交出了五卡车的破烂装备，其中包括800支破枪。布拉巴兰卡本人也拒绝出席缴枪仪式，只是派出了一个代表。他表示：“我们并不情愿交出武器，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不得不听从印度政府的意见。”但不管怎么说，这是“猛虎”第一次向政府军交出武器，虽然只有一些破枪，斯里兰卡政府也满足了，因此，它下令释放了被囚禁的千余名泰米尔人，并取消全国的宵禁。

但是，好景不长，和平协议签字仅仅几个月，双方的冲突再起。1987年10月3日，斯里兰卡海军在海面上截获了一艘从印度偷渡到斯里兰卡的小船，抓到了17个人。警方认为，他们中有4个人与4月份的大规模恐怖事件有关，因此，斯里兰卡安全部长命令将这17个人押到科伦坡继续审讯。10月5日，他们听到了这个消息，立即作出了反应：他们一边高呼“为布拉巴兰卡尽

忠的时候到了，泰米尔伊拉姆万岁！”，一边咬碎了吊在脖子上的小玻璃瓶，看守立即上前制止，但已经迟了，17人中只有2人获救。消息传出，猛虎组织群情激愤，发誓要进行报复。从10月5日开始，猛虎组织就大开杀戒，被他们抓在手中的八名政府军士兵首先遇难。他们被拖到贾夫纳的公共汽车站，当众处死。冲锋枪子弹把这八个士兵打得像蜂窝煤一样，其景惨不忍睹。在此后的两小时内，猛虎组织就屠杀了160人，而且，恐怖行为还在扩大。斯里兰卡政府被震怒了。舆论一边谴责猛虎组织的胡作非为，一边指责印度军队坐视不管，纵容猛虎组织。反对党也举行集会，要求废除已成空文的印斯协议。贾亚瓦德纳忧心忡忡，要求印度政府履行协议，维持和平，否则，他将要求印度军队撤出斯里兰卡，自己采取行动，在斯里兰卡恢复法律和秩序。

猛虎组织拒绝停火，让拉·甘地十分恼火。说实在的，他虽然不支持泰米尔人独立，但也不想得罪泰米尔人，因为印度国内还有6000万泰米尔人，如果他们为自己的斯里兰卡同胞声援，那拉·甘地的处境是十分狼狈的。因此，在停止支持泰米尔人独立要求的同时，他又为泰米尔人争取到了半自治的权利，同时提出派兵进入斯里兰卡维和。说是维和，实际上拉·甘地是存心拉偏架，因为他担心一旦猛虎组织放下武器，斯里兰卡政府就会背弃前盟，向猛虎组织举起屠刀，因此，这个维和更多地是针对斯里兰卡政府军而来的。但他没料到，他的举动还是得罪了猛虎组织，因为在过去的战争中，猛虎组织已经占尽优势。他们认为，印度出兵斯里兰卡阻止了它的夺权行动，因此，印度已经成了泰米尔人独立道路上的障碍。“猛虎”对印度政府军的敌视显而易见。维和不成，印度军队干脆站到政府军一边。10月1日，印度军队开始向猛虎组织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企图以战促和，通过战场上的胜利逼迫猛虎组织放下武器。斯里兰卡北部一时硝烟弥漫。印度政府军出动了大批装甲部队，使用大炮对付猛虎组织，印度海军又切断了贾夫纳地区的海路，切断了猛虎组织的外援。大敌当前，猛虎组织毫不畏惧，它用迫击炮、火箭炮之类的武器进行还击。最后，印军终于攻入了贾夫纳，但是，布拉巴兰卡逃出了印军的包围圈。猛虎组织化整为零，开始了游击战。激战中，双方均蒙受了重大损失。其中，猛虎组织的伤亡更巨，其死伤人数是印军的四倍以上。而且，印军军纪败坏，所到之处，烧、杀、奸、掠，无所不为，在斯里兰卡引起公愤，斯里兰卡国内要求印军早日撤出的呼声日高，最后，印军不得不

在 1990 年 3 月撤出斯里兰卡，而拉·甘地已经在 1989 年的大选中败北。

1990 年，维·普·辛格政权已经摇摇欲坠，1991 年印度将开始新一轮的大选。拉·甘地看样子很可能再次上台执政。猛虎组织早就对他怀恨在心，担心他上台后再次实施对泰米尔人的强硬政策，因此，开始策划除掉拉·甘地。1990 年 10 月，布拉巴兰卡和他的高级幕僚在斯里兰卡北部的丛林中开会，决定成立以“独眼杰克”西瓦拉森为首的暗杀队伍。西瓦拉森是猛虎组织的资深情报人员，同时也是一名爆破专家。暗杀小组的成员包括穆鲁甘、苏帕和佳雅达利，苏帕和佳雅达利是猛虎组织的两只“黑虎”，她们自告奋勇，参加这次暗杀行动，因为她们在战斗行动中都遭受过印军士兵的侮辱，早萌死志，此次决定报此奇耻大辱。

西瓦拉森一行四人潜入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在这里隐蔽下来，寻找暗杀的时机。4 月 21 日，他们进行了第一次演练。他们出席了马德拉斯市马里纳的一个政治集会，并摄了影，录了像。5 月 12 日，他们又进行了第二次演练。维·普·辛格总理在马德拉斯进行竞选宣传，这一次，佳雅达利上前向总理行了触脚礼。这一成功让他们欣喜若狂，能够接近维·普·辛格，就同样能接近拉·甘地。

5 月 20 日，他们得知拉·甘地一行要在第二天赴斯里佩鲁姆布杜镇进行竞选宣传，不由得喜出望外。凭经验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因为这个小镇的治安力量很差，在群众集会上，狂热的信徒一般会把会场的气氛推向高潮，而拉·甘地为了塑造和蔼可亲的形象，也会有意与群众接触，这样就为刺杀创造一个良好的机会。西瓦拉森当即决定，第二天，由两名“黑虎”装作拉·甘地的崇拜者向拉·甘地献花，从而引发人体炸弹，除掉拉·甘地。苏帕和佳雅达利都同意了。第二天，他们来到斯里佩鲁姆布杜镇，随身带着四枚已经装配完毕的炸弹。佳雅达利和苏帕稍事休息，就赶到拉·甘地即将进行讲演的会场。当地的国大党主席拉马穆特正在布置会场。佳雅达利提出，她们都是拉·甘地的忠实支持者，希望能在晚会上向拉·甘地献花，表达心中的爱意。拉马穆特说，献花必须有所在区国大党主席的介绍信才行，否则，任何人都不得接近拉·甘地先生。听到拉马穆特这个解释，佳雅达利和苏帕的心都是一沉。她们事先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接近拉·甘地还要什么介绍信。天这么晚了，到哪里去搞这该死的介绍信？拉马穆特把她们失望的表情看在眼里，安慰她们，来日方长，这次不行，下次还是有机会的。两人悻悻地回到旅馆，把所见所闻告诉了西瓦拉森，西瓦拉森也没有料到会有这种情况。弄一张介绍信并不难，关键是天色已晚，他根本来不及去弄。但事已至此，也只好去试一试了，但愿集会上能找到机会，除掉这个该死的拉吉夫·甘地。他当即决定，由苏帕和佳雅达利两人负责实施此项行动，首先由年龄稍长的佳雅达利身负人体炸弹，乘混乱时接近拉·甘地，然后伺机实施刺杀行动，而苏帕则在一旁协助。如果佳雅达利暗杀失败，苏帕将承担起这个重任。两人都答应了。

当天晚上 9 时，佳雅达利和苏帕两人离开旅馆，来到会场。当时拉·甘地的车队还没有到达，但草坪上已经挤满了拉·甘地的支持者。两人分头进入会场，找僻静处坐下，等待机会的来临。果然，10 点多钟，拉马穆特宣布拉·甘地先生已经到达，顿时，会场上群情激奋，大家争先恐后站起身来，向拉·甘地表达心中的敬意。佳雅达利眼见时机已到，立即挤上前去，要向拉·甘地“献花”。拉马穆特一见此女容貌，就觉得面熟，他刚想阻止，但

拉·甘地为了表示自己与民同乐，已经主动向佳雅达利低下头来，接受了她的花环。就在这时，炸弹响了。

接下来的破案工作是近乎戏剧性的。尽管印度政府对此案高度重视，成立了维杰·卡兰为首的特别调查小组，但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调查小组一无所获。眼看拉·甘地 47 岁寿辰已近，如果在这个节日前调查小组还拿不出一点线索，维杰·卡兰如何向国人交代？就在这时候，调查取得了突破。5 月 25 日，印度警方在泰米尔纳德邦逮捕了一个“猛虎”成员。经审讯，他交代是来谋杀“泰米尔伊拉姆人民革命阵线”领导人帕鲁瓦尔的。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个笔记本，上面有两个人名：纳利妮和穆鲁甘。6 月 1 日，警方又逮捕了一个名叫帕德玛的女人，她的女儿就是纳利妮。她供认，她曾窝藏过佳雅达利。

8 月 17 日，卡纳塔卡邦的警察找到了一条重要线索，在一个名叫穆撒提的小村里，警察找到了一张纸片，上边写着一个名叫安贾纳帕的人名及住址。这个小村曾遭到猛虎组织的袭击，这个字条与“猛虎”会不会有什么关联？警察按图索骥，找到了这个安贾纳帕所住的小村，但人没有找到。后来，还是安贾纳帕自己跑到警察所，告诉警察，他的朋友兰加纳斯带他去过了穆撒提村“猛虎”的安身处，并留下了他的地址，但他不知道那里的人是否就是猛虎组织的成员。警察跟踪追击，于 18 日找到了兰加纳斯家，并抓住了他的老婆。兰加纳斯夫人是个教师，她不知警察抓她何事，想来想去，只有自己与猛虎组织有瓜葛能令警察对她感兴趣，因此，她把西瓦拉森的藏身处供了出来。当时，西瓦拉森住在离卡邦首府班加罗尔 20 公里开外的一个小村里。当天下午，警察再次出动，包围了西瓦拉森藏身的小屋，同时与特别调查小组联系。第二天一早，维杰·卡兰和他的助手卡西凯扬赶到班加罗尔。有两个人乘黄包车来到小屋前，一看小屋被包围，撒腿就跑。警察逮住了他，其中有兰加纳斯。他供认，小屋里藏着的是西瓦拉森和他的表妹苏帕。听说小屋里藏的真是“独眼杰克”西瓦拉森，维杰·卡兰如临大敌。当天下午，700 名警察开始向小屋发动了进攻。20 日清晨 6 点半，5 名敢死队员冲进小屋，但见小屋内尸横遍地，西瓦拉森已经用 AK-47 型冲锋枪自尽，其他人服了氰化钾。这样，拉·甘地一案终于降下了帷幕。

从人群中飞出的子弹

拉·甘地并不是猛虎组织暗杀的唯一一个国家领导人。自暗杀拉·甘地以后，猛虎组织就一发而不可收，死在它手里的斯里兰卡政界要人不少，不少无头案子也被指控是它所为。

1993 年 4 月 23 日傍晚，科伦坡上空乌云密布，一场大雨即将来临。但是，市中心的吉鲁拉帕纳公园依然人头攒动，斯里兰卡的反对党民主联合全国阵线将在这里举行一次群众集会，该党党魁拉利特·阿图拉达穆达利将在这里发表演说。

晚上 7 点，雨终于下了起来，集会者顿时成了落汤鸡。但是，拉利特依然未到，集会者不愿离去，他们还在等待。8 点左右，拉利特终于出现在会场，看到这么多支持者冒着大雨在这里等候他的到来，他心中充满了感激，也有几分歉意。随后，他登上了讲台，开始向自己的支持者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

拉利特生于 1936 年，原来是执政的统一国民党的重要成员。1971 年，他开始走上政治舞台，1977 年在斯里兰卡省议会选举中获胜，从此平步青云，成为斯里兰卡政界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在 1989 年的大选中，他获得的选票数量最多，当时许多人都认为他会担任总理。他当过贸易与航运部长，1989 年改任国家安全部长，后又任农业、粮食和合作部长。他和当时的总统普雷马达萨及统一国民党的另一位重要领导人加米尼并称为统一国民党的三驾马车，后来因政见不合，他与加米尼和普雷马达萨分道扬镳。1991 年，他策动 47 名国会议员弹劾总统普雷马达萨，指责他滥用职权，迫害异己，窃听反对派的电话，秘密武装反政府武装，等等。普雷马达萨后来收买了一些议员，使弹劾流产；但是，拉利特在斯里兰卡却是声名鹊起。他退出了政府，组织民主联合全国阵线。短短的几个月内，阵线的成员发展到 50 万。他举行了大量的群众集会，控诉普雷马达萨利用职权，营私舞弊。一时间，由于拉利特和普雷马达萨的对立使斯里兰卡的新闻媒介引发了一场宣传大战，执政党利用职权，禁止新闻机构报道反对党的活动，违规的记者还遭到袭击。这些做法不仅没有损害民主联合全国阵线，反而使它的影响更大。据估计，民主联合全国阵线在 5 月 17 日举行的七个省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可能性极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拉利特的权力可能超过总统。人们对这颗政治明星抱有深深的希望。

正当拉利特面对听众侃侃而谈，一位在前排的听众似乎有点坐不住了，他悄悄地向前台挤去，来到离拉利特仅两米的地方，稍作犹豫后就掏出手枪向拉利特射击。事发突然，拉利特根本来不及作出什么反应，连珠般的子弹已经击中了他。他带着痛苦的表情倒了下去。而这时他的保镖也反应过来，他们拔枪向凶手射击，忙乱之中，凶手躲避不及，中了一枪。拉利特立即被送进医院，医生对他进行了抢救，并做了手术，取出了子弹，但为时已晚，拉利特终因伤重，不治身死。

拉利特遇刺后，人们首先把矛头指向斯里兰卡总统普雷马达萨，因为拉利特在世之时，就一再指责普雷马达萨滥用职权，镇压异己。这次拉利特竞选的又是斯里兰卡最重要的西方省的省长职务，因为首都科伦坡就位于西方省。因此，他有暗杀拉利特的动机。但是，执政党立即发表声明，断然否认此事。斯里兰卡总理、统一国民党总书记库雷在向报界的谈话中说，政府及执政党与拉利特被暗杀一事没有任何牵连。普雷马达萨也发表声明，对这一暗杀事件进行谴责。他说：“我对拉利特死于枪伤一事深感震惊。这是一种怯懦的行为，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会对此行径进行谴责。我已指示有关当局对这起暗杀阴谋进行彻底调查，政府将竭尽所能镇压从事暗杀活动的恐怖分子。”他指示斯里兰卡国防部邀请英国警方派出得力侦探，协助斯里兰卡警方进行调查，并悬赏 500 万卢比，重赏协助破案的有功人员。

清理现场时，警方曾发现一具尸体，经查，他就是那个向拉利特开枪的恐怖分子。他中了一枪，但验尸报告显示，他中的那一枪并不是致命的，死亡原因是他服了脖子上的氰化物。这个现象立即引起警方的关注。谁都知道，只有猛虎组织才使用这种毒药，也只有猛虎组织能有如此宁死不屈的精神。因此，警方断定，拉利特死于猛虎组织之手，凶手开枪杀死拉利特后，又服毒而死，当然，也不排除猛虎组织杀人灭口的可能。拉利特到底死于何人之手，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谜，当然，这其中猛虎组织的嫌疑最大。

普雷马达萨壮志难酬

拉利特死了一个星期后，国际劳动节到了。斯里兰卡准备热烈庆祝一番。执政的统一国民党也准备趁机炫耀一下。尽管斯里兰卡已经是满目疮痍，但是，经过艰难的剿“虎”行动，斯里兰卡国内已经大致安定下来，与两年前印度军队和猛虎组织肆虐北方、僧伽罗人民解放阵线作祟南方的局面相比，已经大有好转，而这一切与普雷马达萨总统的铁腕统治是分不开的。对此，普雷马达萨也颇为自得。5月1日那天早上，68岁的总统4点钟就起床了。他先是做瑜珈功，然后开始读报。7点半，他吩咐自己的秘书去搜集能反映他政绩的资料，以便在庆祝大会上演说时使用。他对秘书说：“我要告诉斯里兰卡人民我是如何治理这个国家的。”

确实，普雷马达萨有值得自傲的地方。他出生于地位较低的种姓，在严格的种姓制度下，他的出身已经意味着前程黯淡。他虽然也出生于城市，但他家住在科伦坡最贫穷的地方。由于生活条件很差，连带着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治安很差，而失学率却很高。普雷马达萨的家境还好，父亲是个开黄包车行的老板。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普雷马达萨自然表现出一种忧国忧民的思想。他知道，穷人的孩子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唯有通过读书这一途径。15岁时，他就开始从事帮助穷人的孩子接受教育的活动，并立誓，如果将来他有了办法，一定要让所有的斯里兰卡人，不管他是什么种姓，住上宽敞的住房，接受良好的教育，要让大家觉得有机会，有前途。

由于父亲的支持，普雷马达萨如期完成学业。也是吉人自有天相，他毕业的时候，斯里兰卡的工会领导人库恩辛赫对他很是赏识。在他的提携下，普雷马达萨小小的年纪就走上了从政的道路，成了市议会的一名议员。1955年，他出任科伦坡市副市长。1956年，他又加入了统一国民党，帮助贾亚瓦德纳振兴统一国民党。针对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的民族分离主义思潮，普雷马达萨提出要实行地方自治。这个口号颇得一般民众的欢迎。普雷马达萨在政坛上逐渐崛起。1970年至1977年，他任统一国民党议员团的组织员（秘书长），1978年出任总理，1988年又担任总统之职。

在他从政初期，他还结识了几个著名的商人，如泰米尔土邦主组织的创始人，如今是斯里兰卡国内最富有的大财团的领袖拉杰德拉姆；僧伽罗的房地产商达马达萨，他们共同参与了统一国民党的经济自由化计划。受这些人的影响，普雷马达萨接受市场经济的思想就更多些。因此，在1988年当选为总统后，他就大力提倡市场经济，发誓要把斯里兰卡建成南亚的新加坡。他向外国投资者开放股票市场，大幅度降低关税。结果，斯里兰卡的经济蒸蒸日上，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年增幅达到5%。普雷马达萨在成为总统后没有忘记童年有关贫民窟的记忆，一直致力于乡村脱贫运动。1992年，他倡议建立了300个乡镇服装厂，为10万贫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另外为全国430万中小学生免费提供校服、课本和午餐，使贫困地区的孩子也享受受教育的权利。如果不是斯里兰卡境内不时有隆隆炮声，人民还真以为是到了人间天堂呢！

普雷马达萨知道，他接手的斯里兰卡绝对不是人间天堂，如果刻薄一点，把它说成是人间地狱也不过分。自内战爆发以来，斯里兰卡几乎没有一天宁静过，不是这里爆发内战，就是那里出现爆炸事件或暗杀事件。他以前的历届政府不是建设无能，而是国内环境无法让他们安静下来进行建设。北方是

要求独立的泰米尔人，南方，僧伽罗人也不甘示弱，建立了僧伽罗人民解放阵线。猛虎组织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但僧伽罗人阵也崇尚武装斗争。“猛虎”动不动就杀人越货，但它只要求泰米尔人的独立，并不要求科伦坡的政权，而僧伽罗人阵就不一样了。它不仅从事恐怖活动，还崇尚武装夺取政权，它看中的就是科伦坡的总统宝座，让斯里兰卡换一种颜色。

人阵成立于1965年，创始人是罗哈纳·维杰维拉。这是一个极左派的政治组织，与当时的国际气候相一致。该组织崇拜古巴的格瓦拉，赞赏他的“一次成功”的革命理论，这是当时左派革命的流行病，连“猛虎”也未能避免。人阵主张，资本主义的危机时刻已经到了，斯里兰卡的国内危机要靠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来解决，夺取政权后，斯里兰卡将实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这几乎是30年代斯大林主义的翻版。

1971年4月5日，人阵发动了一场古巴模式的反政府暴动，但是，这场暴动是短命的，政府军没费多大力气就镇压了暴动，维杰维拉也沦为阶下囚，被判处终身监禁。人阵被迫转入地下。1977年贾亚瓦德纳总统上台后，他允许人阵公开出来活动，但必须在民主、宪法的范围之内，并放弃武装斗争。人阵答应了，而维杰维拉也因而获释。但是，斗争并没有停止。1983年，猛虎组织策划了残杀僧伽罗人的事件，一时间，向泰米尔人复仇的浪潮席卷全国。斯里兰卡政府认为，人阵介入了这些暴力事件，因此，又取缔了人阵，人阵再次转入地下。

印斯两国协议签订后，人阵和许多僧伽罗人一样，认为这个协议损害了斯里兰卡的主权和独立，实际上也是损害了僧伽罗人的独立，因此，斯里兰卡国内出现抗议风潮。激进青年和一些极左派组织不断上街游行，同时也发生了不少暴力事件。据称，这些暴力事件与人阵不无关系。人阵从事的恐怖活动虽然尚不能与猛虎组织相提并论，但它的潜在影响却非“猛虎”可比。“猛虎”仅仅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泰米尔国家，而人阵要的是整个斯里兰卡。因此，它不仅从事暗杀等恐怖活动，而且还与反对党勾结，以扩大影响。它从事恐怖活动的目的就是扰乱人心，制造恐怖气氛，给政府施加压力，迫使统一国民党党员退党，最终搞垮该党，达到执政的目的。

对人阵的活动，斯里兰卡政府是坚决打击的。为了镇压人阵，政府甚至动用了印度军队。1987年印斯两国协议签字后不久，斯里兰卡政府就把2000名印度军队从斯里兰卡北方空运到南方镇压人阵，同时成立了反颠覆机构，并把三军联合作战司令部迁到南方，以加强对军事行动的指挥。但是，人阵的暴力活动还是有增无减，最终形成“猛虎”为害北方、人阵大闹南方的局面，斯里兰卡政府的政令没法贯彻下去。

普雷马达萨1988年上台后对这种局面心急如焚。他在竞选时就提出，要让印度军队撤出斯里兰卡，以维护斯里兰卡的主权和独立，但是拉·甘地置若罔闻。而这时，人阵在南方闹得轰轰烈烈，普雷马达萨只得把矛头首先指向人阵，以解燃眉之急。他先是用软的一手，释放了监狱里关着的1800名嫌疑犯，取消了政府的紧急状态法，指望人阵能投桃报李。不料，人阵利用这个机会，反而闹得更凶了。3000名政府的支持者和普通平民死于非命。软的一手无效，普雷马达萨只得拿出强硬的一手，再次宣布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并于第二年2月下令对人阵进行清剿，结果取得了胜利。人阵有几千人被杀，从此元气大伤。

平定了南方僧伽罗人的叛乱，普雷马达萨开始考虑对付北方的“猛虎”

和印度军队。猛虎组织为害斯里兰卡，是斯里兰卡陷入内战的主要因素，剿灭它理所当然。但是，这是斯里兰卡的内政，不劳印度援手。印度5万军队在斯里兰卡领土上耀武扬威，动辄烧杀抢掠而斯里兰卡政府却敢怒不敢言。斯里兰卡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脸面何在！心高气傲的普雷马达萨总统哪里受得了这种气！他请拉·甘地撤军，而对方却拿出印斯两国协议，说“猛虎”未除，斯里兰卡国内和平没有实现，印度军队怎能撤出？白纸黑字写在那里，普雷马达萨总统也无可奈何。但是他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反正“猛虎”和印军都是为害斯里兰卡的罪魁，何不让他们自相残杀，然后自己出来收拾残局？“猛虎”不管怎么胡闹，这终究是斯里兰卡的内政，印度军队在里面插一手算怎么回事？因此，他决定暗中支持“猛虎”，让它用爪子在拉·甘地的脸上抓两下，让他知道厉害，自己退出。1989年4月，普雷马达萨呼吁猛虎组织与政府直接谈判，解决斯里兰卡的种族冲突。而“猛虎”也作出了温和的反应，这还是内战爆发以来第一回。在致总统的信中，布拉巴兰卡说：“您已认为，外国军队可能利用我们国内的冲突而获得他们自己的利益。您会认识到，我们一贯反对把外国军队引入国内的政策。”在对待外国军队介入斯里兰卡内政方面，政府与猛虎组织第一次取得了共识。猛虎组织在复信中异乎寻常地使用了“我们国内”这样的字眼，让人以为它已经放弃了民族分立的要求。于是，斯里兰卡北方就出现一种奇怪的局面：一方面，科伦坡信誓旦旦，要与印军一起行动，剿灭“猛虎”；而另一方面，普雷马达萨却秘密地与猛虎组织签署停火协议，命令政府军把重武器秘密地交给猛虎组织，让它与印度军队对抗。布拉巴兰卡的妻子也被总统下令从丛林中运到了安全的地方。1990年2月，印度新政府终于从斯里兰卡撤兵，而猛虎组织与政府的矛盾又开始恶化。猛虎组织指责总统背弃前盟，言行不一，双方重开战火。总统也受到指责。一位军官说：“每当我手下人在战斗中被炸掉腿时，我就想起了我们的总统。”

5月1日11点半，普雷马达萨总统已经视察了支持者的队伍，他准备亲自带着他们从体育场出发进行“五一”游行。沿线已经布置完毕，到处是总统的画像，普雷马达萨十分自得，这是他希望看到的场面。他从一个低级种姓的下等人，成长为一个国家的总统，还不值得骄傲吗？事实上，他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纪念馆，它就在他自己的家中。他专门辟出一间房子，里面陈列着铭刻着他功绩的玻璃盒子，另外还有一辆黄包车，这是他父亲的产业，是他发家的象征。他的父母的蜡像站在车旁，而他，普雷马达萨，则在车上正襟危坐。没有人说这不合适，因为这毕竟是普雷马达萨自己的私事，没有人能干涉他，包括他的父母。

游行队伍来到阿姆奥街，总统戴着标有执政党字样的绿色棒球帽，沿途向人们致意。一个青年推着自行车从对面走来，没有人意识到他的行动，只是到了跟前，总统的私人秘书莫希丁才认出，这个名叫巴布的人是一个泰米尔人，曾在自己开的百货店里干过。最近已经有风声传出，猛虎组织要暗杀总统，因此，莫希丁上前干涉这个青年的行动。他推了巴布一下，想把他赶得离总统远一点。就在这时，巴布引爆了捆在身上的炸弹。只有录音机大小的炸药威力很大，炸弹发出巨大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包括普雷马达萨在内的16个人被炸死，另外有38人受伤，其中有7名是重伤。到处是残腿断臂和横飞的血肉，68岁的普雷马达萨总统刚才还威风凛凛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此刻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四肢不全，凶手也是身首异处。

不到两周的时间内接连发生两起凶杀案，两名政界要人死于非命，这就不能不让人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何者为因，何者为果？不得而知。舆论认为，普雷马达萨总统在镇压人阵的同时，也组织起一支代号为“黑猫”的秘密敢死队，专门绑架持不同政见者。因此，他首先杀了拉利特，而拉利特的追随者也采取了极端措施，报复普雷马达萨。有一位学校的教师就说：“我们对前任领导人经常对反对派采取的独裁作法已经司空见惯。”言下之意是，普雷马达萨遭此报应也属必然。一位反对党领导人也说：“我们是佛教徒，我们相信因果报应之说，不是在今生就是在来世。”普雷马达萨本人对自己这种易得罪人的性格也深有体会，但表示决不会因此改变。在临死前几天，他曾经说过：“你们可以谋杀我，但是不能除掉我的性格。我不是一个凶手，他们指责我，但是他们没有证据。”

当然，最有可能的还是猛虎组织或人阵策划了此次暗杀事件，斯里兰卡警方也坚持这种观点。事发之前，警方已经得到情报，猛虎组织的爆炸小组已经潜入科伦坡，目标是陆军司令部和政界要人。普雷马达萨作为总统当然是首当其冲。再说，这次巴布杀害普雷马达萨使用的又是自杀性攻击，这不能不让人们把猛虎组织当作嫌疑犯看待。另外，普雷马达萨对待人阵也十分心狠手辣，人阵要进行报复，杀害普雷马达萨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因此，斯里兰卡司法部长哈密德说，由于总统结怨甚多，到底是谁杀害了总统，现在还不得而知。

驯“虎”之路漫漫

普雷马达萨总统遇难后，接任的维杰通加总统对猛虎组织发动规模更大的围剿。政府军发动了代号为“贾夫纳之女”的军事行动，把猛虎组织压迫到贾夫纳半岛的最北端。双方交战十分激烈，死伤惨重，猛虎组织元气大伤。但就在政府军一步步向前推进、逼近猛虎组织总部贾夫纳城之际，猛虎组织出奇兵，攻陷政府军的普内林军事基地。这是一个包括陆、海军事基地在内的大型基地，主要负责阻止猛虎组织向内陆渗透，切断其海上补给。这个基地的陷落，对政府军的剿“虎”行动极为不利。国防部承认，这是政府军10年中最惨重的失败。最后，政府军出动精锐部队，使用了空降作战，终于夺回基地，但已经伤亡惨重。猛虎组织在撤退前把基地内的军事装备洗劫一空，监视海上情况的雷达站也被摧毁。普内林基地的陷落表明，猛虎组织虽遭重创，但仍有相当实力。

1994年，斯里兰卡新一届政府组成，主张早日解决民族冲突、通过政治途径结束内战的人民联盟在选举中获胜。新政府宣布解除北部地区的紧急状态，并不再把猛虎组织放下武器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猛虎组织也作出了积极反应。经过两轮和谈，双方达成了停火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同意在五个冲突地区设立由双方代表及国际代表组成的仲裁委员会，并在双方之间设立一个隔离带。在此期间，猛虎组织不得从事爆炸、暗杀等恐怖活动。但是，这种和平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1995年4月18日，猛虎组织退出和谈，重开战端。19日，猛虎组织成员以自杀性进攻方式，炸沉政府军的两艘炮艇。政府军也发动了代号为“跃进”的军事行动。政府希望以战迫和，让猛虎组织回到谈判桌上来。1995年8月3日，库马拉通加总统提出了政治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案：1. 斯里兰卡实行地区联邦制，将全国划为九个地区；2. 下放权

力，给予地方政府较大的权力，泰米尔人所居住的东北地区将设立“东北地区”。这个方案被猛虎组织拒绝，所有的泰米尔组织部对这个方案表示失望，认为它无法保证泰米尔人获得足够的权力。看来，泰米尔人的要求是“不独立，毋宁死”，但是，恐怕任何一个斯里兰卡政府都无法满足泰米尔人的这个要求，因此，政府军再次发动代号为“阳光”的陆海空三军联合军事行动。经过八天的苦战，政府军在猛虎组织的大本营升起了斯里兰卡国旗。猛虎组织则退回丛林地区，重作森林之王。“猛虎”在丛林中舔血养伤，一俟时机成熟，它又出来为害。布拉巴兰卡声称：“要为独立建国流尽最后一滴血”。1996年1月31日，它炸毁了科伦坡的中央银行大楼，造成70余人死亡。1996年7月18日，猛虎组织再次发动进攻，奔袭了政府军的穆莱蒂军事基地，打死了150个士兵，劫掠了大批军火。消息传到科伦坡，科伦坡交易所的股票指数剧跌，达到三年来的最低点。

对斯里兰卡政府来说，要消灭“猛虎”并非易事，14年来的内战已经说明了这一点。猛虎组织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得到了大部分泰米尔人的支持。14年的血战，使“猛虎”已经出落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森林之王。它长于化整为零的游击战，除了正面交锋外，它还不时进行恐怖活动以造成恐怖气氛。这对政府军的围剿颇为不利。

但是另一方面，猛虎组织也面临诸多不利因素。首先，政府军近年的围剿还是有效果的。“猛虎”死伤惨重，14年的内战，已经使5万余人丧生，其中猛虎组织成员也有3000人，有生力量受到沉重打击。现在，猛虎组织已经被迫退出它盘踞多年的贾夫纳，进入丛林地区。这一地带长期与世隔绝，生活用品缺乏，猛虎组织衣食无着，药品更是奇缺，不利于长期坚守。

其次，猛虎组织过去打着民族独立的旗号，尚可得到一定程度的国际社会和普通民众的同情与支持，这是猛虎组织得以发展壮大基础。但是，由于猛虎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恐怖活动，尤其是暗杀政界要人，滥杀无辜，致使人心丧尽。现在，印度政府已经明确宣布“猛虎”是恐怖主义组织，组织力量大肆追捕，并且切断了泰米尔纳德邦与猛虎组织的联系，“猛虎”的补给困难，难以长期坚持下去。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也采取行动，拔掉了猛虎组织的几个内线，敲掉了“猛虎”的几颗“牙齿”。美国政府也公开宣布“猛虎”是恐怖主义组织，不时向斯里兰卡提供有关猛虎组织的情报。大赦国际谴责猛虎组织侵犯人权。欧洲议会则呼吁其成员国关闭猛虎组织的办事处。如果国际社会对猛虎组织坚持其否定态度，那么，“猛虎”重出丛林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

再次，泰米尔人问题终究是一个国家的少数民族问题，在斯里兰卡这样一个小国，再分裂出来一个更小的泰米尔国，是很难设想的。斯里兰卡对待泰米尔人的态度是现实的，也是坚决的，即泰米尔人可以争取更大的民族自治权利，如果泰米尔人坚持独立，那是不可能的。国际社会也不会支持一个分裂的斯里兰卡。人心思和，猛虎组织如果顺应民心，停止恐怖活动，当是顺应历史潮流之举；但是，就怕一小撮恐怖分子，到了黄河心也不死，那么斯里兰卡就很难国有宁日了。

和平也需要勇气（一） ——阿以冲突中以色列的恐怖活动 国王广场上的枪声

1995年11月4日，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

这一天是星期六，根据犹太教律，也是安息日。犹太教的先知摩西曾告诫他的子民：“一星期要工作六天，第七天安息日，应当有圣会。”因此，一般情况下，从星期五傍晚落日 to 星期六晚上天空中出现第一颗星为止，犹太人必须在家或宗教场所进行宗教活动，而不得在外边闲逛。因此，在安息日里，人们会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大街上空空荡荡的，没有人，更没有汽车。如果有人不守礼法，驾驶汽车上街，那么，等候他的也许是石头。

但是，这一个安息日与以往遇然不同。夜幕降临后，特拉维夫还是灯火通明，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市中心的国王广场，到那里参加一个集会。据说，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和一批政要将出席集会，并在集会上发表重要演说。

今天集会的主题是“要和平，不要暴力”，是由“支持和谈结束以阿争端总委员会”组织的。一段时间以来，以色列国内出现了一股极右势力，他们反对政府与巴勒斯坦人谈判，以结束持续了50余年的阿以纷争。为此，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暴力活动，以抗议政府的和谈举动。8月份，一名政府部长的汽车在大街上被极右分子掀翻；9月份，那路撒冷警察局长也遭到右翼分子的攻击，就连拉宾总理自己上个月在一次群众集会上也遭到右翼分子的攻击；极右分子甚至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剥夺了魏茨曼总统的发言权。犹太右翼分子气焰之嚣张是以色列立国以来所罕见的。今天，拉宾总理决定率同僚出席由工党组织的和平集会，从气势上压过右翼分子。他深知，如果不对这股反和平势力进行压制，那么，中东和平进程将岌岌可危，以色列也许不得不再次面对战争的危险。

7点钟，随着市政厅电动平台在国王广场缓缓升起，拉宾总理一行出现在国王广场。陪同他出席这次集会的有他的内阁同僚，包括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另外，埃及、约旦等国驻以色列的使节也应邀出席。当他们出现在广场上时，聚集在广场上的人们顿时欢声雷动，向贵宾们致意。拉宾从这如潮的人流及翻滚的彩球上看到了人们的心声，深知自己的和平举动得到了人民的认可。有这么多人支持和平进程，中东的和平有望实现。因此，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集会正式开始前，一些知名演员主动表示，希望登台献艺。他们上台后站在拉宾和佩雷斯中间，与以色列当今这两位巨人一起引吭高歌，唱起了《和平之歌》。这首于1969年发表的曾被斥为失败主义的歌曲在很长时期内禁止在军营中传唱。歌中唱道：

让太阳升起，让清晨充满光明，最圣洁的祈祷也无法使我们复生。

生命之火熄灭的人，血肉之躯被埋入黄土的人，悲痛的泪水无法将他唤醒，

也无法使他重获生命。

无论什么人，无论是胜利的欢乐，还是光荣的赞歌，都不能使他从黑暗的深渊中回到世上与我们重逢。

所以，请唱一曲和平之歌吧。

不要小声地祈求神灵。

引吭高唱和平之歌，这是我们最应当做的事情。

如果这首歌在阿以关系正处于血与火的抗争时传唱，那无疑会动摇以色列人的军心，而在阿以关系出现重大转机、和平之神招之即来的今天，唱这首歌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因此，拉宾总理挽着佩雷斯的手，激动地唱着这首和平之歌。

在人们的掌声中，拉宾总理开始向来宾发表演说。他首先向今天晚上来到广场集会的人们表示感谢。他说：“请允许我这样说，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要感谢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因为你们都是为了反对暴力、拥护和平而光临的。我和我的朋友西蒙·佩雷斯领导的政府决定给和平一个机会——这个和平将解决以色列大部分的问题。”

他继续说道：“我当了27年的军人，只要和平的机会没有到来，我就会矢志不渝地斗争下去。我相信现在有一个机会，一个争取和平的伟大机会，为了站在这里的人，为了更多的不在这里的人，我们必须把握住这个机会。”

“大多数人希望和平，并且随时准备为和平而去冒险，今天来参加集会的人和没有集会的人都真正地渴望和平，反对暴力。

暴力腐蚀了以色列自主政体的基石，暴力必须受到谴责和孤立。”

是的，暴力必须受到谴责，但是，拉宾总理不知道，今天来到广场参加集会的人们，并不全是和平进程的拥护者。夹杂在热望和平之神降临的人群中，就有这么一位誓死从肉体上消灭拉宾的人。此刻，他怀中揣着手枪，正在等待着机会的降临。

他叫伊加尔·阿米尔，巴尔·伊兰大学法律系一年级的学生。他的父亲是犹太法律学家，母亲是幼儿园的老师。阿米尔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就养成了知礼、守法的好习惯。在人们的心目中，阿米尔是个文静、温顺、有礼貌的年轻人，从小就因乐于助人得到人们的赞扬。从预备役退役后，他进入大学深造，读的也是法律。杀人是一桩违法的勾当，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他知道得很清楚。

可是，今天他就要去干一件违法的事情，这件事情的程度足以惊天动地，使许多人扼腕顿足，又令一些人欣喜若狂，令他阿米尔青史留名，不管它是英名，还是骂名。

他要去刺杀伊扎克·拉宾，用自己的手枪将伊扎克·拉宾总理送入地狱。

他与拉宾并无私仇。可是，他觉得他与拉宾仇深似海。

仇恨的根源在于阿米尔对拉宾的和平政策不满。阿米尔是个极端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他上的学校也是一所犹太教会大学。因此，他不希望听到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在这块土地上可以和平共处的说法，对巴勒斯坦极端分子不时挑起的恐怖行动，他也深恶痛绝。他认为，万恶的根源就在于拉宾总理与巴勒斯坦人议和，因此，“我们要把这一切记在拉宾和他的政府帐上”。在他的心目中，拉宾是一个犹太人的“叛徒”、“刽子手”，是出卖犹太人利益的“纳粹分子”。仇恨的火焰在他胸中燃烧，他发誓，一定要为犹太人除掉这个败类。

今天是他第三次策划谋杀拉宾。前两次，因为机会不佳，暗杀无法进行，阿米尔深感遗憾。这一次，他听说拉宾将出席一个盛大的群众集会，认为天赐的良机总算降临了。他摸着自己的手枪，不断地对自己说：“刺杀拉宾！刺杀拉宾！我要让拉宾变成一具僵尸！”

他为手枪压上了经过自己精心改装过的子弹，使它更具杀伤力，然后，

大步走出家门，赶往国王广场。

台上，拉宾还在发表演说：“总会有和平的敌人，他们正在拼命伤害我们，目的是破坏和平的进程。……这是一个充满困难和痛苦的过程，对以色列来说，没有毫无痛苦的道路可走。但是，和平的道路比战争的道路要好。”

阿米尔慢慢地靠近了拉宾总理的汽车。他已经知道，这一次拉宾将从市政府的后门离开，并在台阶处乘上他的汽车离开。他仔细地察看着周围的一切，包括拉宾总理周围的保镖。

拉宾以一个老军人、一个国防部长的身份向人们保证，他的政府将尽一切可能去推动中东的和平进程。他说：“这次集会一定会给以色列人民、全世界的犹太人、阿拉伯世界的许多人，确切地说是向世界传递一个信息，以色列人民需要和平，支持和平！为此，我向你们深表感谢。”

广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拉宾总理意犹未尽，又与全场群众一起高唱《和平之歌》，广场上群众的情绪达到了高潮。歌毕，拉宾转过身来，同站在自己身旁的佩雷斯紧紧拥抱在一起，这个举动让大家深感意外。虽然佩雷斯是拉宾的重要阁僚，但大家都知道，两人的关系素来不睦，两人曾为争夺工党领袖这个职位明争暗斗几十年。就在去年，拉宾和亚西尔·阿拉法特因为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中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获得了当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而西蒙·佩雷斯的支持者不断鼓噪，要把外交部长佩雷斯也列入候选人。应该说，拉宾和佩雷斯是一对冤家对头，人们从未看到两人拥抱过。因此，马上有记者挤过去问拉宾，这是不是两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拥抱？拉宾说：“事情在变，不仅仅是世界和中东在变，我们也在变。”

拉宾一行在人们的簇拥下走下广场，准备乘车离去。拉宾一边走一边与热情的群众握手。就在此时，拉宾突发奇想。他对佩雷斯说：“你跟我说过，在这个大会上有人要行刺，不知道这人群中会有谁会开枪。”佩雷斯把它当作笑话，一笑了之。大会已经结束，下边是层层护卫着的警卫，就是有杀手，这个时候行刺也不可能得逞。

佩雷斯走下台阶，碰到了总理的司机达姆提。达姆提问：“总理什么时候走？”佩雷斯说还要再等几分钟，拉宾总理正在与外国使节握手。

拉宾和夫人丽荷向停在广场旁边的轿车走去。在此之前，他的警卫曾要求他穿上防弹背心，尽快离开广场。拉宾拒绝了。他说：“此刻我觉得像在家一样安全。”有记者问丽荷：“你不怕一个疯子会突然冲出来，向总理开枪吗？”对这个不吉利的问题，丽荷没有反感，也没有担心，更没有引起警觉。她反问道：“你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你疯了吗？我们在哪里？在非洲吗？我真不明白，你们记者怎么会有那么多奇怪的问题。”

丽荷是有理由说这番话的。虽然丽荷所处的巴勒斯坦地区是世界闻名的火药桶，战后绝大多数重大的局部战争发生在这里，世界上恐怖主义活动最频繁的地方也在这里，但是，以色列这块土地，却像一个孤岛，一个世外桃源。这里绝少出现恐怖主义案件。在以色列，个人拥有枪支虽然很普遍，但犯罪率很低，这令美国人感到不可恩议。至于说战争，只要以色列不首先动手，一般不会打起来。更何况，今天的晚会如此成功，拉宾得到这么多支持者的拥戴，记者先生提出这个问题岂非突兀！

拉宾终于同人们告别，向自己的汽车走来。黑暗中，有一个人突然从旁边窜到离拉宾两米远的地方，从怀中掏出手枪，对准迎面而来的拉宾，“叭叭”就是两枪。他一边开枪，还一边喊着：“没事，没事，这不是真的。”

不消说，对准拉宾开枪的就是阿米尔。他无心听拉宾的演说，对全场高唱《和平之歌》的情景也无动于衷，他只想除掉犹太人的“败类”，顺便使自己名垂青史。因此，他迎面对准拉宾的胸口就是两枪，拉宾的胸口如同中了两下重锤。他不由得弯下腰来。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拉宾的保镖发了呆，一刹那，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职责，愣在那里，既没有去追捕凶手，也没能用自己的身体护住自己的总理，反而把拉宾的后背暴露给了凶手，结果，阿米尔向着拉宾的背部又开数枪。一枪击中了拉宾，另一枪击中了一个保镖。拉宾终于倒下了。

拉宾被立即送上汽车，随车的一名保镖问拉宾：“总理先生，你伤着了吗？”

“唔，唔。”拉宾呻吟着，他已经无力回答保镖的提问了。

“伤在哪里？”

“背上，背上。”然后，他又说，“我没事，没事。”然后，头一歪，再也没有醒过来。

拉宾被送到伊希洛夫医院，这时，他已经没有血压，也没有脉搏。检查发现两颗子弹，一颗打中他的脾脏，一颗击中他的脊椎。凶手使用的不是普通的子弹，这两颗子弹都经过改装，是国际上禁止使用的炸子弹。阿米尔在弹头上加了一个铁丸，还在子弹上钻了一个洞，使它的命中率更高，威力更大。结果，拉宾流血不止。

当以色列电台向全国人民宣布，拉宾总理在国王广场遇刺，伤势非常严重时，以色列人民点燃了蜡烛，祈祷拉宾总理平安度过险境，更多的人则涌向医院，探问拉宾总理的病情。11点10分，医生终于放弃了一切努力，走出手术室，宣布拉宾总理伤重身死。11点14分，拉宾总理的助手哈伯正式宣布，拉宾总理遇刺身亡。消息传出，举世同悲。很多人禁不住痛哭失声，更多的人点起了白烛，为拉宾总理祈求冥福。国际社会纷纷发表声明，谴责这一恐怖主义行动。联合国加利秘书长发表讲话，称拉宾遇刺对以色列乃至全世界都是一个重大损失。美国总统克林顿也发表声明，对这一恐怖主义事件的发生表示愤怒。拉宾几十年的对手、中东和平进程中的和平伙伴亚西尔·阿拉法特更是对此表示震惊和悲痛。他说：“这种对一位以色列勇敢的领导人与和平缔造者犯下的可怕的罪行使我感到非常悲痛和震惊。”

11月5日，护送拉宾遗体的车队离开特拉维夫，前往那路撒冷，这是拉宾总理最后的一段人生旅程。拉宾总理的灵柩安放在一辆军车上，遗体上覆盖着以色列国旗。车上，6名以色列将军为先总理守灵；车外，则是如流的车队和随同灵车一起前行的人们。从5日下午2点至6日上午11点，大约有100万人守候在耶路撒冷，等着见拉宾最后一面。

下午2点，葬礼仪式开始。6000名来宾肃立在苍松翠柏掩映下的赫茨山公墓，一列军人抬着拉宾总理的灵柩缓步进入公墓，许多人的眼泪夺眶而出，一名犹太教士为拉宾诵经。拉宾的儿子首先致词，然后，以色列总统魏茨曼，拉宾的伙伴、代总理西蒙·佩雷斯先后致词。佩雷斯说，拉宾的身躯可以被打死，但是，他的精神、他的思想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以色列将沿着他开辟的和平道路继续走下去，直到同邻邦和所有的国家实现和平。随后，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在内的一大串来宾也发表演说，盛赞拉宾总理的功绩。下午3点半，在一片祈祷声中，拉宾的遗体由8名军士放入了赫茨山的公墓，仪仗队同时鸣枪，向先总理致敬。就这样，73岁的伊扎克·拉宾告别了自己的和

平事业，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程。

战争之神

1922年3月1日，伊扎克·拉宾出生于耶路撒冷一个犹太人家庭。从此，他就与这块土地、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及其矛盾结下了不解之缘。

巴勒斯坦位于亚洲西部，地中海东岸，是亚洲、欧洲和非洲三大洲的交通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阿拉伯人的祖先迦南人、犹太人的祖先希伯来人都曾在这块土地上定居，建立国家。其中，犹太国家是公元前1025年建立的，当时叫希伯来王国，经历过扫罗、大卫和所罗门三个王朝，都城在耶路撒冷。后来，希伯来王国为巴比伦人所灭，从而也结束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立国的历史。失去祖国的犹太人被迫背井离乡，受尽了欺压，生存权受到严重威胁。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排犹、反犹运动，这无论是在黑暗的中世纪还是在所谓文明的近代都是如此。因此，犹太人一直想回到自己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重建犹太国，并把这当作改变自己苦难的唯一出路。1917年11月2日，犹太复国主义者终于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支持。当天，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发表宣言：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犹太人欣喜若狂，于是，他们不惜长途跋涉，回到巴勒斯坦。

但是，斗转星移，沧桑变化，巴勒斯坦虽然曾经是犹太人的祖国，但是，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今天的巴勒斯坦已经是面目全非。英国政府虽然把巴勒斯坦许诺给了犹太人，但巴勒斯坦并不是一块无主的土地，阿拉伯人一直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犹太人大举返乡，势必与世世代代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阿拉伯人发生利害冲突。因此，《贝尔福宣言》发表后，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人就不断发生冲突，最后发展到刀兵相见。这种局面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在巴勒斯坦这块弹丸之地建立两个国家，一个是阿拉伯国，领土占全境的41%，另一个是犹太国，领土占全境的59%。阿拉伯国家不承认这个偏袒犹太人的决议，因此，发誓不让犹太国成立。但是，1948年5月15日，以色列临时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本-古里安还是在特拉维夫现代艺术博物馆宣布成立以色列国。当天，阿拉伯国家军队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冲进巴勒斯坦，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从而开始了中东长达40年的战争进程。战争结果出乎人们意料。在面积、人口、军事上占尽优势的阿拉伯国家没有把以色列人赶下大海，反而让它存在下来了，而且面积比起联大的分治决议还扩大了许多。这个结果令许多阿拉伯人目瞪口呆。但是，以色列军事上的胜利没有转化为政治上的胜利，阿拉伯国家坚持不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以色列赢得了战争，但没有赢得和平。战争状态一直持续了下来。此后在1956年、1967年，以色列又与周边国家发生了两次战争。以色列军队越战越勇，以色列国土面积越打越大。到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以色列不仅占有了巴勒斯坦全境，而且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

但是，战争结果没有改变中东的政治格局。以色列成了中东地区军事上的超级大国，政治上却是孤家寡人。中东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尽管它明明白白地在那里存在。

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叙利亚向以色列发动了突然袭击，以色列措

手不及，损失很大。这场战争给了以色列人一个教训：虽然以色列在军事上已经很强大，但它并不是不可战胜的。以色列人必须通过另外一条途径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从此，埃及和以色列开始了和平的探索，最终有了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1979年，埃及承认了以色列，以色列让出了西奈半岛，终于在外交上打破僵局。

但是，全面的和平依然没有取得。绝大多数阿拉伯人不赞成与以色列议和，萨达特在阿拉伯世界极度孤立，最后被自己的士兵刺死，成为第一个为和平事业献身的人。此后，阿以关系时而紧张，时而缓和，但根本的症结没有消除。1987年，巴勒斯坦人在被占领土上发动了一场“民族起义”，以色列当局对起义进行了残酷镇压，但是，巴勒斯坦人没有放下自己的武器，以色列人虽然是战争的胜利者，但生命并没有保障。在这个时候，有识之士都在想，要是再出现像萨达特一样的和平英雄该有多好啊！这样可以打开阿以之间的死结，结束敌对状态，最终导致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拉宾出任以色列总理，但是，人们绝对不会把希望寄托在拉宾身上，因为拉宾有一个外号——鹰爪。

拉宾得到这个外号并不奇怪，因为他一直站在阿以斗争的最前线。1941年，年仅19岁的拉宾就参加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武装组织帕尔马契，投入到复国运动的最前线。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年仅26岁的拉宾就是“哈雷尔”旅的旅长，他率领自己的士兵冲锋陷阵，为以色列的新生立下了汗马功劳。1949年，他又调任以色列精锐“内格夫”旅任旅长，并入选国防部代表团，参加阿以停战谈判。此后，拉宾就成了以色列军界一颗耀眼的新星，先后担任了以色列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军训部长、北部军区司令、副总参谋长等职务。1964年1月，拉宾担任总参谋长。

时势造英雄，这句话一点儿没错。要是没有阿以长期冲突的背景，拉宾的崛起绝对没有如此神速。他担任总参谋长不久，机会又来了。阿以关系在松弛了一段时间后，再次紧张起来。到1967年5月，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已经像绷紧了弦，其势必发了。而这时候，拉宾已是以色列军队的统帅。

军队已经作好了战斗准备，但以色列内阁却优柔寡断，迟迟不能下最后决心。原来，以色列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中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在政治上却未能取得舆论的支持。因此，以色列政府不准备打第一枪，而把主动权留给阿拉伯人。面对这种局面，身为最高统帅的拉宾极为恼火，他不断催促总理艾希科尔，力主首先开战，先发制人。他说：“如果我们一味等待而痛失良机吃了败仗，处境和二战时就没有两样。到时候，美国人能做些什么？只好说犹太民族多灾多难，但这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最后，拉宾甚至表示，如果不开战，他宁愿辞掉总参谋长的职务。但艾希科尔还是犹豫不决。

拉宾见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他想到了全军闻名的刺头儿沙龙。第二次中东战争期间，由于沙龙犯了错误，一直赋闲在家。1964年，拉宾看中了沙龙的才华，任命沙龙为北部军区的参谋长，而此时的沙龙还在南部军区当师长。拉宾心想，艾希科尔不肯开战，沙龙这样的人会对付他的。因此，他授意沙龙向总理施加压力。沙龙照办了。他闯进了总理办公室，当办公室主任要求他放下武器时，他“啪”的一声将手枪放在桌上，怪声怪气地说：“如果你以为我需要用手枪来吓唬总理，那你就想错了。我只要嚷嚷几句，他就会拔腿而逃！”艾希科尔以一国总理之尊，当然不会因为沙龙几句狂妄的话语就拔腿而逃。但是，在听了沙龙的威胁后，他自忖没有勇气带领以色列投

入第三次中东战争，因此就主动让贤了，从而为开战扫清了道路。

1967年6月5日，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首先出动空军，对阿拉伯国家的空军基地发动突然袭击。顷刻间，阿拉伯国家苦心经营多年的空中力量化为齑粉，以色列取得了制空权，实际上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以色列取得了埃及的西奈半岛，苏伊士运河被迫关闭，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也成为以色列的安全屏障，而根据联大的分治决议分给阿拉伯国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则成为以色列的囊中之物，阿拉伯国胎死腹中，直到今天，以亚西尔·阿拉法特为首的巴勒斯坦人还在为这个阿拉伯国而苦苦抗争。以色列获得了中东第一军事大国的称号，以色列军队编织了“不可战胜”的神话，而作为这场战争的总策划、总指挥的拉宾更是成了以色列的民族英雄。

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拉宾脱下了军装。他已经官至总参谋长，在军界的前途已经到顶，因此，他的目光瞄准了政界。不久，他成为以色列驻美大使，到华盛顿为争取更多的美援游说去了。多年的军旅生涯使拉宾在人们心目中树立了一个鹰派形象。这样的人，会成为和平的先驱？真是不可思议。

但是拉宾说，世界在变，我们也在变。这句话是至理名言。拉宾虽历经战争，但他确实在变。战争教育了阿拉伯人，也教育了以色列人，教育了拉宾。虽然拉宾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战无不胜的形象，但拉宾知道，战场上没有常胜将军，在中东这块特殊的土地上尤其如此。拿以色列来说，以色列是赢得了战争，但没有取得和平。战争是暂时结束了，但这只不过是更大规模的厮杀作准备。双方都没有罢兵言和的意思。这场没有休止的战争，打到何时方是尽头？没人知道。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突然爆发，更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以色列人为这次战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场战争使大多数以色列人意识到，以色列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和平的曙光开始闪现。到萨达特执政的后期，这种曙光就更明亮了。萨达特主动向以色列伸出了和平之手，于1977年对耶路撒冷进行了一场旋风般的访问。站在欢迎萨达特的人群中，拉宾也是百感交集。他佩服萨达特的勇气，对中东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

但是，进入80年代后，巴勒斯坦的形势没有得到缓和，反而有日见恶化的趋势。利库德集团推行“大以色列”的政策，因此，阿以关系持续紧张。1987年，由于以色列政府的高压政策，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开始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民族起义。多年来郁积在难民心中的怒火喷发了，人们冲上街头，用自制的燃烧瓶对付以色列士兵的真枪实弹。巴勒斯坦青年蒙着黑纱，向以色列士兵投掷石块或土制燃烧弹。当时，拉宾正在利库德集团与工党的联合政府中充当国防部长。1988年1月19日，他终于沉不住气了。他召集以色列将领开会，研究对策。他宣布，要对被占领土上的反抗实施“铁拳政策”，要求以色列士兵向抗议的巴勒斯坦人进行“可能的打击”，这是一个公开下达的向巴勒斯坦人开枪的命令，结果，以色列士兵大开杀戒，他们向手无寸铁的难民使用了催泪弹、橡皮子弹。可不要小看了这些橡皮子弹，它们在近距离一样可以致人于死地。结果，全世界都发出了抗议声，但拉宾满不在乎。他说：“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组织正试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伸出肮脏的手按部就班地伤害我们！”结果，从1987年底到1992年中，以军共杀死了1775名巴勒斯坦人，受伤的更多。没有人认为以色列必须这么做，连一贯袒护以色列的美国人也觉得以色列干得太过分了，一直扶持以色列的美国犹太社团也主动与阿拉法特接洽，以色列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立。1991年7月，美国

总统布什亲自出面，要以色列总理沙米尔参加马德里中东和会。美国朋友出面，沙米尔感到不好拒绝，于是，他就派出了代表团，应付国际舆论的压力。由于以色列毫无诚意，和会的结果可想而知。双方马拉松式的会谈一直进行了5轮，但就是没有进展。就在这时，以色列大选开始了。这次，以拉宾为首的工党取得了胜利。

和平英雄

几年来，拉宾对中东局势和以色列安全形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觉得，现在是采取主动措施打破僵局的时候了。在1月13日的就职演说上，拉宾向他的内阁成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说：“征服与奴役另一个民族与犹太人的民主传统是相对立的。”“今后我们不要再使用和平进程这个词了，这个词我们已经用了十年，但和谈毫无进展。”他建议，今后使用更能表明以色列诚意的“实现和平”。对阿拉伯人，他也发出了呼吁。他呼吁阿拉伯领导人向埃及前总统萨达特学习，以他为榜样，大胆地迈出和解的步伐。像萨达特一样，拉宾也向他的对手发出了邀请，请他们到以色列议会来发表演说，并说愿与他们讨论实质性的问题。为了打动他们，他在讲演中引用了著名以色列诗人肖尔·切来柯夫斯基的话：“尽管目前看来还很遥远，我确信在将来国与国之间出现平静和相互祝福、和解的日子就要来了。”

拉宾知道，中东问题的关键不是那些阿拉伯人，尽管他们口口声声说与以色列誓不两立，但实际上，他们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根本的问题在于巴勒斯坦。不管将来中东的政治格局向何种方向发展，只要巴勒斯坦人觉得不满意，那么以色列就国无宁日，以色列的安全形势仍然不容乐观。因此，他又向巴勒斯坦人呼吁：“我希望看到双方停止流血、战争与死亡。”“听我的话，哪怕就这么一回。我们从目前的立场向你们提出最公平和最可行的建议——自治，一种有利的和有限的自治。”“你们不会得到所有想要的东西，可能我们也不会。不要失去这个可能去而不返的机会。”

拉宾的讲话在以色列、在中东、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个历来主战的鹰派竟然发出了如此动听的和平宣言，这不能不让人们感到意外。阿拉伯人会作出怎样的反应？仍然说“不”吗？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阿拉伯国家也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出席马德里中东和会的巴勒斯坦代表团发言人阿什拉维肯定拉宾的倡议是令人鼓舞的，埃及外交部长穆萨也赞扬他的倡议“引起了某种程度的乐观情绪”。阿拉伯舆论一致指出，现在是以色列政府改变政策、实现“以土地换和平”原则的时候了。对这一点，阿拉伯国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利库德政府一直坚持“以和平换和平”，而不愿“以土地换和平”，如果拉宾真有和平意愿，真正推动和平进程，那么，他就应该改变利库德集团的“以和平换和平”的政策。

拉宾也知道，推动和平进程要有实际行动，而放弃“以和平换和平”、实行“以土地换和平”就是他的和平诚意的体现。因此，他下令，冻结被占领土上100个定居点的建设，并派出军警阻止犹太移民的建房行动。他保证在1993年允许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选出自治机构，5年后就被占领土的最终地位进行谈判。他还表示，愿意从戈兰高地撤军。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举动。

但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敌对几十年，打破坚冰需要时日，双方建立相

互信任也需要一个过程。因此，马德里中东和会虽然进行了一轮又一轮，但是到 1992 年 11 月，中东和会还是陷于僵局，对此谈判各方都很着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面临的困难更大一点，因此，阿拉法特一直在寻找打破僵局的方法和途径。巴勒斯坦谈判代表阿什拉维和侯赛尼找到以色列海法大学教授希施菲尔德，请他协助打开僵局。而此时，以色列当局还有禁令，禁止以色列人与巴解组织直接接触。阿拉法特通过挪威外相斯托尔滕贝格传话给拉宾，要想谈判成功而又把巴解组织排斥在谈判大门之外是不可能的。拉宾也深有同感，于 1993 年 1 月撤消了这个禁令，为巴以直接接触开了绿灯。

巴以双方约定的秘密接触地点是挪威，因为挪威与双方的关系都不错，而且挪威一直在调停巴以冲突，当年的联合国特使雅林就是挪威人。再说，挪威不是世界政治关注的焦点，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巴以双方都认为，挪威奥斯陆 FAFO 研究所所长泰里·拉森是替双方牵针引线的最佳人选。拉森曾几度访问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对占领区的情况有相当了解，并对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的命运深表同情，巴勒斯坦人信任他。此外，他的夫人朱娜·朱尔是挪威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也是一位中东问题专家。她对这个地区的情况十分熟悉，对耶路撒冷也是心向往之，她的办公室就挂着两张地图，一张是挪威地图，而另一张就是巴勒斯坦全图。因此，双方同意，在挪威首都奥斯陆进行直接谈判。巴勒斯坦方面派出了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阿布·马赞，以色列则派出了副外长约西·贝林。

1993 年 1 月，巴以双方直接谈判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以南 80 公里处的保尔高德庄园进行。这个地方是拉森向他的朋友借用的，最初并未说明用途。每天，挪威人上午参加会谈，用过午餐后，挪威人就告退了，留下充足的食物、饮料给谈判代表，双方谈判经常通宵达旦。

最初的谈判是艰苦的。双方的隔阂太深，因此很难取得进展。拉森和朱尔则竭尽全力，在双方之间进行调解。好几次，谈判都接近破裂的边缘，但拉森和朱尔表现出高超的调解技巧，使双方再度回到谈判桌上。有一次，巴方代表暴跳如雷，威胁说要离开谈判桌，再也不回来了。朱尔和拉森则柔声相劝，让他去奥斯陆的海上乐园看看挪威的海上生物。神奇的自然景观使巴方代表的怒气烟消云散，他又回到了谈判桌上。谈判终于一点点地取得进展。

为了谈判成功，也为了双方的政治前途，谈判双方决定此事必须极度保密。在以色列，工党虽主张与巴勒斯坦人和解，但大部分人还心存疑虑，总怀疑这件事的可行性。利库德集团就更不必说了。和平进程天天讲，但就是没有看到一点进展。现在工党上台，再次推动和平进程，它一定会拼命反对。如果消息提前泄露出去，工党搞不好会提前下台，拉宾也会重蹈覆辙。而阿拉法特那边的疑虑就更多了。他的谈判不仅背着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甚至也背着绝大多数巴解执行委员会成员，连巴解政治部主任卡杜米也被蒙在鼓里。如果消息泄露，那么他的地位将岌岌可危。因此，双方不断更换地点，而且都用代号称呼。如拉宾成了“爷爷”，而佩雷斯则成了“爸爸”，负责谈判的副处长则成了“儿子”，这些外号连一贯精明过人的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也莫名其妙。

8 月 20 日深夜，双方谈判终于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以色列同意，给予加沙地带的 80 万巴勒斯坦人自治，至于杰里科地区，以色列方面考虑到该地没有犹太人定居点，且面积较小，人口也少，因此也予以同意。巴解方面也同意，关于被占领土的最终地位和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可以等两年再行解

决。因此，巴以双方签署了原则宣言。当天深夜，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帕克路45号外交部大楼内的小型会议室里，以巴双方谈判代表和挪威外交部官员欢聚一堂，共庆这一美好时光。高举酒杯的谈判代表，忍不住激动的泪花，用碰杯来表示自己心中的喜悦。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从互相敌对到成为和平伙伴，这是一段多么漫长的路程！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在这块土地上拼拼杀杀几十年，最后终于化干戈为玉帛，迈出这一步是多么不容易。而这一切，竟然在拉宾和阿拉法特身上得到了实现。

1993年8月29日，以色列内阁开会。拉宾环视四周，看了一眼他的伙伴佩雷斯，然后宣布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经过多轮秘密谈判，佩雷斯外长已于8月20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与巴勒斯坦方面签署了秘密协议。以色列同意巴勒斯坦人在被占领土上的加沙和杰里科地区进行有限的自治。此言一出，在座的部长个个目瞪口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总理和外长会背着他们干出这种事情。随后，佩雷斯向与会者介绍了谈判的要点。消息立即传遍了全世界。雀跃者有之，骂街者有之，但不管怎么说，大家都十分佩服拉宾的勇气，不由得想起了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当时，他的访问也是出乎众人意料之外，后来被学者称为一起外交上的突然袭击事件。今天，以色列总理拉宾也完成了类似的壮举。在巴以协议签字的仪式上，拉宾充满感情地对巴勒斯坦人讲：“巴勒斯坦人民，我们注定要在这同一个地球同一块土壤上生存。我们曾经和你们作对过，但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用嘹亮的声音告诉你们——鲜血和泪水流淌得太多了，太多了！”拉宾的话不仅感动了巴勒斯坦人，也感动了犹太人。

对巴以之间的原则协议，世界的反应远不是一致的。国际舆论大多认为，协议的签署是中东和平进程上一个关键性的突破。美国总统克林顿说，巴以协议是走向中东公正与持久和平的重要一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说协议是一座历史里程碑；埃及、约旦等中东国家也表示赞许；而叙利亚、伊朗、利比亚等中东国家则表示不满。叙利亚外长沙雷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批评该协议，说以色列统治者不想谋求中东真正的公正与全面和平。海湾国家的表现则十分谨慎。就是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中间，也出现了反对意见。利库德集团攻击拉宾出让了以色列的安全，为建立巴勒斯坦国铺平了道路。犹太定居者因为涉及切身利益，接二连三地在定居点上闹事。宗教领袖公开号召以色列士兵拒绝政府重新部署军队的命令。而一些巴勒斯坦人也对协议表示不满，有人认为阿拉法特在谈判中作出的让步太多了，如果他争取一下，首批自治的领土可能会更多一点。至于说巴解主流派的反对派，如哈马斯，则坚决反对任何临时性的安排。它认为，只要以色列不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完全撤出，中东地区就没有和平可言，因此，它反对这项协议。但是，拉宾和阿拉法特的举动还是得到了公正的世界舆论的支持。1994年，为了表彰拉宾等人为中东和平所作出的贡献，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决定授予拉宾、阿拉法特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这就是人们对拉宾和平举动的评价。

和平也需要勇气

拉宾死了，人们称赞他为和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掩卷深思，我们发现，拉宾并不是第一个为和平而献身的英雄。在他之前，有埃及总统萨达特，正是他，以非凡的勇气表示愿到耶路撒冷与以色列领导人会谈，以解

决中东问题，他获得了成功，也付出了代价。几年后，他死于自己的士兵手中。在萨达特之后，还有阿布·杰哈德，巴解武装力量副总司令。1988年4月18日，他被几个以色列杀手杀死。

从表面上看，阿布·杰哈德与拉宾之死、与中东的和平事业毫无关系。拉宾是为和平而死的，称之为和平英雄理所当然，阿布·杰哈德却是为了反抗以色列而死，这两者怎么可能相提并论呢？但是，细细追溯中东问题的来龙去脉，我们不难发现，这两件事中间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正是阿布·杰哈德的死使拉宾成了一个和平英雄，也正是他的死，使拉宾的死成为必然。

中东问题表面上是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问题，人们习惯把目光放在以色列与它的邻国埃及、叙利亚甚至约旦上面，很少有人想到，中东问题的实质是巴勒斯坦问题。1947年的联合国大会决议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两个独立的国家，其中有一个就是巴勒斯坦，也就是所谓的阿拉伯国。但直到今天，我们只看到了活跃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的以色列人，看到以色列的国旗在高高飘扬，就是看不到巴勒斯坦的影子。实际上，巴勒斯坦人才是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第一次中东战争，使巴勒斯坦人立国的希望化为泡影，而第二次、第三次中东战争又使巴勒斯坦人失去了全部家园，巴勒斯坦人全体成为无家可归、寄人篱下的难民。这种例子是罕见的。翻开世界历史史册，也只有犹太人的遭遇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但犹太人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终于取得了自己的安身之地，可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在哪里？因此，巴勒斯坦人只得自己拿起武器，企图用武装把占领自己国土的外来者赶走。因此，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就上演了一幕幕悲剧。巴勒斯坦人一次又一次地向以色列发动进攻，制造了一次又一次流血事件，被以色列人包括拉宾称为“恐怖分子”，遭到血腥镇压。但是，是谁把他们变成恐怖分子的？他们难道不愿意放弃那种自杀性的行动，安居乐业吗？还不是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眼中，巴勒斯坦人只有服从以色列的统治，听任犹太人的盘剥，才有生路，否则就是死路一条。由于以色列政府将巴勒斯坦人的生命视为草芥，以色列国内的极端分子当然也不把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放在心上，因此，他们也时不时地向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大开杀戒。

1988年5月20日清晨，一名以色列男子身穿黑色上衣，怀揣一支以色列制造的M-16自动步枪，悄悄来到特拉维夫以南8公里的小镇里雄莱锡安镇，潜入一处灌木丛中。如果你看到他这副模样，准以为他是狩猎的。

不错，他确实是狩猎的，不过，他的猎物不是一般的动物，而是有血有肉有思想的巴勒斯坦人。

6时许，天已放亮，灌木丛已经无法掩盖他满身的杀气，于是，他走出灌木丛，朝热闹的街口走去，那里坐着20余名巴勒斯坦人，他们正等着去打工。随后，又一辆满载工人的汽车开来了。那个以色列人命令停车。司机以为他是一名军人，以色列虽然是一个法治国家，但军人对于这些没有国家保护的巴勒斯坦人还是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遵命停车，车上的巴勒斯坦人纷纷下车，与原先坐在那里的同胞坐在一起。他命令他们掏出身份证来。没有违拗，一个个顺从地掏出了身份证。他又问：“知道我为什么截停你们吗？”答案当然是“不知道”。“很好，那就让你们弄个明白吧！”他的眼中突然冒出野兽般的凶光。他端起自动步枪就向这些手无寸铁的工人狂扫。结果，8名巴勒斯坦人当场死亡，劫后余生者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胞受难

而无能为力。凶手作案后又截住一辆汽车，打死了开车的阿拉伯人，然后扬长而去。以色列人的暴行传出后，当即在全国、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激怒的巴勒斯坦人涌上街头，抗议以色列人的暴行，但又招来军警的镇压。冲突中至少有 10 名巴勒斯坦人死于非命，数千人受伤。它成为 1987 年被占领土起义以来最严重的流血事件。

事情闹大了。警方收审了这个名叫阿米·朴帕的凶手。他才 21 岁，曾在以色列军队中服役 18 个月，因违反军纪被判入狱 4 个月，后被军方认定不宜继续在军中服役而提前退伍。在审判过程中，他对自己的暴行面无愧色。追究其原因，他一会儿说是因为最近与女友感情破裂感到十分痛苦，需要发泄一下；一会儿又说自己 8 年前曾遭到一个阿拉伯人的性虐待，因此他想报复。真真假假，连法官也无法分辨。法官对以色列军方电台说：“我不知道他所说的是否是事实。”

对这一起暴行，以色列政府是什么态度呢？当局一方面谴责这是一起恐怖主义暴行，另一方面却说，这次暴力事件是一次神经错乱的举动。阿米·朴帕有精神病，其行为无法控制，因此算不得什么，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考虑到当时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起义，考虑到拉宾先生对以色列军方下达的开枪政策，我们不难发现，这起暴力事件实际上与以色列政府的巴勒斯坦政策是分不开的。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的领导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利库德集团一贯制造仇视阿拉伯人的气氛，长期纵容以色列士兵袭击和屠杀阿拉伯人，因此，这不是一起孤立的暴力事件，也不是一个精神错乱者所为。它的真正制造者是以色列政府。审判阿米·朴帕的法官克莱恩也说：“问题在于，如果纯粹是因个人理由，那么他为何只袭击阿拉伯人而不去袭击犹太人？”约旦首相巴德兰道出了事实真相。他对约旦国家电视台讲：“以色列政府是恐怖的当权者。”

巴德兰一语中的。回顾以色列政府的所作所为，人们不难发现，以色列政府在过去确实制造过不少恐怖主义事件。在中东的政治对抗中，以色列当局奉行的是“以血还血”政策，历届以色列政府对所谓阿拉伯人的恐怖行为都是毫不留情的。当年，阿拉伯人的恐怖主义组织“黑九月”制造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事件”，屠杀了几名以色列运动员，为此，以色列政府派出了精干的情报人员，最终将凶犯一个个击毙。而对阿拉伯人在被占领土上的反抗，以色列政府也统而概之地称之为“恐怖主义”行动，以掩盖自己的铁拳政策。它忽视了巴勒斯坦问题的真正实质是：犹太人在恢复自己的民族权利的同时，取消了另外一个民族的生存权。如巴勒斯坦人，他们是巴勒斯坦地区的原始居民，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几千年，直到以色列建立，他们的命运才发生了改变。他们难道不该拿起武器，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吗？实际上，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开始，部分犹太人就存在着一种矫在过正的行为。以色列开国总理本-古里安在宣布以色列成立时故意不宣布它的疆界在哪里，他说：“我们不宣布我们的疆界在哪里。因为我们不知道它到底在哪里。”事实上，联合国分治决议是为以色列划分了边界的，本-古里安之言只不过表明他不愿意遵从联合国划定的巴勒斯坦地图，而想凭武力随心所欲地改变巴勒斯坦的地图。因此，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就通过法令，强行兼并戈兰高地、约旦河西岸等地，把耶路撒冷作为自己的首都。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竭尽欺压之能事，根本没把它当作一个民族看待，更忘记了今天的巴勒斯坦人实际上就是过去犹太人的缩影。对巴勒斯坦人的反抗，他们还发明了一个

名词——“恐怖主义”，对这种行为进行痛击。

1994年2月25日发生的希伯伦惨案是另一个典型例子，有意思的是，根据以色列政府也就是拉宾先生的说法，造成这桩惨案的凶手巴鲁赫·戈尔茨坦也是一名神经错乱者。

2月25日凌晨，戈尔茨坦身着旧军服、手持步枪混入希伯伦的易卜拉欣清真寺。当时正值伊斯兰律法的斋月，清真寺里有大批的穆斯林正在礼拜真主，对戈尔茨坦的闯入谁也没有留心。谁都没想到，戈尔茨坦手持步枪，对准虔诚的穆斯林扣动了扳机。措手不及的穆斯林还没有清醒过来，就夺路而逃，岂料连出口也被封住了。封住出口的正是以色列士兵，因此，戈尔茨坦得以对准这些手无寸铁的穆斯林继续射击，结果当场造成66人死亡，而受伤者竟达400余人。事后检查，死亡的66人中，只有3人不是穆斯林，可见这次巴勒斯坦人又成为犹太人发泄仇恨的对象。

事件发生后，巴勒斯坦人被激怒了。他们走上街头，为受难者举行隆重的葬礼，并且在被占领土上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总罢工。阿拉伯国家对此反应强烈，纷纷发表声明，谴责这一暴行，并认为以色列政府应对此负完全责任，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等发表声明，暂时退出正在华盛顿举行的中东和会。连以色列总统魏茨曼也说，希伯伦惨案是“我们犹太复国主义历史上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可是以拉宾为首的以色列政府是怎样解释这一惨案的呢？拉宾说，戈尔茨坦是一名精神病患者，而且在事发后也已经自杀身亡，因此，在他看来，这件事纯属戈尔茨坦个人的恐怖主义行为，与以色列政府无关。而公正的舆论则认为，对于这件事，以色列政府脱不了干系。一名以色列警官作证，他曾接到命令，如果发生犹太移民向穆斯林开枪或以色列士兵开枪的事情，以色列警察不可开枪阻止。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戈尔茨坦行凶是有预谋的。而目击者证实，当时在场的不止戈尔茨坦一个人，他还有几个帮手，他们堵在大门口，不让穆斯林从清真寺中逃出，另外还有一个一直在帮助戈尔茨坦往枪里压子弹。把这件事说成是孤立的恐怖主义行为很明显缺乏说服力。希伯伦惨案甚至震惊了善良的犹太人。惨案发生后的民意调查表明，66%的人主张政府采取行动，宣布一些极端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为非法，25%的人认为，应该解除他们的武装。结果，拉宾政府也被迫采取一些措施，取缔了几个非法组织，并收缴了他们的枪支。应该说，拉宾的举动适应了时代的潮流，但得罪了以色列国内的极端分子，使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建立“大以色列”的美梦破灭。他们认为，过去的战神拉宾已经背叛了犹太人的事业，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最大障碍。因此，他们诅咒拉宾，并喊出了“打倒拉宾”的口号。反对派为拉宾举行了模拟葬礼，棺木上印着“拉宾：锡安主义的谋杀犯”，而利库德集团的领袖内塔尼亚胡则昂首阔步，走过了拉宾的“棺木”。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已经不满足于除掉争取和平的巴勒斯坦人，连拉宾也不放过了。凶手阿米尔事后说：“这是最神圣的领土。2000年前，以色列人大多住在这里。拉宾政府的骨头很软，他们愿意放弃所有的东西来换取和平。”他说，他是按上帝的旨意行事的，根据犹太教经典，他可以杀死任何放弃土地的人。因此，对于他自己的行为，他毫不后悔，十分满意。

读者一定还记得，在拉宾遇刺前，拉宾的警卫曾要求拉宾穿上防弹背心，并尽快离开广场，但拉宾拒绝了。当记者问拉宾的夫人是否担心有人会向拉宾行刺，她认为他是发疯了。以色列不是非洲，暴力与以色列无缘。以色列

是一个法治国家，容不得歹徒乱来。实际上，当他们在讲这些话时，都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以色列虽然是一个法治国家，但它的法律是犹太人的法律，而不是巴勒斯坦人的法律，对巴勒斯坦人，他们从来没有讲过法律，对他们，以色列政府历来是用刺刀和子弹发言。而且，以色列也不单纯是恐怖行为的受害者，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是恐怖行动的制造者。在从事恐怖活动方面，犹太人绝不比巴勒斯坦人逊色。甚至可以说，以色列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恐怖主义组织。此外，恐怖活动在以色列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建国之前，以色列就有三个准军事组织，它们是哈加纳、伊尔贡和施特恩邦。这些组织最初就是靠杀人放火、在巴勒斯坦制造恐怖气氛起家的。它们是地地道道的恐怖组织。他们的口号是“花一个美元，杀掉一个阿拉伯人”。杀死一个阿拉伯人在以色列是完全合法的。曾任以色列总理的贝京当时就是伊尔贡的首脑。建国后，以色列更是强化了这种恐怖机制。哈加纳等三个准军事组织被改组成以色列国防军，此外，以色列还建立了秘密情报机构摩萨德。摩萨德既从事反恐的活动，也执行政府的旨意，针对阿拉伯人进行恐怖活动。因此，以色列既有单独的个人恐怖主义行为，也有由国家组织的集

体恐怖主义行为，这是以色列的恐怖主义不同于当今世界上其他恐怖主义的地方。当然，以色列政府的恐怖主义行为针对性是极强的，即完全针对那些威胁到它的国家安全利益的人或组织。

在以色列政府眼中，这种人或组织主要是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首的巴勒斯坦人。像拉宾自己，他就曾说阿拉法特是恐怖主义的总后台，并说他是和平进程的障碍。对此，阿拉法特曾不客气地回敬说：“我没有在被占领土上搞恐怖主义，我们将继续开展占领点的斗争。这是一个合法的方式。对于遭到侵略和占领的人民来说，他们根据联合国宪章有权这样做。”阿拉法特认为，如果他是一个和平障碍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身为以色列总理的拉宾也是一个和平障碍。阿拉法特还说，拉宾是个聪明人，但他通常都是用体力而不是用脑子来考虑问题。

1988年的阿布·杰哈德事件毫无疑问是以色列政府进行恐怖主义的一个主要证明，而这件事，拉宾先生当年也是积极参与的。

阿布·杰哈德，原名哈利勒·瓦齐尔，1935年10月10日生于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拉姆勒。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约旦河西岸被以色列占领，瓦齐尔一家成为难民，流浪到加沙地带。20岁时，瓦齐尔到开罗一个军事基地学习，为光复国土、反对以色列的统治作准备。1960年，他结识了阿拉法特，从此两人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一起成立了巴勒斯坦的游击队组织“法塔赫”，任阿尔及利亚分部的负责人。“法塔赫”成立后，积极从事反以斗争。瓦齐尔也在战斗中成长，立下了赫赫战功，并表现出高超的军事技能和组织才能，被人称为“杰哈德”，意为“圣战之鹰”。他是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巴解武装力量副总司令、“法塔赫”风暴突击队负责人，在人们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对他，以色列政府是恨之入骨。1972年，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黑九月”制造了慕尼黑事件，以色列当局认为，杰哈德是幕后指挥者，因此将他列入暗杀名单。此后，以色列秘密情报机构摩萨德多次对杰哈德进行追杀，但杰哈德每次都幸免于难。1987年，由于以色列政府的高压政策，被占领土上爆发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起义，以色列当局又认为，是杰哈德在幕后策划，准备将他除掉，但慑于杰哈德的崇高威望和国际影响，以色列政府不敢立即下手。1988年3月，3名巴勒斯坦人在以

色列制造了一起绑架事件，在随后发生的冲突中，有6名人员死亡，包括那3名绑架分子。以色列当局认为，这次事件的主使是杰哈德，因此，它再也忍不住了，决心下手除掉杰哈德。4月13日，以色列内阁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从肉体上“消灭”巴解领导人一事，杰哈德首当其冲。表决结果：4票赞成，2票反对。这4票赞成票中，就有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宾和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总理沙米尔投赞成票自不待言。结果，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紧急出动，执行内阁决议。对这种任务，摩萨德当然是驾轻就熟，因为它早就在搜集杰哈德等人的情报，杰哈德的一举一动都没有瞒过它的眼睛。接到任务后，摩萨德马上就了解到杰哈德在突尼斯住宅的所在地，并将周围的情况模得一清二楚。随后，内线发来密报，4月16日晨，杰哈德将从突尼斯飞往某地，3时离开别墅。据说杰哈德此行是与一位外国首脑会面，讨论尽快恢复巴解组织的战斗力，开展对以武装斗争。自1982年以色列进攻黎巴嫩后，巴解武装力量大为受损，在以军的包围下，巴解战士不得不放下武器，撤往突尼斯。摩萨德总部认为，这是刺杀杰哈德的绝好机会，因为飞机在凌晨起飞，杰哈德这段时间不可能外出，一定会呆在寓所内，因此成功的可能性极大。这样，总部就下定了最后决心。报告再次送到内阁讨论。最后，沙米尔和拉宾等人认为，此次行动关系重大。杰哈德此行如果成功，对以色列的安全将是一个严重威胁。除掉杰哈德，对巴解武装力量又是一次重大打击，搞得好，巴解将无法恢复元气。因此，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但是，由于杰哈德在突尼斯，这是一个主权国家，以色列在别国主权范围内杀人，搞不好是一件丑闻，因此，此事必须做得十分机密，不能留下任何痕迹，不能让人抓住把柄。这就需要高超的技巧和组织才能。内阁决定，此次行动由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沙姆龙将军亲自挂帅，副总参谋长巴拉克亲自指挥，军事情报部部长沙哈克、沙米尔的特别行动顾问普雷斯勒从旁协助，由摩萨德和陆海军的特别行动部队具体执行。上述部门接到行动命令后，立即挑选精兵强将，组成了一支30人的突击队，分工负责，进行模拟演练。

4月14日，一部分突击队员化装成黎巴嫩人，分批进入突尼斯。第二天上午，三名阿拉伯男女手持黎巴嫩护照，到突尼斯三家旅游公司租车，其中有两辆是大众牌小型面包车，还有一辆是法国标致小轿车。一名妇女曾到杰哈德寓所附近拍摄了大量照片。

16日凌晨1点多，一架看不清国籍的波音飞机在距突尼斯55公里处的国际走廊上空施放电子干扰，该地的通讯设施全部失灵。几乎与此同时，杰哈德寓所附近的电话线也被切断。

1点半，3辆汽车停留在杰哈德寓所周围，车上跳下了几十个蒙面人。他们有序地分成三组，一组切断路口交通，一组包围寓所，另外一组则闯进了杰哈德的寓所。杰哈德的两名警卫觉得情况有异，但没等他们作出反应，以色列突击队员的无声冲锋枪就让他们失去了抵抗，正在楼上的杰哈德听到楼下有变，立即作出反应，他掏出手枪，来到门边，正好碰上了迎面而来的蒙面人。他当即就是一枪，但杀手的反应也不慢，几乎就在同时，4支冲锋枪一起吐出烈焰，杰哈德当即倒地。刺客们还不满足，他们继续对准倒在地上的杰哈德射击，直到打光了冲锋枪里的子弹。

也就在这个时候，杰哈德的妻子、有“奋斗之母”之称的乌姆·杰哈德也听到了声音，当即和女儿赶下楼来，问：“发生了什么事？”杰哈德已经不能回答她的问题了。4个杀手用枪把她逼到墙角，把屋里的文件洗劫一空；

然后，闯进杰哈德两岁儿子的卧室，用冲锋枪对准天花板又是一阵狂扫，最后与楼下的接应者会合，扬长而去。杰哈德倒在血泊之中，他至少身中 75 弹，右手臂被打断，连手枪也被打毁了，全身被打得像蜂窝一样，惨不忍睹。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竟有一名女杀手还手提摄像机进行摄像。凌晨 4 点，所有杀手都回到地中海的船上，没有一个人落网。以色列再次创造了集体恐怖主义的“奇迹”，杀手们还在途中，沙米尔就急不可耐地发来了祝捷电报，并对沙姆龙说：“这表明以色列的打击还能走得更远。”但是，以色列想掩盖自己恐怖主义罪行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事发后，人们很快就想到，这肯定是以色列所为。随后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猜测。突尼斯警方在海滩上找到了以色列突击队员遗弃的三辆汽车。事后人们想起，这三辆车是手持黎巴嫩护照的人租的。因此，突尼斯警方下令通缉这三个人，但是，谁能拿以色列有什么办法？巴勒斯坦人只有以更猛烈的行动来回敬以色列占领军。4 月 16 日成为被占领土上最暴乱的一天，抗议者与以色列警方发生冲突，有 15 人被打死，数百人受伤。

1995 年 11 月 4 日，伊扎克·拉宾遭到了同样的厄运，中东的和平进程遭到重大挫折。拉宾在世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成为了和平伙伴，双方在很多问题上都取得了共识，尽管双方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但是，只要双方都有诚意，中东的真正和平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是，现在拉宾已经倒在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枪口之下，以内塔尼亚胡为首的利库德集团取代工党上台执政。内塔尼亚胡推翻了巴以双方本已达成的原则，又一次声称要以“和平换和平”，并在定居点问题上挑起事端，中东和平进程出现逆转。这下子，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图谋是实现了，但是，巴勒斯坦人会答应吗？拉宾的血没有唤醒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良知，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也许又要上演悲剧了。

和平也需要勇气（二） ——阿以冲突中巴勒斯坦的恐怖活动 “恐怖公司”

风平浪静的爱琴海上，载重 688 吨的希腊游船“波罗斯城”号正在破浪前进。来自美国、英国、瑞典、法国等国家的 471 名游客，在饱览了爱琴海各岛的旖旎风光后，正在返回雅典的途中。此时已是夕阳西沉、彩霞满天了。再过几个小时，游船就会到达特罗卡德罗港，那是他们此行的终点站，在那里他们还要游览雅典古城，一睹古希腊文明的风采。因此，大家的兴致都很高，没有人意识到，危险正在悄悄临近。

船行 40 分钟，甲板上一个 20 多岁、肤色黝黑的年轻人突然从背包里抽出冲锋枪，对着甲板上的游人就是一阵狂扫，跳跃着的子弹像飞蝗一样扑向没有任何准备的游人。或许是由于晚霞迎面照在他的脸上，或许是因为嗜血的野性得到了营养，凶手的脸上一阵泛红，露出狰狞的形象。几乎在他动手的同一时刻，船舱里突然窜出两个蒙面人，他们一手端着枪，一手举起手榴弹，对着游人狂扫滥炸。顷刻间，游轮变成了屠场。毫无准备的游人四散逃去，有的躲进船舱，有的干脆跳进了大海，船上一片混乱，三个凶犯打完了枪膛中的子弹，扔完了背兜里的手榴弹，乘着混乱，跳上一旁接应的快艇，扬长而去，只留下尸横遍地的游艇和痛苦呻吟着的游人。事后检查，这一场血腥的屠杀，造成 9 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这是 1988 年 7 月 11 日。

事发突然，471 名游客，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他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直到子弹飞上来与他们“亲吻”，他们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一位双脚中弹的法国人事后心有余悸地说：“我当时正在甲板上，突然听见自动武器的声音。我刚转过身，就中弹摔在甲板上。我看到了正在射击的人。我简直无法相信这是真的。我以为这大概是在开玩笑。但当我看到其他人也摔倒在甲板上，我才相信这是真的。我还看见一个人在换弹夹，然后他又把一颗手榴弹扔向烟囱，引起了大火。”

这当然不是什么开玩笑，游客自己已经有切身体验，而犯下这一恐怖罪行的人，马上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他们不是在开玩笑。两天后，黎巴嫩一个团体给西贝鲁特一家国际新闻机构送去两页纸的声明。声明是用阿拉伯文写的：“巴勒斯坦人民革命烈士组织——阿布·杰哈德部队——对‘波罗斯城’号游轮上的几十名犹太复国主义者、美国和英国士兵发动了突然攻击。这次攻击是为了对犹太人——美国人在巴勒斯坦、黎巴嫩和海湾地区屠杀和歼灭阿拉伯人及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愚蠢地对犹太人罪行表示支持的报复。对游轮的袭击不是针对希腊人民的，他们正在对其政府施加各种压力，要求政府限制以色列人的活动，限制美国人及其西方盟国在希腊的活动。”

阿布·杰哈德部队？巴勒斯坦倒是有这么一支部队，它的领导人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武装力量副总司令阿布·杰哈德，但是，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解主流派并不从事恐怖活动，他们从事的是正大光明的武装斗争，与恐怖活动完全挂不上钩。1969 年阿拉法特刚刚从事反对以色列的武装斗争时，就明确反对恐怖活动，认为它给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带来了严重的政治损失。1970 年 8 月，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通过决议，禁止劫持民用飞机，1974 年底，阿拉法特更是宣布，巴解将清除那些犯有恐怖罪行的人。倒是有一帮人，包括以色列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舆论，他们敌视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把巴勒

斯坦人民的武装斗争说成是恐怖活动，大肆打击。因此，恐怖分子声称他们是阿布·杰哈德部队，那肯定是栽赃，不可能是真的。

但是，恐怖分子分明是阿拉伯人，他们的肤色证明了这一点，阿拉伯文声明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他们为什么要栽赃于阿布·杰哈德呢？要知道，巴解组织才是巴勒斯坦人的真正代表，他们这样做，对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有害无益。而且，他们声称他们的目标是美国人、犹太人和英国人，但事实上，游轮上的美国人总共不到 10 人，罹难的大多是法国人，有 34 个法国人受了伤，而法国政府是西方世界里最早公开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戴高乐总统甚至中止了与以色列的军火合同，已经准备交货的四艘快艇被法国政府扣在港口。后来，以色列特工部队以海盗手法，开走了这些快艇。法国和以色列的关系降到冰点。

没有明确的目的，没有明确的对象。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恐怖行为，绝不可能是巴解组织所为。希腊政府立即组织力量破案。帕潘德里欧总理中止休假，部署破案事宜。希腊警方悉数出动，缉拿恐怖分子。到 7 月 20 日，案子终于有了眉目。希腊公共秩序部长塞希奥蒂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初步确定四名恐怖分子参与了这次游轮袭击事件，其中三人持黎巴嫩护照，于 5 月初从贝鲁特经贝尔格莱德来到希腊。袭击小组的头目是阿布·尼达尔集团的赫加比·贾比拉，又名卡达·萨米尔·穆罕默德，他持有利比亚护照，6 月 1 日从哥本哈根乘飞机来希腊。

阿布·尼达尔！原来是他干的。怪不得恐怖分子要说他们是阿布·杰哈德部队的，原来纯粹出于栽赃目的。是的，只有“恐怖公司”才会有如此灭绝人性的行径，也只有它，所干的恐怖行径能如此干净利落。毕竟是世界头号恐怖组织，“恐怖公司”出手，不用说只杀死九个人，就是“波罗斯城”号的游人全部被杀死，人们也不用过分奇怪。因为它既然被称为“恐怖公司”，干起这类恐怖行径恐怕是不会眨一下眼睛的。

阿布·尼达尔，这位有“沙漠飞狐”、“神秘的谋杀大师”之称的人，是当今世界上最危险的恐怖分子。他领导的组织，在西方新闻界有“恐怖公司”之称。在中东乃至整个世界，阿布·尼达尔和他的组织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自 1986 年起，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发出国际通缉令，捉拿这个超级恐怖分子。但是，两年过去了，阿布·尼达尔不仅毫发无损，反而接连制造了几起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

1986 年 9 月 6 日，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一所犹太人教堂里，一群犹太人正在祈祷。正当他们跪在上帝面前祈求上帝给他们赐福的时候，两个年轻人悄悄地走进教堂，锁上大门，然后，从背包里抽出机枪，对着人群就是一阵猛扫。两名凶手一口气射出了 100 多发子弹，结果，29 名犹太人，只有 7 人死里逃生，其余全部遇难。而凶手在发泄完仇恨之后，又引爆了手榴弹。土耳其警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只是一个偶然的时机，有人认出了凶手脸上的伤疤，并肯定地说：“他在阿布·尼达尔的营地受过训练，他是‘恐怖公司’的人。”人们这才知道，狡猾的“沙漠飞狐”此次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欠下了 22 条人命。飘忽无定、精心策划、手段狠毒，符合“恐怖公司”的特点。阿布·尼达尔自己就说过：“我这个只在夜间行动的幽灵，使得敌人胆战心惊，夜不能寐。”确实，阿布·尼达尔的所作所为令人切齿痛恨。他干过迄今为止伤亡最重的劫机事件，暗杀过 100 余名外交官，死在他手下的人已经是成千上万。他所制造的恐怖行动，曾经是第五次

中东战争（黎巴嫩战争）的导火线，使中东和平进程数次中断。因此，只要阿布·尼达尔存在一天，人们就一天不得安宁。

阿布·尼达尔怎么会变成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恐怖公司”的老板的？他是不是生来就嗜血成性，以致不杀人就无法生存？确实有很多人这么认为，以美国、以色列为首的西方舆论就这么看待阿布·尼达尔。在他们看来，阿布·尼达尔青面獠牙，生来就是一个恐怖分子。但实际上，他们谁也没有想到，正是中东特殊的政治格局造就了阿布·尼达尔一帮恐怖分子。没有巴勒斯坦问题，也就没有阿布·尼达尔和他的“恐怖公司”。

阿以矛盾的产物

尼达尔生在一个富裕的阿拉伯家庭，如果不是环境发生变化，他本来可以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学富五车的学者、在巴勒斯坦呼风唤雨的政治家、一个合格的丈夫、一个慈祥的父亲……可如今，除了是一个为害人类的恐怖分子以外，他什么都不是。

1937年，巴勒斯坦的本纳家族添了一个小少爷，雅法的巨富哈里纳·本纳老爷的第八房太太生了一个儿子。哈里纳给他起名萨布里·哈里纳·本纳。对这个生下来眉清目秀的儿子，哈里纳好生喜欢，虽然在他之前，哈里纳已经有了若干个儿子。根据伊斯兰教圣训，每一个穆斯林至少可以娶四个妻子。他娶了13个妻子，生下了16个儿子和8个女儿。人多力量大，本纳家族本来就是一个名门望族，今天的埃及、科威特和伊拉克都有本纳家族的人。如今，又添了一个男丁，本纳家族更兴旺了。

萨布里出身于这样一个锦衣玉食的家庭，生活之好可想而知。在巴勒斯坦，他读的是耶路撒冷最有名的私立学校，每个星期回家两次，每次都是家里派汽车接送。如果不是后来环境变故，萨布里的生活节奏还会这样持续下去。

但是，富裕的生活对于萨布里来说竟如过眼烟云。转眼之间，来到巴勒斯坦定居的犹太人越来越多，他们聚居在一起，很快形成了一股势力。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为了水源、土地和不多的就业机会而不断发生冲突，最后竟然发展到刀兵相见。1948年11月29日通过的联合国分治决议，站在犹太人一边，把巴勒斯坦的一大半，分给了以色列。阿拉伯人当然不会接受这个不公平的决议，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了。战火打乱了萨布里的宁静生活，战争中本纳家族的财产被犹太恐怖分子付之一炬，萨布里被迫随家南迁，一直逃到加沙的难民营。一个富裕之家，转眼间一贫如洗。而此时的萨布里刚刚10岁，可他小小的心灵中，已经埋下好仇恨的种子。他不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只知道是犹太人焚毁了他的家产，破坏了他的生活，一切都是因为犹太人。

财产没有了，萨布里全家都变成了难民，再让萨布里上昂贵的私立学校很明显不可能了，于是，萨布里进入了廉价的公立学校。在学校里，萨布里的成绩说不上超群，但其学习之刻苦却在老师和同学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萨布里还有一副侠义心肠，因此，在同学中颇有些威信。

1956年，萨布里高中毕业，进入一所美国人开办的大学学习，他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工程师。大学毕业后，萨布里来到沙特阿拉伯，在吉达港找到了一份工作。当时，他对巴勒斯坦问题还是不感兴趣，当一些年轻的巴勒斯坦

人开始谈论政治的时候，萨布里则一个人沉默在那里，想着自己的心事。1962年，他与一位巴勒斯坦姑娘结婚，那位姑娘与他一样，也是一位背井离乡的难民。两人同病相怜，夫妻生活十分恩爱。很快，两人生下两女一子，女儿的名字叫碧珊和纳易法，儿子名叫尼达尔。据说，阿布·尼达尔这个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它在阿拉伯文中是“尼达尔的父亲”之意。

中东的局势像三伏天的脸，说变就变。苏伊士运河战争结束没几年，到1967年，中东的局势又变得十分紧张了。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十分愤怒，强烈要求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埃及的纳赛尔向以色列开战，以收复失地。而以色列因为国内矛盾突出，也希望通过战争转移人民的视线，这样，第三次中东战争又爆发了。以色列军队通过突然袭击，摧毁了阿拉伯国家的空军，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阿拉伯国家军队重演前两次战争中屈辱的一幕。萨布里再次看到，以色列的坦克又开进了他的新家纳布卢斯，而他的故乡雅法早就变了模样。本纳家族拥有的4.5万亩土地，已经为以色列政府没收，犹太人在上面建立了住宅，昔日的庄园已经成了雅法市的军事法院。此情此景，令萨布里怒火中烧，复仇的思想在他的心上扎下了根。

萨布里参加了阿拉法特的风暴突击队，由于作战勇敢，萨布里赢得了战友们的拥护，很快，他就进入了法塔赫的中央委员会。1970年，萨布里又独当一面，被派往苏丹，开设巴解组织驻喀土穆办事处。在那里，他在巴勒斯坦学生中进行宣传，想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游击战争，结果被苏丹驱逐出境。随后，他又被任命为巴解组织驻伊拉克的首席代表。这个时候的萨布里思想上已经产生变异。他认为，正规的战争手段不可能赶走以色列人，历次战争的失利就说明了这一点，只有采用非常规的手段，才可能对以色列产生震撼力。而他看中的非常规手段，实质上就是恐怖主义行为。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巴勒斯坦人心中很有市场。以色列的扩张政策是巴勒斯坦问题的真正根源，巴勒斯坦人在这块土地上已经平安地生活了两千年，而自从来了犹太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就完全变了样，上百万的巴勒斯坦人被迫背井离乡，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大量的平民遭到屠杀，这笔帐，不记在犹太人头上，又应该记在何人帐上？难道巴勒斯坦人不能找犹太人算帐？因此，很多人认为，由于犹太人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滔天罪行，以色列的一切东西，从军人到平民百姓，从男人到妇女小孩，都是巴勒斯坦人有权袭击的目标，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更是完全合法的军事目标。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的领导人哈巴什曾说：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属于敌人，它们把以色列这一孤岛与其他海岸相连接，它们运输部队和弹药，它们由以色列空军的预备役军官驾驶。在战争中，打击任何地方的敌人都是正当的，这一规则把我们引向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升降的欧洲机场”。萨布里的一个下属就说：“在任何有以色列人的地方进行战斗，这是我们的权利，不管他是在酒店还是机场，因为以色列人袭击巴勒斯坦人时，他们并不区分成人与儿童、军人与平民，因此，我们也不打算这么做。”“被剥夺了权利的人的愤怒和损失，使他们有权摧毁所有的道德界限。”巴勒斯坦人长期受到压抑的怨气一下子发作出来，其结果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不管对方是什么人，只要心中有气，就可以发作出来。至于说会造成什么后果，达到什么目的，那一概不管。而这一点，以阿拉法特为首的法塔赫主流派是坚决反对的，萨布里等人就把阿拉法特看作是温和派或者是妥协派，温和派与犹太人一样可恶，也必须除掉。两人的分歧越来越大，最后不得不刀兵相见。1974年10月，萨

布里与阿拉法特公开决裂，把与他志趣相投的一班人从法塔赫里拉了出来，另立山头，成立法塔赫革命委员会，自称“阿布·尼达尔”。“恐怖公司”开张后的第一个目标不是以色列人，而是巴勒斯坦人的真正代表阿拉法特及其领导的法塔赫主流派。阿布·尼达尔派出一个小组到大马士革暗杀阿拉法特。要想随心所欲地开展恐怖活动，夺取巴勒斯坦人民解放事业的领导权，阿拉法特无疑是一大障碍。因此，尼达尔想拿阿拉法特开刀，并借机树立起自己的权威。这恐怕是阿拉法特无数次被暗杀遭遇中的第一次，令他痛心的是，最早向他下手的并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他的阿拉伯同胞。可是，阿拉法特大难不死，枪战中，巴解组织的财政总管却不幸身亡。法塔赫革命法庭缺席判决尼达尔死刑，实际上也是用实际行动向世人宣告：巴解组织不是恐怖组织，它不会与恐怖分子同流合污。可惜，当时的国际舆论，尤其是美国、以色列等国，都没有从中看出这一行动的含义，而将阿拉法特当作头号恐怖分子看待。

阿布·尼达尔自诩为真正的革命者，是法塔赫和巴勒斯坦解放事业正确路线的代表，实际上，阿布·尼达尔的思想深受当时流行的左派思想的影响，这从他的纲领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阿布·尼达尔及其“恐怖公司”实质上是当年极端的左派政治的产物，这一点也就注定了阿布·尼达尔不可能是巴勒斯坦解放事业正确路线的“唯一代表”，而只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恐怖组织的老板，它与其他恐怖组织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打着为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的旗号。

阿布·尼达尔的“恐怖公司”的头号敌人是以色列和美国等西方国家，这一点他曾公开宣布过。他说：“对美国人，只要我们有办法，就绝不会心慈手软，因为这是我们与美国人之间进行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确实，没有一个世界大国像美国那样，深深地介入中东政治。可以这么说，没有美国，就没有以色列。如果不是美国在联合国运筹帷幄，犹太人虽然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但也至多是同情而已，以色列说不定会胎死腹中。如果不是美国在关键时刻提供援助，以色列也已几度亡国，犹太人又得四处飘零。如果不是美国公然站在以色列一边，以色列在这个国际大家族里只怕要孤独死了。因此，阿布·尼达尔公然与美国人作对，以美国为打击对象。为防引火烧身，美国驻欧洲各国的机构甚至把门前的美国招牌取下来，美国侨民也不得不隐瞒自己的国籍，这是心高气傲的美国人最难忍受的。

犹太人和美国人不会将自己的国籍写在脸上，阿布·尼达尔也没有工夫一个一个去核实，因此，一旦他狂性大发，那就会制造不少“冤假错案”，滥杀无辜。像前述希腊游艇事件就是一个典型。阿布·尼达尔虽然知道这艘游艇上的游客大多来自西方国家，但到底哪些人来自美国、英国这些要打击的国家，他却没有搞清楚，也不可能去搞清楚。如果每件事都核实得清清楚楚，那他的“恐怖公司”一年能作几桩案子？那样的话，打击力度太弱了。尼达尔是不会干这种事的。因此，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同当年中国的蒋介石清共时的作法差不多，那就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走一个。”这样，打击面就太宽了，尼达尔不得人心，也就不难理解了。1985年11月25日，“恐怖公司”接连袭击了罗马和维也纳的两个机场。恐怖分子对着候机的乘客狂轰滥炸，造成19人死亡，122人受伤，但事后检查，受难者中仅有一名犹太人，其余的全部是无辜者。

尼达尔自诩为“彻底的革命者”，因此，对巴勒斯坦人中间的“不坚定

分子”、实际上也就是不赞成他滥杀无辜的人，他也要大开杀戒。他认为，以色列人中没有中间派，在剥夺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残杀巴勒斯坦人上面，以色列人个个有份，因此，对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必须从肉体上消灭，谁不赞同他的主张，谁就是动摇分子，谁与以色列谈判，谁就是反对巴勒斯坦革命事业。因此，他要消灭约旦国王侯赛因、埃及总统萨达特。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尼达尔的“恐怖公司”一开张，就要拿巴解组织和阿拉法特祭旗。据不完全统计，“恐怖公司”进行的恐怖活动中，大部分是针对阿拉伯人自己的。巴解的财政总管成为第一个殉难者，在他之后有巴解组织驻巴黎、伦敦和科威特的代表。阿布·尼达尔绝对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他的妻舅、姐夫、侄子也因政见不同而死于他的手下。

由于阿布·尼达尔口口声声说他是巴勒斯坦解放事业正确路线的代表，而且是以以色列和美国为目标，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阿布·尼达尔在中东得到相当多国家的援助。他提出的用非正规手段打击敌人的主张，在巴勒斯坦人心中更是有相当影响。巴勒斯坦人纷纷仿效阿布·尼达尔，或是加入他的“恐怖公司”；或是另起炉灶，从事恐怖活动，向以色列复仇。他们用暗杀、爆炸、动机、绑架人质等手段，在中东掀起巨浪。一时间，中东大地波涛汹涌，恐怖事件层出不穷，中东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

但是，恐怖活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色列并不因为飞机被劫持或人质被杀就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让步。相反，有着悠久的恐怖传统的以色列奉行的是以牙还牙的政策。比之于巴勒斯坦人的恐怖活动，以色列的国家恐怖主义要强多了，而且杀伤力要大得多。巴勒斯坦人的恐怖活动未必能真正落实到犹太人头上，但是以色列的恐怖活动却从来没有落空过。1972年9月，阿布·尼达尔的“恐怖公司”，打着“黑九月”的旗号，在西德慕尼黑黑袭击了以色列奥运代表团，杀死了9名以色列运动员，从而在奥林匹克历史上写下了恐怖的一页。“恐怖公司”的暴行在世界上引起公愤。在此后的数年里，以色列特种部队一个一个地将恐怖分子除掉了。1982年，“恐怖公司”的一名成员通过长达数年的跟踪，终于在伦敦暗杀了以色列驻英大使艾高夫，大使先生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但最后终于捡回了一条命。以色列岂是好惹的！以色列政府本来就想建立一个“大以色列”，正苦于没有借口，阿布·尼达尔的恐怖行动正好为它提供了绝妙的口实。于是，它抓住时机，向驻在贝鲁特的巴解组织总部发动大规模进攻，挑起了第五次中东战争，结果巴解武装力量在优势敌人面前几乎全军覆没，阿拉法特被迫命令他的部队放下全部重型武器，转移到突尼斯，巴解组织元气大伤。

阿布·尼达尔的恐怖活动如此频繁，危害如此之大，各方都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就出现了奇异的一幕：尽管巴解组织与以色列、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但在对待阿布·尼达尔的“恐怖公司”的问题上，立场却完全相同。巴解武装组织多次对“恐怖公司”采取行动，以色列和美国在打击阿布·尼达尔的恐怖活动方面更是不遗余力。美国还发出了国际通缉令，缉拿这个最具危险性的国际恐怖分子，但连尼达尔的影子也没有见到。1978年和1983年，阿布·尼达尔曾两次赴美治病，但美国情报部门根本没有察觉。为此，尼达尔曾得意地说：“我既不是妖魔，也不是鬼怪，而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阿布·尼达尔。我的成功归功于我的隐蔽。”他说：“甚至连我的儿子也不知我是何许人也。”这套隐蔽之术正是阿布·尼达尔得以猖狂一时的原因。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虽然尼达尔对自己的成功津津乐道，但幸运之神并不总是跟在他的后面。“恐怖公司”不断出击，国际反恐怖力量也在追踪尼达尔。1989年2月8日，阿布·尼达尔终于被一名利比亚情报人员杀死了。1990年6月，巴解武装力量又对“恐怖公司”在黎巴嫩南部的总部进行突击，结果“恐怖公司”的大部分人员被消灭。“恐怖公司”元气大伤。但是，阿布·尼达尔的幽灵还时不时地出来作祟。据说，一个有18年恐怖经历的恐怖分子侯赛因·本·阿里又接替了阿布·尼达尔的位置，继续经营“恐怖公司”。虽然阿里是一个阿拉伯人，但他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基督徒。阿里虽然继承了阿布·尼达尔的“事业”，仍然打着法塔赫革命委员会的招牌，但他对于阿以斗争已经不感兴趣，他的真正目标却是要消灭巴解组织，为阿布·尼达尔复仇，最终建立一个政治、军事、安全组织，解放耶路撒冷。

飞来横祸

1988年12月21日午夜，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渐入梦乡，天空中传来一阵沉闷的轰鸣声，如果这时你抬起头，将会看到几点星火，在没有月光的晚上，这几点星火显得格外清晰。轰鸣声渐渐近了，这是飞机飞近的声音。这并不奇怪，因为英伦三岛本来地方就不大，每天经过这里的飞机不知有多少，谁也没有去计算过。

高空中突然亮起一团奇异的火光，其亮度远远超过正常的夜航机发出的灯光，约莫几分钟后，人们听到了一声爆炸。但由于距离过远，声音并不是想象中的震耳欲聋，而是极度微弱，不足以把睡梦中的人们惊醒，他们也不可能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因此，一切照旧。只是当爆炸后的飞机摇摇晃晃地落到地面，削平了几十间房屋，并引发大火之后，人们这才从睡梦中惊醒，争先恐后地逃命。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地震，还是火灾？不管它，逃命要紧。

遭到飞来横祸的是苏格兰小镇洛克比，在此之前，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小镇的名字，但这之后，洛克比这个名字传遍了全世界，洛克比几乎成为空中灾难的代名词。而失事的航班则是泛美航空公司的103航班，它从德国法兰克福起航，在英国最大的国际机场希恩罗机场作短暂停留后，直飞目的地美国纽约。它是21日22点20分从希恩罗机场起飞的，几分钟后它就越过了爱尔兰海，到达洛克比上空，随后就发生了爆炸。这架波音747喷气式客机上的259名乘客全部遇难，另外，洛克比小镇上的居民也赔上了11条生命，总计270人遇难，其中大部分是美国人。

12月22日黎明时分，闻讯赶来的苏格兰警察把失事现场团团包围起来，开始取证工作。高空爆炸后飞机的残余物分布十分广泛，这为取证工作带来了相当难度。搜寻人员带着各种仪器对这一区域的每一寸土地进行拉网式搜查，寻找遇难者尸体和飞机的残余物件。经过近一周的努力，英国警察找到了大部分遇难者的尸体和大小1.8万余件飞机碎片。这些碎片全部交给了英国国防部所属单位进行分析，以确定飞机失事的原因，并为破案提供线索。1000余名专家和技术人员不分昼夜轮班作业，利用各种仪器对这些飞机碎片进行分析、模拟和鉴定。结果认为，飞机失事前，飞机各个部件运行状态良好，没有任何发生故障的迹象。这个结论是意料之中的，因为103航班在起飞前曾作过10分钟的飞行安全检查，结果一切正常，而且，爆炸是突然发生

的，飞机事先没有任何告警，这就基本上可以排除飞机本身失事的可能。因此，技术人员认为，空难是由飞机内部的猛烈爆炸所致。

飞机当然不会无缘无故地爆炸，爆炸是由人为因素引起的。一位技术人员注意到一片金属板上的少许痕迹，经鉴定，金属板是机体前部行李架上的残余物，而痕迹则是一种高性能塑胶炸弹的残余。进一步分析表明，炸弹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产品，大名为塞姆泰克斯，是军火界最负盛名的塑胶炸弹，也是最受恐怖分子青睐的一种产品，因为一般的安全检查仪器对它无能为力。

塞姆泰克斯是如何跑到 103 班机里的？是恐怖分子自己带上飞机的吗？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虽然大部分人都爱惜生命，但也确有一小撮不要命的恐怖分子，他们常常发起自杀性攻击。对这种恐怖分子，你真是无法提防。但是，现在并不能肯定这就是恐怖分子自己带上飞机的，也有可能是恐怖分子自己没有登机，而把行李托人带上了飞机，自己则逃之夭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调查人员为此伤透了脑筋。

爆炸发生在英国，英国人自己也损失了 11 条人命，因此，调查由英国负责理所当然。由于爆炸的客机是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上的乘客又多是美国人，这样，美国卷入调查事务也势所难免。经过协商，美英两国成立了联合调查组，由英国秘密情报局、苏格兰场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及联邦调查局负责这次空难的调查事务。为了尽快破案，美英两国拿出 5 万美元，悬赏提供线索的人员。至于说凶手是谁，调查进展到何种地步，两国一概秘而不宣。1991 年 11 月 14 日，经过近三年时间的调查取证，美英两国终于宣布了洛克比空难的调查结果：空难是由两名利比亚情报人员制造的。他们是：前利比亚航空公司驻马耳他办事处主任阿里·穆罕默德·迈格拉希，他的同事拉明·哈里发·弗希迈。他们将藏有炸弹的行李从马耳他送上 103 航班，准备于爱尔兰海上空爆炸。这样，爆炸产生的碎片将沉入汹涌的爱尔兰海。另外，美英两国还指控利比亚现任交通运输部长埃泽丁·欣沙里与爆炸案有关，因为恐怖分子所使用的炸弹是他从瑞士麦伯公司采购的。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制造飞机坠毁这样的大屠杀恐怖活动如果没有政府最高层人士的支持是无法实现的，因此矛头直指利比亚最高领导人卡扎菲上校。他还说，布什总统将与英国首相梅杰磋商后采取一致行动。当问到美国是否会利比亚采取报复行动时，菲茨沃特说：“没有排除任何选择。”随后，美英两国通过意大利驻利比亚大使馆向利比亚递交了起诉书和通缉令。利比亚大祸临头。

祸不单行。次日，法国总统密特朗也公布了 1989 年法国航空公司 772 航班爆炸事件的调查报告。当时，法国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在尼日尔上空爆炸，机上 170 余名人员葬身沙漠。密特朗宣布，有 4 名利比亚人涉嫌此案，并向利比亚提出了引渡要求。11 月 27 日，美英法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利比亚在三国调查飞机事件时与三国司法部门合作，并“最终具体同意放弃一切形式的恐怖活动，放弃对一切恐怖组织的支持”。此后，法国司法部门还发出通缉令，缉拿炸机事件的嫌疑犯，其中就有卡扎菲的妹夫、利比亚情报机构事实上的负责人阿卜杜拉·塞努西。三大强国一起向利比亚发难，小小的卡扎菲上校如何作出反应？

不料，卡扎菲对西方三大国的指控并不在乎。他的理由很简单：利比亚与洛克比空难没有关系，因此，所谓交出凶手之说，自然不能应承。但是，

利比亚也希望弄清真相，因此，希望有关国际组织出面裁决此事。不过，由于西方对利比亚的指控言之凿凿，因此，利比亚也把三个据说是炸机案犯的人拘留了起来。12月3日，利比亚情报部门宣布，西方指控的六名情报人员已经被抓起来，并正在进行审讯。不过，它又说，西方的指控是对利比亚的栽赃，“真正的罪犯现正逍遥法外……正在嘲笑我们。我看到，他嫁祸于人的目的已经达到，他或许正在计划采取其他行动。”这与三大国要求利比亚把人交出来、由三大国进行审讯的要求相距甚远。同日，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霍格甚至向利比亚发出威胁：如果利比亚不把与洛克比空难有关的两个人交出来，不排除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利比亚则反击说，如果他们真的与洛克比空难有关，那么，他们将被判处极刑。但前提必须是，103航班确实是他们炸毁的。而且，利比亚是一个主权国家，也不可能随随便便把本国的公民交给别的国家去处理。利比亚的立场是明确的：它反对恐怖主义。卡扎菲已经表示过，过去利比亚支持一些国际恐怖组织是一个错误，但是，利比亚正在与它们断绝联系。如果西方不信，可以派人来利比亚调查。利比亚愿意配合这种调查，这样可以澄清事实真相，洗清泼在利比亚身上的脏水。而且，西方要求引渡嫌疑犯的要求也缺乏法律根据。根据1971年在蒙特利尔通过的《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嫌疑犯所在国有权调查、起诉罪犯。根据这一规定，利比亚根本不用把嫌疑犯交给三大国去处理。面对利比亚的伶牙俐齿，三大国也着实无奈。毕竟，他们在公约上也签过字的，怎能强迫利比亚交人呢？但是，三大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尤其是美国，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平时已经习惯于颐指气使，怎能容忍利比亚的抗辩？因此，三大国态度强硬：利比亚必须交人。利比亚是小国，但是，现任国家元首卡扎菲上校却是一个天生不信邪的人物。他上台后根本没把美国放在眼中，三大国的压力又算得了什么！何况，真理看来在利比亚一方，因此，利比亚虽然与恐怖事件有关，却也博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尤其是阿拉伯联盟，更不能看着大家庭中的成员平白无故地受气。因此，阿盟建议，在联合国国际卫队的护送下，将两名涉嫌洛克比空难的利比亚人送到一个中立国家，由一个国际司法机构进行审讯，但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这一建议充分照顾到了三大国的面子，但是，三大国强权在手，对这个建议置之不理。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站在利比亚一边。双方各执一词，于是，三大国就将此事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安理会不能不理睬三大国要求弄清真相、惩罚恐怖分子的要求。因此，1992年1月21日，安理会通过了第731号决议，要求利比亚在调查空难原因问题上与三大国合作，同时明确要求利比亚引渡嫌疑人员。但利比亚只愿意把人犯交到联合国及其分支机构，却不愿交给三大国，并向国际法院提出申诉，要求由它自己审判嫌疑人员。国际法院也受理了它的申诉，开始调查。但美国与英国坚决不答应。它们早就认定利比亚是一个恐怖主义国家，恨不得把卡扎菲也推上被告席，怎能同意由利比亚自己审判所谓嫌疑犯。安理会731号决议已赋予它们引渡罪犯的权力，因此，它们声明，在利比亚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是遵守安理会决议，引渡人犯；要么是不执行安理会决议，等着制裁。利比亚选择了后者。1992年3月31日，安理会通过了第748号决议，要求利比亚在4月15日前交出嫌疑犯，否则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要从15日起中断与利比亚的空中联系，实行武器禁运，直到利比亚交出嫌疑犯。但是，卡扎菲并不把制裁放在心上。他对记者发表谈话说：“我将对任何实施安理会制裁措施的国家采取

报复行动。”卡扎菲的立场为何变得如此强硬？这有两个因素：一是美国和英国口口声声说利比亚涉嫌洛克比空难，但现在还没有拿出使人信眼的证据，证明它们的指控。二是阿拉伯国家联盟对安理会的决议也持异议，对美国和英国以势压人的蛮横态度更是不能赞同。在它看来，利比亚的立场是有道理的，也是符合国际法的。为什么不能由利比亚自己审判罪犯？为什么在事实真相没有弄清之前就要对利比亚进行制裁？这不是强加于人吗？因此，东盟秘书长马吉德说，他估计，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不会对利比亚进行制裁。

4月1日，安理会决议通过后的第二天，国际法院也驳回了利比亚的申诉，理由是：安理会作出的两个决议，优先于其他国际条约，因此，利比亚的申诉不予受理，当利比亚再次要求国际法院阻止美国与英国采取制裁行动时，国际法院也拒绝了这个要求。

4月15日制裁正式生效。这一天，所有从利比亚出发的航班都遭到拦截，被迫返航。法国、瑞典、日本、德国等国驱逐了利比亚的外交官，利比亚与西方各国本来就没有什么来往，这下子，驻在利比亚的外交机构更少了。利比亚也不示弱，卡扎菲迅速通知那些驱逐利比亚外交官的国家，利比亚将采取报复措施。阿拉伯国家也纷纷作出反应，支持利比亚的立场，谴责西方对一个阿拉伯国家主权的赤裸裸的干涉。苏丹等国首先宣布不执行制裁决议，埃及也开放了陆上边界。这样，利比亚与外界空中联系暂时中断，但与外界的联系并没有真正切断，制裁没有达到目的。但是，制裁一个月后，利比亚在制止恐怖主义行动上还是迈出了一大步：5月14日，利比亚外交部宣布，接受联合国安理会731号决议，放弃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6月23日，利比亚总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解决洛克比危机的新建议，同意通过东盟或联合国，把两名人犯交给一个“公正廉洁”的法庭进行审判，并呼吁与西方国家进行直接谈判。但是，美国等三大国不依不饶，坚持要对利比亚进行制裁。1993年8月，三大国又表示，要对利比亚进行更严格的制裁。克林顿总统说：“美国与利比亚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只有在的黎波里交出炸机嫌疑犯后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关于利比亚的任何问题都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还说，如果利比亚不交出与洛克比空难有关的两名人犯，利比亚将面临更大的国际压力。但是，时间将证明，利比亚是不怕压力的。虽然利比亚因制裁遭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但利比亚还是能支持下去。

三大国为什么一口咬定是利比亚制造了洛克比空难？他们手里有什么证据吗？利比亚遭受的是“无妄之灾”吗？

美英等国对利比亚采取如此强硬的措施，与其说是它们找到了过硬的证据，不如说是它们逻辑推理的结果。

最初，美国与英国在确定炸机嫌疑犯时，根本没有想到利比亚。它们想到了伊朗政府，因为伊朗与美国的关系素来不睦。美国认为，伊朗支持恐怖分子与美国为难，而且，在两伊战争期间，美国军舰“斯塔克”号曾击落过一架伊朗民航飞机，伊朗也一直声称要进行报复。而且，洛克比空难发生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宣布对此事负责，并说这是对美国军舰击落伊朗民航飞机的报复。后来，美国又想到了阿布·尼达尔的“恐怖公司”，这家公司专门与美国和以色列为难，而且尼达尔称，近期会有空难事件发生。如果不是他策划的，那么，他就是一个高明的预言家。此外，美国人还想到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人阵也是巴勒斯坦的一个恐怖主义组织，1970年曾炸毁过一架瑞士的民航飞机。

在调查空难原因时，调查人员发现了两个重要线索：一是一片从烧毁的皮箱里的一件衬衣口袋里取得的金属片，另一个是在另一只皮箱内的东芝牌收录机的残体，最终鉴定是集成电路的碎片，而且不是收录机本身具有的。专家鉴定，这是一只定时器的残体。炸弹藏匿在两只皮箱内的衣物内。经过详细的调查，调查人员发现，衬衣是马耳他生产的，而且，他们在马耳他找到了出售这种衬衣的商店，而定时器则是瑞士麦伯公司生产的，它曾把这种定时器卖给了利比亚。1985年，利比亚交通运输部长埃泽丁·欣沙里从麦伯公司买走了22台定时器，此后，这种定时器多次被发现与塞姆泰克斯一起使用，而且，使用者都是利比亚人。这就可以说明，欣沙里买这种定时器不是为了别的什么用途，而是专门给恐怖分子提供的！美国人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竟然把最有可能实施这项恐怖行动的利比亚忘掉了！

利比亚与美国的恩怨由来已久。自1969年9月1日卡扎菲为首的“自由统一军官组织”推翻伊德里亚斯王朝以来，利比亚与美国的关系就一直走下坡路。1970年6月11日，利比亚收回了美国在利比亚的惠勒斯空军基地，这是当时美国在海外最大的空军基地，美国人的恼怒可想而知。1971年12月，利比亚实施国有化措施，美国又是首当其冲。此后，卡扎菲逐渐左倾，与苏联关系密切，这更是美国不能容忍的。1979年，美国和利比亚相互撤回大使馆人员，但未彻底断绝外交关系。1981年8月，美国曾在利比亚的锡尔特湾向利比亚的空中势力挑战，结果利比亚失败了。1986年，美国借口利比亚在柏林向美国军人采取恐怖主义行动，于1986年4月15日对利比亚动了“外科手术”，结果卡扎菲幸免于难，但其养女却被炸死。双方积怨甚深。可这次，美国竟然先把它忘记了。于是，其他的线索都暂时收了起来，美国和英国开始一心一意对付利比亚。

利比亚在三大国的攻势面前节节败退，在联合国也没有捞到好处，安理会同意对利比亚进行制裁。利比亚为何如此被动？原来，利比亚的屁股确实不是干净的。利比亚确实有支持恐怖活动的坏名声。利比亚与美国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与美国相比，利比亚只是一个弱者。真刀真枪、明枪实弹，利比亚决不是美国的对手，但如果搞背后袭击，进行一些非正规的战争，那美国佬是防不胜防的。因此，利比亚确实利用各种场合，对美国发动过“非正规战争”，也就是恐怖主义行动。而且，卡扎菲还庇护了一大批恐怖分子。这些恐怖分子的袭击对象主要是美国、英国和以色列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卡扎菲为他们提供了大本营，让他们在利比亚训练，借用利比亚的护照向“帝国主义”出击，出事了为他们提供政治保护，受伤了让他们在这里休养生息。因此，利比亚与阿布·尼达尔的“恐怖公司”、北爱尔兰的共和军都有密切的交往。阿布·尼达尔之所以来无踪去无影，与利比亚的帮助有很大关系。因此，西方干脆把利比亚看作是一个恐怖主义国家。但是，由于查无实据，西方对利比亚也只能停留在口头谴责的水平上，真正要对它采取行动，必须有真凭实据才行。像美国那样动不动给利比亚动“外科手术”，那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干得出来的，毕竟，人类已经步入文明时代，强权政治早该结束了。但这次情况就不同了，西方似乎真的抓到了真凭实据，国际社会对利比亚的行动也不支持，因此，利比亚的灾难也就降临了。因此，尽管利比亚使尽外交手腕，背后也有阿盟撑腰，但是胳膊终究扭不过大腿，制裁还是生效了。利比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一年就损失24亿美元，人员死伤数千，缺

衣少药，通货膨胀率高达 120%。

利比亚：代人受过？

利比亚真是洛克比空难的元凶吗？美国似乎找到了不少证据证明了这一点。但这些证据没有一条没有争议，即使在美国也不是人人都相信的。

根据西方的指控，利比亚情报人员迈格拉希和弗希迈从利比亚乘班机将两枚炸弹运至马耳他，这两人在商店里买了衬衣和皮箱，然后把它们送到法兰克福机场，最后装上了泛美 103 航班。原来准备在爱尔兰海上空爆炸，因为时间计算错误，结果，飞机在洛克比上空爆炸。这个结论貌似严谨，是根据严格的事实推断而出，但实际上漏洞百出，纯粹是主观想象的产物。美国 and 英国使用的方法与中国的胡适先生所说“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颇有几分相似。这个假设就是：利比亚是这起空难事件的元凶，因此，一切调查都围绕利比亚进行。比方说，飞机残体上发现了马耳他生产的衬衣，而利比亚人也在马耳他买了衬衣；飞机上发现的定时器是麦伯公司生产的，而利比亚人也向麦伯公司订购了这种定时器，等等。这些所谓的证据不可能让人信服，在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是的，利比亚是向麦伯公司订购了定时器，这些定时器与塞姆泰克斯炸弹相连，这种装置过去也在利比亚人身上发现过，从这个前提出发，能必然地推出此次飞机上的炸弹也是利比亚人安置的吗？很明显不能。此外，美国人也无法说明，那只装着炸弹的手提箱是如何避开法兰克福机场严格的安全检查而被送上 103 航班的，而且，冒险将无主的炸弹箱送上飞机并不符合恐怖分子通常行事的规矩。因此，德国人就含沙射影地说：“有人先认定了一个观点，然后把发现的一切全往上套。”麦伯公司的老板博利尔曾说，麦伯公司生产的定时器全部卖给了利比亚。如果这一点是肯定的，那么当然可以断定利比亚是空难的真正元凶。美国 and 英国也是根据这个结论指控利比亚的，问题是，这个结论的前提本身就是有问题的。麦伯公司的定时器真的都卖给了利比亚了吗？利比亚是麦伯公司的唯一客户吗？明眼人一看就知，事情不可能如此简单。果然，后来博利尔反悔了。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在重新检查所有的销售记录后发现，曾有一些定时器卖给了民主德国国防部。他的总工程师隆佩特提醒他说，1985 年他前往柏林时，曾把两个定时器交给了东德人。博利尔的说法得到了隆佩特的证实。既然是这样，调查的范围就不应局限于利比亚了，至少应把东德包括进来，而东德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的联系是众所周知的。隆佩特对美国 and 英国死死揪住利比亚，而把人阵（总指挥部）放在一边感到不可理解，如此重要的证词被忽略，警方这样做是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隆佩特这么想，受难者家属也这么想。受难者家属的发言人斯怀尔医生就一直怀疑整个案件调查的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他气愤地说：“整个洛克比案的调查被用来为国际政治的交易服务，他们所作的一切就是不让亲属们知道事情的真相。”美国《时代》周刊在经过四个月的独立调查后认为，洛克比空难的真正元凶是叙利亚的毒品大王蒙扎·阿尔-卡萨，他在人阵（总指挥部）的配合下，将炸弹送入 103 航班，而其目标就是消灭乘坐 103 航班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查尔斯·麦基，麦基和一些情报官员正在中东活动准备营救美国人质。泛美航空公司的辩护律师雇用的纽约国际情报公司的侦探贾维尔·阿维夫也把调查目标集中到卡萨身上。

卡萨是叙利亚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的妹夫是叙利亚情报部门负责人阿里·伊沙·杜巴，其妻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亲戚，而卡萨自己更是不同凡响。他是叙利亚的毒品大亨，还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诺思中校情报网的线民，与黑白两道都有密切的往来。据卡萨自称，正是在他的斡旋下，法国的两名人质才因而获释，而代价是一船军火。诺恩因为卷入伊朗门事件已经垮台，而卡萨则毫发无损，继续干他的毒品勾当。卡萨的行动引起了中央情报局科里亚特别行动小组的注意，该小组驻德国威斯巴登，任务是监视毒品和军火的走私交易，但其最终目的则是要打入犯罪集团。为了掩护其活动，科里亚小组开了一系列的公司，如斯蒂芬·曼特拉公司、AMA 工业公司等。科里亚小组盯上了卡萨，但并没有对他采取行动。无奈之中，卡萨只得与科里亚小组合作。科里亚允许卡萨继续向美国走私毒品，而卡萨必须协助中央情报局解救被关押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这桩交易可以说是取长补短，对双方都有好处。中央情报局要解救人质，而人质关在恐怖分子手里，中央情报局要完成任务，没有当地黑社会的配合，只怕也非易事，卡萨在这方面却是行家里手。卡萨要向美国走私毒品，美国药物管理局这一关也不好过，而中央情报局却是轻车熟路。虽然说中央情报局也负有扫毒的责任，但中央情报局的第一任务却是维护国家安全，为此它可以不择手段。冷战期间，中央情报局为了反共还专门与毒品贩子合作，今天的“金三角”之所以成为毒品王国，中央情报局出力不小，而美国的毒品问题之所以会变得不可收拾，中央情报局也是“功不可没”。美国的“使命感”太强，任务太多，因此出现这种局面并不奇怪。现在，中央情报局又要借助于毒品贩子来解救美国人质了，而在此之前它已经通过向伊朗——当时美国在中东的头号敌人——提供军火，使人质获得释放。

卡萨与科里亚的合作本来天衣无缝，但无奈隔墙有耳，双方的非法活动被另外一个武装组织——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获悉。人阵(总指挥部)是巴勒斯坦一个出名的恐怖组织，它与阿布·尼达尔的“恐怖公司”一样，自命为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宗”领导，而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却成了“异端”。人阵(总指挥部)的领导人是杰布里，他头发稀疏、花白，挺胸凸肚，常常身穿一件普通的茄克。在众多的恐怖行动中，人阵(总指挥部)最拿手的并不是炸弹，而是动机，可以说是一劫一个准。1970年9月6日，人阵(总指挥部)曾一天之内劫持了美国环球航空公司、泛美航空公司和瑞士航空公司的三架客机，只有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侥幸逃脱，这一天被称为“空中劫持星期天”。由于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三天后，人阵(总指挥部)又劫持了一架英国客机。同年，杰布里又袭击了一辆以色列接送孩子的校车，结果，12名儿童不幸罹难。1974年，他又在一个犹太人定居点杀死了18个以色列人。1986年，他又威胁说要炸毁美国的航班。人阵(总指挥部)活动的大本营是贝鲁特，支持它的有叙利亚、伊朗和利比亚。这一次人阵(总指挥部)向103航班下手，就是伊朗所托，原因就是报复美国海军击落伊朗的一架空中客车。当杰布里发现卡萨与中央情报局之间的非法交易后，他立即找到卡萨，要他设法把炸弹带到一架美国航班上，但到底是哪一架飞机，当时并没有确定。卡萨非常勉强地答应了杰布里的要求，他非常不希望这个时候有人来打扰他，因为有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他的毒品生意在美国畅通无阻，一本万利。但是，他也不敢拒绝杰布里的要求，同在黑道上混口饭吃，说不定哪一天会求助于人阵(总指挥部)，再说，虽然他在叙利亚也是一个

有头有脸的人物，但比起有组织、有武装的人阵（总指挥部），他的势力还小了点。

1988年12月，查尔斯·麦基等一帮援救人质的中央情报局人员获悉科里亚小组与卡萨集团勾结的证据，对这种作奸犯科的行为，麦基等人气愤万分，因此向中央情报局兰利总部报告了此事，同时发誓要查禁卡萨的行动。但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这一次兰利总部对他们的怨气没有作出任何反应，麦基等人反映的情况犹如石沉大海。麦基等人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决定飞回兰利总部，当面问个明白。他们将准备用于营救人质的50万美元现金放在手提箱里，同时准备好人质的关押地点的地图及照片，计划从塞浦路斯飞到伦敦，然后乘103航班回纽约。后来，英国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了这50万美元和一张地图，但随后赶来的中央情报局特工就把这些东西带走了，只是在几天之后他们把一只空箱子送到了失事地点。麦基在动身前从贝鲁特向他母亲打电话，报告这一消息。接到电话时，麦基夫人大吃一惊，因为以前他都是到弗吉尼亚后才给她打电话，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在电话中，麦基对他母亲说：“明天晚上到匹兹堡机场来接我，这是突然袭击。”

麦基等人的举动既得罪了卡萨，也得罪了伊朗人。因为人质就掌握在伊朗人手中。麦基小组的计划是，只要有可能，就采取行动，强制解救人质。这是伊朗人不能容忍的。1979年卡特政府曾组织过一次类似的行动，中央情报局出动一个行动小组前往伊朗强制解救人质，结果没有成功，中央情报局机毁人亡。这一次，伊朗人同样不会让他得逞。但是，伊朗人自己没有动手，而是把这个消息通知杰布里。杰布里自诩为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正宗领导人，在阿拉法特宣布放弃恐怖活动、愿意与以色列对话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略有松动，杰布里对此不能容忍，因此决定出手显示自己的存在，并对美国略加惩戒。双方一拍即合，伊朗人为此提供了500万美元。但是，这件事刚开始时进行得并不顺利。1988年10月，人阵（总指挥部）的炸弹专家柯里萨特和达尔喀马尼在西德的商店里采购闹钟、电他、电线胶水等物，引起了警察的注意，结果警察在他们的房间里找到300克塞姆泰克斯炸药和一架东芝牌收录机。两个星期后，德国警方释放了柯里萨特，理由是证据不足，但达尔喀马尼仍然在押。柯里萨特后来不知下落，显然是研制炸弹的起爆装置去了。他发明的这套装置也真先进。当安放了炸弹的飞机达到万米高空时，炸弹的定时装置会自行启动，如果飞机保持高度不变，那么炸弹将在45分钟后爆炸。如果飞机在此之前降低高度，定时装置就会自动跳开，指针回转到零。杰布里后来声称，联邦德国抓到的两个人确实是人阵（总指挥部）的，而且人阵（总指挥部）也确实有炸弹被缴获，但是又声称这些炸弹不是用来对付103航班的，而是用来对以色列发动圣战的。他也承认伊朗、叙利亚是他的盟友，但“我们从不为他们于这种事”。这种说法很难让人信服。不过，他私下里倒是说过，美国人永远也不会搞清事实真相。

麦基的行程被中央情报局一名双重间谍洛夫乔伊察觉，这人曾是国务院一个安全官员，后来在利比亚被招募，他把麦基的行程透露给伊朗驻贝鲁特大使馆，这样，麦基就死定了。

洛夫乔伊和伊朗人的联系也被美国政府发现了。1988年11月和12月，美国政府曾监听到洛夫乔伊与伊朗人联系的一连串电话，内容与麦基小组的行踪有关。12月20日，洛夫乔伊最后报告，麦基小组将于第二天登上泛美航空公司的103航班。此外，12月18日，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也通知美

国和西德情报机构，一架美国民航飞机将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卡萨得知这一情报后，以为可能就是 103 航班，于是，他把这一情报通知了科里亚小组，科里亚又通知美国驻芬兰大使馆。于是就出现了奇怪的一幕：美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事先得知了警告，恐怖分子将袭击 103 航班，因此，外交官们临时把机票退了。而美国运输部门也曾把这个消息通报英国运输部门，但双方都没有作什么准备，也没有取消航班，惨剧就这样发生了。事发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首先发难，劝告它分布在全世界 133 个国家的 40 万名员工近期不要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班。对 IBM 的举动，美国政府的航空官员认为这样做将会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联邦航空管理局也说这样做太过分了，而泛美航空公司则暴跳如雷，说这种做法是不必要的。那些死难者的家属更是群情激愤，他们对美国政府这种行为表示愤慨，并威胁说要上告泛美航空公司只顾赚钱、不顾乘客死活的做法。

洛克比空难另有隐情的说法从另外一个角度得到了证实，这就是美国政府对这件事所作出的反应。刚开始，美国情报人员怀疑过伊朗和叙利亚，也怀疑过杰布里，并且把它们作为重点调查对象。美国情报人员还追踪到一笔款子从伊朗汇到了维也纳人阵（总指挥部）的帐下，但后来美国司法部竟出乎意料地宣布利比亚是洛克比空难的元凶，布什总统甚至还为此向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道歉，说：“叙利亚在这件事上承担了荒谬的责任。”这个弯子转得太大，很多人都疑惑不解，因此引起受难者家属的抗议。他们认为矛头突然指向利比亚是一起政治阴谋，其实质是对叙利亚在海湾战争中站在美国一边的奖励，其次是为人质获释创造有利的气氛。中央情报局负责此次调查的负责人卡纳斯特拉罗也认为，把洛克比空难的责任一古脑儿地归咎于利比亚是荒唐的。而美国政府对部分受害者家属的行动就更让人们觉得可疑，这里面确实存在一种阴谋。洛克比空难 4 个月后，麦基夫人收到了布什总统的慰问信。信中布什对麦基夫人表示“我的心与你一样悲伤”，并说“政府的任何行动都无法补偿你所遭到的损失”。空洞的言辞让麦基夫人极为不满。后来，麦基夫人又收到一封署名为“约翰·卡彭特”的人写来的慰问信。信中说，麦基乘坐 103 航班与洛克比空难毫无关系，又说，“我无法评述麦基的工作，因为他的工作还在继续，上帝有眼，他的工作将会结出丰硕的成果，你也总有一天会知道他真正的英雄主义和勇敢的事迹。”中央情报局前工作人员维克多·马凯蒂认为，人质营救小组的成员凑巧在 103 航班上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线索”，“这好比一件毛衣的松散了的线头，你只要拉下去，全部事实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哈马斯：复仇的拳头

自 1948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巴勒斯坦人的命运就与当年的犹太人相仿，开始了离乡背井的生活。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巴勒斯坦人终于自己拿起武器，开始了恢复自己民族权利的斗争。但由于以色列的严厉打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始终不能在巴勒斯坦本土站稳脚跟，巴解组织只得移向临近的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第五次中东战争（也称黎巴嫩战争）后，巴解总部甚至不得不退往突尼斯，这种局面严重影响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反以斗争。

但是，留在巴勒斯坦的人民并不甘心受以色列的奴役，他们一直在寻找

机会进行斗争。随着巴勒斯坦人民武装的发展壮大，这种斗争也变得更为激烈了。1987年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起义，就是巴勒斯坦人在本土进行斗争的最好证明。在这种斗争过程中，诞生了巴勒斯坦本土的领导机构——哈马斯。

哈马斯创建于1988年，但它实际上与巴勒斯坦人民的反以斗争是相始终的。哈马斯的领导人是谢赫·谢辛，这是一个终日与轮椅为伴的老人，正是他，导演了被占领土上一幕幕令以色列胆寒的恐怖事件。

谢辛出生于1935年，其父是当地的富豪，与阿布·尼达尔一样，谢辛的家产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后被以色列剥夺，谢辛变得一贫如洗。四年后，他因摔伤致残，从此一病不起，只得靠传教讲道为生。这样的经历极易使他走上宗教道路。在当时的背景下，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中东产生了伊斯兰复兴运动，极端宗教思想盛行，因此，谢辛加入了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由于兄弟会在埃及是一个非法组织，因此，谢辛也曾经被捕入狱，在监狱里呆了45天。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谢辛着手扩充兄弟会在加沙的势力，建立了穆斯林兄弟会加沙分会。1973年，谢辛成立了伊斯兰中心，很快成为当地一支强大的宗教、政治力量。当时，以色列为了对付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采取了“以夷制夷”的政策，支持了谢辛的活动。由于得到了大量的财政援助，谢辛的势力急剧膨胀起来。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对谢辛更是一个鼓舞。他意识到，在中东这块土地上，要真正做到有影响，必须有实力才行。因此，他放弃了过去那种纯粹的宗教宣传和政治说教，转而从事军事斗争。谢辛的活动为以色列所不容，因此，谢辛再度入狱，被判处13年徒刑，后来被释放了。

在反以斗争中，谢辛的思想与阿拉法特完全不一样，与极端激进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倒很相似。而且，对巴解组织久居国外，谢辛也颇有看法。因此，他不承认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领导力量，而想另起炉灶。1987年爆发的巴勒斯坦民族大起义正好为他提供了这个条件。当时，巴解只能从国外遥控指挥这场起义，并且向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提供经济援助；但是，谢辛的组织则不一样，它一直在被占领土上活动，在人们心中颇有威信。从谢辛开始，伊斯兰运动的领导人十分清廉，救济贫民工作相当出色，因此赢得了极高的声誉。据民意测验表明，谢辛在加沙的支持率达到了40%，在约旦河西岸的纳布斯，谢辛的支持率竟高达60%，这对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主流派是一个严峻挑战。因此，当巴勒斯坦自治机构建立后，伊斯兰运动公开要求在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中得到40%的名额，但遭到了巴解组织的拒绝。在1988年初，谢辛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伊斯兰抵抗运动，其阿拉伯文缩写为哈马斯。成立时，哈马斯发表过《伊斯兰抵抗运动盟约》，声称巴勒斯坦是伊斯兰的土地，解放巴勒斯坦是每个穆斯林的天职。其奋斗目标是对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开展圣战，只有圣战才能拯救巴勒斯坦人，也只有通过圣战才能收复全部被占领土，因此，谢辛的目标是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与其他极端的激进派别一样，谢辛也反对与以色列进行任何妥协，圣战是解救巴勒斯坦人苦难的唯一武器。他反对与以色列有任何接触，并发誓要清除巴勒斯坦人中的妥协分子，因此，自马德里中东和会开始后，哈马斯一直表示反对，它曾联合人阵（总指挥部）、民阵等10个巴勒斯坦组织，发表声明，要求巴解退出和谈，并指责阿拉法特对以色列妥协让步，并说和会签署的任何文件对巴勒斯坦人都没有约束力。哈马斯的高级军事指挥官甚至说：“不要相信阿拉法特，他求生的本能必然驱使他欺

骗你们。他要消灭哈马斯，因为他知道他不这么做，他将被美国人和以色列人换掉。”

哈马斯成立后就逐渐由一个政治、宗教组织演变成一个军事组织，它的组织体制与爱尔兰共和军颇为相似。它分为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前者的身份一般是公开的，他们主要从事管理清真寺、教育、医院等社会福利工作，并积极参加地方各商会、工会和学生会的选举，组织反对以色列占领者的游行、罢工活动。而军事组织的成员身份是隐蔽的，采取单线联系，各个战斗小组之间互不通气。他们主要从事对以色列的军事斗争，被占领土上的恐怖活动绝大多数系他们所为。哈马斯曾向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发出过号召，要他们杀死每一个以色列士兵和犹太人。这种说法与“恐怖公司”和人阵（总指挥部）等恐怖组织的作为毫无二致。因此，自哈马斯成立后，被占领土上的反以恐怖事件就愈演愈烈，不断上演一幕幕血淋淋的惨剧。

1992年12月7日凌晨，3名以色列士兵乘坐吉普车在加沙进行例行巡逻。当汽车行至加沙北部的拜特利格亚村时，迎面驶来一辆卡车，强烈的车灯刺得以色列士兵眼睛都睁不开。就在这时，一阵密集的子弹射向了毫无思想准备的以色列士兵，凶手一边开枪还一边高喊：“真主伟大！”几分钟后，卡车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就在同一时刻，在约旦河西岸的哈利勒镇，一名以色列士兵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不用说，这是哈马斯干的，对此，哈马斯也不想否认，事后发表了声明。哈马斯的恐怖行为引起了以色列警方的大搜捕。数百名以色列警察在被占领土上进行了详细搜查，但几天过去了，凶手还是不见踪影。

12月13日，29岁的以色列警官托勒达诺告别妻子，前去上班，但上班时间过了，他的同事却没有发现他。不久，警方接到电话，说托勒达诺已经落到哈马斯游击战士手里，如果以色列想保住他的性命，那最好在当天晚上9点前释放谢辛。消息传出，以色列政府十分紧张，开会讨论对策。会议决定，要尽力援救警官，但对于哈马斯提出的要求，以色列政府不予理睬。以色列采取这种对策是可以想象的，因为在以色列历史上，还没有因为恐怖分子要挟而妥协的先例，这一次当然也不会例外。因此，政府出动安全部队在加沙地带进行了大搜捕，同时警告哈马斯，不要伤害警官。政府在电视台的阿拉伯语节目中让正在服刑的谢辛露面。谢辛说，被绑架的警官应该获得释放，但是，绑架者的一些要求应该得到满足，因为被占领土上的流血事件本来就是以色列的占领引起的，以色列难道不应该对此负责？如果消除被占领土本身的外部环境，事情本身就可改变一切。

时光飞逝，绑架者规定的期限过了。大搜捕一无所获。以色列没有释放谢辛，哈马斯也没有释放托勒达诺警官。当天，哈马斯在约旦首都安曼发表一项声明，说愿与以色列政府谈判解决绑架问题，但以色列警方强调，现在托勒达诺警官生死未明，不可能坐下来与哈马斯谈判。当天晚上，以色列总理拉宾在电视上发表讲话，严厉谴责这起恐怖活动，指出绑架者的目的是破坏正在进行的中东和谈。他相信警官仍然活着，因此准备与哈马斯谈判。但是，拉宾的讲话没有得到回应。

15日下午，托勒达诺警官终于被发现了。一名阿拉伯妇女在耶路撒冷至杰里科的公路边发现了警官的尸体。验尸结果表明，警官在被发现前36小时遇害，也就是说，哈马斯一分钟也没有拖延，期限过后立即处死了警官。以色列的头头脑脑们面对这一结果，一个个面面相觑。心狠手辣，说一不二，

这历来是以色列的作风。现在，哈马斯把这一手也学了去，用在以色列身上，处置了托勒达诺，手段干净利落，颇有以色列人的风范。

1994年10月19日，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中心商业区车水马龙，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一辆公共汽车正驶在中心广场上，突然一声爆炸惊天动地，正在行驶的汽车爆炸了。霎时间，广场上空烟雾腾腾，血肉横飞。硝烟散去，人们只发现扭曲的汽车和一些残肢断臂，21名乘客死于非命，其中还有一名凶手。他随身携带炸弹混上公共汽车，并引爆了炸弹，自然被炸得粉碎。经调查，这是一名年轻的哈马斯成员，名叫纳扎尔·苏维。

这是十天内以色列所发生的三起恐怖主义暴行。十天前，哈马斯绑架了以军士兵魏克斯曼，以此向以色列政府要挟，要以色列释放200名被关押的阿拉伯人，结果以色列军警找到了人质关押的地点，并发起了强攻。恐怖分子自然被消灭了，但魏克斯曼也不幸身亡。同时，耶路撒冷市中心也发生了冲锋枪射击事件，导致两人死亡。接二连三的恐怖事件震动了以色列全国。特拉维夫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阿尔法说，以色列除了边界安全问题外，现在又产生了内部安全问题。“在以色列境内我们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凶残的恐怖活动。”温和的哈马斯分子也发出警告：“事情正在失去控制，好斗分子正跃跃欲试。”以色列国内群情激愤，纷纷要求政府采取报复措施。以色列在对付巴勒斯坦人的反抗方面历来不会心慈手软，也决不会吃半点亏，因此哈马斯的行动只能招致更严厉的镇压和报复。政府一方面关闭了西岸和加沙地带，每天进出以色列的6.5万名巴勒斯坦人失去了饭碗，同时加强反恐怖主义的措施。以色列情报人员渗入哈马斯的政治组织，摸清了大致情况，但是，由于哈马斯的军事小组飘忽不定，隐蔽性极强，能干的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和欣贝特暂时都束手无策，而且，对付这种自杀性的恐怖行动，全世界都没有找出好办法。以色列只有尽可能地以牙还牙。1995年4月2日，加沙城的一座居民楼突然爆炸，至少有8人被炸死，30人受伤，死难者中就有哈马斯武装组织伊萨·丁·卡西姆战斗小组的第二号人物卡迈勒·卡希尔，还有哈马斯的武器专家亚哈亚·阿以希。据说，他们当时正在装配炸弹，但他们绝不是装配炸弹失手死掉的，而是以色列警方假手一个巴勒斯坦小姑娘除掉的。以色列警方通过一个被俘的巴勒斯坦人，了解到卡希尔的住址，然后，把装着炸弹的手提箱交给了小女孩，让她转交卡希尔，就在此时，炸弹爆炸了。对以色列来说，卡希尔和阿以希是死有余辜，但那个巴勒斯坦小孩又何罪之有？

哈马斯的激进政策也与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和解政策相违背。阿拉法特认为，哈马斯的激进措施已经危及巴勒斯坦刚刚开始取得的与以色列的和解，最终会葬送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已经与以色列达成了协议，这个协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对巴以双方都有约束力，但是，哈马斯肆无忌惮的恐怖行为正在危及这个协议，对巴勒斯坦自治当局更是一种威胁。以色列国内本来就有一帮极端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反对政府与巴勒斯坦人和谈，希望建立大以色列。哈马斯的行为，正好为这帮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推翻协议、中止巴勒斯坦的自治提供了借口。因此，阿拉法特不能容忍这种行为。此外，哈马斯的行为也是给自治政府增加压力。在一些以色列人眼中，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是恐怖分子，他们并不区分阿拉法特和哈马斯，因此，他们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到阿拉法特的自治政府头上，向它施加压力。阿拉法特是左右为难。如果不约束哈马斯的行动，很明显以色列那

边不好交代；如果对哈马斯对武，兄弟阋墙，于巴勒斯坦解放事业也没有好处。阿拉法特曾说，巴勒斯坦内部的自相残杀，将使巴勒斯坦建国的梦想破灭，因此，自治政府建立后，阿拉法特曾试图与哈马斯搞好关系。但是，哈马斯的行动不仅没有收敛，恐怖活动反而越搞越大。有一位哈马斯分子透露：“那些头头们要杀死所有和阿拉法特合作的人，让形势恶化，迫使以色列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他们还要揭下阿拉法特的假面具，迫使他站在以色列一边来反对我们。”“我们要孤立他，削弱他，恐吓他。”哈马斯内部甚至有人建议像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那样袭击外国人，在巴勒斯坦营造一种恐怖气氛，最终使自治当局垮台。这种计谋，阿拉法特清楚，以色列政府也清楚。万般无奈之中，阿拉法特决定对哈马斯采取行动。

1995年4月11日，巴勒斯坦自治当局的警察部队开始对哈马斯采取行动，警察直接闯入居民家中抓人，并与抵抗者交火，一时间，整个自治地区枪声四起。近百名哈马斯运动成员走上街头，高呼“真主伟大”的口号，进行示威游行，抗议自治当局抓人。结果，有300余名哈马斯分子被捕，许多成员转入地下。据以色列电台广播，巴勒斯坦警方不仅抓到了大批激进的伊斯兰分子，还捣毁了哈马斯的许多办事机构，缴获了一些文件。针对自治当局的行动，哈马斯也发誓要进行报复。它明确表示，哈马斯不会交出自己手中的武器，抵抗战士手中的武器将用来自卫。

自治当局的行动引起各方关注。阿拉伯国家呼吁和解，巴勒斯坦人民也希望和平，因此，自治当局也与哈马斯进行了谈判，结果，自治当局同意哈马斯领导人配备武器，但这些武器必须经过登记。哈马斯与自治当局的关系这才有所缓和。

自以色列吞并了巴勒斯坦人的家园以来，巴勒斯坦人民就没有停止过抵抗。在建立巴勒斯坦人的家园这一点上，巴勒斯坦各方都有共同语言，但在斗争方式上，各方一直存在分歧。一些组织发动非正规战争，走上了邪路，沦为恐怖分子。今天，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已经在建立自己的家园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但是，在建立巴勒斯坦国的问题上，巴勒斯坦人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应该说，经过数十年的武装斗争，巴以双方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以色列内部出现了主张与巴勒斯坦人和平共处的“鸽派”，绝大多数犹太人已经认识到，他们与巴勒斯坦人的和平共处已经不可避免，消灭巴勒斯坦人，建立“大以色列”的主张不过是一场梦而已。巴勒斯坦人中也有人意识到，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以后不会再有国家不惜代价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武装斗争了。在这种情况下，巴勒斯坦人的斗争策略也应该有所调整。如果说，在巴以争端刚刚开始时，巴勒斯坦人的恐怖行动还可以说是一种斗争手段或是对以色列强占巴勒斯坦人家园的一种报复，因而还可以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与声援，那么，在国际局势出现重大转折、恐怖主义成为全球共同声讨的对象的今天，巴勒斯坦人再坚持恐怖手段，那就不合时宜了。是面对现实，采取合法斗争手段，与以色列和平共处，建立一个新的巴勒斯坦；还是坚持“消灭犹太人”的立场，最终走进死胡同，这是摆在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面前的问题。有没有勇气正视现实，有没有勇气否定自己？巴勒斯坦能否成为一块没有硝烟、没有恐怖的净土？谁也说不准。

尼罗河畔的硝烟
——穆斯林兄弟会与埃及的恐怖活动
“不可思议……”

10月6日在埃及历史上本来是一个极普通的日子，但是，自1973年以来，10月6日却成了埃及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一天就成了埃及国庆日。每年这一天，埃及政府总要在纳斯尔城的无名烈士墓旁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纪念1973年10月6日埃及对以色列的军事胜利。那一天，经过精心组织的埃及军队在他们的统帅萨达特和总参谋长沙兹利的指挥下，渡过了苏伊士运河，攻占了以色列固若金汤的巴列夫防线，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那场战争虽然埃及并没有取得最终胜利，但是，埃及人民通过这一战却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看到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希望。自此，10月6日成了埃及举国同庆的日子。

1981年是十月战争爆发八周年，按常规要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因此，这一天萨达特总统早早起床，开始梳妆打扮。作为那场战争的发起者和指挥者，作为埃及人民的最高统帅，今天他将在阅兵台上检阅他英勇的士兵。为了把自己最光辉的形象留给自己和人民，萨达特特地为自己准备了一套精心制作的元帅服。笔挺的军服，加上绿色的总统绶带，使他显得十分精神。对此，萨达特总统很是满意。他的夫人贾汉以往看着他这副样子，总要嘲讽他一番，但是，今天她没有这样做。作为共和国总统，他理应以最饱满的形象出现在国民面前。

检阅场充满了节日的气氛。为了迎接这次阅兵，政府已经拨出专款对纳斯尔城进行了装饰，国民警卫队司令马斯里将军提前一个多月就在为这次阅兵作准备。这几年，随着埃及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每年参加观礼的外国政要越来越多，因此，安全因素总是放在第一位的。总参谋部专门组织了一个班子，挑选受阅部队，确保每个受阅士兵都是对国家忠心耿耿的卫士。为防万一，士兵将持空枪参加检阅。

上午10点，阅兵场上已是人山人海，萨达特在副总统穆巴拉克、国防部长阿布·加扎勒等人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来到阅兵台。他的周围围坐着副总统、国防部长、总统私人顾问赛义德·马雷，另外还有阿曼亲王。他的身后是手持手枪的卫士及秘书哈菲德。他看到了爱资哈尔大学的校长和萨维姆主教，他们俩都坐得离他较远，于是示意他们坐得离他近一点，这样可以显示出他亲近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以缓和最近因大逮捕而造成的紧张气氛。就在9月3日，他下令国家安全部门紧急行动，对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分子进行大搜捕，搜捕的主要对象是知识界和宗教界人士，结果共拘捕了3000人。萨达特以为，如果人们见到爱资哈尔大学的校长和萨维姆主教与他一起坐在观礼台上，对改善他的形象将有好处。他还在如潮的人流中看到了自己的妻子贾汉和子女，原来贾汉说不出席这次阅兵庆典，但她还是来了。自己的妻子毕竟懂得自己的心意，知道自己希望她能在这个时刻来捧场。想到这里，他对妻子感激地笑了笑。

11点，阅兵式开始。一位穆斯林长老朗诵了几段《古兰经》的经文，接着，国防部长加扎勒也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最后，萨达特怀捧一个红色的花圈，到离阅兵台200米处的无名烈士墓志哀。没有他们的流血牺牲，就没有埃及的光荣。

11点25分，阅兵式正式开始。受阅队伍开始向主席台行进，播音员介绍着每支部队的情况。首先是骑兵方队，然后是军事院校的方队，接着是骑在驼峰上的“骆驼部队”。12点，天上响起了轰鸣声。人们知道，这是埃及空军的特技飞行部队过来了。

仰头望处，四架一组的“鬼怪”式飞机首先从头顶掠过，接着是十多架的“幻影”式战斗机，它们拖着五颜六色的烟柱，穿过长空。

观礼台上响起了阵阵欢呼声，许多人站了起来，连萨达特也不例外。精彩的飞行表演使得人们几乎忘记地面上的炮兵方队正在向前开进。

12点55分，炮兵方队终于通过观礼台。不料，一直表演顺利的阅兵行动这时却出现了一个差错。一个在炮兵方队前开道的摩托车手突然一个趔趄，在检阅台前摔倒了。许多观众哈哈大笑，但这位摩托车手倒也不慌，他爬起来后向主席台毕恭毕敬地行了一个军礼。这个小小的插曲让人们感到了一些乐趣。在军事训练日趋严格的今天，这种差错已经很难见到了。不过，在十月战争以前，类似的错误几乎是家常便饭，如果军事演习中不闹点笑话，那是不可想象的。今天这位摩托车手的错误正好为这次检阅增添了一些笑料。检阅已经进行了一个小时，坐在观礼台上的贵宾也累了，再加上气温升高，人们早就想开小差了。这个小插曲倒让人们觉得看下去还是有意思的，谁知道下面还要闹出什么笑话呢？

13点零4分，一辆炮车突然偏离行驶路线，停了下来。人们以为又出差错了，因此，对这个现象谁也没加重视。突然，炮车上跳下4个人，其中一个一下车就趴在地上：另一人像离弦之箭，奔向检阅台，人们以为他会像刚才那个摩托车手那样，向检阅台行礼，因此，大家也没在意他的举动。萨达特还特意站起身来，准备接受他的敬礼，并向他还礼。没料到，这个名叫伊斯兰布里的家伙一面高呼“光荣属于埃及”的口号，一面拧开了手榴弹的盖子，用力向检阅台扔了过去。几乎在同一时刻，留在车上的阿拔斯·穆罕默德站起身来，举枪向总统射击，第一颗子弹便击中了总统的颈动脉，后来证明，这是致命的一颗子弹。另外还有两人也向主席台作压制性的扫射。伊斯兰布里投出了3颗手榴弹，但除了第一枚爆炸以外，其余两颗都没有爆炸。一颗扔在国防部长加扎勒的脚下，另一颗砸在武装部队参谋长阿卜杜拉·哈菲茨的脸上。随后，伊斯兰布里便举枪向萨达特总统射击，34发子弹，弹无虚发，全部射进了萨达特的身体，而总统的私人秘书哈菲德还想扑向总统，准备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他，他用手抓起总统的座椅想挡住子弹，但一颗手榴弹正好在他身边爆炸，他的右手被炸断。同时正在进行现场实况转播的播音员作出的反应仅次于哈菲德。在枪响十余下后，人们从电台里听到了他的哽咽声：“叛徒，叛徒，同胞们，埃及……”此后，他就泣不成声了，人们只听到广播里传来了嘈杂的声音，再也听不到播音员的声音了。

当伊斯兰布里扔出第一颗手榴弹时，总统的卫队完全没有反应。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受阅部队会暗杀自己的总统，此前他们一直盯着来宾的小包，看着总统的后方，担心有人打黑枪。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种问题，因此，几秒钟内都没有反应。等他们终于反应过来，整个袭击事件也结束了，暗杀者扔出了所有的手榴弹，打光了枪膛里所有的子弹，然后，他们准备逃跑了。伊斯兰布里首先奔向炮车，并招呼他的同伴。就在这时，卫兵的枪响了，一个凶手当场被击倒在地，另外几名也受了伤。整个过程不足30秒。

萨达特倒下了，他根本没预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当第一颗手榴弹在检

阅台前爆炸时，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心爱的共和国军队内部竟然有人向他扔手榴弹，这太不可思议了！其他人听到爆炸声都吓得躲在椅子下面，而萨达特却毫无畏惧地站着，总理毛希丁等人想把他拉下来也办不到。他对站在旁边的副总统穆巴拉克说道：“不可思议……”这是他临终前最后一句话，人们再也没有听到他的声音。

军用直升机把萨达特送往医院抢救。总统夫人贾汉·萨达特已经看到了刚才血淋淋的一幕，她见到萨达特浑身是血，就知道没有指望了。因此，直升机没有立即前往医院，而是在中途停留。贾汉向她远在美国求学的儿子和美国朋友打电话，报告了这一不幸的消息。1点20分，直升机飞抵开罗医疗条件最好的迈阿迪医院，医生立即对总统进行了检查。医生发现，萨达特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正式的医疗报告是这样表述的：“阁下他处于完全昏迷的状况，脉搏、血压均不可测，听不到心音，两眼瞳孔扩散，对光反射消失，检查表明，眼底未出血，腱反射消失……”但尽管如此，医生还是作了最大可能的抢救。2点40分，医生正式宣布：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第二任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已经死亡。当医生把这一噩耗告诉贾汉时，她禁不住流下了泪水。她引述《古兰经》说：“只有真主是永存的。”

阅兵场上的暗杀事件发生时，向人们报告这一凶讯的播音员连同他的电台都被手榴弹炸毁了。25分钟后，电视台终于恢复正常工作。晚上8时，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向人们报告萨达特去世的消息。他说：“我们的为千百万人所热爱的领袖、战争与和平的英雄，在为崇高的原则而奋斗终生之后，现在去世了。罪恶的叛徒之手杀害了我们的领袖。虽然我们失去了他，但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所有埃及人民，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今天尽管非常悲痛，却站立起来公开宣布，我们将沿着他的道路——和平的道路，不偏不倚地继续下去，相信这是通向权利、正义和自由的道路。”埃及内阁宣布，将于10月10日为萨达特总统举行国葬。

10日，整个首都处于悲痛之中。萨达特的灵柩由直升飞机运到纳斯尔城，安置在一个炮车上。11点45分，灵车在6匹马的牵引下向无名烈士墓前进。萨达特生前曾对自己的夫人说过，希望死后安葬在西奈，再看看自己为之奋斗而收回的国土。但贾汉认为，丈夫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应该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不应该把他放在一个小地方，因此，决定违背他的意志，把他安葬在无名烈士墓旁，让他和自己的士兵在一起。

紧跟在灵车后面的是埃及的国家领导人和来自世界各国的80多位政要。他们中有埃及临时总统塔列布，总统候选人、副总统穆巴拉克，美国的三位前总统尼克松、卡特和福特也来了。引人注目的是，以色列总理贝京也出现在送葬的行列中，而与埃及同文同种的阿拉伯兄弟则没有一个前来埃及为萨达特送葬。

下午1点，在21响礼炮声中，萨达特的灵柩被放入一座用白色大理石砌成的陵墓里，他的遗体仰放在沙土上，面朝着麦加天房。他的儿子贾迈勒和其他一些人开始一问一答，在他的耳边念着坟坑考问的经文，好让他记住如何回答天使孟卡尔和纳吉尔的问题，以便顺利地进入天堂：

“你的主是谁？”

“安拉。”

“你的宗教是什么？”

“伊斯兰。”

“伊斯兰的先知是谁？”

“穆罕默德。”

穆巴拉克亲自监工，为先总统特制了一块墓碑。黑色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墓志铭：

以普慈特慈安拉之名，别认为那种刺杀是为安拉，他虽死犹生，与万能的主在一起。

忠实的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总统，战争与和平的英雄。

他为了和平而生，为了原则而在胜利日牺牲。

盖棺论定，这是埃及政府对先总统的评价，它反映了大多数埃及人民的心声，这种评价至今还能站得住脚。

但是，在埃及，也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在他们的眼中，萨达特不是真主的信徒，而是真主的敌人，是一个暴君，一个魔鬼。对这件谋杀行为，他们不认为是犯罪，而认为是代真主行事。伊斯兰布里说：“我是杀了他，但是我不是犯罪，我杀他是为了宗教，为了祖国。”另一个凶手阿拔斯·穆罕默德认为：“我完全相信这个人该杀，我祈求真主给我参加制服暴君的荣耀，让他付出犯罪的代价。”暗杀组织者伊斯兰布里在回答“你为什么决定杀害萨达特总统”的提问时是这样回答的。他说有三个原因决定他必须消灭萨达特，第一个原因是“国内实行的法律不符合伊斯兰教义和法律，穆斯林们因而受尽了苦难”；第二个原因是“萨达特同犹太人和解”；第三个原因是“拘押穆斯林学者，压迫和凌辱他们”。用通俗的话解释，萨达特该死的第一个原因是埃及国内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每况愈下；第二个原因是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与以色列单方面和解，签署戴维营协议；第三个原因则是，萨达特得罪了宗教界人士的利益，直接的原因则是在9月3日进行了大拘捕。三个原因结合在一起，萨达特非死不可。国际社会对他的评价同样是对立的。阿拉伯世界把这次谋杀看成是真主对叛教者的惩罚，因此，对萨达特的死普遍表现出冷漠甚至兴奋。在巴格达，伊拉克人民走上街头，载歌载舞；在利比亚，人们挥舞小旗表示祝贺，利比亚国家元首卡扎菲敦促埃及人民行动起来，推翻穆巴拉克政权，进军开罗，肢解萨达特的尸体，让他不得进入天堂；在德黑兰，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号召人民推翻“那位业已死去的暴君的继承者”，重建伊斯兰共和国；在黎巴嫩，流浪的巴勒斯坦人又唱又跳，甚至痛喝狂饮。一位巴解组织的领导人甚至说：“我们要握一下那只扣动扳机的手。”阿拉伯国家的首脑中，只有约旦国王侯赛因向埃及发来了唁电，而其他人们则不置一词。80多位外国政府派特使出席了萨达特的葬礼，许多国家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亲自出席，而他的阿拉伯兄弟则一个也没有露面，理由是：以色列总理贝京也出现在送葬的人群中，他们不想与贝京行进在一起。

战争与和平的英雄

安瓦尔·萨达特，1918年12月25日出生于埃及曼努菲亚省一个名叫迈特·阿布·库姆村的小村，家境贫寒，人口众多，因此，生活十分窘迫。当时的埃及名义上是一个独立国家，但实际上大权操在英国人手里。萨达特从小就目睹了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从而种下了民族主义的种子。成年后的萨达特立誓要为埃及民族的独立和复兴而奋斗。1936年，他中学毕业后进入了开罗军事学院，参加了埃及的民族主义组织“青年埃及党”，1942年，由于

从事反英活动，萨达特一度被开除军籍，被捕入狱。1944年他越狱逃跑。1950年他重新入伍。在军队里，他结识了纳赛尔，并成为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的核心成员。1952年，“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推翻了法鲁克封建王朝，萨达特代表组织发表了第一个声明。此后，他成为埃及共和国的一个重要领导人，先后任过《共和国报》的主编、国务部长、埃及伊斯兰大会主席、国际伊斯兰协会秘书长、国民议会副秘书长、议长，1969年，他成为纳赛尔的副手，出任副总统。萨达特的前半生虽然平步青云，官高爵显，但是他始终生活在纳赛尔的阴影之下。革命后的埃及是一个巨星迭出的时代，萨达特在这群星中只是一颗默默无闻的小星而已。

1970年形势突变。由于积劳成疾，再加上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惨败的打击，纳赛尔一病不起，萨达特成了共和国的总统，登上了共和国的权力顶峰。此时的萨达特政权并不稳固，他接手的也不是一个太平盛世。国内，革命成功几十年，但由于纳赛尔经济政策上的偏差，埃及的经济发展很慢，国民生活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国外，埃及面临着头号敌人以色列。埃及共和国已经与以色列打了两场战争，输得一场比一场惨，第三次中东战争竟然把埃及自己的西奈半岛也丢掉了，苏伊士运河被迫关闭，埃及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丧失。国民怨声载道，内部矛盾激化。但是战争并没有结束，埃及还在与以色列进行消耗战，这种战争，国破民贫的埃及是打不起的，但纳赛尔没有办法，还得硬着头皮打下去。萨达特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政权，可谓内外交困。

但是，萨达特并不是一个庸人。在纳赛尔时期他的声名不显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才干，而是因为他缺少施展才干的机会。现在，他自己成了共和国的领导人，捆在他身上的绳索已经不复存在，他可以大施拳脚，大干一场了。牵牛要牵牛鼻子。埃及的关键问题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几十年的战争，不仅消耗了大量的国民财富，而且丧失了许多建设国家的机会。这种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埃及必须与以色列实现和平。几十年的战争证明，以色列这个民族是打不垮的，阿拉伯国家不可能凭武力消灭以色列，因此，阿拉伯国家必须学会与以色列和平共处，共同生活在中东这块土地上。因此，实现和平是当务之急。

但是，和平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萨达特意识到埃及需要和平，但他的对手，还有他的同胞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以色列人尤其如此。以色列的军事将领阿里尔·沙龙说：“以色列现在已经是一个军事超级大国，欧洲哪一个国家的军队都不如我们。我们能在一个星期内征服从巴格达到喀土穆和阿尔及利亚这一广袤的地区。”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也说，以色列的日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这么好过，阿拉伯国家在军事上没有选择。以色列愿意与阿拉伯国家实现和平，但必须是按以色列的条件签订和约。连美国总统尼克松也说，美国能强迫以色列所作的事情是极为有限的，声称“在可以想象的解决方案中，埃及都不能达到它的最高要求，对此埃及不应存有任何幻想”。萨达特意识到，和平的时机没有成熟，现在还不是与对手谈和的时候。以色列人狂妄，不愿坐到谈判桌上来；阿拉伯人自卑，不敢与对手坐到一张谈判桌上来。因此，要实现和平，就必须消除以色列的狂妄姿态，消除埃及人的自卑心理。而这一切，只能通过军事胜利才能达到。从此，萨达特不再谈论和平了，他开始一心一意准备战争。他提出了战争的目的：打过苏伊士运河，在西奈半岛哪怕占有一英寸的土地，这就实现了战争目标。在他的领导下，埃及军方进行了改组，不同意他的战争方案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都被解除

职务。在新班子的领导下，埃及军方开始认真总结前几次战争的教训，摸索对付以色列人的方法。

1973年10月6日，战争爆发了。出其不意的埃及军队渡过了苏伊士运河，埃及的盟友叙利亚人也登上了戈兰高地。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了。经过精心训练的埃及小伙子并不弱于名扬四海的以色列士兵，埃及最高统帅部的指挥能力也不比以色列人差。埃及取得了最初的军事胜利，实现了萨达特的政治目标。从此，世人对埃及军队，包括它的统帅萨达特，开始刮目相看。连它的对手以色列国防军也不得不研究埃及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的经验。这场战争以色列损失了1万人，在一个人口仅300万的国家中，1万人不是一个小数目。以色列人的傲气消了许多，而埃及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恢复了许多。实现和平的时机成熟了。

1977年，萨达特作出了一个更大胆的举动：访问尚处于以色列控制下的耶路撒冷。如果说萨达特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是一次军事上的突然袭击的话，那么，他的耶路撒冷之行就是一场政治上和外交上的突然袭击，而且影响比前者更大。

自萨达特懂事起，他接受的教育就是，犹太人是埃及的敌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只能在战场上相见。自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失利之后，耶路撒冷就成了以色列的首都，虽然是不合法的，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但耶路撒冷确实掌握在犹太人手中，多少阿拉伯人做梦都想回到耶路撒冷，到阿克萨清真寺做礼拜，但没有一个能实现这种梦想。这次他能否打破常规，踏上耶路撒冷的土地，在阿克萨清真寺与阿拉伯兄弟一起做礼拜，与犹太人进行面对面的谈话呢？萨达特小心翼翼地向以色列发出了信号。1977年10月29日，他访问罗马尼亚。罗马尼亚虽然属于东方阵营，但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却是一个著名的国际争端仲裁人。1972年基辛格访问中国，就是齐奥塞斯库参与策划的。这一次，萨达特有没有基辛格的好运呢？萨达特向齐奥塞斯库提出了这个问题，双方谈起了以色列政府的领导人。萨达特问：以色列总理贝京是不是真心向往和平？齐奥塞斯库作了肯定的回答。萨达特又问：贝京是不是有能力实现和平进程，并制定任何可实现的协议？齐奥塞斯库的回答就更肯定了。贝京在以色列政界、军界素以铁腕著称，他是一只雄鹰，能够在以色列起到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起到的作用。如果连他这样一个铁腕人物也赞同与阿拉伯国家实现和平，并制定出任何协议，那么，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能责备他。齐奥塞斯库建议，是不是可以让他与贝京在布加勒斯特进行秘密会谈？萨达特拒绝了，因为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任何秘密迟早都会泄露出去，到时他将更为被动。齐氏又建议，可以举行有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参加的会议，贝京和萨达特都出席。萨达特说，这种会议要放在耶路撒冷举行才行。这个建议吓坏了齐奥塞斯库，因此没有成功。但是，亲自到耶路撒冷走一趟的想法在萨达特的脑海中已经成熟了。

1977年11月9日，埃及新一届人民议会开幕，萨达特在议院发表演说。此前，他已经派飞机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接到开罗，出席人民议会。在议会的讲台上，萨达特突然向议员们宣布：“我准备到地球的另一端去，到犹太教堂去。我要在以色列人的老家谈论我们的和平愿望。”他斩钉截铁地说：“只要能使我的孩子们、士兵或军官免于受伤害，不仅是免于杀戮，而且是免于受伤，即使是天涯海角我也要去。我现在说我愿去天涯海角。以色列如果得知我现在当着你们的面说我愿意去他们的国

家，到他们的国会去与他们谈判，他们一定会目瞪口呆。”人民议会的议员们给萨达特回报以热烈的掌声，连阿拉法特也不例外。但是，他们很快就明白，总统到底向他们讲了什么，于是，掌声消失了，议员们愣在那里，而阿拉法特，则头也不回走出议会大厅，连夜离开开罗。他对送行的人说：“萨达特给我蒙上了头巾。”大多数议员则认为，这是总统的戏谑之言，甚至连总理迈哈杜哈·萨里姆也持这种看法。总理向报刊检查机构发布命令，要求在刊登总统报告的前言或标题中不要突出这句话，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法赫米则要求从报告中删去这句话。报纸的清样传到萨达特那里，他十分生气，于是向报纸发了截然相反的指示：报刊必须全面突出报告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他愿意到天涯海角去与以色列人谈判的部分。萨达特在国内、在国外刮起了一场外交风暴。埃及的阿拉伯盟国大多作出了激烈的反应，他们甚至号召埃及人民起来推翻萨达特政权，叙利亚领导人阿萨德在苦口婆心劝说无效后甚至动了杀机。埃及国内也是一片混乱。外长法赫米辞职了，萨达特任命穆罕默德·利雅德为新外长。在访问叙利亚前，新外长的行李已经上了飞机，但新外长人却不见了。不得已，萨达特任命布特罗斯·加利，也就是后来的联合国秘书长，当临时外长，陪他一起出访耶路撒冷。

以色列虽然目瞪口呆，但它的反应是积极的。11月10日，贝京总理发表欢迎萨达特的讲话，并提醒记者说，他早就说过想与萨达特会谈，无论是在开罗还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当天晚上，国防部长埃泽尔·魏茨曼会见即将访问埃及的美国国会军事委员会成员，请他们向萨达特总统转达他的口信：欢迎萨达特总统访问耶路撒冷。翌日，贝京总理的讲话录音发表。贝京在热情洋溢的讲话中欢迎萨达特总统访问耶路撒冷，并说“为了同一个目标，我个人也愿意去贵国首都开罗。不要再打仗，要和平，真正的和平，永久的和平……”11月15日，以色列政府正式向萨达特总统发出了邀请。

1977年11月19日，星期六，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下午7点59分，萨达特总统的座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在机场上，以色列的政界名流向萨达特伸出了欢迎之手。他们中有以色列现任总理贝京、前任总理梅厄、前总参谋长伊扎克·拉宾、前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前外交部长阿巴·埃班，还有那率军越过苏伊士运河，使埃及军队腹背受敌的阿米尔·沙龙。面对着这个来自相互敌对几十年的国家的领袖，以色列政要百感交集。后来同样为阿以和平献身的伊扎克·拉宾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他当时的感受：“当我站在等待萨达特总统飞机降落的行列中时，我心中萦绕着一种奇特的感觉……当萨达特总统出现在舱门，走向舷梯的时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无比激动的时刻；这是一个永远铭刻在你记忆中的时刻；这是人们所要求的标志着新的时代的时刻。当以色列军乐队奏起两国国歌，尤其是当萨达特总统随着他的卫队检阅以色列三军仪仗队的时候，我仿佛进入了梦境。尽管我耳闻目睹了这一切，但发生在我周围的一切仍是十分难以相信的。”

不仅犹太人如此，埃及人同样如此。在埃及人心目中，犹太人一个个都是青面獠牙的怪兽，但是，这次他们随着电视摄像机的镜头，看清了与他们的总统在一起会谈的犹太人的面目。梅厄、拉宾、沙龙……这些名字以前只是在报纸上见过，从广播里听过，现在，他们一个个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有血有肉。心中的谜解开了。萨达特的形象在埃及国民的心目中高大起来。他们希望这颗明星能带领他们走向和平、富足的明天。现在，他们已经一只

抓住了和平，另外一只手就可以伸向富足了。新生活开始了。

更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后头。第二天，在卫士的层层保护下，萨达特和一群阿拉伯人在阿克萨清真寺做礼拜，在这以前，萨达特一般都是在西奈做礼拜。全世界都感到眼花缭乱，阿拉伯世界更是感到目瞪口呆。平素沉默寡言的沙特国王哈利德不能掩饰自己的愤怒说：“那一天，在进驻阿拉法特山时，我去触摸那高贵的天房石。我走进那庄严的天房。在真主的天房，我不习惯为一个人祈祷，而习惯于为许多人祈祷。那一天，我祈祷真主让萨达特的座机在耶路撒冷从天上掉下来，摔得粉身碎骨。这样可以不让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为此丢丑。我在天房内为一个穆斯林如此祈祷，我感到惊骇，但此人此举不容我有其他选择。”

做完礼拜后，萨达特出现在以色列国会大厅。面对鸦雀无声的议员们，萨达特开始演说：“今天，我以坚定的步伐来到你们这里，为的是我们大家——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穆斯林、基督徒、犹太教徒——一起来为建立和平而创造一种新的生活”，“你们愿意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的这个地区，那么，我十分真诚地告诉你们，我们欢迎你们生活在我们中间。”平实无华的语言感动了在场的以色列人，他们流泪了。这是一个阿拉伯人第一次用确切无误的语言承认他们生活在巴勒斯坦的权利，为了这一权利，他们牺牲了多少条生命，付出了多少代价！此中甘苦，只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才会懂得。对萨达特的演说，以色列议员报以热烈的掌声。实际上，普通犹太人比这些大人物更能理解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的意义。当萨达特走上耶路撒冷的街头，50万犹太人自发上街欢迎，热情的人群齐声高呼萨达特的名字，许多人泪流满面。《耶路撒冷邮报》印着这样的大字标题：欢迎您，萨达特总统。而当萨达特结束访问回到开罗时，百万民众迎立在街道两旁，欢迎他们的总统归来。这种盛况，即使是当年十月战争取得胜利，萨达特也没有见过。此情此景，使萨达特真切地理解到，他这一步真的走对了，人们需要和平。顺应民心的他，成了一个和平英雄。

但是，对萨达特耶路撒冷之行的反应远不是一致的。少数阿拉伯国家，如苏丹、摩洛哥和突尼斯，盛赞萨达特的访问是“一个勇敢的步骤”，“表现出一种真正的政治勇气”。而更大多数的国家，则给予无情的抨击。叙利亚全国进步阵线宣布11月19日是叙利亚国葬日；利比亚宣布，不再承认埃及现政府，并组织10万人抗议示威。一些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则把萨达特称为“卖国贼”、“叛徒”。利比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等国还成立一个“阿拉伯坚定与抵抗阵线”，宣布冻结与埃及的外交关系。阿拉伯国家联盟也把埃及开除出去。埃及赢得了以色列的好感，但失去了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外交上空前孤立。

但是，萨达特已经铁下心来要沿着既定的道路走下去。埃及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处于冰点，而埃及与以色列的关系却迅速地热了起来。双边谈判一直在进行，1978年9月5日，在美国总统卡特的斡旋下，贝京和萨达特来到美国的戴维营，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专心致志地谈判，企图解决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最后终于达成协议，这就是所谓《戴维营协议》。1979年3月，埃及和以色列签订双边条约，结束了两国之间存在30余年的战争状态，建立了外交关系，埃及也通过和平方式收回了失去13年之久的西奈半岛。萨达特的努力赢得了世人的称赞。为了表彰他对世界和平所作的贡献，诺贝尔和平奖评议委员会和国际记者协会于1978年12月

和 1979 年 11 月，分别授予他和贝京诺贝尔和平奖和哈马舍尔德奖。

在谋求和平的同时，萨达特也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旨在把埃及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在政治制度上，他放弃了纳赛尔时期的一党制而实行多党制，并于 1975 年释放了几千名纳赛尔时期未经审讯而被关押的政治犯。1978 年，他成立了民族民主党，其目标是实现埃及的繁荣和人民的富足，建立一个公正、团结、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政策方面，他也作了一系列调整，在坚持国有化的前提下，逐步放宽了对私有经济的限制；在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同时，也鼓励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保证不对它们实施监管、没收、国有化。为了加快国家经济建设的步伐，他决定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1971 年，埃及政府颁布了《阿拉伯和外资投资及自由区法》，为外商投资提供保

证，1974 年又颁布《关于外资和阿拉伯资本投资及自由区法》，为外资提供优惠条件，放宽对民族资本的限制。通过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举措，埃及 70 年代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发展中国家中名列前茅，人民的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萨达特在人民心中的威望空前提高。

但是，萨达特在引导埃及人民前进的同时，也犯了一些错误。在他执政后期，他变得过于固执，独断专行，听不进不同意见。领导集团内部一再进行清洗，建立了一个绝对效忠于自己的领导班子。在他的庇护下，他的亲友大肆挥霍，聚敛财富。埃及的国民经济是得到了发展，但社会贫富不均问题也更突出了，贫者愈贫，富者更富，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人民生活困难，社会矛盾激化。一直被压制的反对派也利用这个机会挑起事端，向政府施加压力。国内的反对派势力于 1980 年 2 月组成全国团结阵线，要求实行议会民主制，限制总统权力。而流亡国外的前总参谋长沙兹利则于同年 3 月成立了埃及民族阵线，提出要用合法或非法的手段推翻萨达特政权，废除埃以和约。而对此萨达特却没有放在心上。

以真主的名义

萨达特遇刺后，对于凶手的动机，外电众说纷纭。合众国际社分析说，暗杀者“可能属于利比亚等敌对方或被它们所利用”，因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曾公开宣布要以任何可能的方式除掉萨达特。美国国务卿黑格也有同感，因为利比亚电台在暗杀事件发生后的几分钟内就报道了此事，动作之快，异乎寻常。如果利比亚不是知情者，这种情况难以设想。法国的《费加罗报》则认为暗杀是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为中心的一帮人干的。而事发之后，贝鲁特竟同时有三个组织承认，是他们杀了萨达特，很明显不可能都是真的。

还是埃及军方提供了准确答案：暗杀主谋是哈力德·伊斯兰布里，现役军人，中尉，另外两人也是宗教狂热分子。10 月 24 日，已经上任的穆巴拉克总统向《金字塔报》记者发表谈话，说筹划暗杀阴谋的是埃及一个名叫“赎罪与迁徙”的秘密组织，其目标是要建立霍梅尼式的宗教共和国。

伊斯兰复兴运动在 80 年代进入高潮时期。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对现状不满，认为统治者的所作所为违背了伊斯兰教义，因而他们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回到伊斯兰去！用伊斯兰教法统治国家。这就是所谓原教旨主义。在埃及，这种极端宗教神秘主义一直存在，只不过以前由于民族矛盾相对尖锐，从而使宗教矛盾不太明显罢了。自 1952 年埃及七月革命后，纳赛尔的声望大

增，民族主义更是压倒一切，宗教势力被压制。广大的穆斯林对此极为不满。随着埃及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极端宗教势力也开始抬头。在埃及的城市和农村中，清真寺的影响越来越大，清真寺的谢赫成了民意的代言人。在一些地方，谢赫竟然成了政治领袖，他们所在的清真寺则成了说教的讲坛、反对派聚会的场所。他们的说教不仅涉及宗教复兴，而且涉及到很多政治问题，如民主和自由问题、政治腐败问题、与以色列单独议和问题、萨达特接待被伊朗人民驱逐的巴列维国王问题，等等。随着霍梅尼在伊朗的胜利，埃及的原教旨主义组织也深受鼓舞。1981年6月，埃及爆发了严重的教派冲突，有10人在冲突中死亡，45人受伤，警方在冲突中共收缴了43件武器，拘押了113名示威者。但是，矛盾并没有解决。穆斯林兄弟会的《呼声》杂志发行量节节上升，最高时竟然达到8万份。它经常刊登批评时弊的文章，攻击萨达特政府的内外政策，要求在埃及建立类似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那样的宗教政权。1981年8月，原教旨主义者在总统府门前的广场上举行有10万人参加的开斋节祈祷会，他们散发反对现政权的传单，提出宗教参与政治。这种情景使萨达特大力震怒。1981年9月3日，萨达特采取了断然措施，国家警察和安全部门紧急出动，拘捕了反政府人士。这里面固然有真正的政治反对派，但更多的是一些宗教极端分子。很多思想界、文化界、新闻界的名人，因为与萨达特政见不一，或者发表过与萨达特相反的意见，都被抓进了监狱。《呼声》、《伊斯兰文选》等7种反政府的报刊被查封，14个宗教组织被解散，4万个清真寺由国家接管，17所大学内设置了警察。更糟糕的是，萨达特还气急败坏，在公开场合与宗教界作对，批评宗教人士。他攻击谢赫·迈哈拉维，说“这个人现在像狗一样被扔进了监狱”，其理由仅仅是因为谢赫曾经攻击过萨达特和他的妻子贾汉奢侈。他攻击那些戴面纱的姑娘，说她们的衣服像活动的帐篷；他嘲讽那些留胡须的人，但忘记了真主的使者、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也是留胡须的。这些枝枝蔓蔓的攻击不会帮他解决任何问题，却在大众尤其是原教旨主义分子面前大失水准。大逮捕不可避免地牵连无辜，因此，他的对立面更多了。他还警告：如果再有人捣乱，他还要采取比这厉害十倍的行动。但是，这次行动不仅未能真正解决埃及面临的社会、宗教问题，反而使矛盾激化。大逮捕的第二天在阿巴斯的努尔清真寺就发生了7000人的大规模游行。示威群众在做完礼拜后，浩浩荡荡地走上街头，高呼“萨达特是真主的敌人”的口号。真主的敌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暗杀真主的敌人是替天行道，不仅没有罪，反而应该升入天堂。萨达特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了，但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一股暗流在悄悄地涌动着，他们在策划如何推翻萨达特政权，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鉴于政府控制得极端严厉，因此，这些非法组织行动十分诡秘，外人根本无法得知。其中就有一个“赎罪与迁徙”组织，它属于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

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已经活动了60余年，一直处于非法状态。萨达特早年就曾奉命打入这个组织，要把这个组织改造成政府的驯服工具。这个目标无疑没有达到。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萨达特成了这个组织追杀的对象。“赎罪与迁徙”组织的联络方法十分神秘。它采用了崭新的串形组织。整个组织像一棵大树的根，它由很多须组成，这些须就是“串”，而各个“串”又由很多信徒组成，这些信徒是组成这个集团的基本细胞。所有的“串”都通向一个根，“串”与“串”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切断一个“串”对于“根”来

说无足轻重。这样就保证了整个集团的安全。

“根”与“串”之间的联系一般在清真寺里进行。埃及的清真寺一般分成三种，第一种是德拉尔清真寺，这种清真寺是为世俗目的而修建的，在真正的穆斯林眼中，它们不是真正的清真寺，尽管富丽堂皇，但他们宁愿不到里面去做礼拜。第二种清真寺是无名清真寺，不知道是何人建造，真正的宗教信徒对这种清真寺并不热心，但也不摒弃它。真正得到信徒尊崇的清真寺是第三种，一种小而新的清真寺，它们大都拥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如光明、穆罕默德之光、伊斯兰的荣耀，等等。它们是由一些极端宗教教派修建，一般坐落在城市或农村的小巷，被信徒称为自强清真寺。真正的穆斯林一般光顾这种清真寺，而极端宗教组织也在这些清真寺里完成联络。联络时，你只见到他们的口中在喃喃自语，但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不知情的人以为，他们在念祷告词。就在这些喃喃自语中，“赎罪与迁徙”组织定下了暗杀萨达特的计划。他们曾经考虑过几种方案，一是在萨达特的家乡动手，但很多人认为，萨达特虽然经常光顾那个地方，但是那里戒备森严，很难下手，下手后也不能确保成功，更不能阻止萨达特乘直升飞机逃走，因此该方案被否决。第二个方案是用导弹袭击萨达特的直升飞机，这个方案因可靠性不高也被否决。第三个方案是在10月6日阅兵时动手，由组织的一个飞行员用导弹袭击阅兵台，消灭萨达特和政界要人，但这个主意也被否决。最后，他们决定只好等待时机，先放萨达特一马。

所有的密谋者都以为自己的密谋天衣无缝，殊不料隔墙有耳。哈力德·伊斯兰布里就在祷告时听到了他们的耳语。好在他也是这些清真寺的常客，虽然不是组织的核心人物，但无疑是组织的一个成员，因此，他们也没放在心上。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伊斯兰布里把他们的话记在心上，知道他们暂时遇到了困难，无法下手。但是，当时他也没想到由自己去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哈力德·伊斯兰布里1957年11月14日出生于上埃及的一个小村，在家排行第二，上面还有一个老大，叫穆罕默德。伊斯兰布里一家是拥护埃及革命的。他的父亲也是纳赛尔的崇拜者之一。1956年，埃及收回了苏伊士运河，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的声望大增，一时成为万众崇拜的对象。伊斯兰布里的父亲就给自己的儿子起了这个名字，它正好是纳赛尔一个儿子的名字，这是当时的时尚。高中毕业后，伊斯兰布里没有当成飞行员，而是进入陆军的炮兵部队。他经历过埃及发生的一切，对埃及国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也曾耳闻目睹，对现状他也表示不满，因而经常光顾清真寺。他的哥哥比他走得更远。他曾经在一个公开场合撕碎萨达特的画像，被警察拘捕过。9月3日的大逮捕他也没有漏网。当伊斯兰布里从母亲口中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不由得怒火中烧。他安慰母亲说：“任何暴君都有末日。”但这个时候他还未有暗杀的念头。他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报应迟早会降临到真主的敌人身上。

1981年9月23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对伊斯兰布里、对埃及，这都是一个命中注定无法逃避的日子。10点15分，伊斯兰布里奉命来到333炮兵团，团长阿卜杜·阿勒对他说，他将带领12辆炮车组成炮兵方队，参加10月6日的阅兵式。伊斯兰布里对这种形式不感兴趣，借口说要与亲人一起过古尔邦节，要求豁免。但团长拒绝了他的要求。无奈，伊斯兰布里只得说：“那就按真主的意志办吧！”一句话决定了他自己和萨达特的命运。

“按真主的意志办”是穆斯林的一句口头禅。一个真正的穆斯林，他的任何行为都可以被当作是真主意志的体现，是按真主的意志行事的。伊斯兰布里这句话，是说他参加阅兵式是真主的意志，还是说不参加阅兵式是真主的意志？没有人明白，反正事后他明白过来，他必须参加这个阅兵式。他本来不想参加这个仪式，但团长不肯准假，这是真主意志的体现。是真主要让他在阅兵式上杀掉总统，他不能违背真主的旨意。因此，说完这句话后，他的主意打定了，而团长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其他人，包括他所在的“串”组织的领导，也不知道他已经下决心替天行道，暗杀萨达特。后来在受审时，他说：“我曾对参加军事检阅犹豫不决，但在团长阿卜杜·阿勒的坚持下，我才同意了。我突然想起，这是真主的意愿，是真主给我执行这个神圣任务的机会。”

9月24日，他所在的部队进行了阅兵操练，他带着大炮和牵引车经过检阅的主席台。主席台上空空荡荡，但是，伊斯兰布里知道，阅兵式当天，这里不会是空空荡荡的，萨达特要出席这个阅兵式，他的左膀右臂要出席这个阅兵式，一批外国政要也要前来观礼。他仔细研究了检阅场地的地形、检阅路线、方队同主席台之间的距离，确定攻击是可行的。但是，他需要两个助手，光靠他一个人难度极大。检阅完毕后，他前往姐姐家吃饭，大家都发现，今天的伊斯兰布里陷入了沉思。

25日晚上7点，他会见了自己所在“串”组织的领导人阿卜杜·萨拉姆·法尔吉，两人密谈了一天。他对法尔吉说了自己的详细计划，法尔吉兴奋不已。当年他与伊斯兰布里结交，就看上了他是个现役军人，可能会有机会接近总统。没想到这一天真的来了，其他人都束手无策，而他却想到了主意，实在不简单。伊斯兰布里介绍完自己的计划后，问了法尔吉两个问题：你对这个计划有什么基本看法？能否帮助找两三个可靠的助手？法尔吉让他第二天听回音。第二天，两人在约定的时间，在法尔吉的一个朋友阿勒家中又见面了。法尔吉果然带来了两个人，他们是阿塔·埃依勒·哈密戴·拉海勒，27岁，是毕业于工业学院的预备役军官，后来不干了，转而搞自己的本行。第二个叫阿拔斯，是在民防学校负责火器训练的军士，连续七年获得军队投掷冠军。伊斯兰布里见到他们两人，立即开门见山他说：“有一个需要牺牲的任务，你们准备去吗？”没有任何人犹豫，虽然他们还不知道这个需要自己付出生命代价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于是，伊斯兰布里向他们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方案。计划极为简单。他将率12门大炮组成一个方队参加阅兵式，他的大炮将由炮兵班的牵引车牵引，而其他两个人将坐上他的牵引车，当牵引车行驶到离主席台最近处的时候，他们应该向萨达特开火。他说，检阅方阵与主席台之间的距离是30米，他们可以在牵引车上开火，其他人则在火力掩护下向主席台冲去，在最近的距离内完成任务。讲完他的行动计划后，四个人一起发誓要保守机密，然后又用了一个小时诵读《古兰经》，以便从真主身上吸取力量和智慧。伊斯兰布里要求法尔吉提供一些武器，包括四枚手榴弹、一支手枪以及足够的弹药。以往的经验表明，检阅者尽管会带武器，但都是空枪，不允许带子弹。27日，法尔吉从组织那里搞到了伊斯兰布里所需要的子弹。

到目前为止，暗杀密谋的知情者还仅限于法尔吉。法尔吉所在的“串”组织的军事负责人泽姆尔中校还不知情。26日，法尔吉通过信使向泽姆尔通报了伊斯兰布里的计划，征求他的意见。没想到，这个计划却遭到泽姆尔的坚决反对。他认为目前组织的力量还不足以夺取整个国家政权，实施伊斯

兰化，即使刺死萨达特也无济于事，因此，他认为最好再等一段时间，等组织做好接收整个国家的各项准备工作后再开始行动。但法尔吉表示反对。他相信伊斯兰布里能实施自己的计划，杀死萨达特。此外，他还认为，只要杀死萨达特，埃及的面貌就会焕然一新，组织有可能夺取政权。再说，伊斯兰布里行动时可不是针对萨达特一人的，120发子弹可以消灭主席台上的大部分人，萨达特的整个班子将会消失，广大群众将从国家政权的恐惧中摆脱出来，而这就是不久前伊朗发生的事。他指责泽姆尔犹豫不决，胆小怕事。他通过使者转告泽姆尔，说：“我注意到你的作用导致阻止其他人发挥作用。无论如何，我将执行我的计划。”反对无效，泽姆尔无可奈何，只得收回反对意见，这样，伊斯兰布里的计划得到批准，他可以勇往直前去执行他既定的计划了。

接下来是摆脱一切有可能阻碍计划实施的人。首先是开牵引车的司机，他不是组织的成员，伊斯兰布里认为，应该让他不能发挥作用。首先想到的主意是给他吃一些安眠药，让他看上去生病了，这样，伊斯兰布里本人就可以开车。但是，买回来的安眠药显示，这一招不一定能起作用，阿拔斯吃了一些安眠药，试服后效果不佳，此举只得放弃。最后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伊斯兰布里决定铤而走险。他说他将坐在司机的旁边，用暴力迫使他停车。后来证明这个冒险是成功的。当牵引车靠近主席台时，伊斯兰布里突然亮出手枪，喝令司机停车。司机从命，用力制动，结果汽车偏出跑道。在受审时，审讯人员问道：“司机是不是组织里的人？”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他为什么会服从命令停车？”伊斯兰布里回答说：“因为他害怕了。”审讯人员又问：“他为什么害怕？”伊斯兰布里回答说：“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胆小鬼。”

到目前为止，阿勒还没有被要求参加此次行动，但伊斯兰布里等人的密谋没有瞒着他，因此，大家都认为，他一定会参加这次行动。事实也正是如此，阿勒已经用上了心，知道了自己到时应该怎么办。这样，暗杀就由他们四人去完成。

按规定，一辆炮车上除掉司机和伊斯兰布里外，还有3名士兵。伊斯兰布里设法让两个士兵生了病，第三个人也被他派往其他地方执行公务，这样，他就为阿勒、拉海勒和阿拔斯腾出了位置。他告诉炮连的其他人，外连将有3个士兵参加他们这台车，而且这3个人可能来自军事情报部，是来负责检阅安全的。

10月4日，伊斯兰布里最后一次去了开罗姐姐家，在姐姐家扔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请求你们宽恕我，我没有犯罪。我一点没有想到自己，也不要提升和奖励。如果因为我，你们中有人受到伤害，我希望你们能宽恕我。”一股神圣的宗教热情驱使他走向死亡。后来他被关在狱中，他母亲前去探望。她问他有没有想过，自己的所作所为会给家人带来灾难。他回答说，他只想到了真主，其他的事情，他就顾不得了。

10月4日，阿拔斯等3人在家中念了一天的《古兰经》。天黑时分，伊斯兰布里来了，他们一起换上旧军装，乘汽车进入检阅集合区。奇怪的是，卫兵没有要求他们交进门许可证。第二天一早，伊斯兰布里的勤务兵发现自己的长官没有吃早饭，而是把自己的饭让给了那3位刚来的士兵，想到长官曾经说过，这3个人来自军事情报部，是负责检阅安全的。勤务兵没有怀疑，只是觉得长官过于讨好他们了。吃完饭后，一位高级军官前来传达命令：一

切小型武器均收入专门的帐篷中，随后，另外一名共和国卫队的高级军官前来传达命令：拆除所有武器的击发装置，统统集中到连队指挥官那里。伊斯兰布里忠实地执行了命令，让两名“新兵”去完成这个任务。这种做法并不奇怪，因为秘密警察对国家安全负有更大的责任，让他们两人去完成这个任务，可以证明上面对他们绝对放心。

6日，检阅的日子到了。伊斯兰布里清晨3点就起来了，向战士们发布命令，上午6点开始行动。在此之前，他去了存放武器的帐篷，取了4挺机枪，放在装枪的口袋里。长官进入武器库这也不会引起任何人怀疑。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

6点前，整个连队已经做好准备，伊斯兰布里下一步要把手榴弹放在汽车的座位下。他命令司机到餐厅去给他买三明治，趁此机会，他把手榴弹放在座位底下。这样，一切准备工作就完结了。

在9月3日的大逮捕后，埃及安全机关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一切已经万事大吉了。9月23日，内政部长还发表声明，说安全当局已经掌握了兄弟会的所有机密。他引证穆斯林兄弟会一名发言人的话说，如果认为安全当局只了解兄弟会的旧成员，而对新成员一无所知的話，那他们就是犯了最大的错误。他说：“我们确实了解他们所有的人，老的和新的，我们很好地监视着他们，包括他们在1970年之后的组织发展。”他太自信了，而埃及将为此付出代价。

当暗杀刚开始的时候，谁也不敢肯定这到底是一场有限的暗杀行动，还是一场推翻现政府的政变阴谋的一部分。因此暗杀一发生，埃及政府就采取了必要的安全措施，其中包括切断电力供应，进行戒严。事实上，泽姆尔等人虽然反对伊斯兰布里轻举妄动，但暗杀成功后，他们还是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他们认为“暴君之死”的消息会引起群众的反抗，埃及将会爆发一场革命，因此，他们准备用武力打开一条通往省政府的血路，结果与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有100人被警察打死。法尔吉还在广播电台发表声明，要求武装部队以宗教的名义举行革命，如果他们不支持伊斯兰革命，至少也要保持中立。但他失望了。这场叛乱没有得到人们的响应，两天内就被平息了，泽姆尔也落入法网。

在主要的阴谋策划者落入法网后，情报局75分队搜查了他们的住处，结果在他们的家中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家家都有一个指南针，据说是为了在礼拜时能面向克尔白神庙。家家都保存着一些谢赫的录音磁带，家家都有军装。除此之外，他们还找到了一个共同的东西：被撕碎的贝京画像。所有的被捕者都对萨达特恨之人骨，认为他的残酷统治已经无法忍耐。审讯者问法尔吉：为什么不再等一段时间，给萨达特总统一点时间？他回答说：“圣战是不容拖延的事业，萨达特带给人们的暴虐超过了人们所能忍受的程度，他侵犯了真主的权利。”“伊斯兰运动从1952年革命以来在埃及一直受压迫，信徒们等了很久，任何忍耐都是有限度的。”在军队中发展成员有困难，毕竟军队是政府控制最严的组织之一，再说，军队和警察的力量也是有限的，伊朗革命的经验证明，只要群众发动起来，军队和警察都是不堪一击的。

埃及警方对罪犯进行了大审判，直接参与暗杀的伊斯兰布里等人被判处死刑；另外，穆斯林兄弟会也有300人被判处死刑，武装部队也进行了清洗，大约有100人被开除出武装部队。但是，埃及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伊斯兰运动还在悄悄复兴，穆斯林兄弟会还在活动，不过，它的攻击目标已经不

限于那些赞同与以色列议和的人们，而是以整个埃及政权为敌了。他们利用广大中下层群众对现状的不满，先后成立了各种非法组织，埃及境内的极端势力急剧膨胀。他们在偏僻的乡村和小镇，挑动教派冲突，暗杀政府官员和知名人士，仅 1992 年他们就挑起冲突 17 起，制造暗杀事件几十例，埃及著名作家福达也死于他们之手。1992 年 10 月，他们又改变策略，认为小敲小打影响不大，难以对政府产生大的威胁，因此，他们把目标盯住了埃及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旅游业。从 10 月开始，埃及接连发生了几起袭击外国游客的暴力事件。只要是到埃及旅游的人员，不管他来自哪个国家，恐怖分子都一样对待。结果，一些国家纷纷告诫本国公民，不要到埃及旅行，否则，后果自负。恐怖分子的行动导致埃及的旅游业急剧衰退，几百艘游轮因缺少游客而不得不在岸上停泊，直接经济损失达 7 亿美元。1993 年 2 月 26 日，恐怖分子在开罗一家咖啡馆制造了一起爆炸事件，七名外国游客当场被炸死，同时有十几名本国人遭难。恐怖分子还扬言，要对外国投资项目开战，一时间人心惶惶。

针对恐怖分子的暴力行径，埃及政府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92 年 7 月，埃及国会通过了《反恐怖法》，宣布对恐怖分子动用死刑。在内务部门的统一指挥下，国家安全力量从南至北，开展了有计划的搜捕行动，共抓获了千余名嫌疑犯，收缴大量枪支弹药。穆巴拉克总统还宣布，以后恐怖活动将交由军事法庭审判。原先由私人管理的清真寺也收归国有。1993 年 3 月 9 日，军事法庭首次对 49 名穆斯林极端分子进行了审判，随后几天，保安部队又在开罗、吉萨、格勒尤比亚等城市向恐怖分子的老巢发起了猛烈的进攻，200 余名恐怖分子被捕，另有 10 余名被击毙。政府的严厉打击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由于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已经深入到埃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加上国际上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埃及政府打击穆斯林兄弟会的行动是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的，在反恐怖斗争的道路上，埃及政府依然是征程漫漫，任重而道远，唯有消除埃及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才能清除穆斯林兄弟会这种极端宗教势力滋生的土壤，也只有如此，埃及政府的反恐怖斗争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真主的愤怒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的恐怖活动 喋血安纳巴

1992年6月29日，星期一。阿尔及利亚东部港口城市安纳巴新落成的文化中心门口旌旗飞舞，观者如潮。今天是该文化中心举行落成典礼的日子，阿尔及利亚最高国务委员会主席布迪亚夫将出席典礼，亲自为其剪彩。因此，一大早，安纳巴的各个主要街口已经站满警察，文化中心门口更是戒备森严。这一段时间以来，阿尔及利亚国内气氛紧张，布迪亚夫刚刚上任，对伊斯兰拯救阵线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引起了众怒。这些情况引起了安全部门的注意，因此，知道布迪亚夫要出席这样一个仪式，安全部门不能不慎之又慎。

按理说，今天的仪式并不是布迪亚夫主席非出席不可。安纳巴在首都阿尔及尔东部450公里，是一个港口工业城市，但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城市，而且，典礼又是为了一个文化中心，布迪亚夫主席更是不值得亲自为它剪彩。如果阿尔及利亚每一个类似的场合都找到布迪亚夫，那么布迪亚夫也要忙死了。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布迪亚夫答应了安纳巴市的请求。这让安全部门颇为纳闷。

实际上，布迪亚夫并不是一个喜欢在公共场合出头露面的人物。只是，他革命一辈子，在国外亡命几十年，半年前才回到朝思暮想的祖国，且国内的局势如此紧张，他采取的一些紧急措施又不为人所理解，因此，他很想借这个机会向他的人民讲讲自己的心里话，阐述自己的治国方略。这才是他答应前往安纳巴为一个小小的文化中心剪彩的本意。

10点钟，仪式正式开始。先是主持人致词，主持人讲话完毕，请布迪亚夫发表讲话。布迪亚夫在人们的簇拥下走上主席台，开始向听众，也是向全国国民发表讲话。电视台已经作好实况转播的准备，现在，摄像机镜头就对准了他。

对着摄像机镜头，布迪亚夫侃侃而谈。他从阿尔及利亚面临的严重的经济危机，讲到近年来风起云涌的伊斯兰拯救阵线的活动情况，对自己上台后对伊斯兰拯救阵线实施的严厉镇压措施进行了一番辩解。他之所以在漂泊几十年后回到阿尔及利亚，对伊斯兰拯救阵线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并不是想建立自己的个人统治。对权力，他本身是十分淡泊的，他的经历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动情他说：“我们必须明白人生是短暂的，我们何苦紧紧抓住权力不放呢？”因此，他以古稀之年回到祖国执政，对伊斯兰拯救阵线采取如此严厉的镇压措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布迪亚夫此言也许是向伊斯兰拯救阵线解释他的苦衷，也许是劝说他们悬崖勒马，放弃夺取政权的尝试，积极投身到祖国建设上来。他说：“其他民族已凭借科学技术超越我们，伊斯兰……”

布迪亚夫的话音未落，主席台左边响起一声爆炸，突如其来的爆炸打断了布迪亚夫的演讲。他惊愕地转过头去，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布迪亚夫的警卫也把注意力转到主席台左边，并向那边急速奔去。他们全忘记了自己的责任，而只想去弄清爆炸的原因。爆炸的硝烟还没有散尽，主席台上又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未等布迪亚夫回过神来，一个身穿防暴警察制服、手执冲锋枪的男子冲了过来，对准布迪亚夫的后背就是一梭子，子弹像急流一样泻在布迪亚夫的头上和背上，他倒在血泊之中，鲜血不断向外涌，身后主席

台上的国旗也倒下了，正好覆盖在布迪亚夫身上。布迪亚夫的警卫人员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刚才的爆炸是声东击西，他们全部上当了。他们当即举枪向凶手射击，但是已经迟了。凶手被当场击毙，但布迪亚夫也永远倒下去了。会场一片混乱，惊慌失措的人们四处奔逃，引起了更大的混乱。谁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救护车从大街上呼啸而过，直升机在天空盘旋。这场混乱，导致了几百人受伤。

布迪亚夫被送进了医院，但医生已无回天之力。12时，阿尔及利亚国家电视台正式宣布，最高国务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布迪亚夫在安纳巴遇刺身亡。消息传出，举世震惊。各国纷纷发表声明，谴责这一恐怖主义行动。

与往常的恐怖行动不同，这一次没有一个人或组织宣布自己对布迪亚夫之死负责，这就为阿尔及利亚警方留下了一道难题：是谁杀死了布迪亚夫？他的动机是什么？两家阿尔及利亚报纸不约而同地在第二天以通栏大标题向人们提出了这个问题：谁是受益者？一个人干任何事都有动机，何况刺杀国家领导人这种惊天动地的事。布迪亚夫死了，对谁有好处？如果把这个问题弄清楚，那么，离揭出谜底的时间也就不远了。

凶手已经当场毙命，人们无法弄清他行刺的动机。因此，人们只得作出各种猜测。阿尔及利亚有影响的《民族报》认为，暗杀是一个由13人组成的“进攻者”小组实施的。他们为了除掉布迪亚夫，已经策划了多种阴谋，如在布迪亚夫的饮食中下毒，在某钢铁公司的讲台上安放炸弹，因为布迪亚夫在剪彩完毕后将去那儿视察。因此，凶手必欲除掉布迪亚夫而后快，布迪亚夫必死无疑。7月25日，阿尔及利亚官方的调查委员会发表报告：刺客系阿尔及利亚反间谍机构的成员，也是布迪亚夫贴身卫队的成员，过去曾是伊斯兰拯救阵线领导人阿里·杰迪的学生和信徒。这样，人们把怀疑的视线纷纷转到伊斯兰拯救阵线。在此之前，警方已经拘留了一个名叫布马阿拉菲的宗教狂热分子。12月9日，阿尔及利亚官方的调查报告才认定，布马阿拉菲是本案的“事实主犯”，他是“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因此，刺杀布迪亚夫明显非个人所为，而是一次协同作案。那么，到底是谁在后面操纵着凶手呢？布迪亚夫在演讲中曾讲到，自从独立以来，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之间缺乏相互信任，那身处高位的人也许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话。这身处高位的人，指的是谁呢？气绝身亡的布迪亚夫再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了。他把这些问题留给了警方，他们将为此伤透脑筋。许多前来参加布迪亚夫葬礼的人指出，他们怀疑谋杀事件与在前政权时期获得种种利益的“黑手党”有关。布迪亚夫的亲属则不同意政府把责任归于某个狂热分子身上的作法，认为它是一起幕后操纵和事先策划的犯罪阴谋。这与政府的立场其实差距并不大。政府怀疑伊斯兰拯救阵线策划了暗杀阴谋，而根据布迪亚夫家属的说法，伊斯兰拯救阵线也脱不了干系。

那个称为“伊斯兰拯救阵线”的组织到底是什么机构？它为什么要策划暗杀布迪亚夫？这还得从80年代末期阿尔及利亚局势的骤变说起。

阿尔及利亚以前曾是法国的殖民地。战后，阿尔及利亚人民开始了反抗法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经过8年苦战，阿尔及利亚人民终于赢得了独立。1963年，阿尔及利亚的第一部宪法规定，阿尔及利亚是一个民主人民共和国，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1976年通过的第二部宪法进一步规定阿尔及利亚是社会主义国家，其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但是，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绝对不是同一个概念。阿尔及利亚是

一个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在阿尔及利亚国内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影响极大。因此，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也没有脱离阿尔及利亚的“国情”，它走的是阿拉伯社会主义道路，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但在外形上，在许多具体措施上，它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实践又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凭着丰富的石油资源，阿尔及利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极快，建立了石油化工、冶金、机械等工业，工业生产总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半数以上。阿尔及利亚的农业长期不能自给，每年需要大量进口。然而，随着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下跌，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出现了危机。到1988年，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出现了负增长，政府实施了一系列调控措施，但收效不大。经济不景气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过去，由于人民生活富足，对执政党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腐败和官僚主义还不怎么介意。但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执政党的腐败就日益突出了，下层人民对此非常不满。1988年，阿尔及利亚出现全国动乱，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无业青年滋事破坏，损失达2亿美元。下层穆斯林为了摆脱困境，只得求助于《古兰经》，希望从宗教中寻找出路。而阿尔及利亚的宗教势力本来就十分强大，清真寺遍地都是。每逢星期五，清真寺里人头攒动。一直在地下活动的伊斯兰复兴组织乘机而动，他们以《古兰经》为武器，建立秘密网络，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俗话说，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句话用来形容80年代末阿尔及利亚的局势真是再贴切不过了。阿尔及利亚政府本来已经焦头烂额了，这个时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的多党制浪潮又袭向非洲，阿尔及利亚也不例外。在国内外势力的压力下，沙德利总统被迫开放党禁。1989年2月，阿尔及利亚修改宪法，²

2月23日经全民公决，新宪法获得通过。新宪法取消了原宪法中与社会主义有关的内容，对一党制和执政的民族解放阵线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未置一辞，在公民权利一章中增加政治结社和罢工的权利，模仿西方的三权分立设立了宪法委员会，从而拉开了向多党制过渡的序幕。一时间，阿尔及利亚风云突变，各种政党如雨后春笋涌现出来，其中最著名的当数伊斯兰拯救阵线。

1989年3月10日，在新宪法通过半个月后，伊斯兰拯救阵线应运而生。它没有提出任何治国的具体主张，而用一句鲜明的口号代替了它的全部纲领。那就是：不要宪法，不要法律，《古兰经》主宰一切。这句口号很容易把它与一句十年前流行的口号联系起来，那就是：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那是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在发动宗教革命时提出的口号，在伊斯兰世界影响极大。事实上，由于阿尔及利亚本来就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是国教，宗教在阿尔及利亚的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可想而知。只不过过去民阵执政，推行非洲社会主义，从某种程度上压制了伊斯兰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现在党禁既开，伊斯兰教在阿尔及利亚的影响就立即显现出来。伊斯兰拯救阵线以清真寺为据点，大肆抨击执政的民阵贪赃在法、营私舞弊及严重的官僚主义，要求以《古兰经》为武器，建立一个公正、清廉的伊斯兰国家。这个口号在下层的穆斯林中颇受欢迎。在民阵执政期间，尽管阿尔及利亚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但阿尔及利亚下层的穆斯林似乎并没有因此得到多少好处。生活依然贫穷，贫富差距依然很大，穆斯林的境遇并没有改变，而执政的官僚却发了大财。因此，下层的穆斯林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公正、清廉的社会。伊斯兰拯救阵线正好说中了他们的心事。因此，伊斯兰拯救阵线

在阿尔及利亚受到普遍欢迎，但当时的民阵及西方国家都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只看到，“民主化”在阿尔及利亚已经结出硕果，并为此欢欣鼓舞。

1990年6月，阿尔及利亚举行地方市镇议会选举。在全国1541个市镇中，伊斯兰拯救阵线独得853个席位，占总数的55%；在48个省的人民大会选举中，伊斯兰拯救阵线再尝胜果，32个省的议席成为它的囊中之物。执政的民阵坐不住了，它看到了伊斯兰拯救阵线咄咄逼人的挑战。

到目前为止，伊斯兰拯救阵线的举动还很温和，没有过激的措施，它指望通过自上而下的选举把执政的民阵赶下台去，从而夺取国家政权。但是，在市镇议会选举获胜后，伊斯兰拯救阵线的领导人就迫不及待地要立即夺取政权，市镇选举已经使他们看到了民心的向背，知道了自己已经胜利在望。于是，伊斯兰拯救阵线发动了一连串的示威游行，要求沙德利总统提前下台，提前进行大选，从而在阿尔及利亚引起严重的骚乱。无奈之中，沙德利总统出动了军队，轰走了闹事者，并在全国实施戒严，从而勉强控制了局势。

12月26日，阿尔及利亚举行了独立以来的首次多党议会选举。四天后国家宪法委员会公布了大选结果，在总共430个席位中，231个席位已经有了得主。其中，执政的民阵仅得15席，社会主义阵线得25席，无党派独立人士得到3席，其余悉数成了伊斯兰拯救阵线的囊中之物。虽说还有199个席位必须等到第二轮投票后才能确定，但看势头，伊斯兰拯救阵线压倒性多数已成定局，这一结果出乎国内外舆论的预料之外。谁也没想到伊斯兰拯救阵线会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也没有人想到民阵的失败会这么惨。沙德利面对结果，真是傻了眼。

伊斯兰拯救阵线在欢呼自己的“辉煌胜利”，希望能尽快上台执政，建立一个伊斯兰政权，其他国家对此则忧心忡忡。法国人惊呼：伊斯兰拯救阵线的胜利将使阿尔及利亚面临倒退几百年的危险，在伊斯兰旗帜下的阿尔及利亚对法国、对欧洲是一个严重威胁。法国如此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法国在非洲有着广泛的利益，如果这些非洲国家都步阿尔及利亚后尘，那么，法国在非洲的影响将荡然无存，这是爱丽舍宫不愿看到的，因此，它称伊斯兰拯救阵线实质上是“一个反对西方的极端主义组织”，对伊斯兰拯救阵线持强硬态度。但是，现在大选实际上已经揭晓，伊斯兰拯救阵线在第二轮投票中只要再得28席，就可以上台执政了。木已成舟，法国人也无可奈何。

正当伊斯兰拯救阵线摩拳擦掌、准备上台执政的时候。1月11日，离第二轮投票还有几天，沙德利总统突然宣布辞职。国家宪法委员会立即接受了他的辞职，军队开进了首都，控制了主要街道和总统府、政府大楼等要害部门。第二天，全国最高安全委员会宣布，取消原定于16日进行的第二轮投票，1月14日，由五人组成的最高国务委员会接替总统的职权，负责处理日常政务。长期流亡在外的布迪亚夫成为国务委员会主席。接二连三的变故让世界看花了眼，也给跃跃欲试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当头一棒。阿尔及利亚国内反对伊斯兰拯救阵线执政的势力则松了一口气。阿尔及利亚高级官员私下里承认，沙德利总统突然辞职是为了对付伊斯兰拯救阵线的，这是摆脱伊斯兰拯救阵线执政的代价最小的方法。沙德利总统也说：“请把我的辞职看作是我为国家稳定作出的牺牲。”只有伊斯兰拯救阵线发表声明说，它怀疑国务委员会存在的合法性，并声明国务委员会无权取消大选，发布决议。伊斯兰拯救阵线的主席哈沙尼警告当局不要阻挡人民的选举，但这一切无疑已是马后炮，大选取消已经成了定局，伊斯兰拯救阵线上台失去了希望。

阿尔及利亚政局为何出现如此重大的转折？伊斯兰拯救阵线到手的胜利为什么化为泡影？原来，阿尔及利亚虽然也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但它与其他伊斯兰国家还是有很多不同。阿尔及利亚虽然从法国赢得了独立，但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大量投资，阿尔及利亚在法国的侨民达 100 多万，在其他西欧国家的侨民也达 300 多万，这些侨民深受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影响，对阿尔及利亚本国的人民也有很大的影响。伊斯兰拯救阵线在第一轮选举中获胜，那并不是因为阿尔及利亚人民普遍赞同伊斯兰拯救阵线的观点，准备“回到《古兰经》”去，用《古兰经》来治理国家，而是因为人民对民阵长期执政、治国无能且贪赃在法的厌恶，想换一套班子上台看看。民阵下台是他们希望的，但伊斯兰拯救阵线上台却是违背他们意愿的，而且，如果要他们在民阵和伊斯兰拯救阵线中选一个，他们恐怕宁愿选择民阵而不愿选择伊斯兰拯救阵线。因此，第一轮投票揭晓，阿尔及利亚国内的局势没有平静，反而日见恶化了。阿尔及利亚总工会首先建立“拯救阿尔及利亚委员会”，其他各界人士也纷纷行动起来，呼吁选民阻止伊斯兰拯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军方也不希望伊斯兰拯救阵线上台，伊朗军队在伊斯兰革命后的处境他们看得很清楚，因此，不想重蹈覆辙。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伊斯兰拯救阵线执政的希望就化为泡影。

接替沙德利总统的布迪亚夫，早年参加民族解放战争，在战争中树立了崇高的威信。胜利后，他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本·贝拉政见不合，因此一直在外流浪，直到国内局势突变，他才奉召回国，真可谓临危受命。他执政后表示要用他所掌握的权力来解决阿尔及利亚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并向伊斯兰拯救阵线发出警告：虽然伊斯兰是阿尔及利亚全体人民的宗教，但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垄断宗教或利用它来达到可鄙的目的。伊斯兰拯救阵线立即作出强烈反应，表示决不承认自沙德利辞职之日起签订的任何协议，意即不承认新政府的合法性。从 1 月 17 日起，每逢星期五，伊斯兰拯救阵线在各清真寺聚集数以千计的支持者。为了维持治安，当局不得不出动军警，双方剑拔弩张，几度发生冲突。1 月 22 日，政府公布法令，禁止在清真寺进行任何有偏见的活动，并禁止在清真寺附近的街道上祈祷或集会，从而拉开了与伊斯兰拯救阵线争夺清真寺的战斗。随后，伊斯兰拯救阵线的主要领导人相继被捕，伊斯兰拯救阵线公开号召人民起义。2 月 7 日后，暴乱从阿尔及尔蔓延到各大中城市。政府出动军队进行镇压。2 月 10 日，阿尔及利亚在全国实施紧急状态。3 月 4 日，阿尔及利亚最高法院作出解散伊斯兰拯救阵线的决定，对它的七名领导人提出起诉。布迪亚夫的强硬政策遭到伊斯兰拯救阵线的强烈反抗，冲突愈演愈烈，半年之内，150 余人死于非命，另有多人受伤。随后，就有布迪亚夫在安纳巴遇刺事件。

布迪亚夫死了，但是，阿尔及利亚的动乱并没有就此结束。7 月 15 日，法庭判决原伊斯兰拯救阵线主席迈达尼和副主席贝勒哈吉 12 年徒刑，另外五名伊斯兰拯救阵线领导人也被判处 4—6 年徒刑。但是，伊斯兰拯救阵线的活动并没有停止，对抗愈演愈烈。阿尔及利亚的机场、兵营等要害部门相继遭到伊斯兰拯救阵线的袭击，政府制定了反恐怖与颠覆的法律，大举镇压伊斯兰拯救阵线的非法分子。伊斯兰拯救阵线的恐怖活动也不断升级，从刺杀政界要人、各界名流，发展到袭击外国人。1993 年 9 月后，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外国人不断遭到袭击，9 月 21 日，两名法国人被绑架，后被撕票，凶手至今未被抓获。10 月 16 日，五名俄罗斯人在一所军校遭到袭击，结果三人

死亡，一人重伤。 10月19日，三名意大利人遭到绑架，三天后全部被杀。

法国人是伊斯兰拯救阵线恐怖活动的主要目标，这也难怪，因为阿尔及利亚原来是法国的殖民地，自法国从阿尔及利亚撤退后，阿尔及利亚又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影响极大。伊斯兰拯救阵线崛起后，法国的态度最为强硬，坚决主张镇压。法国政府曾表示，坚决支持阿尔及利亚与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作斗争。为了对付伊斯兰拯救阵线，法国向新政府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并禁止伊斯兰拯救阵线人员在法国本土活动，原教旨主义在法国出版的杂志也遭到查封，伊斯兰拯救阵线恼羞成怒，一位伊斯兰拯救阵线的领导人曾说：“法国政府对国务委员会的支持太多了。”因此，伊斯兰拯救阵线就把法国人当作出气的对象。

10月24日，正在上班的高峰时间，众目睽睽之下，一群歹徒绑架了法国外交官弗契诺夫妇和富雷西耶，一名上前干预的警察也被打死。阿尔及利亚出动大批警察查找绑架者及人质的下落，但一无所获。29日，伊斯兰拯救阵线发布传单，承认这起恐怖事件是它所为，并称这是对外国人尤其是法国人的警告。如果他们不迅速撤出阿尔及利亚，等待他们的将是同样的命运。结果，驻阿尔及利亚的外国侨民和旅游者纷纷离境。各国政府纷纷警告国人，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务，近期不要去阿尔及利亚。

30日，阿尔及利亚特种部队终于发现了绑架者的踪迹。军警包围了阿尔及尔南部一间尚未完工的民宅，并与恐怖分子进行了激烈的枪战。六名恐怖分子当场毙命，弗契诺和富雷西耶获得解救，但弗契诺夫人下落不明。31日，根据被捕恐怖分子的口供，特种部队又找到了另外一处恐怖分子的营地，双方发生激烈战斗，11名恐怖分子被击毙，弗契诺夫人终于获得自由。11月1日，她出现在巴黎机场，随身携带了伊斯兰拯救阵线领导人致法国政府的公开信，警告支持阿尔及利亚政府的外国人必须于11月30日离境，否则必将遭到惩罚。

伊朗：“绿色恐怖”的源头

由伊斯兰拯救阵线掀起的阿尔及利亚恐怖狂潮，实际上是70年代后期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延续，也是世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在中东有着深厚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创建伊斯兰教。此后，伊斯兰教随着东征西讨的阿拉伯大军传播到大半个世界。在中东地区，伊斯兰教更是根深蒂固，成为各个国家的国教。进入近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伊斯兰教也进入了它的危机时期，中东地区成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殖民者除了掠夺财产外，还对中东各国进行文化入侵，用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取代原先的伊斯兰文化。宗教界人士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后来，中东出现了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各国先后推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建立了民族主义政权。在民族革命的大潮中，伊斯兰教同样遭到压制。由于各个国家经济建设方面出现的种种失误，打破殖民枷锁的中东各国，并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一些伊斯兰国家人民生活艰辛，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阶级矛盾突出，而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大搞专制，生活上腐败不堪。下层穆斯林对此颇感失望。在人口众多、文盲大量存在的伊斯兰世界，人们只得从《古兰经》中求得解脱，期待真主重现人间，来解脱他们的苦难。人们认为，造成苦难的根源在于统治者偏离了《古

兰经》的教诲，为维护人类的纯洁，必须回到伊斯兰教刚创立时的局面，即由伊斯兰教统治一切，国家、社会实行伊斯兰化，建立神权高于一切的政教合一体制。一切有悖于《古兰经》原则的制度和政权都是对真主的亵渎，必须予以推翻，所有虔诚的穆斯林都可向异教徒发动圣战，直到夺取国家政权。

当代原教旨主义运动的源头在伊朗。1979年，伊朗的穆斯林在霍梅尼的领导下，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神权体制。伊朗革命的成功为广大原教旨主义者带来了希望，也为建立原教旨主义政权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模式。在伊朗革命成功的影响下，中东各国的原教旨主义分子也蠢蠢欲动。伊朗政府又推波助澜，称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是一个世界性的革命，目的是解放一切被压迫的穆斯林，因此，伊斯兰革命迅速在中东各国蔓延开来。这就是所谓伊斯兰复兴运动，也称原教旨主义运动。

伊朗革命的矛头首先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伊朗在革命前，曾是美国在中东最坚定的盟友，伊朗革命成功后，两国反目成仇，激进的伊朗学生占领了美国大使馆，扣留了美国人质。卡特政府曾派中央情报局进行营救，但遭到了失败。可以说，伊斯兰革命一开始，便带有鲜明的恐怖主义色彩。

革命后建立的伊朗政权十分奇特。宗教领袖霍梅尼是最高领袖，但是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没有任何职务。新宪法规定，伊朗是一个共和国，并且模仿西方的三权分立，分设政府、议会、法院；但是，在新体制下，伊朗总统并不是伊朗国家事务的最后决策人。不仅如此，他自己的去留既不是由他决定，也不是由选民决定，而是由霍梅尼决定。霍梅尼是“高贵的救助者、革命领袖大阿亚图拉伊玛目”。此外，霍梅尼有权任命最高法院院长，有权统帅全国武装力量，有权任命三军指挥官，有权决定宣战、停战、缔约等事宜，国家大事必须向他汇报，他的批示必须得到执行。新体制下，霍梅尼的权力是无限的。此外，1979年3月根据霍梅尼的圣谕建立起来的伊斯兰共和党几乎控制了伊朗政府，而其成员实际上全部是宗教界人士。这就不可能不引起社会冲突。

巴尼萨德尔是在1980年的大选中当选为伊朗总统的。他出身于一个宗教世家，也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曾是霍梅尼的高级智囊。但是，巴尼萨德尔在西方留过学，受过西方教育，因此，他的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资产阶级的色彩，在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中影响较大。在反对国王的斗争中，他与霍梅尼走在一起，但在建立宗教政权后伊朗该向何处去，巴尼萨德尔却与霍梅尼的思想截然不同。

在内政方面，巴尼萨德尔主张建立一个“有权威的”、“稳定的”、“代表各种倾向政治力量的”联合政府。他反对一个集团大权独揽，更反对一人专权。他认为伊朗军队是共和国的坚强柱石，而革命后由神职人员组成的革命卫队只是辅助力量，反对神职人员控制军队，这与霍梅尼的思想又发生冲突。霍梅尼认为，国王留下的军队是不可信的，应该着重发展革命卫队。在经济建设方面，巴尼萨德尔主张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让人民丰衣足食。而神职人员则鼓吹，“我们起来革命不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为了伊斯兰”，并称“经济不是伊斯兰社会的支柱”。在对外政策方面，巴尼萨德尔主张搞务实外交，主张维护民族独立，执行不结盟的中立政策，注意与欧洲国家搞好关系，也不希望与美国搞得过僵，对扣留美国人质，他持反对态度。而神职人员则认为，美国是伊朗的头号敌人，扣留美国人质是第二次革命，伊朗要向世界输出伊斯兰革命，等等。这一系列的冲突到1981年6月终于发展到

顶峰。6月7日，巴尼萨德尔主办的几家报纸被查封，8日，霍梅尼不指明地攻击巴尼萨德尔，要他改弦更张，否则将面临前国王的下场。10日，霍梅尼解除巴尼萨德尔的武装部队最高总司令职务。12日晚，伊斯兰革命卫队包围了总统府。巴尼萨德尔向人民呼吁，要人民起来捍卫革命，奋起抵抗暴政。19日，霍梅尼对巴尼萨德尔进行了空前严厉的谴责，等于判处了总统的死刑。随后，巴尼萨德尔的支持者与革命卫队发生冲突，德黑兰出现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霍梅尼下令开枪镇压，结果造成数十人死亡，巴尼萨德尔最终被赶下了台，宗教力量独掌政权，他们开始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大规模的清洗，凡是支持巴尼萨德尔的人都是逮捕和处决的对象，德黑兰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恐怖分子”被处死，从而出现了所谓“绿色恐怖”（绿色是伊斯兰的象征）。

伊朗神权政治的主要敌人是1965年建立的人民圣战者组织，这个组织曾与霍梅尼一直反对巴列维王朝的统治，但革命胜利后，霍梅尼大权独揽，人民圣战者组织被排斥在政治舞台外面。不仅如此，宗教极端势力还不断挑起事端，袭击人民圣战者组织。在这次巴尼萨德尔与霍梅尼的较量中，人民圣战者组织站在巴尼萨德尔一边，失败后又进行地下活动。人民圣战者组织本来就崇尚暴力，主张在城市开展游击战和暗杀活动。革命胜利后它再次成为被镇压的对象，因此它只好拿起弱者的武器，发动恐怖主义战争。伊朗革命后发生的几起恐怖事件，都与人民圣战者组织有关。

1981年6月23日，霍梅尼和巴尼萨德尔的斗争已经结束，全国各地爆发的抗议活动已经被镇压下去，因此，执政的伊斯兰共和党得以坐下来研究全国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这天晚上，总共有90名党的重要成员出席会议。由于伊斯兰共和党已经掌握政权，这些党魁实际上都是政府各部门的重要负责人。

会议进行到半途，党的领袖们并没有就通货膨胀问题拿出什么好的办法。这些神职人员本来就崇尚精神食粮，对于这些世俗的问题他们还真没有多少经验，因此，也想不出什么高招。就在这时，一枚定时炸弹在会议室所在大楼旁边的车库爆炸了。在巨大的爆炸气浪冲击下，大楼严重受损。正在发言的伊斯兰共和党总书记、最高法院院长、总统三人委员会成员阿亚图拉·穆罕默德·侯赛因·贝赫什提当场毙命，与他一起遇难的还有73人，其中10人是政府部级官员，另有议员40人。议长拉夫桑贾尼和总理拉贾伊在爆炸发生前几分钟提前离去，幸免于难。

遇难的贝赫什提在伊朗是一个仅次于霍梅尼的人物，他一身三任，实际上是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在政府中，他是取代巴尼萨德尔的总统三人委员会成员之一，又是执政的伊斯兰共和党的总书记，伊朗的武装力量、公安部队、检察机构、司法机构全由他控制，政府总理由他提名，政府各部部长由他选定。最重要的是，他本身也是神职人员，深得霍梅尼的信任。他死后，霍梅尼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贝赫什提是最具牺牲精神的人，是伊斯兰教最伟大的烈士之一。”他的死对于霍梅尼的神权统治无疑是一大打击。7月8日，伊朗革命卫队宣布，伊斯兰共和党总部爆炸事件是共和党党员穆罕默德·礼萨·库拉希干的，他深受人民圣战者组织的影响，因此在总部大楼安置了两枚炸弹。事发后，库拉希逃亡在外，不知下落。革命卫队号召人民，如发现库拉希的行踪，就立即报告当局。

贝赫什提遇难后，霍梅尼为稳定政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7月24日，

在6月28日大爆炸中幸免于难的总理拉贾伊当选为伊朗总统，接任贝赫什提总书记职务的巴霍纳尔被任命为总理，接替拉贾伊。8月17日，新政府得到批准。

8月30日下午3时，拉贾伊、巴霍纳尔相国防部长纳姆朱、警察司令等10人在总理府一楼会议室召开特别会议，研究国内的治安问题。会议进行到半途，6月28日的悲剧再次上演，总理府发生大爆炸。不过，上次爆炸发生在总部大楼附近的车库，这次却发生在会议室。大爆炸激起冲天的烟尘，凶猛的火舌从门窗挤出，谁也不知道里面的人怎么样了。几名军官从浓烟中钻了出来，身上满是鲜血。

消防队赶到。由于爆炸发生在总理府，这次德黑兰警方还出动了两架直升机。经过三个小时的苦战，大火终于扑灭，会议室成了一片废墟，几具尸体从废墟中抢出，但已经面目全非。人们发现，总统拉贾伊、总理巴霍纳尔都没有逃出来，心里不禁一沉。如何分清尸体是一大难题，最后验尸官总算想到拿出牙科病历，这才勉强把各具尸体分辨清楚。

总理府发生大爆炸！总统、总理一齐遇难！消息传出，举国震惊。由议长拉夫桑贾尼和最高法院院长阿达比利组成的临时总统委员会发表声明，宣布从8月31日至9月4日为公共哀悼日。声明说，尽管伊朗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件，但是伊斯兰革命的进程必将继续下去。8月31日，伊朗为前总统和总理举行国葬。霍梅尼对前来送葬的人讲：“伊斯兰的哲学是‘他们从真主那里来，又要回到真主那里去’，我知道拉贾伊和巴霍纳尔是进了天国。”不过，天晓得这两人进了天国没有，唯一比较可信的是，他们和贝赫什提都成了伊朗国内矛盾的牺牲品，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正是他们自己，这正是可悲之处。爆炸总理府的仍然是人民圣战者组织的成员，名叫马苏德·凯什米里。他一年前打入总理府，主管安全事务。伊朗政府用子弹对付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而作为弱者的人民圣战者组织则用炸弹还以颜色。这样，就有了1981年接连两次大爆炸，德黑兰为它的宗教革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人质：黎巴嫩的风景线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伊斯兰国家本来就有深厚的土壤，因此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一兴起，原教旨主义运动很快就蔓延到整个伊斯兰世界。从美国到菲律宾，从伊朗到巴基斯坦，从苏丹到阿富汗，处处可以看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影子。但是，原教旨主义运动最富生命力的地方，当数中东地区。这个地区伊斯兰教影响深远，宗教势力强大，矛盾错综复杂，因此，是原教旨主义势力活动的最佳舞台。它与中东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特有的画面。

黎巴嫩面积仅1万平方公里，人口也仅300万，完全是一个袖珍小国。但是，这个国家却一直处于混乱状态。黎巴嫩国内政治力量十分复杂，300万人口出现了260个政党、几百支武装力量。各派政治力量为了争权夺利，不断展开混战。仿佛还嫌黎巴嫩乱得不够厉害似的，黎巴嫩的各个邻居，不管它是强是弱，见黎巴嫩如此混乱，纷纷前去插足。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扶植长枪党武装，建立了一个“安全区”。叙利亚更是将黎巴嫩当作它传统的势力范围。走投无路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在黎巴嫩圈了一块地，当作自己反对以色列的基地。黎巴嫩成了中东各派政治力量大显身手的场所。

在黎巴嫩的各派政治力量中，由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是影响很大的一支力量。真主党成立于 1982 年，在黎巴嫩众多的政治力量中只能算是一个晚辈，但它是一个后起之秀，短短几年工夫，真主党在黎巴嫩穆斯林中的影响已经超过了老牌的阿迈勒运动，为了争夺对黎巴嫩穆斯林的控制权，真主党和阿迈勒运动不惜大动干戈。它的最高目标是消除黎巴嫩以前各种统治政体的痕迹，建立伊朗式的伊斯兰共和国，甚至希望与伊朗合并，因此，它得到了伊朗政府的支持。真主党的拿手好戏就是扣押人质，其中主要是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人质。他们把这些入质抓在手里，藉此向西方国家施加压力。最多的时候，关押在黎巴嫩什叶派武装者手中的人质达几百人，关押时间最长的达三年之久。这种劫持人质的举动虽然遭到世界各国的反对，但真主党几乎是一劫一个准，西方国家也无可奈何。为了解救人质，西方国家用尽了各种方法。

1989 年 7 月 28 日深夜，一架没有航标灯的以色列直升机在一架以色列喷气式客机的掩护下，飞行在茫茫的地中海上空。喷气式客机发出的巨大轰鸣声掩盖了直升机发出的声音，而客机发出的电磁波又成功地掩盖了直升机发射出来的电磁波，因此，从雷达上，你只能看到一架大型客机的回波，绝对不会发现在它机翼下方飞行的直升飞机。这种把戏以色列已经玩过多次了。1976 年，以色列特种作战部队长途奔袭乌干达的恩培德机场，用的就是这种手法。今天，以色列又想干什么呢？

飞机沿着地中海海岸飞行没多久，直升机突然一个急转弯，拐向黎巴嫩海岸，然后降落在以色列北部国境线 16 公里处的黎巴嫩安全区内。20 名荷枪实弹的军警跃下飞机，然后消失在夜幕中。

以色列人的目标是凡公里外的吉布希特镇。这个小镇本来默默无闻，只有一万居民，镇外有一个水塘，白天，家畜在这个水塘饮水，妇女也在这里清洗衣服。按理说，这种小镇不值得以色列人注意，但由于小镇里住了一个大人物，一个令以色列和西方国家头疼的人物，因此，这个小镇就显得特别重要了。以色列人为此已经多次搜集情报，察看地形，并进行过演练，今天，他们终于找上门来了。

以色列要我的人叫谢赫·欧贝德，黎巴嫩真主党的领导人之一。据说，他的真主党已经绑架了不少西方人质。1986 年两名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到绑架，也是他干的。另外，由于他是真主党的首要人物，因此，他也掌握了大量真主党的机密，如真主党的密码、组织编制、弹药库和藏匿人质的地点，这些都是以色列希望知道的。自真主党成立以来，它就与以色列作对，不断对以色列士兵采取行动，虽然规模都不大，但确实令以色列政府头疼，因此，今天他们找他算帐来了。

没有多久，以色列军队已经潜过小镇外的稻田和橄榄林，来到人口，随即四散开来。一群士兵围住了镇东一幢四层小楼，这时是凌晨 2 点钟。

一名突击队员在欧贝德的大门上绑上了一枚特制的消音炸弹，几秒钟后，大门的绞链被炸弹炸断了，突击队员一涌而入，冲上欧贝德所住的二楼。面对奔进来的突击队员和黑洞洞的枪口，欧贝德措手不及，一言不发，束手就擒，他的 25 岁的妻子蒙娜、堂兄阿迈德和朋友法斯也同时被抓，住在另一个房间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被突击队员抓了起来，突击队员将他们住的房间从外面锁住，让他们呆在里面。欧贝德的妻子吃了一点苦，她被单独关起来，突击队员将她的手脚绑住，用胶带封住了她的嘴巴，并把她锁在一间

屋子里。随后，五花大绑的欧贝德和他的堂兄及朋友被带到担架上。看得出，今天以色列突击队员不想杀人，他们只想以欧贝德之道，还治于欧贝德自身，让他也成为人质。这时，欧贝德的邻居齐德听到了异常动静，好奇的他伸出了头，但没等他问话，一名以色列突击队员对着他就是一枪。在以色列人看来，住在这里的没有几个好人，更不会有犹太人，他们统统都是反对以色列的阿拉伯人，除掉他没有什么关系。可怜的齐德就成了这次行动的唯一一个牺牲品。要不是他，这次行动可能一点动静都不会有。用一名突击队员的后来说就是，连狗都没有叫一声。整个行动费时 55 分钟，符合以色列人干净、利落的特点。20 分钟后，这些突击队员乘坐直升机回到以色列领空。

以色列这次并未大开杀戒，他们不想伤害欧贝德，只想用欧贝德换回被绑架的三名以色列人。三年来，他们一直通过各种途径，想使三位同胞获释，他们甚至愿意用关在以色列大牢里的 300 名什叶派穆斯林交换这三个人，但没有结果。以色列从来不遗弃任何一个犹太人，可这一次，他们却一点办法也没有，眼看着自己的同胞在阿拉伯异教徒手中受难。因此，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以色列政府可说是丢尽了脸。三名人质在受难，以色列各位政要的心也在受着煎熬，他们在想办法营救自己的同胞。两个月前，国防部长拉宾先生提出了绑架欧贝德的计划，并得到了绝大部分内阁同僚的赞同。这样，行动就开始了。

以色列绑架了欧贝德，在黎巴嫩各个什叶派武装之间引起极大的愤慨。一个自称为“世界被压迫者”的组织宣布，如果以色列不立即释放欧贝德，它就要在 7 月 31 日处死美国人质希金斯。可怜的希金斯本来是在黎巴嫩执行维持和平任务的，没料到落在信仰真主的什叶派武装手里。以色列当然不会关心一个美国大兵的死活。千辛万苦，可不是用来给美国人作筹码的。美国大兵是死是活，关以色列什么事！有本事，美国人也可以自己去绑架嘛！因此，以色列对“世界被压迫者”组织的最后通牒充耳不闻。但“世界被压迫者”组织说话算数，7 月 31 日，它宣布已将希金斯绞死，并说，如果以色列还不放人，它将拿另一名美国人质西西皮奥开刀。黎巴嫩电视台播放了希金斯被绞死的镜头。可怜的希金斯中校在绞索上晃来晃去，舌头长长地伸了出来，模样十分恐怖。另一个镜头是西西皮奥在黑洞洞的枪口下语无伦次：“他们真要绞死我了，我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了。”这下子，白宫再也坐不住了。白宫和五角大楼联合作出反应。布什总统通过瑞士和日本等国的外交使节转告伊朗政府，必须对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负起责任。布什又通过阿尔及利亚驻黎巴嫩大使转告伊朗：“我们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我们不知道伊朗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认为总会有机会解决的。你们能否帮助？你们是否了解什么事？你们是否有什么忠言相告？”没有恶语相向，也没有白宫常使用的恐吓，白宫这次向德黑兰低下了头。这大概是美伊交恶以来，美国人第一次与德黑兰平等地打交道。德黑兰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而这，全来自伊斯兰革命，来自原教旨主义。

在与德黑兰寻求对话的同时，美国又请求苏联、叙利亚等国，请它们向穆斯林武装施加影响，不再开杀戒，又请求罗马教皇看在人道的份上，协助美国赎回希金斯的尸体。美国没有去找黎巴嫩政府，它知道贝鲁特现在自顾不暇，如果它有办法，不用美国出面，它就会采取行动了。同时，五角大楼毫不留情地举起大棒：如果西西皮奥再被处死，美国必将“毫不含糊地采取报复措施”。国防部发言人宣布：“衣阿华”号驶离马赛，“美国”号航空

母舰也驶离了新加坡，“珊瑚海”号已经离开开罗，开往黎巴嫩水域。这一招也真奏效。伊朗新总统拉夫桑贾尼在德黑兰的祈祷会上表示：“黎巴嫩的人质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必须通过对话，而不是通过武力来解决。”一句话决定了西西皮奥的命运。8月3日，什叶派“革命正义组织”宣布，停止处死西西皮奥。胡萝卜加大棒，美国的政策取得了成功，西西皮奥暂时得救了，但下次呢？其他人质怎么办呢？白宫又一次陷入了沉思。

对以色列来说，由于以色列本身地处中东，与黎巴嫩很近，因此，它可以用武力解救自己的人质，但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来说，这种方法就不适用了。这么多人质落在黎巴嫩，而美国政府却无可奈何，白宫也知道丢脸，但是，里根政府对1979年卡特政府的教训仍然记忆犹新。胡萝卜加大棒也只能偶一为之，下次不一定能见效。只有伊朗人对这些什叶派武装才有影响，劫持人质肯定得到了伊朗人的许可，因此，如果换得伊朗人的回心转意，人质获释也就有希望了。白宫意识到，它真的必须与德黑兰达成某种默契，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人质危机。

美国与伊朗已经断绝外交关系，要与伊朗人联系只得通过中间渠道。这其中，有一个名叫特里·怀特的英国圣公会大主教显得特别活跃。凭着他的宗教身份，他每年都要去几次黎巴嫩，而每次出马，他都不会空手而回，总会有一些人质获得释放。因此，怀特简直成了人质的希望之星。

怀特与什叶派虽然都笃信宗教，但怀特信的是天主教，而什叶派信的是真主，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那么，怀特怎么会说得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恐怖分子回心转意，放了这些人质的呢？起初人们对此也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人们才发现，怀特与美国军方关系密切，他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诺思中校过从甚密。1985—1986年间，诺思和怀特至少会晤过六次，怀特甚至还能使用美军的武装直升机和美国外交使团的办公设备。1985年9月，怀特的斡旋成功地使一名人质获释，但人们发现，以色列在美国的授意下向伊朗提供了500枚陶式反坦克导弹。1986年2月，美国直接向伊朗出售了1000枚陶式反坦克导弹，到7月份一名美国人质挣脱囚笼。1986年11月，又有500枚陶式导弹运到伊朗，人质雅各布森随即获释。原来，怀特的妙方就在这个地方！当怀特陪同雅各布森前往塞浦路斯的次日，震惊美国的伊朗门事件爆发了。

苏丹：又一个伊朗？

1993年8月20日，美国政府指控苏丹帮助训练国际恐怖分子，参与恐怖活动，因而将苏丹列入支持恐怖主义活动的国家，并开始对苏丹进行制裁。这是继伊朗、叙利亚、利比亚之后第四个获此“殊荣”的国家。美国佬扬起了大棒，苏丹政府作何反应？苏丹首都喀土穆出现了几十万人的大游行，抗议美国政府的行动。苏丹执政的巴希尔将军称：“美国实际上是对我们信仰伊斯兰教的敌视。”

不管巴希尔如何否认美国对它的指控，也不管苏丹是否真的从事了恐怖活动，反正在美国宣布对苏丹进行制裁后，一向同气相求的阿拉伯国家没有出面为苏丹辩护，反而有一些阿拉伯国家附和美国的指控，如埃及指控苏丹支持埃及境内的原教旨主义力量，在埃及境内从事恐怖活动；并说1990年10月暗杀埃及议长的凶手就是在苏丹受的训练；被埃及政府通缉的盲人教长

拉赫曼也是先在苏丹政治避难，然后去了美国。埃及政府甚至指责苏丹穆斯林兄弟会的武装人员进入埃及，参与当地伊斯兰极端分子的骚乱。其他国家对苏丹也有类似的指控。

这些都是真的吗？难以考证。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对苏丹的指控是在巴希尔将军上台、宣布伊斯兰化开始出现的。人们认为，现在的巴希尔政权，实际上就是当年伊朗霍梅尼神权政治的翻版，只要想想伊朗当年推行的伊斯兰世界革命，人们就会想到苏丹政府以后的举动。事实是，苏丹政权确实表现出强烈的伊斯兰化倾向，这就不能不使它的阿拉伯邻国对它产生怀疑。

苏丹是非洲最大、也是最穷的一个国家。80年代初，苏丹的独裁者尼迈里将军上台执政。受伊朗宗教革命的影响，尼迈里上台之初也推行过一段时间的伊斯兰化。但是，由于他是通过政变上台的，他的反对派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一次军事政变中把他赶下了台，那场刚刚起步的伊斯兰革命也就随同他的下台而烟消云散了。不过，苏丹境内的原教旨主义势力并没有因此受挫。支持伊斯兰化的穆斯林兄弟会等极端组织在苏丹发展极快，很快在苏丹形成了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穆斯林兄弟会在苏丹拥有一批实力雄厚的企业，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在新闻舆论方面，穆斯林兄弟会也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苏丹共有10家报刊，兄弟会控制了其中5家。兄弟会对大学的控制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所有大学的学生会均接受它的指挥。可以说，兄弟会在苏丹控制了整个知识界。

伊朗宗教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伊朗有一个宗教领袖。没有霍梅尼，光靠下层什叶派穆斯林，宗教革命绝无成功的希望。而苏丹也具备这个基本条件，那就是，它也有一个宗教领袖哈桑·图拉比，虽然他不像霍梅尼那样，是十二伊玛目“转世”，但是他也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学识绝不在霍梅尼之下。精通神学自不待言，他还是英国牛津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的高材生，获得过宪法学的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过苏丹最高学府喀土穆大学法学院的院长。除了精通阿拉伯文外，他还能讲流利的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有这样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作指导，穆斯林兄弟会在知识界、宗教界的影响就蒸蒸日上。图拉比从1964年起担任苏丹穆斯林兄弟会的总书记。在他的领导下，兄弟会的组织日趋完善，活动能力大增，在苏丹成了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在于有霍梅尼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在下层穆斯林中一呼百应，而图拉比在苏丹的下层穆斯林中，未必有这种魅力。不过，由于兄弟会在苏丹的影响，图拉比在苏丹的军方有不少信徒。这就注定苏丹的革命模式完全不同于伊朗，伊朗必须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才能取得宗教革命的胜利，而苏丹却可能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伊斯兰化。1989年6月30日，苏丹军方高层人士变动，军事政变再次发生。这次上台的是哈桑·巴希尔将军，他推翻了不信真主的异教徒马赫迪。巴希尔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也是图拉比的崇拜者。换句话说，这次由巴希尔领导的政变实际上是图拉比领导的政变，只不过是假手于巴希尔罢了。兄弟会为这次政变的成功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政变成功后，巴希尔宣布，解散国民议会，中止宪法，取缔所有政党。巴希尔声称他与任何政党均没有联系，但实际上，军政府对兄弟会言听计从。不过，图拉比与霍梅尼一样，对直接上台执政没有兴趣，他喜欢在幕后操纵。这样，又一个原教旨主义政权建立

起来了。

巴希尔上台后，立即宣布全面恢复被前政府中止了的伊斯兰法，从而成为阿拉伯世界中第一个实施伊斯兰教法的国家（伊朗虽然也信仰伊斯兰教，但它不是阿拉伯国家）。《古兰经》高于一切，妇女重新蒙上面纱，西方腐朽的意识形态因素被清除，各种西方式的娱乐活动全面禁止，新闻出版被严加控制起来。苏丹成了世界上最纯洁的两个国家之一。图拉比表示，作为阿拉伯世界中第一个实现了伊斯兰革命的国家，胜利后的苏丹有义务帮助其他阿拉伯兄弟建立伊斯兰社会，因此，它要积极地帮助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事业，发挥它的伊斯兰革命桥头堡的作用。

因此，苏丹开始输出革命。它在国内的军营里培养来自各国的原教旨主义力量，由苏丹人传递思想，由伊朗人提供军事训练。如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埃及的圣战者组织部跑到这里接受训练，连阿布·尼达尔的“恐怖公司”也来了。这就不能不引起它的邻国的恐惧。

只有伊朗对苏丹的胜利欢欣鼓舞，它认为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带来的必然结果。因此，当巴希尔的政变一成功，伊朗立即表示，要全力支持巴希尔政权，加强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合作，并主动表示，愿向苏丹派遣军事顾问，在苏丹训练战斗人员。到1991年，在苏丹的伊朗专家已经达到800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苏丹东部的几个营地，帮助训练苏丹的武装人员。

苏丹政府也接受了伊朗的石油、食品和武器。此外，两国还进行了高层互访。1991年12月，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率领一个200人的代表团访问了喀土穆，苏丹也派了一个重要的军事代表团回访。

1991年4月，喀土穆召开了一次非同寻常的国际会议，有55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由于苏丹是个穷国，因此历来没有什么重要的会议在这里召开，因此，这次国际会议显得格外醒目。这个会议的正式名称是“阿拉伯伊斯兰人民会议”，来自55个国家的原教旨主义分子出席了这次大会，其中有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党主席拉希德·盖努西、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的负责人阿巴斯·马达尼、巴勒斯坦“人阵”的领导人乔治·哈巴什。伊朗虽然不是阿拉伯国家，但也派员列席这次会议。会议的东道主是图拉比。他身穿白袍，头缠白色头巾，慈眉善目。他在会上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要加强团结，共同对西方国家发动圣战。会后通过了一个宣言。宣言称，无论美国在海湾战争后显得多么强大，但只有真主才是真正伟大的。为了对西方进行圣战，全世界的穆斯林，应该团结起来，什叶派穆斯林和逊尼派穆斯林要消除分歧。为了取得圣战的胜利，穆斯林的任何斗争方式都是合法的。会议决定，在喀土穆设立一个常设机构，由图拉比任秘书长。西方把这次会议称为国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大聚会，一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际诞生了。

当代中东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本意要通过纯洁宗教，在中东建立一个公正、廉洁的社会。作为一种尝试，伊斯兰的复兴本来无可厚非。但是，伊斯兰复兴运动提出要“回到《古兰经》去”，用《古兰经》来解决当代伊斯兰社会普遍面临的各种问题，则是不现实的。原教旨主义者通过“圣战”，建立伊斯兰政体的手段更是与当今世界的潮流相背。因此，这场绿色革命演变成绿色恐怖，也就在所难免。现在，伊斯兰国家均把原教旨主义作为洪水猛兽，加以防范，很多国家对原教旨主义的活动进行了镇压。国际上针对原教旨主义组织发动的恐怖活动也加大了打击力度，但是能否收到实际效果，现

在还难以预料。不过，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像一场潮水，既然是潮水，终究有它退潮的一天。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来临。

蠕动的“红色蚯蚓” ——意大利“红色旅”的恐怖主义行动 被撕票的总理

1978年4月18日下午，从意大利都城罗马的一座兵营里，七八架直升飞机相继起飞，飞向距罗马160公里的杜凯萨湖。

飞机上的气氛相当沉闷。机舱里，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副书记和国家总检察长正襟危坐，不知道心中在想些什么。不过，看得出来，他们的神态都很黯然。围坐在他们周围的蛙人们，由于同行的两巨头不开口，因此也不敢发出瘖笑声。整个飞机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声外，听不到其他声音。

160公里的距离转瞬即至。蛙人们跳下飞机，立即奔向湖边。由于当地的天气比较寒冷，因此，虽然已经是4月，但杜凯湖上还是结着一层薄薄的冰。没有犹豫，小伙子们一个个跳下湖，敲开了冰冻，钻进刺骨的水中，寻找着什么。

一无所获。蛙人们劳顿了一天，什么也没有发现。守在岸边的天民党副书记和总检察长交换了一下眼色，似乎在询问：难道又是假的？是一场恶作剧？从他们的脸色看不出他们是喜是悲。他们是因为没有发现目标而感到失望，还是因为消息没有兑现而满怀喜悦？

结束了一天的寻找，蛙人们也累了。他们请示两位巨头：怎么办？是打道回府，还是继续寻找？两位领导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明天继续打捞，一定要找个水落石出。

第二天，蛙人们又跳下水去。突然，一个蛙人从水中发出信号：水底发现一具尸体！顿时，几个蛙人一齐钻进水底，半晌，从水底托出一具尸体。天民党副书记和总检察长趋步上前，失望的表情立即显现出来。不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经调查，这只是一个牧羊人，据说还有精神病。是他自己掉到湖里的，与凶杀无关。如果不是这一群蛙人来到湖底，恐怕谁也不会知道他的下落。

他们彻底死心了。算了，看来这又是一场恶作剧，他们不过是要让我们不停地找下去罢了。蛙人们放弃了努力。

5月9日下午1点多，罗马的警察接到报告：一辆红色的雷诺轿车，停放在耶稣广场已经好久了，说不定这里面有什么名堂。接到报告后，警察当局如临大敌。最近，汽车炸弹事件时有所闻，说不定这也是一部装满炸弹的汽车，而耶稣广场距天民党总部极近，万一出了什么漏子，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因此，三名警察立即赶往耶稣广场。他们围着这辆轿车转了几个圈，最后终于大着胆子，拉开了车门。

炸弹没有响。三个警察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这到底是哪个粗心鬼，把这么一辆高级轿车放在这里不闻不问十几个小时？警察探过头去，想看个究竟。结果，他看到一具尸体，身穿白色衬衣，满身血污。再一看，原来那具尸体不是别人，正是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而为了找到他的尸体，意大利的军警几乎是倾巢出动，找了几个月了。原来以为他被沉尸杜凯萨湖，因此，几十名蛙人在那里折腾了两天，但一无所获。现在，他终于在这里出现了。

发现了莫罗总理的尸体！消息立即传遍了整个意大利。法医赶来了，对尸体进行检查。尸体已经僵硬，莫罗死了起码有几十个小时了。一个旁观者

流着眼泪，一遍遍地说：“他们终于杀死了莫罗。上帝啊！他们真能干出这种事情！”

意大利安莎社立即把这个消息传到整个世界。世界各大媒介纷纷对此事作出报道。路透社发表评论说：“一个像莫罗这样的领导人遭到绑架并被害，这在任何国家还是第一次。”意大利《共和国报》则登出了这样一个醒目的标题：“对共和国的攻击达到了顶点。”来自世界各国的唁电像雪片似地飞往罗马，对莫罗被害表示哀悼，并谴责这一恐怖主义行动。罗马教皇保罗六世则把自己关在小教堂里，为他的好友莫罗祈祷，祈求上帝接引莫罗到达天国。

是谁导演了这一恶魔般的行径，杀害了天民党的元老、五任意大利总理的“伟大的政治人物”莫罗呢？

谜底早就揭开了，那就是：“红色旅”——意大利一个极左的恐怖主义组织。

狂飚突进

本世纪60年代是一个火红的“革命年代”。当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正在与美国竞赛。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要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比一比，看到底是谁的政治制度优越。在古巴，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已经取得了成功，卡斯特的副手切·格瓦拉已经提出了“游击中心论”，要把游击战推进到第三世界各个国家，通过少数人建立“无产阶级武装中心”。格瓦拉自己则跑到了南美洲的大森林里，发动了游击战。而在东亚，社会主义革命更是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越南共产党正在开展抗美斗争，而中国，正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此，60年代是左派的年代，左派思想是当时政治思潮的主流。

落后国家在开展社会革命，而发达国家还沉浸在醉生梦死之中。60年代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有所发展，但社会问题成堆，而且积重难返，现政权看起来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因此，当中国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喊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时，法国的大中学生首先响应。以农泰尔文学院为基地，法国大学生建立了“三·二二运动”组织，掀起了著名的红色“五月风暴”。日本、美国、意大利、西德的大学生也群起响应，他们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乃至与警察进行面对面的搏斗。法国政坛巨星戴高乐总统终于被赶下台去，重新回到科隆贝双教堂，以度过自己一生的最后时光。法国的“五月风暴”虽然最终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它对一代人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它反对当局、改变现状的理想，在一代人心中长期留驻下来。红色，成了一代人向往的话题。后来，意大利出现了“红色旅”，西德出现了“红军派”，日本出现了“赤军”，都与红色有关。

意大利距法国最近，因此，它最先感受到了“五月风暴”的气息。战后的意大利出现了经济奇迹，经济高速发展，而与此同时，它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也十分突出。法西斯余孽不时兴风作浪，老牌恐怖组织黑手党则与政界勾结，大肆谋财害命。意大利的经济是发展了，但人民的生活却未能得到相应的改善，住房、福利问题突出。政府无力解决由于工业化带来的众多问题，对待高通胀率、高失业率束手无策。即使是罗马、米兰、都灵这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政府的公务员位置也已经饱和。大学生就业困难，毕业等同于

失业。严峻的现实使他们对前途灰心失望，沮丧心情笼罩一切。与此同时，意大利政局却十分不稳。丑闻不断，政府像走马灯似地更换，这已经成了意大利政坛的一大奇观。可谓“各领风骚三五天”，这种局面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浓厚的阴影，他们把意大利描绘成“一个在危机的海洋中失去了舵手的社会”。没有安全感的国民纷纷寄希望于各种各样的革命学说，指望借“革命”这把利刃割除窒息意大利社会的毒瘤。因此，极左思想在意大利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

在这风云际会的时刻，一个名叫雷纳托·库乔的人应运而生。1967年，年仅22岁的库乔在特伦多大学就读。他的专业是社会学，是专门研究社会问题的。库乔没有从学校提供给他的书本上找到解决意大利问题的答案，但是，他从图书馆里读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格瓦拉等革命导师的著作，试图从中找出医治意大利瘤疾的答案。应该说，库乔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他没有从书本上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而是结合意大利的国情，对经典作家的理论进行了“修正”。他认为，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目前，帝国主义已经发展到“跨国公司帝国主义时代”。因此，单个国家的革命斗争不可能取得胜利，工人阶级必须联合起来。目前，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敌人不仅仅是意大利政府，而且包括美国、英国、西德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经济共同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一批国家和国际组织。要夺取革命的胜利，意大利工人阶级必须打碎国家机器的喉舌，具体地说，就是用血淋淋的恐怖手段，唤醒人民的觉悟。

库乔不仅在理论上先知先觉，而且身体力行。学校的每次学生运动，他都是积极分子，而且是组织者。一天，学生队伍与警察发生冲突。库乔和他的好朋友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与手持棍棒、头戴防毒面具的警察搏斗起来。突然，一枚催泪弹落在库乔的朋友脚下爆炸开来，那位同学立即血流满面。按理，催泪弹并不是一种杀伤性武器，但由于距离过近，它照样造成了人员伤亡。库乔的朋友倒下去了。库乔虎目含泪，发誓要为朋友报仇。从此，他发起了一场“使权力机构残废的活动”。库乔的想法是，只要敲掉政府公务员的膝盖骨，他们就再也站不起来，不能为虎作伥了。因此，意大利接二连三地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政府的一些公务员突然站不起来了。在罗马，一位高级官员的膝盖被手枪击中，痛苦地跪在地上；在威尼斯机场，外交部的一位官员被几个恐怖分子摁在马桶盖上，然后被手枪击碎膝骨；在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类似的例子接连发生。一时间，人们感到很纳闷：恐怖分子为什么不杀人，而只是敲碎他们的膝盖骨？

库乔攥着他的大胡子，不无自得地解答了这个问题：“政府官员是为权力机构效劳的人，打碎他们的膝盖骨，他们便终身不能走动。他们的残废，象征着政权的残废。”

原来如此！

一夜之间，意大利人民发现，在古罗马帝国的国土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组织——“红色旅”。它的标志是：一颗环绕着圆圈的红五星和一挺锃亮的机枪。红五星象征着红色，这是库乔梦寐以求的目标，而机枪则象征着暴力，旧的国家机构将通过暴力打破，而库乔的新政权则在暴力中诞生。

一帮志同道合者聚集在库乔的大旗之下，其中有一位名叫玛格丽特·戈卡尔的丽人，后来成了库乔的夫人。

最初，“红色旅”的成员大多是一些20多岁的大学生，他们思想最为激

进，对现实极为不满，因此，他们首先参加了“红色旅”。库乔对斯大林的“干部问题决定一切”的口号有深刻的了解，他深知这些大学生都是他发动“革命”的宝贵“种子”，如果让他们直接走上战场，与资产阶级政权搏斗，那么，这些宝贵的种子将会很快消耗殆尽。而且，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仅靠几个书生，是成不了什么大事的。唯有将其作为人种，才能形成燎原之势。因此，他把他们作为骨干，一个个派到工厂、农村和学校，去发动工潮，领导罢课，宣传他的“马克思主义”，并且努力做到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相结合，从工人和学生中吸收积极分子，使他们成为“红色旅”的新鲜血液，为“红色旅”的发展壮大奠定群众基础。

库乔的夫人戈卡尔在宣传运动中一马当先。在意大利，妇女的地位极低，而且随着意大利社会矛盾的发展，她们的境遇每况愈下。她们不仅要首先承担失业的痛苦，而且还要承担由于生活失意而变得愈加狂躁的丈夫的暴力。在这双重压力下，不少妇女的心灵受到巨大创伤。她们企图通过暴力向社会和男人复仇，从而为自己找到一条宣泄和证明自己力量的机会。“红色旅”是她们必然的选择。因此，“红色旅”中的女性一度占到了80%以上。妇女运动、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红色旅”对意大利的各个社会阶层都产生了强大的震撼力和吸引力。到1973年，“红色旅”的成员已经发展到400人，同情者则达到20万人之巨。

作为一个崇尚暴力的恐怖组织，“红色旅”的组织结构十分严密，这充分体现了库乔的聪明才智。它的全部人马分为五个部分，分别为米兰纵队、都灵纵队、罗马纵队、威尼斯纵队及那不勒斯纵队。各个纵队相互独立，互不来往，各自建立起“完整的政治—军事单位”，也即战斗小组。这种战斗小组一般由三到五个人组成，每六个小组构成一个“核心”，几个“核心”构成一个纵队，形成一种金字塔结构。任何纵队的头头只是本纵队的权威，他的权威不能达到其他纵队，更不能凌驾于其他纵队之上。每个纵队必须采取“单线生殖”的形式，自行产生一个网络，然后再各自去串联其他人。在这些网络中，每个成员都是其基本细胞，但这些细胞相互间是独立的，外边的人是不了解其底细的。这样，一旦某个细胞或组织出了问题，那么，受损失的也只是细胞或那个组织本身，对其他细胞单位和整个组织没有影响。这种方式后来为埃及的恐怖组织穆斯林兄弟会、爱尔兰共和军、斯里兰卡的猛虎组织所仿效。从巴勒斯坦的哈马斯运动，我们也可看到它的影子，库乔对整个国际恐怖运动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意大利的警察很快领教了库乔的厉害。曾有一个警察打了这么一个比喻：“红色旅”的组织结构就像一条被切成几段的蚯蚓，每一段都能蠕动。

从1972年起，“红色旅”的游击战在意大利的各个城市升级。它对打碎政府官员的膝盖骨已经没有兴趣，暗杀、绑架被认为更具有威慑性，库乔称其为“武装宣传”。后来，绑架成了“红色旅”最拿手的恐怖行动，这与巴勒斯坦人阵的劫持飞机、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攻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红色旅”的历史上，它看中的人没有一个能逃脱它的魔掌。

1972年3月3日，一位名叫马基亚里尼的地方官员遭到绑架，他是“红色旅”第一个绑架的政府要员，因而得以青史留名。假若没有“红色旅”的这次恐怖行动，还有谁会知道他这么一个小人物？“红色旅”一战得手，可谓旗开得胜。此后，“红色旅”几乎每一年都要干上一两起绑架案，成为风行一时的话题。1974年6月17日，红色旅在帕多瓦的扎巴雷拉大街，与新

法西斯分子交上了火。这是“红色旅”第一次杀人。鲜红的血液刺激了“红色旅”的血性，从此，红色旅大开杀戒，并一发而不可收拾。

意大利历来是一个动乱国度，各种各样的犯罪组织层出不穷，资格最老的恐怖组织黑手党就是在意大利发源的，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更是法西斯组织的滥觞。因此，意大利每天都不会平静。“红色旅”最初干的几件恐怖活动没有引起警方的重视，谁也没把这个组织放在心上。不就是一群乳臭未干的学生干的嘛？意大利什么大风大浪没有经历过，几个学生闹事算什么。因此，警察对“红色旅”更多的是轻视，而不是后来那种恐惧和谈“红”色变。只是到了后来，他们才意识到，“红色旅”并不是一群打家劫舍的乌合之众，更不是街头上闹事的普通犯罪分子，而是一个有明确纲领、有政治目标的恐怖组织，是一个硬碰硬的对手。于是，警方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专门对付“红色旅”，并开始了大搜捕。说来也巧，“红色旅”虽有极严的组织措施，但库乔竟然在一次偶然的行动中落网，这几乎可以视为反恐怖斗争历史上最幸运的事情。库乔被投进了意大利北部城市卡萨列蒙菲拉托监狱里。

库乔的被捕急坏了“红色旅”，他的夫人戈卡尔更是成了一只热锅上的蚂蚁。这位美艳如花、心如蛇蝎的女人经过三个月的周密准备，终于把自己的丈夫从监狱中救了出来。库乔发誓，要以更猛烈的暴力行动向资产阶级政府报复。

但是，幸运之神似乎背弃了“红色旅”，它的行动不像以前那样顺利了。四个月以后，“红色旅”绑架了一位百万富翁，但是，警方竟找到了“红色旅”隐藏的地点，双方发生了交火。枪战中，库乔的夫人玛格丽特·戈卡尔杀身成仁，他的副手马拉斯基也在战斗中被俘，被判30年徒刑，库乔则侥幸逃脱。然而，库乔还未来得及策划新的行动来为夫人复仇，警察已经找到了他的米兰寓所，库乔再次落入警方之手。这个结果，连意大利警方也感到惊奇，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轻而易举地抓到这个大魔头。

红色蚯蚓的脑袋暂时被制服，但是，蚯蚓的特性此时暴露无遗。库乔是落网了，但“红色旅”并没有解散，相反，它在蠕动中产生了一个新的头：一个名叫科拉多·阿卢尼的小伙子接替了库乔的职务。与库乔相比，阿卢尼更热衷于恐怖活动。舆论评价，阿卢尼是“使‘红色旅’完成向系统的恐怖活动转变的理论家”。

也就是说，库乔的被捕不仅没有使“红色旅”严重受损，反而使它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初期的“红色旅”刚刚拉开了血腥的帷幕便匆匆落幕，但它的后继者又在杀人的标记下将“红色旅”推进到另一个阶段。这一次，“红色旅”杀人不再是躲躲闪闪、偶一为之的报复行动，而是以制造血雨腥风、产生恐怖的威慑为目的。亚平宁半岛变得更令人胆战心惊了。

库乔的落网让意大利政府有些喜出望外。随后，意大利开始组织对库乔的审判，准备将他绳之以法。但是，库乔的能量这时才充分释放出来。当库乔还是自由的时候，他没有斗得过警察，可是，当他身为犯人时，却挫败了法庭对他的审判。他认为，资产阶级的法庭是无权对他进行审判的。在法庭上，他指着法官的鼻子大叫：“应该受到审判的是你们——资产阶级的老爷！”他警告陪审团：“你们！立即离开法庭！否则，我们的同志会把你们一个个杀死，就像杀狗一样！”结果，陪审员一个个向法官提出，由于被告咆哮公堂，妨碍了司法公正，他们的生命安全无法得到保证，因此，拒绝充当陪审员。

西方不少国家的法律制度是建立在陪审员基础之上的，没有陪审团，法官无法量刑，也无法作出判决。库乔就用他的威严，在法庭上制造了一阵“红色恐怖”，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恐怖的威力，从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威慑效果。

库乔在法庭上与资产阶级老爷们英勇搏斗，他的同志们在狱外也没有闲着。挫败对库乔的审判是“红色旅”的最高目标，围绕这一目标，“红色旅”作了大量工作。根据意大利的司法制度，被告有权为自己进行辩护，法庭也有义务为被告指定律师进行辩护。于是，柯罗希律师就充当了这一个角色。他是都灵市一个德高望重的律师，在意大利司法界享有崇高的威望。为了显示对库乔的审判是公正的，意大利请出了这位老律师，让他为库乔辩护。当柯罗希前往监狱，把自己的来意告诉库乔时，库乔劈头盖脸地把柯罗希骂了一顿：“笑话！所谓审判，不过是资产阶级政府堂而皇之地镇压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场闹剧而已，还请什么律师？如果要辩护的话，我自己会辩护的！”库乔在大学里虽然学的不是法律，但“革命”生涯的磨练已经足以使他胜任一个律师的角色。

柯罗希说：“我是律师，我要履行我的神圣义务。”

库乔见柯罗希不识抬举，立即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小丑！不要讨好政府，你会倒霉的！”

柯罗希没有理会库乔的威胁，开始搜集资料，为库乔辩护。没想到，“红色旅”真的不能理解他的好意，柯罗希大祸临头了。库乔已经在监狱里发出号令，谁帮助资产阶级政府完成对他的审判，谁就要倒霉。“红色旅”找到了柯罗希，枪杀了他。而柯罗希到死都紧紧攥着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为库乔辩护的材料。

这是阿卢尼的杰作。他与库乔里应外合，又一次挫败了政府的审判。有这种恐怖效应存在，还有谁敢充当辩护律师、陪审员？

临退庭的时候，法官对库乔说：“我们终究要审判你的。库乔，你等着。”

“我会等的。我会等一千年！”库乔挥舞着拳头，在法庭上狂性大发。在他看来，谁不怕死，敢来组织这场审判？审判，见鬼去吧！

是的，不怕死的市民确实不多，为了不当这个倒霉的陪审员，有些家庭举家迁往外地。但是，大法官巴巴诺还是找到了12位不要命的人，他们将充当下一次审判中的陪审员。此举意味着什么，他们心里都很清楚。但是，为了将库乔绳之以法，他们也豁出去了。审判准备于1978年3月17日进行。法官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库乔，库乔不屑一顾地说：“不要枉废心机了，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法官正颜厉色地对他说：“这次我们一定要完成对你的审判。”

库乔冷笑起来：“说得轻巧。我不合作，我的同志们也不会坐视这场闹剧开场的！”

法官告诉他，为了使审判能顺利进行下去，这次法庭放在一个兵营里，政府特地抽调了4000名警察来维持治安，如果“红色旅”想劫法庭，那是妄想。

库乔又是一声冷笑：“4000士兵？不过是4000草包而已！”

距审判还有两天，都灵市街头岗哨林立，戒备森严。看这阵势，“红色旅”想劫持法庭不过是一个梦想。审判将如期举行。

深夜，大法官巴巴诺床头的电话铃响了。巴巴诺摘下听筒，一个低沉的

声音传了过来：“这里是‘红色旅’。巴巴诺，我们以上帝的名义起誓，绝不让审判如期举行。”

巴巴诺的心脏似乎暂时停止了跳动。离审判还有两天，“红色旅”能怎么样？因此，他平静地说：“不可能。”

“你瞧着好了。”

“后天就要审判，你们想干什么？又能干什么？”巴巴诺觉得所有的牌都抓在自己手里，“红色旅”本事再大，也翻不了天。

“还有两天时间，这已经足够了。明天，你就会知道了。”

电话挂断了。

明天，明天是3月16日，他们能干些什么呢？巴巴诺在床上辗转反侧，百思不得其解。

“意大利最勇敢的男子汉”

3月16日清晨4点多钟，意大利总理莫罗就起了床。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因此，他的心情十分激动，怎么也不能平静下来。

他做了一遍体操，舒展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开始了洗漱。做完这一切后，他又看了一下日历：没错，是3月16日。莫罗满意地笑了，他觉得，这几个阿拉伯数字就像一个个快乐的音符一样，在他的脑海里跳跃。

61岁的莫罗，是意大利名副其实的元老。他已经五次出任意大利政府总理，可以说，是看着新生的意大利成长起来的。战后，意大利奇迹般的复兴，有他莫罗的一份功劳。他是意大利执政党天主教民主党的总书记。自意大利解放以来，天民党在意大利几乎一直执政，因此，作为执政党的总书记，莫罗的地位可想而知。此外，莫罗还多次出任外交部长，在国际上也享有崇高的声誉。

今天的日子更为特殊。由于莫罗的威望，也由于他的调解，意大利各个政党结束了混战局面，达成了—个历史性的妥协，将成立—个联合政府。莫罗已经得到了各个政党口头上的保证，而今天，国会将讨论这个问题。如果这个协议得到通过，那么，战后意大利最大的一次政治危机将宣告结束。对这一点，莫罗有充分的信心。

7点钟，莫罗与夫人一起共进早餐，洋溢在他嘴角的笑容还没有消去，他真是太高兴了。夫人对丈夫的成就也很欣赏，不过，她还是说了一句：“就算国会通过了这个协议，那又怎么样呢？你知道，政治是那样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

莫罗没理会妻子话中的含义。政治就是政治，这与人情是两回事，夫人不懂得政治，提出这种疑问情有可原。

门铃响了。警卫去开门。莫罗知道，他该去国会大厦了。

他吻别妻子，出了门，上了他那辆菲亚特牌轿车。这只是一辆普通的汽车。莫罗的警卫里奇已经多次要求他将菲亚特换成防弹汽车，但莫罗拒绝了。几十年来，他生活在意大利这块国土上，一直轻车简从，从不招摇，很多时候，他甚至是步行上班。莫罗认为，这样可以与群众打成—片。至于说自己的生命安—全，他倒是很少考虑。虽然，他是一个政治家，而目前的意大利又是问题成堆，社会治安形势复杂，但是，莫罗还是认为，不会有人与他为难的。或许，莫罗相信自己在群众中的威望和他的人格力量。

包括里奇在内的五名警卫也上了车。两辆车一前一后，向国会大厦疾驶而去。前面就是玛丽奥夫尼大街和斯特里大街的交会处，过了这个交会处，莫罗的目的地国会大厦也就到了。

突然，一辆白色的菲亚特从一条小巷里冲了出来，拦在莫罗的汽车前面。莫罗的汽车被迫减速，跟在那辆菲亚特后面缓缓行驶。里奇的警惕性极高，当菲亚特从巷口里冲出来，他就注视着它；不过，他看到，前面的车挂的是外交牌照，一直提着的心也就放了下来。他还注意到，前面的路口处，有四个人穿着民航制服、手里拎着旅行包，他们似乎在等车。

里奇失算了。前面的那辆菲亚特挂的确实是外交牌照。这是一辆委内瑞拉大使馆的车，但是，现在车子里坐的却不是大使馆里的人，而是“红色旅”的战士。他们从委内瑞拉大使馆偷来了这辆车，而其目标，当然是意大利五朝元老——莫罗。

莫罗一看时间已经快到了。他命令司机加速，超过前面那辆菲亚特。司机刚一挂挡，前面的菲亚特却停了下来，莫罗的司机只好来了个急刹车，车胎与地面的高速摩擦发出了刺耳的声音，但总算没有与那辆车亲吻，只是里奇因为猝不及防，脑袋在挡风玻璃上狠狠地撞了一下，直撞得他眼冒金星。而后面的警卫车则根本来不及作出什么反应，就啃上了莫罗的座车，四个警卫全部受了伤，虽然伤势并不重，但已经使他们的反应变得极为迟钝。

就在一刹那，似乎在等车的四个穿民航制服的人，突然从旅行包中抽出了冲锋枪，闪电般地奔向莫罗的两辆车，几下就敲碎了汽车的挡风玻璃。雨点般的子弹打在里奇和司机的身上，而后面的四个警卫见势不好，拉开车门就想往外跑，但子弹跑得比他们更快。三个人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就倒了下去。最后一个人拉开了车门，跑出了几步，也被子弹击中，全身被打成了马蜂窝。

从撞车到枪声结束，总共只有几十秒的时间。莫罗坐在车上，一动不动。他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他没有反抗，也无法反抗，连久经训练的里奇都没有来得及做出什么反应，他莫罗一个文人，连枪都没有摸过，能干什么？

由于恐惧，莫罗的脸上已经没有血色，但是，里奇和司机的鲜血，却喷到了他的脸上。

“滚出来！”一声喝令，菲亚特的车门被拉开了。莫罗从车里挪了出来，有一颗流弹击中了他的屁股，因此，行动略显艰难。

他手里拿着公文包，里面有他准备面对全体国会议员发表的演讲稿。他攥着他的公文包，故意把自己的头昂得高高的。

“上车！”又是一声命令。莫罗没有违拗。他知道碰上了谁。他挺胸、阔步，向恐怖分子的车走去，走了两步，又回首看了一眼里奇和司机的尸体，眼中充满了怜悯。

突然，他抛下了公文包，用恳切、近乎哀求的口吻对恐怖分子说：“求求你们，放了我吧！”

恐怖分子没有理会他的哀求。一个名叫安娜的女恐怖分子厉声说：“上车！”

莫罗顺从了。菲亚特扬尘而去。

一个妇女站在附近一座楼房的阳台上目睹了这一切。事后，她激动地说：“他是意大利最勇敢的男子！”尽管莫罗在最后的关头曾经有过胆怯，但是，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谁不会产生这种瞬间的感觉呢？因此，瞬间出现的

恐惧并不会影响莫罗的形象。

“宝石”行动

莫罗被绑架！意大利举国震惊！全世界都被惊动了！

罗马戒严！全国戒严！罗马城的军警连夜出动，封锁了罗马城的各个主要路口，设置关卡和路障，对一切过往车辆进行检查。同时，政府紧急调动5万军队增援罗马，对各个地区进行拉网式搜查。政府指望通过这种行动，能找到莫罗。一时间，只见罗马街头军警林立，到处都是鸣着警笛的警车在奔驰，一队队警察在居民区进进出出。自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跨台后，意大利人民已经久违了这种阵势。

是谁绑架了莫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恐怖组织宣称对此事负责。但是，意大利人对究竟是谁干了这种恐怖勾当，心里还是有底的。巴巴诺法官想起了那个神秘的电话。上帝！难道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来阻挠对库乔的审判？真是太可怕了！

3月19日中午，罗马《信使报》记者巴沙拉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要他到亚兰诺路天桥下去拿“第一号公告”。巴沙拉是《信使报》资深记者，在罗马这个恐怖主义肆虐的城市，他曾无数次替恐怖分子向外界通报他们的活动情况，传达他们的要求，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第一号“信使”。

巴沙拉一看就知道，第一号公告绝对与莫罗有关，这是第一手的新闻线索。他发疯似地奔了过去，在桥下见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公告上印着莫罗的照片。照片上的莫罗神情沮丧地坐着，背后的墙上有一面旗帜，红五星、机关枪历历在目。

“红色旅”在第一号公告中列举了莫罗的几大罪状，为其绑架莫罗的行径辩护，并提出条件：释放库乔。库乔是“红色旅”的领袖，而莫罗是意大利资产阶级政府的领袖，双方进行对等交换。

原来如此！巴巴诺这才明白，“红色旅”还有这么一手。好厉害！

这次名叫“宝石”的行动并不是3月16日临时策划的。早在半年前，“红色旅”就计划搞一个世界上最大胆的行动，以震动整个意大利，救出库乔。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是一个绝色女子，名叫安娜，她是库乔的大学同窗，也是“红色旅”的创始人之一。只要抓到莫罗，不愁意大利政府不放出库乔。这笔交易他们是赢定了。因此，半年来，他们不断到当地察看地形，熟悉这里的一切，选择最佳的攻击路线，然后，又一次次地进行演练，直到一切都显得天衣无缝。这里原有一个老头，每天早上必定开着他的汽车来到这里卖花，“红色旅”嫌他碍事，在3月15日深夜把他的车胎搞瘪了，这样，第二天他就来不了啦。为了不引起莫罗警卫的疑心，他们特意从委内瑞拉大使馆偷来一辆小汽车，取下了上面的外交牌照，然后又搞了一辆警车，这样，事成后逃起来方便。3月16日8点半，三个身着电话公司制服的人出现在玛丽奥夫尼街的邮电局前，破坏了这一带的电话线，以致事发后居民竟然无法打电话报警。

一切都无懈可击，莫罗可以说插翅难飞。

大搜捕在夜以继日地进行，警察发了疯似地一心要把莫罗找出来。他们把罗马翻了个底朝天，可是，连莫罗的影子也没有发现，以致有人怀疑，是不是“红色旅”在事发后就转移出了罗马，莫罗已经不在罗马了？

实际上，莫罗的藏匿地点离出事地点并不远，就在警察的眼皮底下。安娜深知，不管他们的事先准备多么充分，在现代交通条件下，他们是跑不出多远的。因此，他们事先就准备好了一个藏匿之处。那是一个地下停车场的修理库，离事发地点仅几百米。就在莫罗被绑架的那一天，警察已经对这个修理库进行过搜查，但是，他们没有发现“红色旅”改造过的隔音密室。百密一疏，莫罗与幸运之神擦肩而过。

被关在密室里的莫罗度日如年。屁股上的枪伤已经开始化脓，“红色旅”不想对他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因此，拒绝给他医治。实际上，在警察满天飞的情况下，如果“红色旅”对莫罗实施“革命的人道主义”，他们自己就跑不了。因此，莫罗呆在斗室里痛苦不堪。每天，他必须聆听“红色旅”对他的指控，接受对他的“正义审判”，还必须阅读“红色旅”的“革命文学”和“红色旅”的文件、公告、大事记。这倒是一个了解“红色旅”的绝佳机会，对日后打击“红色旅”有百利而无一弊。只是莫罗心情不佳，想不到这上面去。连续不断的心理折磨与车轮式的疲劳轰炸渐渐摧毁了莫罗的心理防线，他每天恶梦不断。

“红色旅”不断发表公告，向政府施加压力。同时，他们充分利用了抓在自己手中的莫罗。莫罗被迫向政府内阁成员们和自己的妻子写了很多言辞恳切的信件，请求他们释放库乔，与“红色旅”谈判。在致内政部长科西加的信中，莫罗写道：“这些天，我被作为一名政治犯，作为天民党主席被判.....

“在上述情况中，除了涉及不能忽视的人道考虑外，还涉及到国家理性的问题。国家理性意味着首先要考虑我目前的处境。我处于完全的、没有控制的统治下，并有可能被迫以一种令人不快的、危险的方式讲话。让无辜受害者为抽象的合法原则作出牺牲，这种牺牲是不能允许的。不能因为一个国家没有制止对国家生活中高级人物的绑架就说它丢了脸。

“当谈到国家的活动时，我想起了勃列日涅夫和皮诺切特的交换，即大量交换特务，把持不同政见者驱逐出苏联领土。”

莫罗在信中提到了国家的理性问题，不知道他是否想起绑架那天夫人与他说的话。夫人告诉他，政治斗争是那样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当时他是一笑置之。确实，让无辜者为了抽象的原则受害是不能允许的，但是，他没有想到，反恐怖主义、不向恐怖分子屈服并不是什么抽象的原则，而是摆在各个国家、各个政府面前的实实在在的难题，而他莫罗，作为天民党主席和意大利政府总理，并不是什么与恐怖主义无关的人，更不是什么“无辜”的人。“红色旅”有充分的理由拿他开刀。莫罗在信中还提到了间谍交换的问题。这种事情在冷战时期曾发生过多，尤其在美国和苏联之间，这种交换更是屡有发生。可是，莫罗先生没有想到，苏联与美国间交换的是间谍，而不是政治家。一个暴露的间谍是无用的间谍，而一个沦为人质的政治家则是一个筹码，双方是不等价的。因此，莫罗的哀求是无法打动意大利政府的头头脑脑的。

莫罗的信在《信使报》发表，在意大利引起轩然大波。莫罗委婉凄凉又略带哀求的陈词令意大利人民久久难以平静，政府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压力。确实，莫罗的信具有几分合理性。对待恐怖分子的绑架，历来有两种做法。一是满足恐怖分子的要求，双方达成妥协。这种情况在过去也屡有发生。但更多的是，政府拒绝恐怖分子的要求，双方最后拼个鱼死网破。意大利政

府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呢？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略作犹豫，就达成了共识：不能向恐怖分子低头，不接受他们任何形式的讹诈。意大利政坛的两大巨头天民党和共产党都表示，即使这封信真是莫罗所书，也一定是饱受折磨后被迫写的，甚至可能是受到了药物影响，因此，信中的恳求不足为凭。

政府对莫罗的信没有反应，库乔也没有得到释放。“红色旅”就逼迫莫罗一次次地拿起笔，向自己的同僚请求。“红色旅”的公告接二连三地出笼，而莫罗那哀怨动人的信件也一起在报上公布。但所有这些都如同泥牛入海，音讯全无。他简直弄不明白，现今的意大利政府很多人都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们为什么就这么冷酷无情呢？他没有想到，如果被绑架的不是他莫罗而是其他什么人，他也会采取同样的措施。中国有句古话，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被绑架的是莫罗，他虽然是意大利政府总理，在意大利政治生活中影响很大，但是，他并不是上帝，意大利人离开莫罗照样可以生活。他不在了，意大利人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表决机器，重新选出一位总理。因此，自从他沦为人质，他就不再是政府总理了。此时的莫罗，只是意大利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政府有必要为了一个平民而向恐怖分子屈膝吗？显然不会。

莫罗在失望之余，无可奈何地在信中哀叹道：“说实话，我甚至有点感到被你们抛弃了。”不过，失望的岂止是莫罗，“红色旅”也是恼羞成怒。它原以为抓住了莫罗，意大利政府就会就范，谁知意大利政府会采取这种态度。“红色旅”按捺不住心中的恼怒，决定好好地将意大利政府戏弄一番，看看这个貌似强大的国家机器，能顽固到何时？

4月18日，“红色旅”发出了第七号公告。公告声称：“我们已经用自杀的方式处决了天民党主席莫罗。现在他葬身于杜凯萨湖的泥泞湖底。”意大利当局立即忙碌起来，几十名蛙人在湖底折腾了两天，结果捞起了一个精神病患者。“红色旅”看到这一幕，得意地哈哈大笑。一个貌似强大的国家机器，被“红色旅”折腾得团团转，“红色旅”好不开心，他们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不过，仅做到这一点还是远远不够的。“红色旅”还想捉弄政府几次，像猫捉老鼠一样，猫要把老鼠戏弄够了，这才吃掉它。

20日，第八号公告又出笼了。公报实际上是一张莫罗的照片，照片上的莫罗身穿白衬衫，神情沮丧，坐在椅子上，手里捧着一张最新出版的报纸。这就足以证明，莫罗确实还活着。但是，“红色旅”在最后声称：“天民党及其政府必须在48小时内释放我们的战友，时间从今天下午格林威治标准时间算起。时间一过，我们就处决莫罗！”

政府没有理会“红色旅”的要求。都灵的检察官发誓：“即使政府与‘红色旅’达成了幕后交易，我也绝不会签署释放库乔的命令。”莫罗的老部下们面对声泪俱下前来求助的莫罗夫人，沉痛地说道：“党的立场不会改变。我们也绝不能与恐怖分子对话。这样，即使莫罗被害，也等于意大利精神上的胜利。”莫罗夫人再次对自己的名言“政治斗争没有人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莫罗还在不断地向自己过去的部下写信。求生的欲望迫使他不断地写下去，直到自己完全绝望。现在他知道，过去的部下不会因为他的生命而背弃国家利益。有时他也想到应该体谅他们的苦衷，如果自己处于这个位置，也一定会这么做。不过，更多的时候，他还是想不通：为什么这些同事和部下，竟然为了那虚幻的原则而抛弃他莫罗，置他的生死于不顾呢？政府的答复，他也从电视上看到了，知道“红色旅”没有撒谎，政府确实不愿让步。当他

从电视上看到，他的第 80 封信也被政府拒绝了，他才彻底死心，不再作求生的打算，开始等待死亡的来临。

最失望的还是“红色旅”的领导人阿卢尼，他原指望通过莫罗要挟意大利政府，这次他失算了。现在他面临一种两难境地：处死莫罗，那么，表面上看，“红色旅”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实际上，绑架的目的没有达到，库乔没有获得释放，“红色旅”一无所获。而如果放了莫罗，那么毫无疑问，政府取得了胜利。政府用它的行动证明，自己对待恐怖分子是不会姑息的。以后，“红色旅”不用再搞绑架了，因为没有人相信“红色旅”会撕票。思前想后，阿卢尼决定：处死莫罗。

5月9日，这是莫罗住进修理库的第55天。下午1点，“红色旅”的执法队来了，他们向莫罗宣布了“人民法庭”的判决：对前总理、资产阶级的代表莫罗的指控全部成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此时的莫罗一扫近两个月来的沮丧和悲哀。反正死定了，哀求也是无用的。不如死得硬气，像一个铮铮铁骨的汉子。

莫罗用完了最后的晚餐，洗了澡，理了头发，穿上了自己的衣服，仔细地把自己修饰了一下，就像要出远门一样。随后，他要求恐怖分子帮他请一个牧师，为他祈祷一下，恐怖分子也答应了。随后，他随恐怖分子出了门。临行前，安娜问他，要不要服用一点镇静剂？莫罗昂着头说道：“不需要。”

来到大街上，莫罗贪婪地呼吸了一下新鲜空气，这是最后的时刻了，过去关在密室里，连空气也是不自由的。现在，他终于走出了密室，虽然这已经是最后一次了。

安娜命令他躺到车厢的后排上，莫罗顺从了。安娜对准莫罗，扣动了扳机。她接连打了11发子弹，但没有一发正中心脏。这并不是因为她的枪法差劲，而是她不想让莫罗死得太快了。她要折磨他，发泄心中的怨恨。十分钟后，在车上抽搐着的莫罗痛苦地死去，他的身体蜷缩在车上，像一只烧熟的海虾。

罗马电视台的新闻播音员呜咽着把这个消息告诉意大利人民，意大利举国同悲。悲痛难抑的人们自发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喊着“立即处死库乔”、“为莫罗报仇”的口号，来到政府门口请愿。战后意大利历史上第一次不同年龄、不同党派的人肩并肩地走到了一起，为了莫罗的死，他们放弃了分歧。共产党的红旗与天民党的白底红十字旗一起在示威队伍的上空飘扬。

“红色旅”的政治形象急剧下降。如果说，在莫罗事件之前，意大利人民对他们的政治主张还有一丝同情的话，那么，在莫罗被枪杀后，他们的真实面目一下子暴露出来。在意大利人民的心中，他们变得比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还要可恶。阿卢尼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种印象甚至影响到公众对意大利左派力量的总体评价。虽然意大利共产党与“红色旅”没有任何联系，共产党也反对“红色旅”的恐怖行为，在莫罗死后，意大利共产党也参加了示威游行，但是，公众对他们仍持怀疑态度。在当月进行的选举中，意大利共产党的得票率下降了30%。

“红色旅”内部也因莫罗事件出现了分歧。库乔在都灵的法庭上得意洋洋地宣布：“杀死莫罗是一个革命的正义的行动，暗杀是在这个有阶级的社会中能采取的最人道不过的手段。‘红色旅’对国家的宣战将继续下去。”但是，与他同时被捕的另一位“红色旅”领导人马拉斯基却从狱中带出信件，

宣布与“红色旅”断绝关系，说“对莫罗的袭击不可能推进无产阶级事业。我必须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斗争而执言，不要再把我看作是‘红色旅’分子”。马拉斯基背叛“红色旅”阵营，剩下的“红色旅”分子也分成了两派。“军事派”主张用极端手段消灭一切敌人，制造恐怖气氛，而“运动派”则主张只有在真正打击国家机器的前提下才动用恐怖手段。两派相互争吵，相互拆台，“红色旅”元气大伤。

莫罗事件同样震惊了意大利政府。在此之前，意大利已经成了恐怖主义肆虐的乐园，这一方面是因为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另一方面是因为意大利一直缺乏得力的反恐怖主义措施。议会没有这方面的立法。意大利议会曾想制定《反恐怖活动法》，但由于议员的相互扯皮而没有结果，最终不了了之。莫罗的死擦亮了人民的眼睛，因此，莫罗死后一个星期，议会便以绝对多数赞成通过了这个法案。法案加重了对绑架、暗杀等恐怖行为的处罚，而且授予了警方必要的权力。内政部长科西加还任命安东尼奥·法列洛为“中央安全行动核心”的头目，让他从国防军和全国警察部队中挑选了170名精干人员组成反恐怖部队，其主要任务是对付绑架、劫持飞机等恐怖活动，对付“红色旅”是其工作重心。“核心”直属内政部“侦察和特别行动中央办公室”指挥。但是，为了保密，意大利政府不承认有这么一支部队存在。意大利的宪兵部队也成立了一个“特别干预小组”，由100多人组成，主要是一些射击能手和跳伞尖子。如有意外行动，它直接听命于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两支部队在以后的岁月里，给“红色旅”多次沉重的打击。

中国有句古话：天降其殃，犹可说也；自作其殃，不可说也。这句话用在“红色旅”身上也很合适。莫罗事件是“红色旅”恐怖事业的顶点，在这一事件中，“红色旅”风头出尽，一时间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其声势威镇海内外。但是，莫罗事件也是“红色旅”衰落的起点。人们暂时遗忘了意大利的老牌恐怖组织黑手党，“红色旅”成了罪恶的代名词，名声一落千丈。莫罗事件成了“红色旅”走向衰落的导火线，而点燃这根导火线的，正是“红色旅”自己。可悲的是，“红色旅”的决策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阿卢尼还杀气腾腾地说：“我们的口号不再是咬了就跑，而是开枪杀人。”意大利议会通过《反恐怖活动法》，阿卢尼认为这是对“红色旅”的公开挑战。于是，他杀气腾腾地下达了密杀令，意大利总理、莫罗的接班人安德烈奥蒂，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和参议院议长范范尼赫然在列。但是，由于莫罗事件提醒了意大利政府，警方加强了对政界要人的保卫，“红色旅”的杀人阴谋没有得逞。相反，阿卢尼等一批恐怖分子却落入了法网。

1978年9月14日黄昏，警方接到内线举报，包围了米兰市的格罗利大街3012号。“红色旅”头号人物阿卢尼束手就擒。警方从他窝藏的地方搜到了机枪2挺、手枪14支、各种口径的子弹1200发，此外还有防毒面具、匕首等物，简直是一个小型的军械所。警察看了目瞪口呆。

“宝石”行动没有换得库乔的自由，却又赔进了阿卢尼自己。“红色旅”两代领导人相继落网，元气大伤。在此后的几年时间内，“红色旅”的残余分子忙着舔伤抚痛而无暇复仇。

最后的疯狂

意大利南部有一个名叫维罗纳的小城，气候宜人，风景秀丽。莎士比亚

的名作《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地方。优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和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建筑，吸引着一群群观光客，他们来此抚今追昔，寻觅这一对情圣的踪迹。因此，维罗纳又是一座旅游城市。尽管如此，维罗纳在世人心目中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如果不看莎翁的名作，谁会知道意大利还有这么一个地方呢？可是，1981年12月17日发生在维罗纳的一件事，却使它成了一时举世瞩目的焦点。

当天下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南欧盟军地面部队副参谋长、美国陆军准将詹姆斯·多齐尔将军结束了一天的公务，回到家中。6点钟左右，四名自称是煤气公司工人的人来到他的家门口，按响了门铃。多齐尔夫人朱迪斯赶紧打开门。来说：“我们是公寓的水暖工，现在前来检修煤气管道。”朱迪斯心中感到诧异：我家的煤气管道没有出问题呀？再说，我也没有报修。她心里嘀咕着，可还是把他们让进了大门。她还没有来得及把他们引到厨房里去，这四个人就迫不及待地动起了手。他们捆住了她的手脚，嘴里塞上了破布。接着，他们就掏出手枪，向里间的多齐尔将军扑去。门口的响声惊动了多齐尔，他立即意识到，情况不对，可能有问题。于是掏出手枪，准备抢占有利位置。不愧是军人，多齐尔的行动十分敏捷，但是，那四个工人的手脚也很麻利。他们扑了上去，与多齐尔扭打起来。50岁的多齐尔哪里是四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的对手，没几个回合，多齐尔被打倒在地。四个人把他塞进了一只大木箱，然后大摇大摆地把他抬了出去。

一切都准备得天衣无缝。木箱是事先准备好的，楼下的汽车也是等着的。木箱被扔上了车厢，汽车疾驶而去。

第二天早上，多齐尔的警卫来接将军去上班，可是，不管他怎么敲门，里面连一点反应都没有。他知道大事不妙，立即敲开窗户，进入将军的住宅，结果发现将军的夫人被捆在地上，嘴里塞着布团，已经说不出话来了，而将军则下落不明。

多齐尔60年代曾在越南战场拼杀过，后来调到南欧盟军地面部队司令部任职，他是这个司令部职务最高的人，因此，他掌握着大量的军事机密。多齐尔将军的意外失踪，急坏了美国总统里根，也急坏了意大利政府。

这起恐怖勾当是谁干的？人们立即想起了往事：三年前，意大利总理莫罗被“红色旅”绑架，最后被枪杀。这一次，多齐尔的命运如何呢？是不是又是“红色旅”干的？

绑架者马上就亮出了他们的身份。第二天，意大利安莎社维罗纳分社接到一个匿名电话：“我们，来自威尼斯、米兰和那不勒斯、罗马的‘红色旅’战士，绑架了这个北约刽子手多齐尔。现在，他已经被关在人民的监狱里，人民监狱将对北约组织的刽子手进行人民的审判。”口气与当年绑架莫罗一模一样。

“红色旅”卷土重来！消息震惊了整个世界。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立即打电话给里根，对这起绑架事件表示“非常遗憾和震惊”。里根总统恨恨地说：“‘红色旅’是一帮怯懦的游民，他们不是英雄。他们没有胆量公开站出来面对任何人。”不过，他不得不承认，美国目前面临的局面“十分令人失望”。

是的，目前的形势确实令人感到失望。“红色旅”在经过两年时间的养伤后，又卷土重来了。此前，他们已经干起了多起恐怖勾当，其中主要是绑架人质，这是它的拿手好戏。1981年4月27日，“红色旅”在那不勒斯绑

架了天民党负责住宅事务的部长齐罗·齐里罗，它向政府开出的价码是把市内空闲的私人住宅分给在1980年地震中失去住宅的人。“红色旅”此举明显是在收买人心，因为自从莫罗事件后，它在意大利人心目中的威望尽失，那顶美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光环也消失了，有人甚至这样说：“像他们这样的革命，一万年也不会成功。”在这种情况下，“红色旅”也干一些事情，证明自己确实在为人民着想，以收买人心，挽回损失。这一招倒有些威力，政府不能拒绝它的要求，因此，“红色旅”的愿望得到了满足，空闲的住房分出去了。但是，“红色旅”的本性这时又暴露出来了，它并没有立即放人，而是向齐里罗的家人勒索了一大笔赎金，这才放人。1981年6月3日，“红色旅”又以工人阶级的救世主自居，绑架了阿尔法汽车制造厂的经理桑德鲁奇，迫使其放弃了解雇5000名工人的计划。在要求得到满足后，“红色旅”发布公告：“无产者法庭已经决定释放桑德鲁奇。”

接连几次绑架得手，“红色旅”又得意忘形了。它以为自己的形象已经有所改善，因此，准备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1981年下半年，它宣布准备组建恐怖国际，以“红色旅”和“红军派”为核心，联合西班牙的“埃塔”和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军，向以美国为首的“跨国公司的帝国主义”开战。为了扩大影响，“红色旅”决定搞一起轰动事件，拿一个美国人来“祭旗”，多齐尔不幸中选。

多齐尔被绑架后，意大利立即成立了一个“紧急行动中心”，全权负责多齐尔的营救工作。吸取莫罗事件的教训，“紧急行动中心”认为，“红色旅”还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把多齐尔转移出维罗纳地区。多齐尔一定被关在维罗纳某个地区，因此，警方立即封锁了维罗纳至帕多瓦地区，并开始了规模空前的搜捕行动。这一次，意大利警方得到了美国和德国专家的帮助，他们对该地区进行了地毯式搜查，每个角落都查到了。这次行动抓到了不少“红色旅”成员，但多齐尔仍然下落不明。

12月27日，“红色旅”的第二号公告出笼了。公告没有提及释放多齐尔的条件，只是说：“多齐尔这个猪猡，这个暗杀者，是美国在越南进行大屠杀的‘英雄’，在那里，由于他的‘功绩’，他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勋章。同志们，无产者们，无产阶级对猪猡多齐尔的审判已经开始了。”看来，这一次“红色旅”要杀掉多齐尔，为全世界的无产者特别是越南战争中受害的无产者报仇。多齐尔看来是死路一条。

意大利政府的要求是，多齐尔活着要见人，死了要见尸。“红色旅”不断发表虚假信息，一会儿说多齐尔关押在阿尔卑斯山的某个无名山谷里，一会儿又说尸体已经运到某军营附近的汽车里面，但是，所有这些线索经过核对都是假的。这说明，“红色旅”还没有处死多齐尔。警方悬赏170万美元，奖励提供线索者。据说，意大利警方还与另一个老牌恐怖组织黑手党联系过，要求他们协助搜查多齐尔，结果，线索源源不断。

1月20日，警察已经搜到了帕多瓦地区，此地离维罗纳不过50公里。网一点点在收缩。

25日，帕多瓦警署的报警器响了，值班警察一把抓过报警器：“帕多瓦警署，请先报姓名和住址。”

“我不愿意透露姓名。”对方拒绝了警察的要求。警察立即压下录音机的开关。

“现在我把‘红色旅’关押多齐尔的确切地址告诉你们。他被关押在宾

德蒙大街2号马利罗·法拉斯勒医生的公寓。”

警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谁提供了这个机密情报？是黑手党，还是“红色旅”的叛逆，抑或是偶然发现线索的老百姓？不得而知。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知道了多齐尔的下落，又不用付出170万美元的巨额酬金，这笔买卖不亏本。

意大利警察特种部队“金豹”中队的负责人布尔吉塞负责对这个情报进行核实。布尔吉塞立即带领他的部下来到宾德蒙大街2号。这是一幢8层高楼，一楼是附近几个街区最繁华的“迪阿依”超级市场，楼上则住着居民。由于附近只有这么一家超级市场，因此，平日这里热闹非凡，购物的、观光的，络绎不绝。布尔吉塞走进了超级市场，与营业员聊了起来。一位营业员告诉他，他曾看到几个人抬着一个很重的大木箱上楼去，当时大家都没在意。布尔吉塞又向其他几个营业员核实，结果大家都记起来了，而且时间就在多齐尔失踪那天。布尔吉塞什么都明白了。好家伙！“红色旅”也真会选地方。如果不是那个神秘电话，很难想象这卫会有一座“人民监狱”，而这大概正是“红色旅”的高明之处。中国人说，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最平常处，最不显眼的地方，往往最安全。熙熙攘攘的人群足以掩盖“红色旅”的活动，热闹非凡的超级市场上出现几个陌生面孔大概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莫罗被关在修理所的隔音室里50多天，警察几次搜捕而一无所获；如果这次没有人举报，人们发现的恐怕又只能是多齐尔的尸体。

“红色旅”的一切安排都显得天衣无缝，但是，百忙之中，他们忽视了此地一个最大的弱点：没有出路。一旦被发现，警察包围了通道，那么，他们只有束手就擒。

也许是艺高人胆大，也许是他们根本就不认为有人会发现他们藏匿在这个地方，反正“红色旅”没有意识到这个危险。因此，他们守在楼上的“人民监狱”里，外边连个岗哨都没有。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风水轮流转，这次，该意大利警察出头了。每战皆败，不是警察的作为，这一次，意大利警察要改写记录。

紧急行动中心立即研究营救方案。有人建议在深夜动手，有人主张在拂晓时分出击。大家都能提出一堆理由支持自己的观点。但布尔吉塞却提出，应该在中午出击。理由是，夜晚固然有利于隐蔽，但是，敌人在这个时候警惕性最高，不利于造成突然袭击，而且，夜袭很可能造成误伤，如果一不小心，打死了多齐尔，那么此次行动有什么价值？这一点最有说服力，因此，利用夜幕进行掩护的方案立即被否决。布尔吉塞认为，中午人多，恐怖分子思想麻痹，这是实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最佳时机。于是，紧急行动中心决定，1月28日中午11点半开始行动，由布尔吉塞负责。

28日天还未亮，通往帕多瓦郊区的各个出口都被封锁了。超级市场周围布满了便衣警察。布尔吉塞和他的10名战友，也提前进入出击点。他指着二楼，告诉他的同事，那个窗户上写着大A字的房间，就是多齐尔关押的地点。

11点半，时间到。一声令下，超级市场旁边的一辆铲泥车开始启动，巨大的轰鸣声掩盖了其他一切声响。紧接着，布尔吉塞和他的战友们跳下车，向二楼奔去。早就隐蔽在人群中的便衣警察立即露出真面目，他们命令街上的行人立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防止发生误伤，命令一切车辆停驶，封锁所有的路口，防止恐怖分子逃跑……

布尔吉塞和他的战友们冲进超级市场时，曾引起一阵小小的骚乱。由于

“金豹”中队一身黑衣，每人头上都带着有色塑料兜，蒙住了脸部，只露出两个眼睛，模样十分怕人，因此，当他们冲进超级市场时，人们还以为碰到了打家劫舍的强盗，尖叫声不绝于耳。一个妇女当场昏了过去，营业员也战战兢兢，躲到了柜台的后面。

混乱会惊动恐怖分子！断后的警察立即把住大门，大声宣布：“我们是警察，大家安静，不要害怕，也不要乱动！”楼下逐渐安静下来。

楼下发生骚动，二楼的“人民监狱”却十分平静，恐怖分子根本没有意识到外面发生了什么。几十天来，他们一直太平平地呆在这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们庆幸自己选了个好地方。这座“人民监狱”里，“犯人”只有多齐尔一人，看守却有四人，领头的叫安东尼奥，绑架莫罗就有他的份，此次他已经是一个小头目。他个头不高，一副书生相，是“红色旅”的笔杆子，此刻他正在里面的房间看报。他太投入了，因此，外面发生的一切他一点也没在意。另外三名恐怖分子，有一对男女正在谈情说爱，而另一名因刚刚从超级市场购物回来，正在收拾东西。他们也没有注意到外边发生的事。

房间的中间是一张钢丝床，床上坐着可怜的多齐尔。他脸色苍白，看样子身体不好。他的手被扣在床上，头上戴着耳机，耳朵里流行音乐在轰鸣。倒不是“红色旅”十分人道，让他听音乐，而是怕他偷听他们的谈话。自进入这座“人民监狱”，“红色旅”已经对他进行了多次审讯，但他一直缄口不言。原来，他的眼睛上还蒙着黑纱，但这两天，“红色旅”分子不再给他蒙黑纱了。唉，关进来日子也不短了。外边一直没有动静，看来警察是找不到这里了。“红色旅”看来也失去了耐心。死期将至，多齐尔心里烦躁不安。

轰的一声巨响，门被撞开了。正在整理东西的恐怖分子还没来得及扭过头来，已经被枪托击中，谈情说爱的男女立即从两人世界里清醒过来，男的拔出了手枪，对准了多齐尔的脑袋。但是，他还没来得及扣动扳机，一个突击队员已经一个虎跳，奔到他的旁边，用枪托猛击他的头部。一声惨叫，手枪从他的手上脱落，在空中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线后，落在地上。

太幸运了！从恐怖分子的手枪顶上多齐尔的脑门，到他的手枪被撞落，只是一眨眼的工夫。突击队员的动作稍微迟滞一下，恐怖分子的动作再麻利一点，那么，多齐尔就会一命呜呼。这其中恐怕只有百分之一秒的时间，可就在这段时间里，多齐尔已经从生到死走了一圈。他大叫起来：“太漂亮了！干得太好了！”造物主彻底抛弃了恐怖分子。

安东尼奥的报纸还没有放下，突击队员已经冲到了他的面前：“举起手来！”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他的脑门，安东尼奥知道，他的动作再快，也没有逃生的机会。于是，他乖乖地举起了手。

从突击队员撞门，到安东尼奥就擒，总共只用了90秒钟。多齐尔被突击队员从床上扶了起来，简直不相信自己已经获得自由。

他被带到帕多瓦警署，警察拉了一把椅子请他坐下，多齐尔风趣地说：“我已经坐了整整六个星期，该好好站一下了。”说话间，电话已经打到罗马和华盛顿，华盛顿的电话回过来了。接线员说：“里根总统要与你亲自讲话。”被囚禁42天的将军，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

意大利警察乘胜追击，继续搜捕“红色旅”分子。在此之前，已经有1500名“红色旅”分子落入法网，其中包括“红色旅”在罗马的头目乔瓦尼·森扎尼。多齐尔获救之后，意大利警方又发出了几百张逮捕证。在营救多齐尔一役中抓获的安东尼奥成了一个悔过者，他向警方提供了很多“红色旅”

分子的线索。结果，又有 100 多名恐怖分子落网。在这场大搜捕中，“红色旅”的各个纵队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几乎所有重要的头目都成为警方的囊中之物。

毁灭性的失败使一些“红色旅”分子产生了信仰危机。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反思，对前途感到悲观失望。他们不明白，他们口口声声代表了无产者的利益，但为什么这么多无产者都不与他们合作，反而向警方通风报信呢？安东尼奥想起了自己被带出超级市场时，围观的群众射向他的愤怒的眼神。恐怖行动不会带来社会的进步，“红色旅”代表的不是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部分“红色旅”分子幡然悔悟。1983 年 1 月，从意大利传出消息，关押在监狱里的部分“红色旅”领导人，包括其创始人库乔，已经公开发表声明，认为当年产生意大利恐怖主义的社会根源已经不复存在，自己的政治纲领破产，因此，他们决定放弃武装斗争。这个消息令意大利人欢欣鼓舞。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红色旅”分子都认清了大势。还有一些人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企图卷土重来。鉴于“红色旅”的创始人库乔都已悔过，再打“红色旅”的旗号明显不合时宜了，因此，部分“红色旅”残余放弃了“红色旅”的招牌，亮出了“战斗的共产党”的旗号，继续进行恐怖活动，其手段之残忍，令以前的“红色旅”自叹弗如。因此，意大利反对极左恐怖主义的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

西西里的苦难 ——意大利的黑手党之战 世纪审判

1986年2月10日上午10时，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首府巴勒莫汽笛长鸣，全市的机关、学校、工厂全部沉默一分钟，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及时把这一情景传播到全国乃至整个世界。

按常理推论，这种阵势使人觉得意大利可能正在举行国葬，或许有哪一位政界要人死了。但是，今天的情景恰恰相反。意大利今天在巴勒莫地区的巡回法院开庭审判黑手党。这是一个生命力特强、历史特别悠久的历史恐怖组织。按理，意大利人民对此应该欢欣鼓舞，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意大利人既没欢呼，也没雀跃。巴勒莫的市民只是默默地向巡回法院所在地注视了一下，然后，依旧去干自己的工作。法庭里，旁听席上听者寥寥，只有审判席上神态庄严的法官，惴惴不安的陪审员，如临大敌的警察，此外就是关在笼子里的囚徒和少数几个旁听的记者。这次审判是意大利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审判，就是当年推翻法西斯统治，意大利也没有经历过这种阵势。对这次审判，意大利政府虽然有理由感到欣慰，但是，考虑到这一次反“黑”之战尚未结束，胜负尚没见分晓，因此，它不能过早兴奋，免得让人家看笑话。因此，它只是规定西西里全岛静默一分钟，既是对这次审判的关注，也是哀悼苦难的西西里的过去。至于说老百姓，他们就更有理由表示沉默了。因为鹿死谁手还不得而知，过早兴奋只会招来灾难。理由是明摆着的。过去政府扫黑也不是没有取得过进展，但黑手党像一只不死鸟一样，一次次卷土重来。这次，政府扫黑的力度虽然大了点，抓住了200多名黑手党分子，其中不乏黑手党的头面人物，如黑手党的领袖卢恰诺·利吉奥、财政部长皮波卡罗，但至关重要的黑手党教皇格列科尚不知下落，法庭为他预设的铁笼子还是空着的，谁知道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在背后会干出什么勾当来。因此，西西里人只能姑妄看之，对审判持观望态度。

对意大利政府来说，这次审判是政府反黑行动取得成就的集中体现。共有475名罪犯遭到起诉，其中一人已经死亡，尚有115名潜逃。主控官准备的起诉书长达8600多页，涉及的谋杀案就有97件。审判动用了150名法官，300名辩护律师，前后将长达一年时间。如此庞大的规模，不用说在意大利，就是拿到全世界，怕也没有先例可循。因此，对这次审判，政府的态度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为此，政府拨款300亿里拉（合1900万美元），专门在巴勒莫盖了一座面积为7500平方米的法庭，并在墙上安装了闭路电视，每次可供30名犯人受审，他们将关押在装有铁栏杆和防弹玻璃的笼子里，另有三个笼子是留给证人的。新建的法庭靠近监狱，两者之间还修建了一条钢筋水泥隧道，可以押解犯人到堂。为了保证审判顺利进行，西西里的警察已经倾巢出动，政府另外还从全国其他地方抽调了1000名警察。他们被部署在法庭的外围和巴勒莫的主要街道。另外，250名警察荷枪实弹，虎视眈眈地守着囚笼。开庭前，法庭附近的居民已经疏散一空。这是整个审判中花费力气最少的一项工程。就是政府不发告示，附近的居民也不会呆在这里，谁都害怕黑手党的炸药。谁也不敢保证，黑手党不会炸毁整个法庭，只要他们在行动时稍微多埋一些炸药，住在附近的居民就在劫难逃了。

审讯进行到第九天，主控官的起诉书还没有读完，巴勒莫警方接到一个

神秘的电话：米凯莱·格列科已经潜入巴勒莫市郊。如果在平时，警方接到这个消息，肯定会愁眉苦脸，这不是给人出难题嘛！但是，这一次情况不同了，黑手党刚刚遭到出其不意的打击，格列科肯定元气大伤，此时势单力孤。他潜入巴勒莫，形同自投罗网。如果能在此时把他抓住，那岂不是奇功一件！因此，警方连夜出动，包围了巴勒莫市郊，并开始拉网式搜捕。2月20日上午7点半，警察搜到马多尼亚山脚下一个名叫坎加莫村的小村，村里有一座用白色石头盖成的农舍。警察搜到了农舍里面，发现了一个头发花白、留有小胡子的老头。按惯例，警察对他进行了查问。老头神情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他叫朱塞佩·迪弗雷斯科，1926年1月20日出生于巴勒莫，家住巴勒莫1000大街1608号。老头的回答让警察纳闷。说老头在做假吧，他的神态不由得你不信，相信他吧，早上7点半，他从巴勒莫跑到一座荒凉的小村来干什么？不管它，先核实一下情况再说。电话立即打到巴勒莫警察局，几分钟后，几位警察来到1000大街1608号，揪响了门铃。一位老妪出来开门。警察问：“是朱塞佩·迪弗雷斯科先生家吗？”回答是肯定的。警察又问：“他在家吗？”老妪反问道：“在家？他已经去世3年了。”

原来如此！警方这才明白，眼前的朱塞佩·迪弗雷斯科先生肯定是个冒牌货。这下子，警察把老头扣住了。但他死活不交代自己的真实身份，于是，警察通过核对指纹，终于弄清楚这个老头的真实身份。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黑手党教皇米凯莱·格列科！

格列科是意大利黑手党最高委员会的头目，黑手党的“好汉”们称其为教皇，也有人称其为爸爸，这是因为发音的重音不同而致。他今年62岁，崇尚“沉默是金”，话少得出奇。但是，格列科的心又狠得出奇，对警察、法官等公务人员，他要杀；对不听话的下属，敢于犯上作乱者，他要杀；对违反黑手党帮规的，他也要杀。据不完全统计，直接或间接死于他手下的，达1600人之多！黑手党的重大恐怖活动，最后都要他拍板。因此，在这次大审判中，他被指控犯有90项谋杀和走私罪。他的被捕，对黑手党而言，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

审判继续进行，法官们面对空无一人的旁听席，继续强打起精神，念完全部起诉书。结果，审判一直拖了22个月，到1987年12月16日才结束，格列科等19名大头目被判无期徒刑，另外338名黑手党分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共2700年。由于意大利已经废除死刑，因此，本来应该上绞刑架的格列科等人获得一条生路，但是，他得在狱中度过自己的残生。有人认为，这次审判意味着黑手党的末日来临了，巴勒莫市的市长也兴奋地说：“这次审判是对黑手党的有力打击，证明巴勒莫不再是黑手党的一统天下了。”市长的话有几分道理，但是，黑手党远不是被消灭了。尽管格列科已经被捕，其他黑手党大人物也多束手就擒，但是，经验证明，黑手党就像传说中的九头怪物，是不会就此消亡的。它会不断蜕皮，不断得到新生。

玛菲亚

今天，黑手党已经是一个风靡全球的恐怖组织，美国的黑手党早已蔚为大观，成为左右美国政治的一大势力，据说，美国总统肯尼迪就死于黑手党之手。俄罗斯的黑手党我们也已经耳闻，在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黑手党更不是一个新鲜名词。但是，黑手党的老巢却是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而其存

在的时间，竟然长达 8 个世纪！这个记录足以令其他恐怖组织自惭形秽，因为它们大多是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才产生的。

黑手党的意大利名称是“玛菲亚”，中国人称其为黑手党，其实玛菲亚这个词与黑手党的意思没有任何关系。传说，以前的黑手党分子作案后习惯在现场留下一些印记，如一只黑手，交叉的骷髅，因此，中国人习惯称其为黑手党。应该说，这个名称比它的意大利原名更形象，更贴切。

关于玛菲亚这个名称的起源，研究黑手党的专家学者曾穷尽心智进行考证。意大利议会甚至曾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个名称的起源。十余年下来，虽然委员会归纳了黑手党活动的一些特点，但玛菲亚到底是什么意思，依然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玛菲亚可能是一个阿拉伯名词的变化形式，意思是“保障其成员安全的团体”。也有人认为，玛菲亚一词起源于西西里的韦斯波里时代，最早可以追溯到 1282 年。当年，一个民族主义组织选择了“消灭法西斯，意大利要自由”这句口号的意大利文每个词的词首作为自己组织的名字，这个名字就是玛菲亚。有位年轻的德国学者为此专门在黑手党的老巢西西里岛生活了若干年，并翻阅了大量的档案，最后认为，在西西里的方言中，玛菲亚第一次出现在巴勒莫的正式公文中是在 1658 年，当时玛菲亚是作为一个巫婆的诨名，有“勇敢的”、“富有权力欲望的”等意思。如果说一位姑娘玛菲亚，那是赞美她漂亮；说一个男子玛菲亚，那是称其勇敢。但是后来玛菲亚这个词出现了一些变异，玛菲亚成了流氓犯罪集团的代名词。1862 年，巴勒莫上演了一幕喜剧《维卡利亚的犯罪集团》，该剧就用玛菲亚表示犯罪团伙。1865 年，玛菲亚一词正式出现在官方用语中，成为犯罪团体的别名。但是玛菲亚后来何以成为黑手党的代名词，还是无法弄清。

玛菲亚的名称有争议，玛菲亚的行动同样存在争议。今天的黑手党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恐怖组织，但是，当年的玛菲亚却并不是如此。它原本是一个贫苦农民为求生存而联合起来的秘密帮会组织，因此，当年它的成员无一例外来自农村，出身都很贫穷，成员之间经常互相帮助，能够同舟共济。因此，它与当年中国的绿林好汉、与英国出现的打家劫舍的罗宾汉有相同之处。如果农家妇女遭到贵族摧残而官府又拒绝审判强奸犯时，玛菲亚会自作主张将罪犯处死。如果警察无端欺负一个贫民，玛菲亚也会帮他出头，处死那个警察。即使是邻居间发生纠纷，玛菲亚也会不请自到，帮助他们分个是非曲直。因此，年复一年，黑手党在西西里的作用日趋突出，变得比政府还要权威，西西里人渐渐地离不开黑手党了。在他们的生活中，黑手党变得像一日三餐一样重要。能成为一名黑手党成员，自然是一件崇高的事情。黑手党首领所到之处，村民会列队欢迎，男人争着握手，女人则争先送吻。1954 年老死家乡的黑手党首领唐·维齐尼，虽然本人目不识丁，但其葬礼之隆重，连意大利国王也会嫉妒。乌黑的高头大马，拉着维齐尼巨大的灵柩，在长街上缓缓行走。成千上万的村民如丧考妣，低头紧随其后，牧师竭尽自己的聪明才智，把能想到的最美好的词汇全部奉献给维齐尼。巴勒莫的市长这样评价维齐尼：“他是穷人的朋友，从来没有忽视过求助他的人。”教堂的铭文是这样写的：“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讲信用的人，一个有骨气的人，一个值得依赖的人。”有这样的评价，维齐尼上天堂是没有问题了。

黑手党分子把荣誉和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有的黑手党分子，穷得家徒四壁，连张床也没有，但是，为了在人前摆阔气，他加入黑手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一件丝绸衬衣，然后招摇过市。他们不仅迷恋自己所属的“光荣

社团”，而且还陶醉在“我们的事业”中。一名黑手党分子已经上了法庭成了被告，但他还是一本正经地告诉法官：“法官先生，当您年老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您一想起我们今天的会晤你就会懂得，我非常认真地遵守了大自然的规律并且正直而自觉地履行了职责。我是一个高尚的人。”

黑手党自成立伊始，就是一个崇尚暴力的组织。它有为穷人出头、替百姓伸张正义的一面。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它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中国的青红帮、三合会是如此，意大利的黑手党也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黑手党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它蜕变成一个从抢劫、暗杀、绑架、投机倒把、开妓院到走私、贩毒无恶不作的令人切齿痛恨的犯罪团伙。他们凭借暴力，控制了西西里岛上的畜牧、屠宰、果园和港口，并向私人业主收取保护费。丰收时节，如果农民不邀请黑手党成员充当保护者，那么，黑手党就会在一夜之间将庄稼全部破坏。如果他还执迷不悟，那么，黑手党会毁掉他的全部牲畜，用血腥的方式告诉他：你是活够了！竟敢无视黑手党的存在！最后，农民只好就范，请毁掉他庄稼的黑手党分子充当自己的保护人，并把一半收成交给黑手党。通过这种方式，黑手党在西西里全岛确定了自己的权威，并把这种权威扩展到整个意大利，进而扩展到全世界。

黑手党的性质发生蜕变，但是一些做法却传了下来。加入黑手党是一个高尚的事业，全体黑手党分子要以此为荣，西西里黑手党组织的名称就叫“我们的事业”。在吸收新成员时，黑手党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先在蜡烛的上方燃烧一张画有颅骨和两根交叉骨头的纸，然后主持人振振有词地朗读一遍黑手党的宗旨：加入黑手党后，要惩强扶弱，杀富济贫。然后，他用针将宣誓人的一只手指刺破，让血滴在圣像上，接着，让圣像在宣誓者的手上点燃，宣誓者必须忍受火的烧灼，不停地将圣像从一只手倒腾到另一只手，并宣誓：“我以自己的人格宣誓，忠诚于我们的团体，就像我们的团体将会忠于我一样。这幅圣像正在化为灰烬，再也不能变成纸了。我的鲜血正在流淌，永不复返。我也永远不能脱离我的团体。如果我不能信守誓言，我的肉体也会像圣像一样燃烧。”经过这一番庄严的宣誓，一个黑手党分子就诞生了。

维系黑手党的是严格的纪律，这就是所谓“七诫”：一、守口如瓶；二、组织高于个人；三、不得违抗上级命令；四、不得叛变自首；五、对家人保密；六、不得擅自搞绑票活动；七、兄弟之间严禁斗殴。一个人一旦加入黑手党，他就不再属于自己了，而是必须听从组织的。除非经组织批准，否则不准中途退出黑手党。曾有一位黑手党的家长想洗手不干，但是黑手党的纪律不允许他这样做，他只得继续干下去，直到被杀。至于对付黑手党内部的叛逆分子，黑手党更是毫不留情。1973年，黑手党分子莱奥纳尔多·维塔莱曾向一名警察供出了巴勒莫市前市长维托·钱奇米诺与黑手党有牵连，他立即遭到了黑手党的报复。他被关在狱中，遭到毒打，后来又被送进疯人院，继续受折磨。最后，他被从疯人院里放了出来，却被杀死在街上。黑手党杀死叛逆者后，通常会在他的嘴里塞上一个小木塞，以警告那些告密者。因此，黑手党分子被捕后，宁死也不愿坦白。这就使政府的扫“黑”行动增加了难度。

黑手党的组织结构也十分复杂。每一个黑手党分子都是一条“好汉”，他们是黑手党的基本细胞，每条“好汉”隶属于一个家族。家族里有家长、副家长，负责管理家族日常事务。1990年，意大利的黑手党共有142个家

族，其中有 42 个大家族。家族之间通过一个委员会联系。在意大利，凡有黑手党的省份都有一个委员会，委员会可以在任何一个家族的势力范围内杀人，而不用通知家长。当委员会决定杀人时，它就组织一个行刑队，行刑队长有权挑选队员。他们的行动，除执行者外，其他人都不知道。委员会上面还有一个由 11 人组成的委员会，称 11 人委员会，地点设在巴勒莫，这是黑手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它凌驾于所有黑手党家族之上，也是黑手党世界最高的权力机构。11 人委员会里面有一个教皇或教父。像格列科，就曾是黑手党的教皇。这是黑手党内的最高职位。

意大利黑手党也曾几起几落。对黑手党打击最大的是 1922 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上台。最初，黑手党曾支持墨索里尼进军罗马，但在法西斯政权建立后，黑手党却不见容于墨索里尼。法西斯的本性是独裁和专政，法西斯党大权在握，岂能容忍旁边还有一个黑手党，因此，墨索里尼“革命”成功，首先就拿昔日的盟友开刀。大批黑手党徒被处死，更多的黑手党“好汉”被关进了监狱。墨索里尼翻云覆雨，黑手党措手不及，遭到重创。不少黑手党分子不得不漂洋过海，到美国去寻找生路。美国取代西西里，成为黑手党世界的中心。整个法西斯统治时期，黑手党在意大利都处于被打击的地位，大批黑手党分子被关进了法西斯的监狱，剩下的漏网之鱼或是躲上了山，或是洗手不干。黑手党元气大伤。人们想，这只不死鸟这次也许真的死了。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的一个错误使黑手党奇迹般地死而复生了。1943 年盟军准备在西西里岛登陆。为了减轻伤亡，美国人找到了逃到美国的黑手党分子，要求他们与西西里岛的黑手党分子联络，在盟军登陆时作内应，里应外合，一举打破墨索里尼的防线，条件是战后让黑手党复兴。没有犹豫，黑手党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一批黑手党分子潜入西西里岛。他们与关在监狱里的黑手党分子取得了联系。在美军登陆那天，凭着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他们居然劝说三分之二的士兵开了小差。结果，美军顺利登陆。胜利了的美国人不忘前约，打开了法西斯的监狱，久陷囹圄的黑手党分子重见天日。1944 年 11 月，美国人与黑手党在巴勒莫举行会谈，推举黑手党人出任西西里的行政长官。卡洛·维齐尼等一批重要的黑手党头目，在美军的推荐或支持下，出任巴勒莫地区许多城镇的镇长或市长，有的还担任了省长职务。卡洛·维齐尼的儿子还当上了美军驻巴勒莫司令部的翻译。黑手党利用美军、政界人士，在当地大肆扩大势力，聚敛财富。由于遏制共产主义的需要，美国人战后利用黑手党来对付共产党，黑手党的势力盛极一时。黑手党的头目与意大利的政客广泛结交，毫无顾忌。战后，整个意大利由于战败而不得不勒紧裤腰带，黑手党却通过传统的生财之道——控制市场，控制水源，从而大发横财。战后黑手党还发现了一个一本万利的买卖，这就是走私毒品和香烟。意大利人酷爱美国的香烟，而香烟在意大利属于国家管制商品，黑手党就在境外大肆搜罗美国香烟，然后偷运入境，通过这种途径大发横财。当毒品交易兴起后，有些黑手党家族又走私毒品。通过这些非法手段，黑手党的财富飞速膨胀起来了。60 年代以后，意大利的经济出现起飞，黑手党的财富也呈几何级数在增长。它与政客勾结，从事工程承包，大发横财。

腥风血雨

黑手党明白，要维持住源源不断的非法收入，非得有政界的合作才行。黑手党说穿了是一个地下组织，它虽然也是一个权力机构，但毕竟不是合法的，因此，黑手党十分注重与政府机构的结交。他们大肆收买政客、警察、法官，他们相信金钱的神奇力量，没有金钱攻不破的堡垒。如果真正碰到钉子，那么，黑手党也决不会手软。如果某人不服从黑手党的招呼，那么黑手党唯有将其除掉，这是黑手党的一贯法则。因此，从 70 年代开始，随着黑手党的劣迹昭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揭露黑手党的罪行，对于这些人，黑手党的手法只有一条，那就是：杀！

1970 年 9 月 16 日，新闻记者德·毛罗奇怪地失踪了。从此之后，人们再也没有发现他。事后，人们才想到，毛罗的失踪可能与黑手党有关，因为他掌握了黑手党的大量机密，这可能是他失踪的唯一原因。

1979 年是恐怖的一年。这一年接连发生了数起恐怖事件。3 月 9 日，巴勒莫天主教民主党书记米凯莱·雷纳死于非命。7 月 21 日，巴勒莫警察局副局长、刑警队长博里斯·米蒂亚诺博士在咖啡馆毙命。9 月 25 日，切萨雷·特拉诺瓦法官也被杀害。

1980 年，西西里大区主席马塔雷拉决定整顿西西里的银行系统和公共承包工程。这两个环节都是黑手党聚敛钱财的主要渠道，因此马塔雷拉此举得罪了黑手党，黑手党毫不犹豫地将他除掉了。警长朱利亚诺和宪兵上尉巴西莱对黑手党倒卖毒品及其赃款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认真调查；检察长格斯塔发现了黑手党存款的银行，威胁到黑手党的利益，因此黑手党将他们几个一古脑儿地除掉了。

1982 年五一节前一天，意大利共产党西西里区委书记庇护·拉托雷又遭暗杀，拉托雷遇难的唯一原因是，他在 1980 年 3 月 31 日曾在议会中提出过一项反对黑手党的特别法律。这项法律首次规定，必须对黑手党分子及其亲属的财产进行调查。黑手党怀恨在心，两年之后终于找到机会把他杀害。

此时的黑手党羽翼已丰，因此行事肆无忌惮，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黑手党的危险性，因此不断采取措施来打击黑手党。尽管这些措施都是零星的、个别的行动，意大利政府远没有行动起来坚决打击黑手党，而黑手党认为，这些人的举动已经冒犯了它的尊严，因此他们再次祭起“逆我者亡”的古老信条，在西西里大开杀戒。一时间，西西里充满了腥风血雨。据统计，1980 年在巴勒莫市有 63 人被杀，到 1981 年被害者的数目翻了一番，达到 120 人。在 1982 年以前，西西里是平均 75 个小时有一人遇害，到 1982 年则增加到每 48 小时就有一人遇害，黑手党杀人的频率明显加快。

最让人震惊的是 1982 年 9 月 3 日西西里总督、意大利宪兵司令达拉基耶萨的遇难。达拉基耶萨将军贵为一省之督，又兼宪兵副司令，是专政机关的典型代表，但就是这种人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黑手党的猖獗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达拉基耶萨，1920 年出生于意大利一个军人家庭，参加过反法西斯地下抵抗运动，战后成为一名宪兵军官，曾两次到巴勒莫服役。达拉基耶萨是一位杰出的反黑手党事务专家，曾有 76 个黑手党头目落入他的手中，因此，黑手党对他怀有刻骨仇恨。作为一名宪兵军官，达拉基耶萨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中表现突出。“红色旅”的头目库乔就是他抓获的。鉴于他在反恐战争方面的经验和崇高的威望，意大利政府派他出任西西里总督，指望他在那里打开局面。达拉基耶萨果然出手不凡。上任后，他没有直接与黑手党交锋，

而是深入调查黑手党的经济活动。他深入到银行调查黑手党的资金周转情况，查阅了西西里的承包记录，发现了黑手党活动的许多蛛丝马迹。此外，在黑手党贩毒、走私、行贿等方面，将军都找到了直接的证据。这都是涉及到黑手党的要害之处，因此，黑手党对他颇为忌惮。将军据此制定了他的作战方案，只待时机成熟，就可付诸执行。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将军却感到有一只神秘的黑手在向他伸来，他感到自己的前景堪忧，并把自己的感觉告诉了记者。他说：“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飘摇在大海上的小舟，当暴风雨来临时，我将会被风浪吞没。”

达拉基耶萨贵为一省总督，身边自然不乏军警保卫，他为何感到如此悲观？原来，将军意识到，自己的一系列措施已经得罪了黑手党，黑手党必欲除之而后快。作为个人，他当然是势单力孤，因此，他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来对付黑手党。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达拉基耶萨的反黑手党措施却得不到上司的支持。他要求上级部门给予他更大的权力，但迟迟不见答复。他要求增派精干警力，充实反恐怖部队的装备，也一直不见回音。他甚至发现，总督府的门房，也换上了一个曾经判过刑的黑手党分子。将军觉得非常孤独，渴望得到人们的支持。他甚至想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件事。有一次，有一个宪兵上尉得罪了一个黑手党分子，找到将军求援。将军二话不说，挽着上尉的手臂在大街上走了一圈，并特别在那个黑手党分子的家门口逗留了许久。将军此举意在向那个黑手党分子示威：你别神气，上尉不是孤立无援的。结果上尉果然平安无事。现在他多想有人挽着他的手，帮助他一把啊。但是，他在政府中找不到志同道合者，政府并不支持他的行动。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所面临的确实是一项艰巨甚至危险的任务”，现在，“我不像过去那样有部队撑腰。”将军甚至哀叹：“我是孤立的”，“现在我感到自己像进了他人之家那样，没有朋友的帮助。”将军的儿子后来透露：“父亲曾明确地告诉我，天主教民主党地方领导人对他施加压力，不给予他同黑手党作斗争的必要权力。最起劲地反对他的是安德烈奥蒂派、范范尼派的人士。”天民党成员利马承认，将军当上省督，不是出于天民党的推荐，因此，天民党对他不表示支持。实际原因当然不止这些。达拉基耶萨的调查触及到黑手党与政界人士的勾结，危害了黑手党及其在政界的庇护人的根本利益。事实上，进入90年代后，意大利爆发出一大丑闻：曾任意大利总理的安德烈奥蒂曾与黑手党勾结，安德烈奥蒂被送上了审判台。因此，政府当时与达拉基耶萨为难是可以想象的。达拉基耶萨干的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黑手党要除掉他，而政府对他并不支持，他的困境也就不难理解了。

9月3日，十分孤独的达拉基耶萨找到了美国驻西西里总领事约翰逊，把这个事讲给领事听，对领事说：“现在我多么希望有人挽着我的胳膊在巴勒莫的大街上走一走啊。”他希望约翰逊能促使美国政府向意大利政府施加压力，支持自己与黑手党作斗争。

太晚了！达拉基耶萨的预见不差，方法也颇为对症。如果这个时候华盛顿对罗马施加压力，意大利政府说不定真会采取什么行动。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而达拉基耶萨已经等不起了，黑手党更是急不可耐。

当天晚上8点半，一辆小卧车穿过大街，开进了总督府。车上坐着一位年轻的女子，她是达拉基耶萨新婚不久的夫人。门卫通过送话器告诉总督，夫人来接他下班了。达拉基耶萨推开桌子上的文件，通知警卫，今天晚上，他要与夫人一起到塔楼饭店共进晚餐。他特别讲明，今天很想吃鱼，让饭店

准备一下。

21点零5分，两辆小车驶出总督府，向塔楼饭店驶去。今天他们没有乘坐高级防弹车，主要是为了不引人注目。但是，总督今天失算了。格列科已经在11人委员会上发出了命令，总督今天是在劫难逃。黑手党在总督府周围的每个路口都设下了埋伏，并用步话机随时联系。因此，总督一出大门，他的行踪立即被黑手党掌握了，而且，就在他的座车后面，两辆摩托和两辆轿车不紧不慢地跟着。

车行至财政警察局门口，后面的摩托车和轿车突然加速冲了上来，把将军的车堵在角落里，没等将军及其警卫反应过来，铺天盖地的子弹已经倾泻在他们身上，吞噬着他们的躯体。凶手行凶后扬长而去。这一幕让在旁的民众看得目瞪口呆，但没有一人敢吱声，以至于后来寻找证人时，竟然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作证。想一想，黑手党连贵为西西里总督的达拉基耶萨都敢杀，你再多嘴多舌，那不是活够了嘛！

警察赶来了，但已经太迟了。他们只看到血肉模糊的尸体，而不是生龙活虎的总督了。如果不是事先知道是总督遇难，他们连死在车里的是谁都搞不清楚了。将军的脑袋上中了9弹，头颅完全给打碎了，根本认不出是谁。无奈的警察只好找出一张报纸，把将军夫妇的头颅包一下。直到下葬，将军的家属都没有看到将军夫妇的遗体。

意大利的新闻媒介反应极快。将军是21点10分遇难，25分，电视二台的屏幕上已经打出新闻稿：“巴勒莫，21点10分，达拉基耶萨将军遇难。”整个意大利都震动了！社会各界纷纷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这一恐怖行动，称“这是对意大利国家明目张胆的挑战”，要求政府惩办凶手。不少人在将军遇难的街头悄悄扔下一束束鲜花，也有人在鲜花上挂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对于诚实的巴勒莫市民来说，希望已经在此消失。”

达拉基耶萨无疑是这场反黑手党战争中死难的身份最高的一个，在此之前，已经有太多的人为此流出了鲜血，但是，他们的死没有唤醒西西里人。将军的死把对黑手党抱有幻想的人们唤醒过来，使他们意识到，黑手党的猖狂已经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了。再不对黑手党采取行动，意大利真的要“国将不国”了！过去，意大利政府惧怕人们指责政府是法西斯政权，因而不敢对黑手党采取行动。现在政府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因此，议会立即行动起来，通过了《黑手党取缔法》。这部法律被认为是意大利历史上最严厉的反恐怖法，专门用来打击黑手党式的集团。打击黑手党的行动有了法律依据。这也是达拉基耶萨以前要求过但没有得到满足的。此外，政府任命内政部警察处长弗朗切斯科为西西里总督，继承达拉基耶萨的未竟事业。弗朗切斯科也是一位反黑专家，此次他握有尚方宝剑，可以跨省行使权力，协调各种警察和宪兵武装。弗朗切斯科告诉新闻界：“我来巴勒莫的目的，就是继续我前任的工作。我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接受这份沉重的遗产。”

“圣·迈克尔”行动

他身材魁梧，体形匀称，皮肤黝黑，文质彬彬，戴一付墨镜，一看就是一个知书识礼的人。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他与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联系在一起。可是现在他落到了巴西警方手里，罪名是与贩毒有联系。继续检查发现，他持有的是一份假护照。

他护照上的名字叫约塞·罗贝托·埃斯科贝尔，但实际上，这只是他众多名字中的一个。他曾经是阿达尔贝托·巴尔别里，这个名字他在苏黎世的

旅馆里用过；他叫过托马斯·罗贝托·费利切，这是在巴拉圭时用的；在美国移民局，他登记的名字是曼纽尔·洛佩斯·卡代内。但是，这些都不是他的真实名字。他的真实名字叫托马斯·布谢塔，是西西里黑手党一个家族的家长。但是，他死活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说自己是一个黑手党分子，但不是领头的。里约热内卢把这个消息通知了意大利警方。意大利立即派出了乔万尼·法尔科内法官和他的助手杰拉奇飞往里约热内卢，提审这位黑手党分子。

在审讯室里，神情沮丧的布谢塔看了法尔科内一眼，嘴里咕哝了一句：“我不是你们的敌人……”然后再无下文。法尔科内和杰拉奇对视一眼，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

法尔科内出生于黑手党的老巢西西里，长大后成为一名法官，他对黑手党的活动规律了如指掌，常常能预见到黑手党的一些活动，因而在意大利的法律界颇有名声。他知道黑手党的纪律：任何黑手党分子均不得透露黑手党的内部机密，这是黑手党的一项最高法则。为了遵守这一纪律，很多黑手党分子宁死也不愿与警方合作。现在布谢塔竟然吐了这么一句，这证明他想开口了。因此，法尔科内甚感欣慰。

1984年7月10日，布谢塔被引渡回国。在此之前，他已经自杀过一次，但没有死成，因此，他不想再死了。在登上飞往意大利的班机时，他出人意料地对法尔科内又说了一句：“我将与你们合作。”法尔科内更高兴了。看来，这次完全可能从布谢塔身上打开一个缺口。消息传到意大利，警方在机场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布谢塔一下飞机，就被送到离罗马30公里的一处安全房屋里审讯。面对法尔科内和杰拉奇两位法官，布谢塔滔滔不绝，一口气讲了45天，倒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一个黑手党家长与警方合作，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通过布谢塔，警方掌握了黑手党的历史沿革、组织结构以及以往的罪恶活动情况。而这些情况，过去人们只能猜测，而没有任何证据。从某种意义上说，过去意大利政府是在与一个影子敌人作战，对这个敌人的情况，除了知道这是一个犯罪团伙外，他们知之甚少。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意大利政府什么都不知，它怎么可能不吃败仗！可是，自布谢塔开口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一个活生生的组织出现在人们面前，人们可以对症下药了。因此，有人认为，布谢塔的招供是一次地震，而且是一次从未有过的地震。巴勒莫的首席检察官兴奋地说：“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我们第一次深入到了黑手党的内部。”

布谢塔对两位法官说：我是黑手党分子，加入“我们的事业”黑手党已有40年历史，我没有什么可悔过的。我不赞成黑手党内部进行火并，被杀的全部是无辜者，与“我们的事业”毫不相干。他还说：黑手党是癌症，我要讲了解的情况，以便后人能够生活得比较高尚和人道。布谢塔此言明显在为自己贴金，但是，黑手党内部的家族战争，确实使他心痛不已。在这场残酷的火拼中，他已经失去了两个儿子，一个兄弟，两个侄子，一个女婿，两个表弟。如果他再不与警方合作，恐怕连自己的命也保不住了。他现在已经不是家长，他的家长之位已经被巴勒莫最高委员会革掉，因此，他也没有力量复仇了。他决定与警方合作，借助警方的力量消灭自己的仇敌，也使自己躲过这场血光之灾。因此，杰拉奇法官评论：“如果谁认为布谢塔背叛了黑手党，那就错了。他之所以说出那些秘密，首先是因为他要复仇。其次是因为，他属于老一代捍卫黑手党纪律的教父。这些纪律规定，只能处死叛徒和犯有

严重过错的人，不应为树立威信而杀人。他无疑是个不择手段的人，但也是个具有荣誉感的西西里人。对他来说，黑手党‘荣誉社会’的那一系列行径已经丧失了荣誉，于是，他的思想观念崩溃了。”

布谢塔在滔滔不绝地交代，警方也没有闲着，一份份逮捕令已经签署好了，只待一声令下，警方就要把这些黑手党“好汉”捉拿归案。

更大的行动还在后面。

1984年9月29日圣·迈克尔节，巴勒莫街头没有一丝喜庆的气氛，相反各种迹象都表明本市将有重大军事行动发生。街头已经设置了路障，直升飞机在夜空中盘旋，3000名警察和宪兵在待命。午夜时分，法尔科内大法官拿起电话：闪电行动开始！

3000名全副武装的宪兵和警察，携带着366份逮捕令，闪电般地奔向巴勒莫市区的各个角落。半个小时后，第一批27名黑手党分子已经落网。整个行动中，共有70余名黑手党分子束手就擒。消息传到指挥部，法尔科内和杰拉奇对视一眼，举杯庆祝。此后，警方又于1984年12月12日和1985年2月20日两次在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三次行动共抓获500多名黑手党分子。与黑手党勾结的巴勒莫市前市长钱奇米诺也于1984年11月被捕。他在70年代担任巴勒莫市长期间，曾在公共事业拨款上为黑手党做过手脚，并帮助他们转移赃物。以前媒介曾揭露过他的罪行，但一直没有对他采取行动，因此，当这次巴勒莫特别行动队鸣着警笛来到他家门口时，他以为又是例行公事，因此一副谁也奈何不得的样子。当警察向他出示逮捕证后，这位政客竟然吓得晕了过去，警察不得不把他抬进车内。格列科家族的一些重要成员也相继落网，但格列科却不知下落。为了追捕格列科，巴勒莫警察局拘捕队长蒙塔那在黑手党经常出没的一个乡村租了一间房子，派人在那里日夜监视。后来蒙塔那得到情报说，格列科就躲在马多尼亚山坡的一个农舍里，立即率人袭击了那个农舍，但室内只有一名妇女，桌子上放着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那个女人挖苦说：“侦探队长，这杯咖啡就是为您准备的！”看来，格列科这只老狐狸还真狡猾。但是，他最终没有逃出法网。

东山再起

西西里的世纪性大审判在持续两年后终于结束了。主持这次审判的法尔科内法官不由得松了一口气。他乐观地预言：“黑手党不是不可战胜的。它既然是一种人类的活动，那么它就会像人类的其他活动一样，有开始，也有终结。”但是，事实证明，法尔科内的判断太乐观了。对黑手党而言，虽然他们在第一个回合输了，但这只不过是刚刚开始，真正的战斗还在后面呢！事实上，在审判期间就发生了一连串的怪事。反黑手党特种部队的军官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杀；主要证人在戒备森严的监狱里中毒身亡；许多法官不约而同地生起病来；一名去现场取证的司法人员被枪杀在街头；有一名黑手党徒因为与警方合作，被判当庭释放，结果一个小时后就有人在街头枪杀，另一名黑手党徒因为同样原因被烧死在车内。种种迹象表明，黑手党只是暂时受挫，消灭黑手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992年5月23日下午5点40分，一架小型飞机降落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巴勒莫市郊的蓬塔莱伊西机场，飞机上走下几个人。三辆菲亚特防弹车立即迎了上去。简单的寒暄过后，他们立即坐上了防弹车，车上鸣响了警笛，警

灯闪烁着呼啸而去。一见这阵势，西西里人都知道，他们的法尔科内大法官又回来了。

汽车以 160 公里的高速行驶。法尔科内今天的兴致特高，因此，把司机赶到了另一辆车上，自己为夫人开车。今天是他的生日。1934 年的 5 月 23 日，他出生于巴勒莫，童年也是在有“魔鬼之都”的巴勒莫市的贫民区度过的。但是，法尔科内持身甚正，他没有像他的伙伴一样，沦为黑道上的“好汉”，而是勤勤恳恳，坚持上学念书，并且选择了法律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他的儿时伙伴今天都是黑手党的“好汉”，有的已经混上了家长之职。对此，他感到非常痛心，但又无可奈何。道不同不相与谋。作为法官，他并不能解救一个已经沉沦的“好汉”，只能向他们施以刑罚，让他们体会到法律的尊严，并尽可能防止其他年轻人误入歧途。但是，他的伙伴们能体会到他的这一片苦心吗？想到这里，法尔科内心中泛过一阵苦意。不可能了，他们已经恨死他了，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1989 年，警卫人员在他的海边别墅附近发现了炸弹，在他经常游泳的海滨，蛙人也找到了炸弹，目标不言而喻。现在，他是全欧洲警卫最森严的人。一般情况下，他出门乘的不是汽车，而是装甲车，前面有开道车，后面有压路车，戒备之森严，连意大利总统也望尘莫及。要进入他的办公室，得经过 4 道装甲门，2 道钢门，一间防弹室。每道门后面，始终有全副武装的警卫在守卫着。凡是意大利警方能想到的保安措施，法尔科内都用上了。事实上，他现在已经处于警卫的严密监视之下，也失去了人身自由。他用餐要经过检查，而且都是直接端到室内，偶尔外出用餐，警卫就如临大敌，他预备就餐的那条街，很早就必须封闭，法尔科内的行车路线更是成了超级机密，并随时加以更动。尽管如此，法尔科内还是没有安全感。对死，他有一种直觉式的预感。他说：“虽然有这么多人支持我，保卫我，但我还是感到越来越孤立。”他又说，如果黑手党要除掉他，那么，他们就会选择在西西里下手。但是，法尔科内对此并不感到害怕。自从他进入大学读法律，并担任法官，最后出任反黑手党委员会的负责人，实际上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有过一句名言：“生命对于我来说就像衣服上的纽扣。我不去多想这件事。”再说，在政府的严厉打击下，谁胜谁负还说不准呢？因此，法尔科内很自信。他在罗马与妻子和朋友一起过完了自己的 58 岁生日，又决定返回巴勒莫度周末，并预定了 23 日意大利 CAI 航空公司的机票。这家公司有专门为军事情报部门准备的小型飞机，随时可以起飞，且飞行时间、飞行地点及乘坐者的身份都可以保密，因此，乘这种飞机安全性极高，可以确保飞行安全。

现在，飞机已经安全降落，他已经坐上了高速行驶的汽车，三辆防弹汽车在前面开道，后面有警察局的警车压阵，他自己的座车夹在中间，可以说是万无一失，法尔科内对这种安排很是满意。此时离巴勒莫只有 20 公里了，看来今天是一路平安。巴勒莫市内有重兵守卫，连黑手党也不敢轻举妄动。

前面是一弯道，车子不得不放慢速度，但时速也超过了 100 公里。就在穿过弯道的时候，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打乱了整个行驶的节奏。高速行驶的开道车被突如其来的爆炸震得飞到 100 米开外，三名警卫还没有来得及作出反应，就在震耳欲聋的炸弹声中毙命，法尔科内的汽车也来不及刹车，一头栽进了爆炸引起的长达 20 米、深达 8 米的大坑中，车头完全瘪了，法尔科内被挤作一团，虽然还有一口气在，但也已奄奄一息，在送往医院的路上，他终因伤重身死，同行的夫人也不幸遇难。这次爆炸前后共有 7 辆车被炸毁，

20 余人受伤，2 名路过的行人也同时遇难。

事后查明，此次爆炸歹徒实施了遥控作业。事先，他们侦知了法尔科内的行程，经精确计算后，决定在弯道处理下两吨炸药，然后在不远处一座山上遥控炸弹。由于车速高达 100 公里，只要有 0.001 秒的误差，汽车就会飞驰而过，分秒之差，歹徒把握得十分准确，足见其军事水平之高。

事件发生后，有人打电话给《西西里日报》，说此案系他们所为。炸死法尔科内，是为了给黑手党头目萨尔维持·马多尼亚献上一份结婚礼物。身陷囹圄的萨尔维持，是黑手党一个家族的三公子，因谋杀罪正与其父、其兄在巴勒莫大牢里服刑。但是，意大利是一个“民主国家”，犯人在狱中照样可以结婚生育。因此，萨尔维持与西西里一位漂亮小姐在 5 月 23 日完婚，婚礼就在狱中举行。为了庆祝三公子的婚礼，黑手党就选择在这一天拿法尔科内开刀。这样，法尔科内就在劫难逃了。

下一个目标是博尔塞利诺。他与法尔科内是大学同窗，毕业后也与法尔科内一起从事反黑手党工作。多年来，他一直处于反黑手党斗争的第一线，曾与法尔科内一起举行过对黑手党的世纪审判，因此，他的名字也被列入了黑手党的死亡名单。对此，博尔塞利诺心中有数。他曾说，我已感到自己像具活僵尸。但是，志同道合的好友已经以身殉职，活着的博尔塞利诺岂能知难而退。唯有抓紧工作，清除黑手党这颗依附于西西里乃至意大利的毒瘤，他才能告慰老友的在天之灵。

1992 年 7 月 19 日，博尔塞利诺在警卫陪同下，乘装甲防弹车去看望他的母亲和妹妹。下午 5 时，他们来到母亲住宅的门口，博尔塞利诺下了车，向大门走去。没等他按响门铃，炸弹响了。附近一辆汽车被遥控爆炸，巨大的爆炸能量掀翻了博尔塞利诺乘坐的装甲汽车，博尔塞利诺和他的警卫被炸得血肉横飞，停放在附近的 20 余辆汽车也遭到破坏。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殃及附近一座大楼的第十一层住宅，巨大的爆炸声几十公里外都能清晰可闻。正巧在附近的议员阿亚拉说：“现场尸首枕藉，火焰熊熊，建筑物仿佛刚刚遭到战火洗礼。”意大利安莎社的记者则说，博尔塞利诺的尸体全部被烧焦，右手被炸得不知去向，最后还是与他共事多年的同事才勉强辨认出来。很难想象这次黑手党使用了多少高能炸药。博尔塞利诺和法尔科内是志同道合、职务相当的朋友。黑手党舍得花两吨炸药给法尔科内，想来用于博尔塞利诺的也不会少于这个数。

就在博尔塞利诺遇难的同时，黑手党又制造了一起谋杀事件，但这次没有得逞。这次，黑手党的目标是前任巴勒莫市长奥兰多，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反黑手党的战争，因此，法尔科内遇难后，奥兰多也成为黑手党的一个目标，警方将他的处境从“危险”提升到“极其危险”，这是安全等级中最高的一级，表明奥兰多周围已经是杀机四伏，随时都有生命危险。7 月 19 日，奥兰多正穿行于意大利的卡拉布里亚市区，他的警卫突然发现周围情况有异，立即端起冲锋枪，将奥兰多围在中间，并请求警方支持。最后，警方出动直升飞机把他救走。在飞机上，奥兰多获悉几分钟前博尔塞利诺遇难，吓出一身冷汗。要不是警卫机灵，此时，他已经追随博尔塞利诺，走在赴天国的路上了。

奥兰多幸免于死，但他却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囚徒。被黑手党看中的人，生存的可能性是极小的。法尔科内的警卫不可谓不严，可法尔科内终究没有逃脱死亡的陷阱。奥兰多不可能有法尔科内那样森严的警卫，因此，他只得

闭门不出，坐在他的碉堡般的办公室里，在警卫护卫下，坐在办公桌前，吃着他的三明治。有一次记者找到他，想对他进行采访。他说，此次不谈政治了，谈谈电影和音乐吧。可是没等他开口，阴云就布满他的脸上。他苦笑着对记者说：“谈不了啦！我已经好几年没有上过电影院和音乐厅了。我甚至忘记了在酒吧喝咖啡的滋味和自己买报纸的光景了。”他对记者说：“我是死定了，不用多久他们就会逮着我。这是一场战争，而我处于劣势的一方……这场战争不只是黑手党与国家之间的对抗，而是黑手党对抗被黑手党渗透的国家。要打赢这一仗，比登天还难。”

任重道远

两个月之内，接连有两位反黑手党的法官遇害。意大利人民含泪送别两位勇士，转而对政府开火了。黑手党已经向意大利宣战了，可是，意大利政府在干什么？！21日，在博尔塞利诺的葬礼上，愤怒的群众围住了警察，堵住了巴勒莫一座教堂的大门，要求意大利警察总监辞职，警察局长则被愤怒的群众抓住吃了一顿拳头。他们高喊“博尔塞利诺”、“公正”等口号，围住了教堂的大门，参加葬礼的意大利总统和总理不得不从教堂后门离开。

法
尔科内和博尔塞利诺的八位年轻同事，则用辞职来表达心中的愤慨。一位检察官说：“黑手党获胜了。这个国家的一些重要部门，不是与黑手党同流合污，就是推三阻四；不是无精打采，就是垂头丧气。这样死去毫无意义。”群众的愤慨感染了当局。23日，斯卡尔法罗总统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像当年抵抗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一样，抵抗黑手党。阿马托总理声称：“本人要正告凶手和那些专门与国家为敌的人，无辜者惨遭横祸，固然使我们充满悲伤，但更坚定了我们与黑手党作斗争的决心。”政府随即向西西里增派1000名士兵和300名警察，对主要的监狱加强了警卫。小小的西西里，成了一座兵营。7月20日，政府把关押在西西里的黑手党头面人物，包括教皇格列科，转移到其他更安全的监狱去。7月24日，参议院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反黑手党法令，决定给予警方更广泛的权利，包括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对嫌疑分子进行搜查，可以通过跟踪手法来获取证据，延长法官调查取证的期限。25日，政府下令，再向西西里增兵7000名，协助当地的警察维持治安，镇压黑手党。

黑手党十分可怕，但它并不是三头六臂，也不是强大得不可战胜。意大利之所以在这场反“黑”之战中屡屡失利，一是因为黑手党渗透了意大利整个社会，在社会上掌握了相当大的实力，有一批后台，尤其是它渗透了意大利政府上层人士，从而形成了一个可靠的保护网络。黑手党根本不怕政府的反黑措施，因为他们都知道，即使他们被捕了，也只是到监狱中去走一遭，体验一下生活而已。用不了几天，收了他们贿赂的法官们会以各种理由将他们开释。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意大利实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制，而在历史上又有过墨索里尼法西斯专政的恐怖的一幕，因此，政府十分担心如果它对黑手党采取十分强硬的措施，会引起人们的批评，指责它是法西斯政权，走墨索里尼的老路，因此，行事不免缩手缩脚。现在，事情闹大了，黑手党实在不像话了，再放纵它搞下去，意大利的政局就会出现动荡，这是政府不愿看到的。因此，借着两位法官的生命，政府决定镇压黑手党，哪怕被指责为

法西斯也在所不惜。政府动起了真格的，黑手党就乱了阵脚。很快，反“黑”战争出现了转机。

1993年1月15日8点钟，一辆深蓝色的法国产雪铁龙轿车停在巴勒莫一幢不起眼的楼房前，楼内走出一个60岁左右的老头，他个子不高，一米六左右的身材，这在高身材的西方国家十分显眼。他身体略显肥胖，宽脸，头发花白，额前有一绺刘海。他走到车旁，拉开车门，坐到司机旁边，点头示意司机开车。这时，隐蔽在角落里的便衣立即用无线电通知：“弟兄们，他来了。”

雪铁龙沿着达·芬奇大街行驶，在通向西西里大街的拐角处，红灯亮了。雪铁龙停了下来。与此同时，几辆小轿车和摩托车也停在他的一侧。绿灯亮了，雪铁龙驶向西西里大街。当车行驶到阿吉普汽车旅游饭店前的圆形广场上时，突然被从四面逼上来的轿车和摩托车围住，几个彪形大汉跳出来，黑洞洞的枪口逼住了车里的人。那个老头震动了一下，但随即恢复常态。

“里纳先生，出来！”一个便衣警察拉开了车门。

“你们认错人了吧？我是个农民。”那个老头很轻松地回答说，随即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

“没错，我们我的就是你。”农民？西西里农民虽然富裕，但有几个乘上了雪铁龙？几个便衣不由分说，连拉带扯把那个老头和司机弄上了警车，直奔附近的邦西尼奥雷兵营。

在兵营里，警方出示了证据，法院验证了老头的指纹。在铁证面前，老头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身份：黑手党新教皇、负案潜逃23年的萨尔瓦托雷·里纳。

8点半，意大利宪兵司令维埃斯蒂走进了办公室，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将军拿起电话，话筒里传来激动的声音：“里纳已经在我们手中！”消息立即传到总统那里，喜不自禁的总统拿起电话，通知正在召开内阁会议的总理阿马托，不苟言笑的内阁大员们立即笑逐颜开，会场上响起了一阵掌声。

意大利沸腾了！人们奔走相告。为了这一天，意大利人民已经等得太久了，意大利人民为此付出了太多的生命和鲜血，现在，这一天终于来临了。此前，警方已经抓住了巴勒莫黑手党二号头目朱塞佩·马多尼亚，一大批黑手党分子落入法网。此外，100多名黑手党分子在两个月时间内投案自首。

萨尔瓦托雷·里纳，又名托托·里纳，绰号为“托托矮子”，1930年出生于巴勒莫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因此，他对警方说自己是一个农民，倒也几分真实。不过，里纳对穷家没有什么留恋的。他与大部分对生活感到绝望的下层社会青年一样，没有把自己拴在庄稼地上。他的父亲，一辈子在庄稼地上辛勤劳作，但终究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连儿子上学都供养不起。里纳刚上到四年级，就不得不辍学在家，后来流浪街头。像大部分对生活感到失望的巴勒莫青年一样，里纳成为一名黑手党“好汉”。由于他心狠手辣，很快成为黑手党的一条汉子。他是黑手党头目利焦的得力助手。后来，利焦成了科尔莱奥内镇的黑手党首领，里纳的地位也一再攀升。利焦后来遭到警方的追捕，里纳便成了利焦的代言人，实际上是一个代理家长。虽然大事还得向利焦汇报，但里纳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他甚至可以代替利焦参加黑手党最高委员会的会议。1958年，利焦与米凯莱·诺瓦拉发生黑手党之间的家族战争。家族战争失败，利焦元气大伤，落入警方手里，里纳也随同落网。他因犯有多项谋杀罪而被判处终身监禁。看起来，里纳要在狱中呆一辈子了，

可他刚 28 岁。这对于嗜血的魔头来说是很难想像的。因此，他在狱中仅呆了 10 年，就想方设法逃出了囚笼。越狱后的里纳从此销声匿迹，不管是白道还是黑道的人，都不知道里纳的消息。里纳似乎隐居起来了。

抓不到里纳也就算了，反正后来警方再也没听到里纳的消息。在黑手党大开杀戒的西西里，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这起码可以证明里纳没有继续作案。但是，警方想错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他怎么可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呢？警方没有听到里纳的消息，这只能说明里纳隐蔽得太好了。他在幕后布置了一起又一起的凶杀案，除掉了一个又一个的对手。只是因为黑手党内部有宁死也不能吐露机密的传统，里纳的劣迹才没有传到警方耳中。实际上，他一出狱，就接过了利焦的权力，继续利焦的未竟“事业”。他走私香烟，贩卖毒品，这种行径为恪守黑手党传统规矩的布谢塔所不容。而里纳虽然是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没有什么信誉的小人，但在家庭生活方面却十分严肃，他和自己的夫人安东涅塔感情甚笃。安东涅塔出生于一个黑手党世家，13 岁时就与里纳相识。1957 年她与里纳结婚。两人臭味相投，安东涅塔不仅是里纳的夫人，更是他的助手，里纳犯下的累累血案，大半少不了安东涅塔。当里纳负案潜逃后，安东涅塔不仅隐情不报，还为他通风报信，并与他生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而布谢塔婚姻态度与里纳正好相反，布谢塔一共结了三次婚，一生中情人无数，私生子无数。因此，里纳也看不惯风流好色的布谢塔，最后两人水火不相容，只好刀兵相见。经过数次交锋，布谢塔最终告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里纳在黑手党内则青云直上。1978 年，他进入巴勒莫最高委员会。

里纳对反对派心狠手辣，对一直扶植自己的利焦，里纳并不感恩戴德。在他看来，他的名位、权力都是他自己奋斗的结果，因此，他不欠利焦任何人情。利焦入狱后，从狱中传出口信，让贝尔纳尔多·普罗文查诺接替他担任家长职务。按黑手党的规矩，这

根本不成问题，因为家长对本家族的事务是有绝对权威的。不料里纳却要向这个规矩挑战。他一气之下愤然出走，几个月之后，他又被巴勒莫最高委员会召回了。新家长普罗文查诺被控没有决策能力，因而被罢免。里纳的能量由此可见一斑。曾长期为里纳开车的黑手党头目加斯帕雷·穆托洛说，里纳是一个可怕至极的要人。他与里纳 1965 年在狱中相识，并与里纳住在一间牢房。当时，里纳就显出了极强的权力欲望和极高的手腕。排队时，所有人都要向他致意，下棋时不能赢他的棋，否则他会勃然大怒。西西里卡塔尼亚市黑手党的悔过者安东尼诺·卡里奥内这样描述里纳：“托托兽性十足。他的逻辑是：如果一个人的手指不好，最好是将其整个手臂砍下来。”

为了攫取黑手党的最高领导权，里纳竭尽心智，大搞阴谋诡计。他先是向黑手党领袖斯泰法诺·邦塔特提出，由于他现在正遭到警方追捕，与黑手党其他家族的联系颇为不便，最好每个家族都指定一个大使与他联系。邦塔特同意了他的要求。不料里纳却利用这个机会向各个黑手党家族大肆渗透，每位“大使”都成了他向各个家族渗透的情报网。通过这个情报网，里纳掌握了各个家族的种种动向，并及时加以利用。1981 年，里纳见羽翼已丰，时机成熟，又发动了黑手党历史上第二次家族战争，清除了所有的对手，建立了绝对权力。1991 年，里纳成了黑手党世界的最高代表，可以对全世界的黑手党组织发号施令。这个时候的里纳兽性就更突出了。巴勒莫市诺切区黑手党头目萨尔瓦托雷·斯卡里奥内这样形容他：“或是魔鬼，或是上帝，处

处不在，又无处不在。”与这样的人打交道，你必须用十二分的心智。格列科在黑手党内贵为教皇，但他在长时期内却是里纳的傀儡。里纳之可怕，由此可见一斑。

警方从黑手党的悔过者口中得到了里纳的消息，确定他还在西西里。布谢塔曾肯定地说：“里纳就在西西里。我了解这个人，他不会把自己的东西抛在空中而说‘我三五个月后回来’，否则他会失去自己的权力和追随者。”一年多之前，里纳的律师竟然在电视上宣称里纳就在西西里。他本来想以此来吓唬意大利当局，却更坚定警方将他捉拿归案的决心。一张捕捉里纳的网布下了。意大利宪兵司令部组织了一支由30余名官兵组成的特种行动队。队员均来自西西里以外地区，确保与黑手党没有瓜葛，而且全部是单身，无牵无挂，立志于反黑手党事业。他们悄悄地潜入巴勒莫，在里纳可能出没的地方潜伏着。

在政府的强大打击力量威慑下，黑手党军心不稳，几个月工夫，竟然有270余名黑手党分子向政府投降，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他们交代了大量情况，其中包括里纳的最新动向。这为政府掌握里纳的去向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1993年1月9日，意大利宪兵副司令马里奥·莫里上校飞抵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他的公开理由是去看望宪兵部队的有关人员和会见即将到巴勒莫上任的检察官贾恩卡洛·卡塞利，但实际上，他此行的真正目的是去提审一位黑手党分子，他曾当过里纳的司机。这个黑手党分子交代了里纳的近况和他在巴勒莫的一处藏身地点。特种行动队立即严密监视了这个地点，仔细对照大楼里进出的人员。由于里纳已经在逃23年，警方掌握的材料全部是23年前的，连一张里纳的照片也找不到。后来经美国联邦调查局帮助，里纳的照片进行了老化处理，以便使他的照片与他的真实年龄相符一点。每个队员都把照片记在心中，经过仔细监视，照片上的里纳终于与生活中的里纳对上了号。这样，里纳就插翅难逃了。

里纳的被捕对黑手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警方不敢掉以轻心。“宜将剩勇追穷寇”，在反黑手党战争取得重大胜利之时，意大利政府决定乘胜追击。1994年午夜时分，意大利在米兰、瓦雷泽、科莫和布雷西亚等城市，发起了反击黑手党的大规模行动。这次行动意大利警方共出动了3000名警察，发出了370张逮捕令，搜查了几百幢住宅，抓住了117名嫌疑犯，其中包括一些沦为黑手党帮凶的政府官员。意大利内政部长马罗尼称，这是意大利1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搜捕行动。黑手党再次遭到沉重打击。

但是，对意大利而言，抓获里纳、围捕黑手党，这只能算是一个初步的胜利。大家对1986年格列科的落网都记忆犹新，当时大家都认为黑手党这次完了，连法尔科内大法官也持这种看法，但事实上，1986年西西里大审判后，黑手党的活动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更嚣张了。法尔科内和博尔塞利诺也因此付出了血的代价。黑手党过去也曾几起几落，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时期更是黑手党最困难的时期，但战后黑手党能奇迹般地复兴，这固然与当年美国的错误政策有关，但不能不说，黑手党这个超级毒瘤，确实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黑手党是暂时受到了挫折，但是，产生黑手党的机制没有消除，产生黑手党的土壤依然肥沃。在这种情况下，要让黑手党绝种，只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黑手党肆虐意大利几百年，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黑手党更是扩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它的触角已经伸到意大利社会政治、经济生活

的各个层面，几乎在各个领域，黑手党都有后台。不仅一般的工作人员接受了黑手党的贿赂，就连政界要人也不乏与黑手党有染者。1991年5月，意大利反黑手党最高专员多梅尼科·西尼奥里诺在内政部的一次会议上透露，在全国12万余名地方行政官员中，大约有两万人应受到司法制裁。里纳刚刚被捕，意大利就传出曾经五次出任总理的安德烈奥蒂接受过黑手党的贿赂，安德烈奥蒂虽然竭力否认，但却拿不出过硬的证据，最后不得不
辞职了事。安德烈奥蒂一案说明，黑手党在意大利已经是盘根错节，成为意大利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消灭它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喋血金三角 ——坤沙王国的覆灭 金三角

金三角，一个动人的名字。

中国人喜欢用流金淌银来形容一个地方的富裕，如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无锡和常州三市形成的三角地带，因为其特别富裕被称为“金三角”，而南京、镇江和扬州则因经济实力略逊一筹而被称为“银三角”。

可是，本篇所讲的金三角，可不是中国的苏、锡、常，而是在我国云南省南边泰国、老挝和缅甸交界处的金三角。

是这里盛产黄金？不是，这里有一块平原地区，但大部分地区都是山高林密的原始森林。如果不是有一条公路，它与外界几乎是隔绝的。要是这里不闻枪炮声，人们倒会怀疑是否到了世外桃源。

是这里人民的生活特别富裕吗？也不是，金三角人民的生活说不上富裕，有的地方甚至连温饱也没有解决，不少地方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年代。

可是，它的名字确实叫金三角，尽管无人能确切地说出它的详细位置，但一提起金三角，一般人都能说个八九不离十。而且，它与“金”也确实沾点边。

在泰国、老挝和缅甸的交界处有一块小小的三角洲，它的上游是湍急的湄公河，每到雨季，河水挟带着大量的泥沙奔腾而下，倒灌入夜赛河，在这里沉淀下来。久而久之，这里就形成了一个三角洲。三角洲面积不大，但土壤肥沃，因此，物产也很丰富。每年的收获季节，这里一片金黄，稻谷飘香，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农民们载歌载舞，感谢造物主给他们带来的丰收。“金三角”三字由此得名。

稻米虽然香气四溢，但毕竟只能用来糊口，而且，由于这里交通闭塞；丰收后的农民面临着卖粮难的问题。他们必须手提肩扛，爬山涉水好几天，才能走出山外，找到买主，换回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运气不好，这点粮食还卖不出去，因此，几千年来，金三角的农民守着这块宝地，过着穷日子。不过，靠着金三角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他们的生活比起其他地方的农民来要好得多。

但是，今天人们心目中的金三角，并不仅仅是这么一小块地区。今天的金三角，范围要宽得多，它包括了缅甸的萨尔温江两岸、掸邦高原，泰国西北的清莱府、夜丰颂府和清迈府，以及老挝西北部的琅南培省、丰沙里省、琅勃拉邦省和南塔河沿岸。而且，人们提到金三角，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更不是它那闻名于世的香米，如果金三角仍然单纯种植稻谷，那么，在这个工业化已经普及的社会，金三角恐怕也会名不符实。事实是，今天的金三角声名远播，金三角与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名声不相上下，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交界处的“金新月”更是不可与之同日而语。

麦德林之所以闻名，是得益千古柯及其制品，金三角之所以闻名，是因为有了罂粟，那是一种与古柯同效的作物。而罂粟的制品海洛因，真是一种可以与金子比价的东西。

今天的金三角，平原面积很小。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大多是崇山峻岭。这里山高林密，气候炎热，雨水丰富，土地肥沃，适宜各种作物生长。因此，山民们多开荒种植稻谷、咖啡等作物。偶尔，山上也开放出一种极绚

丽的花，它有着绿色或白色的枝秆，深绿色的带有锯齿的叶片，花瓣呈鲜红、橙红或粉红色。它的果实是黑色的。山民们知道那叫罂粟，可以用来止泻、祛痛，也可以用来当烟抽提神。但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利用这种绚丽的花摆脱贫困。没有受过近代西方文明熏陶的山民们，还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种东西极受瘾君子们的欢迎，更不知道，还有一帮天良丧尽的人，专门打它的主意，用它来害人，靠它来致富。

1825年，英国殖民者凭借其坚船利炮征服了缅甸。殖民者来到缅甸，并不是来传播上帝的福音的，他们先是用洋枪洋炮开路，轰开了东方小国封闭的国门，然后，不列颠的商人们，就源源不断东进。殖民者发现，在这块被称为“金三角”的土地上，作物极易生长。发达的经济脑袋首先想出一个罪恶的念头：可以在这里种植罂粟，把这里当作鸦片的生产地，然后，把它远销世界，获取最大的利润。于是，凭借其军事力量，殖民者强迫刀耕火种几千年的山民们放弃水稻等经济作物，改种罂粟。就这样，深山里开满了那种绚丽的小花。由于利益驱动，种植这种小花的农民越来越多，种植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发展到最后，甚至有的农民干脆不种稻谷，反正也没人来收购。而种植罂粟则可以足不出户，就把它销售出去，而且，平常就有买主驻在村里，比起种植稻谷来，那不知要方便多少倍。不过，大多数的农民还较有理智。他们毕竟没有经历过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习惯于买粮度日，因此，他们大多种植一些稻谷，以维持生计。但是，罂粟也是绝对少不了的，没有罂粟就没有现金，这个道理已经为大多数人所认识到。

罂粟的果实经提炼后称为鸦片。殖民者指导农民如何种植，如何收割，如何提炼，最后，由他们全部收购。殖民者当然知道这种东西的危害，他们并不想享用这种东西，过一过神仙日子。他们知道，瘾君子们的天堂是假的，一旦离开吞云吐雾，天国就不复存在，而他们的天堂则是实实在在的。每做一笔生意，他们就离天堂近了一步。他们把这些鸦片交给东印度公司，由他们走私到当时的天朝大国中国。鸦片走私规模越来越大，天朝的臣民们体格越吸越弱，而东印度公司的钱囊则鼓了起来，最后，终于引发了一场鸦片战争。

以老大自居的中华帝国，不是船坚炮利的日不落帝国的对手，这场以鸦片为名发动的战争结束了。鸦片贸易的规模更大了，从偷偷摸摸的走私变成了堂而皇之的买卖。需求上升，进一步刺激了鸦片的生产。1886年，英国人征服了整个缅甸。殖民者凭着武力强迫掸邦种植罂粟。罂粟花盛开在金三角的山坡上，而后又蔓延到克钦、曼德勒等省份。

看着英国人从罂粟中获得了暴利，另一个殖民者法国人坐不住了。当时，法国已经征服了印度支那，于是，它就组织起一帮商人，从金三角向自己控制的印度支那走私鸦片，自己从中收取税金，最后，法国人干脆派专家到越南、老挝等地，向当地的少数民族苗族、瑶族、泰族和佬族传授鸦片种植的经验。罂粟花盛开在整个印度支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人为了对付印度支那的民族解放运动，联合了当地的部落酋长，合作的条件就是，法国人收购当地的鸦片，而各部落则提供兵员与共产党作战。尽管如此，法国人还是没有能挽救其失败的命运，最后退出了印度支那。

不久，另一个列强趁虚而入，那就是美国。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一号霸主，趁着法国人的败退，它通过扶植傀儡，提供援助，逐步渗入印度支那。为了对付越南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美国人绞尽了脑汁。前方，荷枪

实弹的美军在与越共交战；后方，中央情报局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隐蔽行动，他们效法法国人，与当地的少数民族联合起来，由他们向越共发动进攻。在老挝，受中央情报局支持的苗族王室的军队最多达到了3万余人。当地的苗族人生活困难，种植鸦片是他们唯一的经济收入。中央情报局凭着其快捷的网络和特殊的渠道，把他们收购的鸦片带上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销往海外。后来，中央情报局甚至在当地开设了一个海洛因制作场，从鸦片中提取海洛因，从中获取高额利润。就这样，罂粟越种越多，鸦片产量越来越大。金三角成了东南亚最大的罂粟种植地，而越南的西贡则成了东南亚最大的鸦片集散地。大量的毒品从这里中转到世界各地。

金三角与外界的联络颇不方便，只有一条公路从泰国的清莱通向金三角的中心腹地万欣德镇。整个金三角大约有3000个村寨，100万人口，但村寨与村寨之间，只有羊肠小道相连。要把鸦片从这种地方运出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收购鸦片的毒品贩子们都有私人武装。武装押运，这个规矩整个毒品界皆然。不过，金三角最初的毒品武装，规模不大，军事水平也不高，虽然对付当地的强盗已是绰绰有余，但要与政府军作对，只怕难有取胜的机会。一个偶然的时机，导致整个金三角的毒品武装上了档次。

那是1950年，中国解放战争接近尾声，国民党军队已经退出大陆。但是，还有一小部残余武装在负隅顽抗。3月9日，最后一支国民党武装在解放军的打击下，溃不成军，荒不择路，进入与我国云南省交界的缅甸。这支残军的番号是第8军237师709团，团长是李国辉。他们与另外一支先期逃入缅甸的国民党残余部队26军93师278团会合，共同成立了“复兴部队”，指望在这里长期潜伏下去，等待国际局势和国内局势的变化，以“复兴”国民党政权。

第8军和93师都是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过痕迹的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曾随同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与日军作战，当时第8军的军长是李弥。李弥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但凭着勇敢作战，李弥也一步步地升到了少将军长的位置。在著名的松山战役中，李弥身先士卒，亲自参加了一线战斗，为整个松山战斗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李弥及其第8军在抗日战争中是有功于国家和民族的。但是，后来李弥又追随蒋介石，参加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并且同样身先士卒。在淮海战役期间，李弥已是兵团司令，黄伯韬战死碾庄，杜聿明举起了降旗，55万大军全军覆没，成为俘虏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不计其数，独李弥逃出了天罗地网。回到南京后，李弥继续其反共“事业”，深得蒋介石信任。蒋介石委派李弥为云南省主席，也算是对李弥坚决反共的一种回报吧，士为知己者死，李弥就这样顽抗到底，成为国民党留在大陆的最后一支武装。但是，国民党气数已尽，李弥再忠勇，也缺乏回天之术。因此，李弥的残部也不得不退出云南，逃到了缅甸。93师的资格也不比第8军浅。1942年中国远征军远征缅甸，93师就排在远征军的序列里。它长期驻扎在车佛南地区，在当地颇有影响。当地的老百姓看到中国军队，就认为它是93师的，93师成了中国军队的代名词，足见其影响之大。因此，当这两支残余部队逃到缅甸后，当地的百姓仍以93师名之。

1950年8月，“反共英雄”、第8军前军长、云南省政府主席李弥从台湾飞来金三角，接管他的老部队并将其改编成云南反共救国军，下辖193师和93师两个师。1952年，台湾派来700余名官兵增援云南反共救国军。1953年，这支军队发展到1.9万人，成为缅甸北部一支很重要的军事力量。

缅甸政府对此十分不安。政府军与这支反共武装发生武装冲突。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蒋介石撤回了这支部队，但仍有几千人留了下来。这支残余部队后来与金三角的地方势力结合在一起，它的领导人段希文娶了当地一个土司的女儿为妻。后来，这支部队向泰国政府投降，变成了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此后，他们在泰国境内建立了一个自治村，许多人加入了泰国国籍。

这支国民党残余武装，由于远离台湾，生活没有着落，因此，只得自食其力。前文说过，金三角盛产稻米，只要愿意耕作，吃饭不成问题。但是，军响从何处来，军人从何处来？这都成了93师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当地的居民以鸦片换取现金，93师也没有更多的出路，因此，他们一方面招兵买马，进行军事训练；另一方面，又组织人开荒垦地，种植罂粟，然后，将鸦片运出金三角，换取金钱。由于有军事力量作保障，这支鸦片武装在金三角站住了脚，并且很快成了当地最大的一支鸦片武装。

反共救国军在当地网罗了很多地痞，但里面也不乏良家子弟。就在这帮少年中，成长起金三角的“后起之秀”，其中一个叫罗兴汉，一个叫坤沙。他们的雅号，都与鸦片有关，一个叫“鸦片将军”，一个叫“鸦片大王”。

论年纪，罗兴汉与坤沙并不是一辈的人。人们说，罗兴汉是金三角这个鸦片王国的第一代“创业者”，而坤沙则是鸦片王国的第二代“创业者”。没有罗兴汉这个大毒梟在金三角的活动，也许就没有坤沙的鸦片王国了。

罗兴汉生于1934年，缅甸掸邦果敢人。据说，他是一个华裔，身上流有华人的血液。他的缅文名字叫畏蒙，家族是村上的首富。罗兴汉曾进入军事专修班学习，后来国民党军退到掸邦，罗兴汉就跟在国民党军官后面，帮助他们跑腿。据说，他的中文名字就是这些军官取的。罗兴汉跟在国民党军后面厮混了一段时间，学得了一些军事知识，就去给当地的地头蛇杨家家族当兵。由于他受过国民党军的正规训练，身手自然非当地的地痞可比，因此，他很快在杨家武装出类拔萃，当了一个分队长。后来，杨家武装遭到缅甸政府军围剿，罗兴汉逃出法网，带领一部分部属，自立门户，回到老家果敢地区，专门给鸦片贩子搞武装押运。生意越做越红火，势力越来越大。正当罗兴汉志得意满的时候，政府突然出动大军，一举抓获了罗兴汉，没收了他的全部鸦片，而罗兴汉的罪名竟然是“卷入掸邦独立运动”。罗兴汉进入监狱后才知道缘由，不由得大喊冤枉。他拉起山头，只是想搞一点钱，哪里想过要搞什么“掸邦独立运动”？他本来是世家出身，生活优越，从小娇生惯养，根本没有经历过生活的磨练，也没有什么政治抱负，说他卷入掸邦独立运动，那真是冤枉了他。缅甸军事情报部门与罗兴汉接触，说政府可以放他回去，归还没收的鸦片，但罗兴汉必须效忠政府，接受政府的改编，把所学的军事知识贡献出来，与当地的反叛势力作战。罗兴汉答应了。政府为他配备了人马，委任他为果敢自卫队队长。这下子，罗兴汉接受了“招安”，由山大王一跃而成为国家人员。罗兴汉拿着政府配备的人马，回去与杨家武装作战，一举剿灭了杨家武装。罗兴汉“剿匪”有功，被委任为果敢县人民主席。

新成立的自卫队比起以前的罗家军势力更大。现在它属于国家军队，可以使用政府控制的公路和城镇走私鸦片，走私起来更方便了。罗兴汉每年搞两次鸦片贩运，每次规模都在200吨左右，净获利600万美元。现在的“罗主席”，比起当年给毒品贩子做保镖的“罗镖头”，不知神气多少倍。他的鸦片走私已经实现了产供销一条龙，自己有贮藏鸦片的仓库，也有提炼海洛因的工厂。凭藉贩运鸦片得来的巨款，罗兴汉买通了泰国、老挝和缅甸等国

的政府要员、海关职员和法院工作人员，在自己的周围营造了一个个保护网。他的果敢县人民自卫队，事实成了“罗家军”，装备之精良，战斗力之强，缅甸政府军都望尘莫及。罗兴汉势力急剧膨胀，引起缅甸政府的不安。1973年，缅甸政府下令，解散所有的自卫队武装。此举表面上针对缅甸各路大小诸侯，实质上是针对罗兴汉的。但此时的罗兴汉与当年入狱时的罗兴汉已经大不相同了。他的羽翼已丰，再也不把政府的号令放在眼里了。因此，他对政府解散自卫队的命令置若罔闻，反而与国民党的反共救国军订立条约，互相支援，互不干扰对方的走私生意，重新拉起山头，与政府军对抗。

1973年下半年，泰国和缅甸政府军联合行动，扫荡金三角，一举攻占了罗兴汉的老巢，罗兴汉仓皇出逃，不久在泰国落网，并被引渡到缅甸。缅甸政府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罗兴汉死刑，判决书中根本没有提及他贩卖毒品之事。在缅甸政府心目中，贩卖毒品实在无足轻重。不独缅甸如此，当时全世界在毒品问题上的认识都是一致的，即毒品是落后地区摆脱贫穷的一条捷径。如哥伦比亚的麦德林本无毒品，可美国“和平队”在经过考察后，认为麦德林的气候适宜古柯生长，因此建议当地居民改咖啡种植为古柯种植。在缅甸政府眼中，走私毒品除了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少一点外，尚不至于对国家政权产生致命的威胁，而罗兴汉拥有的私人武装，对国家政权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因此，必欲除之而后快。罗兴汉被处死刑，他当然不会在监狱里等死，未待死刑执行，关在监狱里的罗兴汉突然越狱潜逃。后来据说在马来西亚发现了她，此后一直下落不明。

当缅甸政府忙着对付罗兴汉时，另一个更大的贩毒集团在金三角崛起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坤沙集团。这次，缅甸政府遇到了真正的威胁。因为坤沙不仅贩毒，而且还打出了“掸邦独立”的旗帜，据说，贩毒只是手段，独立才是目的。缅甸政府这下慌了。

毒品贩子？民族英雄？

坤沙与罗兴汉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两人的家庭出身相仿，经历也差不多。罗兴汉的家族是村中首富，坤沙的父亲是掸邦莱莫部落的土司。两人都在国民党军队里混过。但是，罗兴汉的发迹比坤沙要早得多，当罗兴汉已是远近闻名的鸦片将军时，坤沙还默默无闻。

坤沙出生于缅甸掸邦当阳镇莱莫山弄掌大寨。坤沙是其缅文名字。与罗兴汉一样，他也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张奇夫。他确实是一个奇异的汉子。他的先祖是从中国云南迁入掸邦的，到坤沙已是第八代，他的母亲是土生土长的掸邦人，因此，坤沙的血管中流着中国人的血。此外，坤沙虽然出生于一个世家大族，但其自幼父母双亡，由其祖父和叔叔抚养成人，身世也是很苦的。

坤沙的家族与掸邦卡瓦部落有仇。当时部落仇杀盛行，坤沙的爷爷担心坤沙为仇家所害，因此一直把他寄养在外地避祸。20岁时，坤沙出落成一个个体格健壮的大汉，而且在国民党军队里混了一段日子，学得了一手军事技术，已经足以与仇家对抗了。坤沙回到故里，成为莱莫部落的酋长。他很快拉起了一支私人武装，这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做法。缅甸刚刚取得独立，政局一直动荡不稳。仰光的政客们忙于争权夺利，无暇顾及社会上的其他事务。一时间，缅甸盗寇风起。为保安宁，各个村寨纷纷拉起武装，保家护院。像金三

角这种三国交界、与世隔绝、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要想保得平安，非得有一支武装不可。

20岁的坤沙，虽然已经是一个部落的首长，而且拥有一支私人武装，但这在当时的缅甸实在算不得什么，谁也没有把他放在心上。坤沙就这样默默无闻地混了下去，一边当他的酋长，偶尔也贩卖一些鸦片。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金三角这种与世隔绝、出产不多的地方，要想维持一支私人武装谈何容易！种植罂粟、贩卖毒品几乎是每个村寨都搞的勾当，坤沙自然也不例外。不过，当时他恐怕还未曾有当一个举世震惊的大毒梟的想法，更没有什么争取“掸邦独立”的念头，尽管他的军装上印有SSA（掸邦军）的字号，但掸邦独立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恐怕也没有搞清楚。

1962年，缅甸政府发生人事变动，奈温将军通过政变上台。

面对国内汹涌的反叛势力和民族独立运动，奈温将军着实很伤脑筋。乱世出英雄，但要把一个乱世治理成一个太平盛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奈温将军现在面对的就是一个乱世。对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反政府力量，光靠政府军剿灭，政府很是力不从心。缅甸没有这么大的财力，何况，政局甫定，政府有多少事情要干！迫不得已，奈温想出了一个以夷制夷的法子。这是中国历代王朝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灵丹，缅甸与中国为邻，多少也接受了一点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因此奈温将军想出了这个高招。根据他的计划，听从政府号令的各地武装力量将得到政府的承认，他们将作为国家军事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此接受招安。但是，他们必须去进攻那些与政府为敌的割据力量。此令一出，各地拥兵自重的诸侯们，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而坤沙是积极拥护的。他看准了这么一个发展自己武装的良机，连忙向奈温将军献忠心：愿意为政府效劳，剿灭那些不听政府号令的乱臣贼子。驻守在掸邦的东北军区司令见坤沙有如此忠心，立即封他为“弄亮地区民众自卫队”长官，为他的武装配发武器装备，派军官帮助坤沙进行军事训练。凭着自卫队的旗号，坤沙立即带领他的军队东征西讨，并不断收留败军的散兵游勇，尤其是吸收了一大批国民党士兵。10年下来，反共救国军眼见复国无望，一个个心灰意冷，士气涣散。这批士兵加入坤沙的武装后，坤沙的军队战斗力大增，其他地方武装相形见绌。

坤沙接受改编的条件是可以继续进行鸦片走私，这也是奈温政府给所有接受招安者的优厚待遇，因此，坤沙的生意越做越红火。他不仅收购毒品，而且在自己的辖区内设立关卡，收取关税，设立毒品加工厂，对鸦片进行加工提纯。坤沙的实力迅速膨胀起来，军队人数增到7000余人。

1967年7月，坤沙派500名士兵武装押运16吨鸦片，前往缅甸和老挝的交界处班广。这批鸦片的买主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说起来令坤沙也自愧弗如，他就是老挝王国政府军总司令温·拉迫功少将，也是一个著名的鸦片将军。不过，他披着政府军的外衣，打着堂皇的旗号。300匹骡马，浩浩荡荡，从缅甸的永弄出发，直奔100公里外的班广。沿途山高林密，骡马队必须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一路上又遇到很多小贩子，他们也跟在坤沙的骡马队后面，因此，骡马队越走规模越大，到最后队伍几乎长达2公里。

7月29日，大队行至距夜寨48公里处，遇到了一支国民党部队。原来，这里已经到达国民党的防区。虽然国民党是“非法入驻”，但金三角这个地方天高皇帝远，谁也拿它没办法。虽说国民党对金三角的一山一水都没有贡献，但对经过自己辖区的鸦片贩子，它照样要收取“买路钱”。平时的小贩

子，慑于国民党的武力，也就答应了，但今天国民党军队遇到的是坤沙，而且是一个有 7000 人武装的大毒枭坤沙。国民党军队不给坤沙这个面子，坤沙一方好说歹说，国民党军队就是不改口：没有买路钱，休想过这一道关！说僵了，双方动起了手。坤沙的队伍有 500 人，国民党军队仗着自己是地头蛇，出动了近千人。双方开始厮杀，打得不可开交。

卖主坤沙在与国民党军作战，呆在班广的拉迪功少将心里也在打着自己的小九九。他十分担心这场战争的结果。不管哪方得胜，对他这个买主都没有好处。打起仗来，毒品难保没有损失，而且消息传出去，他是这批鸦片的买主，鸦片总司令的雅号将不胜而走。思忖再三，拉迪功想出一个恶毒的主意：让双方打去，他们打得筋疲力尽的时候，他可以出马当一回“渔翁”，坐收渔利。于是，他向老挝王国的宰相富马建议：出兵打击贩毒分子，树立老挝王国的清廉形象。富马接受了他的建议，授权他全权指挥。于是，在坤沙与国民党军打得两败俱伤之际，战场上突然飞来了 6 架战斗机，对着双方阵地狂轰滥炸。坤沙这才看清楚鸦片总司令的真实面目，不得不忍痛退出战斗，国民党军也退往泰国，留在战场上的是一大堆尸体和哭爹喊娘的伤兵，另外还有 16 吨鸦片。拉迪功将军一分钱不出，白捡了 16 吨鸦片。从此，拉迪功成了泰、老边境上的大毒枭。5 个海洛因工厂不分昼夜，开工生产，海洛因源源不断地流向东南亚市场，远销欧美。直到 1971 年，拉迪功才身败名裂，被迫辞职。

损失 16 吨鸦片，对于毒王坤沙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至于说 500 个士兵，相对于 7000 之众，也算不得什么。因此，坤沙很快就恢复元气，卷土重来。坤沙的举动渐渐引起缅甸政府的重视。罗兴汉是前车之鉴，奈温不能再养虎遗患。因此，奈温政府决意将坤沙剿除。

1969 年 10 月 16 日，新上任的东北军区司令丹定上校邀坤沙来司令部参加紧急会议，有紧急军情商量，接他的直升飞机马上就到。坤沙不疑有诈，接电后立即出发。等他到了司令部所在地后才发现，丹定根本没有什么军事会议召开，等待他的只是一副手铐而已。坤沙后悔莫及。

在诱捕坤沙的同时，丹定派出大军围剿坤沙的自卫队。由于事发突然，坤沙的部属群龙无首。在优势大军面前，坤沙的军队不战自溃。就在这时，坤沙的参谋长张苏泉挺身而出，搜罗坤沙旧部，且战且退，然后消失在深山老林中。

张苏泉是中国国民党军人，老家在中国东北。后来随着军队东征西讨，国民党溃败后，他流落到老挝，后来投奔坤沙。此人是行伍出身，颇懂军事韬略，坤沙用其所长，让他当了自己的参谋长。这次多亏他处变不惊，坤沙才不至于全军覆没。张苏泉退回深山老林后，痛定思痛，觉得不能再打原先的自卫队招牌了，贩毒虽然是令人切齿痛恨的事情，但没有毒品，军队也就断了生计，放弃毒品生意决计不行。于是，他就挖空心思，为坤沙的毒品生意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这就是“支持掸邦民族独立”，为“民族独立运动”筹措经费。这个名目一出，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后来坤沙也认可了这个主张，并正式打起了“民族独立”的旗号，坤沙的自卫队也改称为“掸邦独立军”。

张苏泉躲在深山，坤沙还身陷囹圄。用什么方法把他解救出来呢？张苏泉颇费心思。拉起队伍与政府军硬打，很明显不行。此次政府军突然袭击，坤沙的军队已经元气大伤，再与政府军面对面地交锋，肯定不是对手，劫狱

也没有成功的希望。张苏泉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得另出奇招。但到底用什么办法，张苏泉一时也拿不准。就这样，4年时间过去了。

1973年4月，又是一年一度的泼水节。掸邦东枝的一所高级别墅前张灯结彩，大门口大红灯笼高高挂起。原来，今天东北军区在这里举行盛大宴会，欢庆泼水节。

别墅门口站着几名政府军侍卫和一名军官，今天他们一方面要负责警卫，另一方面要担任礼宾，接待来司令部的贵客。今天的贵宾中，有两名特殊客人，他们是来自苏联、执行援缅任务的医生。当他们走到大门时，侍卫彬彬有礼，向他们行礼，同时请他们出示证件。军官接过证件，仔细地看了一眼：没错，是两位苏联医生。于是，他们对他们说：“对不起，请跟我们到情报局去一次，有要事相商。”两位苏联客人愣在那里。他们是医生，对军事一窍不通，而且，他们与苏联一些披着专家外衣、实则是克格勃特工的人不同，他们是真正的技术专家。不知情报局请他们去有何贵干？他们正想问个明白，突然两支硬邦邦的枪口已经顶在他们的背后。他们只好跟在侍卫后面走了。这一走就走到深山老林去了。

带走两位苏联专家的是张苏泉的特别行动队。他对苏联人并无恶意，只不过想借他们向政府施加压力，让政府释放坤沙。苏联是一个世界大国，如果它出面向奈温政权施加压力，奈温少不得要考虑苏联人的意见。于是，这两个苏联人就成了绑架的对象。

两名苏联人光天化日之下被绑架，急坏了奈温将军。但是，释放坤沙奈温是怎么也不能同意的。因此，奈温决心乘这个机会，彻底消灭坤沙的武装。政府出动大军，进攻坤沙的军队。张苏泉没有想到政府会来这么一手，只得带着两名苏联人连夜转移。行军途中，带上两名俘虏可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有时为了节省行军时间，张苏泉还不得不让人用担架抬着两个苏联人，真是吃尽了苦头。

缅甸的人质危机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国际舆论才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棘手。奇怪的是，苏联人这次倒挺有耐心，似乎在考虑掸邦民族军的耐心，又像在考验奈温将军的能耐。似乎绑架的不是两个苏联人，倒像是与自己不相干的人。这种现象引起国际舆论的抨击，各种报刊纷纷发文，指责苏联政府对待人质的冷漠无情，又指责奈温政府的不人道，对绑架人质的坤沙武装，却

很少指责。这种尴尬局面，奈温将军还是第一次碰到。

张苏泉对这种局面也没有意识到。他所受的文化教养以及他接受的兵书韬略，都没有教给如何处理这种事件。绑架人质并非中国国粹，他无法从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也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一方面躲避着政府军的围剿，一方面又请出各种人出来调解。最后，他竟然请出了泰国军队总参谋长江萨·差玛南上将出来调解。江萨亲自乘直升机到万欣德镇，接回了这两名苏联人，把他们交给了苏联驻泰国大使馆，同时又敦促奈温政府释放坤沙。奈温政府最后同意，在保全政府体面的前提下，可以释放坤沙。这样，在身陷囹圄5年后，坤沙终于挣脱牢宠，获得自由。条件是，坤沙必须住在仰光，每月向缅甸保安部门报告自己的行踪。过惯山大王生活的坤沙享受不了仰光的繁华，仰光的湿热气候似乎也不如深山的气候来得舒适，因此，坤沙在仰光呆了一年多时间，终于乘着吉普车重回金三角。对缅甸政府来说，这是挣脱囚宠的猛虎重回森林，自然不是什么好兆头。因此，派出重

兵对坤沙武装围追堵截。坤沙不敌，再次退入丛林之中，最后进入泰国境内。

“掸邦独立国”

坤沙选中的宝地是泰国清莱府的万欣德镇，以此作为毒品转运总部和情报中心，实际上也是自己的老巢所在地。万欣德镇面积大约 16 平方公里，坐落在一条狭长的山谷里，北面离泰缅边境只有 8 公里，东边就是汹涌的湄公河，西边又与国民党的势力范围接壤。泰国军队对它是鞭长莫及，缅甸军队当时有更危险的对手——缅甸共产党要对付，因此，一时也顾不上坤沙。到 1979 年越南侵略柬埔寨后，缅甸和泰国的注意力又都集中到柬埔寨问题上去，因此坤沙就在这里休养生息，大力发展他的毒品王国。就在这段时间里，坤沙的毒品事业进入了全盛时期。

万欣德镇有 250 余户人家，1600 人。坤沙自己在这里有 4 幢别墅，张苏泉则保持中国传统，住在一幢四合院里。但是，他们到底住在哪里，恐怕谁也说不准。毕竟，想要坤沙项上人头的人很多，坤沙还不敢大意。镇上设施齐全，医院、学校、足球场、武器库、训练场一应俱全。当然，海洛因加工厂更是少不了的。据说，坤沙的毒品事业全盛时期，仅海洛因加工厂就有十几个，一般设在深山密林中。坤沙集团廉价向山民收购鸦片，然后提炼成海洛因。10 公斤重的生鸦片，只能提炼出 1 公斤的吗啡，纯度大约为 95%。这种吗啡可以继续提炼，纯度可达 99.9%，通常会在其包装打上“999”字样。这些吗啡并不是坤沙的最终产品，他还要把这些吗啡提炼成纯度更高的海洛因。刚开始，由于技术水平限制，坤沙集团只能生产三号海洛因。后来，在香港毒品专家的指导下，坤沙能提炼出四号海洛因，坤沙为他的得意之作取了一个名字，叫“双狮踏地球”。“双狮踏地球”成了世界上的畅销品，供不应求。这种海洛因成本价不过 1200 美元一公斤，但在美国市场上可以卖到 20 万美元。因此，坤沙说，他通过鸦片贸易赚的钱并不多，大量的钱让毒品贩子们赚走了。坤沙自己也知道，毒品不是好东西，因此禁止自己的部属吸食。如违禁令，一经发现，立即处决。坤沙自己也不吸食，只是烟瘾很重，每天要抽 4 包美国烟。曾有人问，你既然知道毒品危害人类，为什么还要生产呢？坤沙振振有辞地回答说：“我们掸邦的人，自然知道鸦片不是好东西，吸食的人受了害，贩卖的人却发了财。但，请您想一想：俄国人和美国人生产了中子弹，人们为什么不问问中子弹扔下来会不会死人？吸食海洛因的人也是要死的，但那是自寻死路。他们知道吸毒有危险，然而，那是他们的嗜好。”言下之意是，他们既然自愿求死，关我什么事？

在金三角生存的关键是武装。没有武装，坤沙的毒品运不出去，没有武装，坤沙的大量财产也保不住。坤沙深明此理，因此，他大力发展自己的“掸邦民族解放军”。虽然泰国和缅甸政府军多次对坤沙的毒品武装进行打击，但他仍然能维持 5000 人的兵力。他的军队正常情况下要进行军事训练。配备的武器精良，小到一般的小型武器，大到短程火箭、榴弹炮。坤沙自称，维持这支武装需要 50 万美元。这笔钱只能从鸦片贸易中出，靠抽税是无法满足的。他在毒品王国四周建有 4 座武装兵营。除了正规军外，他还通过户兵制度，建立了一支万余人的后备军。这种制度是从国民党那里学来的。根据这种制度，一个家庭，如果有 5 个男人，就必须抽 2 名壮丁，如果有 3 个男人，就必须出一个。如果是独子，那么这个家庭可以免服兵役。每个士兵服役期

为4年，服役期间不得回家。军队实行供给制，每月发饷5美元。如果士兵阵亡，其家属可以领到20美元。而中队长以上的军官则在毒品工厂中拥有股份，毒品工厂赚的钱越多，那么其收入也就越多。共同的经济利益把一群毒贩连在一起。

坤沙在金三角打的旗号是“掸邦独立”，贩卖毒品则是为“独立运动”筹措经费。他曾公开说：“我们生产鸦片、出卖鸦片是为了支持我们的战争，赢得我们的战争。”他反对人们称其为鸦片贩子，说他的人民、掸邦的人和他，都是为了从缅甸也是从泰国争得独立而斗争，他们得不到任何外援，鸦片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对于毒品他也是深恶痛绝的。如果外界给他以经济援助，帮助他改变金三角单一的罂粟种植模式，他也是乐意的，但那不是一下子就见效的，必须有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仍然离不开鸦片。他声称，愿意帮助任何国家禁毒，条件是收购他的全部毒品。他曾向美国政府提出，只要美国政府出3500万美元，他愿将他生产的全部鸦片提供给美国政府，这样，美国政府不用费那么大的劲去禁毒，他的经济问题也解决了。由于美国政府坚持仰光政府才是缅甸的唯一合法政府，因此交易没有成功。坤沙声称，只要他的“掸邦独立国”一成立，他马上就禁绝鸦片。坤沙的旗号颇获掸邦人拥护，连外界也弄不清楚，坤沙到底是一个毒枭呢，还是掸邦的民族英雄？对外国的“人权”格外感兴趣的美国政府还真的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到金三角，考察坤沙贩毒与掸邦“民族独立运动”之间的关系。在美国代表团的考察报告中，充满了对坤沙的同情。这样，坤沙就成功地从一个毒品贩子转变成为一个“民族英雄”，而对抗政府剿毒的战争就成了掸邦民族的“解放战争”。有人曾嘲笑说：“如果坤沙们都成了革命军，那么世界上所有的毒品贩干都成了革命家了。”

不管外界怎么说，坤沙还是沿着自己的计划继续向前走，掸邦独立的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1985年3月，坤沙与由莫亨领导的另一支武装掸族革命委员会革命军会合，正式成立了掸邦军，又称“蒙泰军”，成立了“掸邦革命政府”，莫亨出任“政府主席”，坤沙则成为“革命军”的“总司令”，牢牢地掌握了军权。革命军下设6个师，组织严密。1993年12月，坤沙公然宣布掸邦“独立”，打出了“掸邦独立国”的旗帜，自任“总统”。上任伊始，坤沙即致信美国总统克林顿，说如果美国支持掸邦独立，从此他将金盆洗手，彻底放弃毒品走私。但是，考虑到坤沙的臭名，克林顿总统思虑再三，没有答应坤沙的要求。

四面楚歌

从坤沙进入泰国北部，泰国政府就觉得芒刺在背。本来，泰国的毒品问题并不严重，整个金三角，每年出产的鸦片达2500吨，而泰国境内的产量不过30余吨，可以说是九牛一毛。因此，对毒品问题，泰国政府并不在意。当缅甸政府囚住坤沙不放，泰国军队总司令江萨还充当说客，在坤沙与奈温之间调停，最后使坤沙获释。可是，泰国政府没有意识到，坤沙竟然恩将仇报，把他的大本营设到了泰国境内。一时间，泰国境内的毒品贩子越聚越多，最后都奔向同一个目标：万欣德镇。泰国本来就是一个西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与西方国家的来往比较多。坤沙看中了这一点，因此，他的海洛因都从泰国首都曼谷出口，曼谷立时成为毒品之都，致使泰国的毒品问题日趋严重，

国内外都对政府的政策提出了批评。前总理克立·巴莫亲王也说：“当时坤沙只是一个小小的集团，不见得有什么危害，就好像人身上长了一个肉瘤。开始时只以为是个普通肉瘤，现在却变成癌了。”因此，泰国政府下决心要把坤沙这个祸害赶出国门。

1982年1月21日凌晨，泰国政府出动12个连共1000人的兵力，突袭坤沙的老巢万欣德，坤沙的独立军派出2000余人进行抵抗。泰军久攻不克，就调动后续部队增援，出动了直升机、大炮、坦克进行围剿。激战三昼夜，泰军终于攻下了万欣德镇。但这次行动只伤及了坤沙的一些皮毛，大部分毒品武装跟随坤沙逃入了深山。坤沙后来对记者说，泰军死伤200余人，而他的手下仅6人死亡，10人受伤。坤沙此言可能有所夸大，但毒品武装元气未伤，则是一个肯定的事实。

坤沙退入深山，与泰国军警打起了游击战，并不时干一些恐怖行动。如1月26日，坤沙袭击夜赛县和液湛市的警察署和泰华农民银行，打死了1名警察和4个平民，烧毁了5辆汽车。28日，他又烧毁8辆汽车，并闯入附近的农庄，将村舍洗劫一空。坤沙的行径吓得附近的农民不得不关门闭户，泰国北部的城镇风声鹤唳，富裕人家纷纷南逃，甚至附近的联合国办事机构和美国

领事馆也将人员撤到曼谷，并要求泰国军方提供保护。

坤沙在进行这几次袭击后，觉得目的已经达到，可以坐下来与泰国政府谈条件了。他托人带了一封信给清莱府夜庄县“救济山地民族发展中心”的官员，要求他向政府转告他们的几点建议：一、允许他们在万欣德附近另建营地，具体地点可以由泰方指定。看来，坤沙想赖在泰国不走了；二、请泰国军警交还在万欣德镇战斗中缴获的武器，这些武器是用来对付缅甸政府的，而不是用来与泰国为敌的。再说，现在武器价格高涨，买点武器不容易；三、坤沙军将尽力做一些对泰国有利的事，以确保泰国北部边境安宁。

看到坤沙这封信，泰国内政部长、政府总理和陆军司令都面面相觑。难道坤沙还准备在泰国建立他永久的“掸邦独立国”？不管坤沙如何口口声声说与泰国政府是友非敌，如果泰国政府真的接受了他的建议，泰国恐怕非得与它的邻国为敌了。这种事情不能做。因此，泰国政府一口拒绝了坤沙的要求。内政部长锡上将受命就此事向外界发表谈话，也算是对坤沙建议的一种答复：“政府对此事已有明确的政策规定，此事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它有关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所以政府不接受任何条件。”这个答复对坤沙无疑是当头一棒。

泰国境内无法立足，坤沙武装只得重入缅甸。掸邦高原是他的老窝，那里是他的故乡，也是他进行独立战争的大本营，那里的掸邦乡亲支持他。因此，坤沙又回到了掸邦高原，沿着泰缅边界缅方一侧西行50多公里，到达一个名叫多朗依的村寨，这里距清莱府夜艾村仅13公里。村南有一座小山，坤沙觉得这里地势不错，是建立新王国的理想地点。于是他就发兵赶走了先期占山为王的一股土匪，然后就在这里建立自己的王国。他以多朗依为总部，建立了一个“公社”，改多朗依为“繁荣村”，然后不断扩展地盘，周围的5个村寨也被卷入王国的范围，不受缅甸政府管理。

坤沙卷土重来，缅甸政府不断派兵进剿，但是，每次坤沙都钻出了政府军包围圈，因此，尽管坤沙遭到多次打击，却伤亡甚微。坤沙在金三角土生土长，手下的士兵也多是金三角的农民，他们熟悉地形，善于与政府军周旋，

再加上坤沙打着掸邦独立的旗号，颇得一些掸邦人的信任，他们积极为坤沙提供情报。而政府军的情况则完全相反，他们好不容易赶到包围地点，已经筋疲力尽，再与坤沙作战，明显是勉为其难，因此，政府军不易取胜。经过多年的经营，坤沙的武装已经完全实现了现代化，其装备之精良，政府军难望其项背。因此，坤沙尽管屡战屡败，却总能在间不容发之际逃出政府军的包围圈，钻入深山后休养一段时间，再次卷土重来。就这样，坤沙的独立王国维持了数年之久。

坤沙在他的王国里舒舒服服地做他的毒品皇帝，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88年，缅甸新政府积极推行民族和解政策，不再用武力镇压作为解决民族矛盾的唯一手段。政府呼吁各反对派武装放弃与政府为敌的立场，与政府一道建设国家。1992年丹瑞大将执政，奉行更为灵活的政策，积极推进民族团结。在政府的号召下，缅甸国内的16支反政府武装，有15支坐下来与政府谈判，并达成了停火协议，唯一与政府对抗的就是坤沙，他还沉浸在掸邦独立的美梦中。坤沙成了一个孤家寡人，处境日益孤立。缅甸政府多次强调，坤沙不属反政府武装，他是人类的公害，政府决不与坤沙集团和谈，只有投降才是他的唯一出路。在坤沙宣布独立并自任“总统”后，缅甸政府更是与坤沙势不两立，加紧了对坤沙的围剿。1994年5月上旬，缅甸政府军7000余人，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强渡萨尔温江，直捣坤沙的老窝。政府军采取铁壁合围、各个击破的战术，逐步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一扫历次进剿行动中的颓势，先后攻占了泰缅边境坤沙集团的各个战略要地。坤沙集团元气大伤，被迫且战且退。

国际局势更是风云变幻。毒品问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由毒品引发的恐怖主义问题举世瞩目。有关国家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正不遗余力。在另一个毒品大国哥伦比亚，政府每年耗资数千万美元，进行剿灭毒品的战争，大毒枭埃斯科瓦尔已经放下武器，向政府投降。至于坤沙自己的境遇只不过比埃斯科瓦尔略好一点。1989年12月，坤沙在美国纽约以10项贩毒罪名被起诉，美国政府悬赏200万美元缉拿他。泰国也将坤沙列为通缉要犯，泰国警方发誓，只要坤沙一在泰国出现，泰国警察将立即将他逮捕并引渡到有关国家。为配合缅甸政府军的进剿行动，泰国加强了对泰缅边境的封锁。坤沙从国外购买的萨姆-7型导弹在泰国被扣留。坤沙集团的七名干将也在泰国被捕。

对坤沙来说，更直接的危险来自内部。走私毒品是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冒险，为了牟取高额利润，很多犯罪分子铤而走险，他们积极参与毒品走私，从而产生了与坤沙集团的矛盾。坤沙集团的毒品生意由盛而衰，开始走下坡路。在坤沙集团内部，由于分赃不均，也是怨声载道，一部分人想撇开坤沙单干。坤沙的“掸邦独立”口号也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了。自1994年起，为报复缅甸政府军对坤沙的进剿，坤沙武装不断洗劫掸邦村庄，枪杀无辜掸民。令人发指的是，坤沙部下竟然袭击缅甸的寺庙，杀害里面的善男信女。缅甸是一个信佛教的国家，国民大部分是佛教徒，佛祖、寺庙在他们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坤沙竟然与寺庙为敌，在缅甸引起了公愤。就是在坤沙武装内部，对这种做法也存在分歧。很多士兵由此看清了坤沙的真实面目。掸邦独立是假，建立毒品王国是真。1995年6月，大约有6000余名蒙泰军官兵脱离坤沙，自立门户，与坤沙分庭抗礼。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对坤沙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坤沙只觉得四面楚歌，被迫辞去蒙泰军总司令职务。他

对记者说：“我老了，不久将要退休了……”当时，记者还以为他是说说的，没想到坤沙此举是真的。他已经将兵权交给自己的手下，自己开始策划投降事宜。

1996年新年伊始，从金三角传出消息：当今世界最大的海洛因走私集团头目坤沙，已经正式宣布向缅甸政府投降。从1月1日下午起，缅甸政府军陆续进入位于泰缅边境的金三角坤沙集团的各个据点，占领了坤沙集团的老巢。1月8日，政府军接受贺孟、瑞兰地区坤沙武装的投降，共计有4431名士兵放下了武器，政府军收缴各种类型的武器3483件。1月18日，缅甸政府在贺孟再次举行坤沙集团的缴枪仪式，坤沙出席了这次仪式。至此，坤沙集团的9000余人已经放下武器投降，少数残余武装也陆续投降。缅甸持续30余年的禁毒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坤沙是投降了，但是，金三角的毒品问题并未因此而消失。只能说，没有了坤沙，金三角的毒品问题将不像过去那样严重。金三角的毒品问题绝不会一下子就消失得干干净净。庞大的毒品消费市场仍然存在，走私毒品的高额利润会刺激新的坤沙出现；而且，金三角长期形成的毒品生产氛围更不会轻易消失。这里的山民们现在除了种植罂粟外，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能力已经退化。不种植罂粟，他们以何为生？改种其他经济作物，派专家进行技术指导，需要大量的经费，这笔经费从何而来？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山民仍会种植罂粟，金三角将会产生新一代的坤沙。因此，摆在缅甸政府和国际社会面前的任务并不比以前更为轻松。要真正解决金三角的毒品问题，人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法律对罪恶的胜利 ——哥伦比亚的可卡因大战 向正义宣战

1989年8月18日晚上8点多钟，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西郊的索阿查广场。

万余群众在此集会，聆听执政的自由党总统候选人路易斯·卡洛斯·加兰的演说。加兰是现任参议员，在哥伦比亚是一颗正在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前途看好。据说，加兰在此次竞选中极可能胜出，取代现任总统巴尔科。他的主要政治纲领针对哥伦比亚面临的重大问题——毒品。加兰在竞选中提出，毒品是哥伦比亚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人类的最大威胁。如果他当选总统，一定把扫毒作为首要任务，加大扫毒力度，还哥伦比亚人民以安宁。加兰这个纲领并不是批评巴尔科总统扫毒不力，自由党这几年在扫毒问题上态度是很坚决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毒品问题在哥伦比亚积重难返，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可以奏效的。因此，此次加兰接替巴尔科为自由党出马竞选，自然要把这个问题列为第一条纲领，以争取民心。

加兰在讲台上娓娓而谈，捧场的听众也听得入了迷，但人们不知道，就在几米远的地方，一桩阴谋正在悄悄地进行着，而目标就是加兰。据电视摄像表明，当时起码有5名凶手在实施这个罪恶计划。两名凶手伪装成加兰的支持者，高举着支持加兰的大字标牌，不时地晃动着，以混淆视听，另一名凶手则在距加兰仅二米的地方，对准加兰的腹部就是一阵狂扫，其他两名凶手则一齐对空鸣枪，惊散人群，然后乘机逃脱。刚才还面对人群侃侃而谈的加兰，顷刻间便命赴黄泉，成为哥伦比亚又一位死于毒品问题的政治家。

这是近三天来第三起因毒品问题而发生的谋杀事件。8月16日，哥伦比亚39岁的高级法官马斯特拉斯·卡洛斯·巴伦西亚在他的汽车上被4名从后面赶上来的摩托车手开枪打死。

巴伦西亚被杀的原因就是他执行政府打击毒品犯罪的指示，公布了对大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逮捕令。8月17日，49岁的警官瓦尔德马·富兰克林·金德罗也困同样原因被害。加兰是三天内的第三位受害者。而就在十几天前，加兰已经遭到过一次暗杀，只是因为警方得到情报后，反应及时，加兰得以死里逃生，但是他终未逃脱毒品罪犯的死亡追杀。

作为总统候选人遇害，加兰绝不是一个孤魂野鬼，只是他先走了一步，此后的几个月中，又有两位总统候选人遇难。

1990年3月22日，哥伦比亚爱国联盟推出的总统候选人贝尔纳多·哈拉米略在他的妻子玛丽亚及10多名青年保镖的陪同下出现在哥伦比亚的国际机场售票厅。一名腋下夹着一卷报纸的青年人向他们打招呼，并伸出手来准备与他握手。哈拉米略不知对方是谁，正在思考是否与他握手。就在这时，青年人突然将手抽回，同时从腋下拔出一支微型冲锋枪，对准哈拉米略就是一梭子子弹。哈拉米略立即倒在血泊之中。6发子弹击在他的胸口，2小时后他死在医院的抢救室里。而那名行刺的安德烈斯·古铁雷斯只有17岁，他既不是哈拉米略的信徒，也不是他的反对者，在此之前，他对哈拉米略还一无所知。只是在21日，有人找到他，愿意出650万美元，让他第二天在机场干掉哈拉米略。在这个贫穷的国家，650万美元是个天文数字。一般情况下，人们只要出10美元就可以雇到一个杀手，出200美元就可以雇到一个职业杀

手，而古铁雷斯什么都不是。因此，他答应了对方的要求，收下了他的钱和冲锋枪。一个总统候选人就这样死于非命。暗杀事件发生后，一男子打电话给电台，声称暗杀事件是贩毒组织麦德林卡特尔所为。

一个月后的4月26日，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一架飞往西部城市巴兰基利亚城的波音707客机已经起飞，突然，从飞机尾部传来一阵激烈的射击声。一位20多岁的青年人从机舱的厕所里取出一支微型冲锋枪，对准20号座位上的乘客一阵狂扫。名叫卡洛斯·皮萨罗的“四·一九”运动总统候选人立即血流如注。他的保镖立即开枪还击，但已经迟了，凶手尽管被击毙，但他们的主人也在送往医院的路上断气。皮萨罗的遇刺在哥伦比亚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四·一九”运动在哥伦比亚曾是一个游击队组织，也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哥伦比亚政府费尽力气也没有把它剿灭。只是到1990年3月，它才与政府达成协议，交出武器，成了一个合法的政治组织，成为哥伦比亚政坛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它的领导人皮萨罗因而成为几个政党联合推出的总统候选人。皮萨罗的被害，在哥伦比亚引起强烈反响。各界人士纷纷走上街头，谴责这一暴行。哥伦比亚政府不得不宣布中小学停课，由最高法院和警方联合调查此案。后来发现，这一事件又是麦德林卡特尔所为，只不过它没有亲自出手，而是假手于哥伦比亚某极右的准军事组织。这一行动对哥伦比亚的和平进程毫无疑问是一次沉重打击。

当然，上面列举的仅仅是麦德林卡特尔所干的几件较为突出的非法勾当。至于说死于它手上的其他次要一点的人物，就更多了。据统计，从1982年至1987年，死于与毒品有关的政治家有108人，法官157人，新闻记者17人，警察1536人，军人408人，游击队员118人，其他公民3100人。这7年因而获得“死亡的7年”的外号。其他年份是否就好一点呢？远非如此，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变得更糟。1989年发生了88次大屠杀，每次屠杀至少有5人遇难。1992年11月8日，哥伦比亚政府宣布全国处于国内动乱状态，1993年2月6日又宣布将动乱状态延长90天。为了对付毒品犯罪，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设立“特别程序”法庭，并颁布法律，认可了这种特殊体制。在这种特别法庭上，对罪犯的审判是不公开的，你在这个法庭上看不到一个主控官，也看不到威严的大法官，更看不到为正义举证的证人。没有一个大法官不怕死，更没有一个证人为了举证一个罪犯而愿意在法庭上露面。一个公开声称要与毒品贩子作对的人是一个了不起的勇士，作出这项决策是要有非凡勇气的。像加兰这样公开与毒品分子为敌的人实在难见。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得到人们的极大尊重。但是，在死亡面前，敢于作出这种决定的人太少了。美国政府公开宣布，在哥伦比亚这块土地上，没有一个法官能够安全地避开贩毒集团的威胁。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哥伦比亚，法官、警察、政治家是恐怖分子“优先”考虑的目标，因为只有这些人敢于同他们作对，或是出于职责，或是出于良知。因此，死于恐怖分子之手的司法人员屡见不鲜。

1984年4月30日，力主扫毒的司法部长罗德里格斯·拉腊首先罹难。正是他首先揭露身为哥伦比亚议会候补议员的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是麦德林卡特尔贩毒集团的第一号人物。他力主将那些毒品巨商引渡到美国受审，因为在哥伦比亚已经找不到一个地方能对毒枭进行公开审判。结果，他被认为是对麦德林卡特尔威胁最大的人物。这样，死亡之神也就光顾了他。

1985年11月，麦德林卡特尔支持的暴力组织占领了哥伦比亚的最高法

院大楼，11名大法官落人敌手，惨遭杀害。最后，政府不得不出动装甲车才冲进大楼，消灭了这帮歹徒。

1985年12月17日，哥伦比亚第二大报《旁观者报》的记者吉列尔莫·卡诺因为著文抨击毒贩，批评最高法院不执行美国与哥伦比亚之间的引渡协议而被列入死亡名单。

1987年，哥伦比亚最大的左派政党爱国联盟主席帕尔多·莱阿尔惨遭杀戮。

1988年1月24日，哥伦比亚总检察长卡洛斯·毛罗·奥约斯在路上遭持枪歹徒的袭击，奥约斯身受重伤，苦苦哀求歹徒将他打死，但歹徒连他这个最起码的要求也没有满足。当天晚上，人们在麦德林郊外发现了血肉模糊的总检察长。两天之后，另外一位著名的反毒人士、库库塔市的市长拉蒙·迪亚士及其夫人也“荣幸”地进入死亡名单。

接下来的是加兰、哈拉米略、皮萨罗……

面对恐怖分子的威胁，有人坚贞不屈，也有人在死神面前退缩了。

1989年7月26日，莫尼卡·德格雷夫就任哥伦比亚司法部长。这位年仅32岁的女性是3年中第11位司法部长，她的前任，不是罹难，就是辞职不干。她明知接受这一任命意味着什么，但是出于良知，出于正义，她还是挺身而出。上任伊始，哥伦比亚开始了新一轮反毒高潮。全国军警紧急出动，大肆搜捕贩毒分子，约有1万余人被捕，2亿美元的资产被没收，200架飞机被查封。德格雷夫的举动激怒了贩毒分子。8月26日，她的家门口出现了一辆装着炸药的汽车。二天后，恐吓电话直接打到了她的府上。恐怖分子威胁她：“你已经成了我们下一个目标，再干下去，我们就杀了你全家！”面对威胁，女司法部长没有退缩。她在记者招待会上慷慨陈词：“国家的法律正在遭到践踏，尽管有死亡的威胁，但我绝不辞职！”她还说：“我要维护法律的尊严！”人们为女部长的勇气鼓掌。

但是，9月21日，人们得知，这位以勇气著称的女部长已经向总统递交了辞呈，并谢绝了总统挽留她出任驻外大使的邀请。人们对这并不惊奇，因为再严密的保护也不可能保障她的生命安全。她有丈夫，也有小孩，食人间烟火，有七情六欲，因此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考虑。

由于毒枭的暗杀，哥伦比亚的法官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职业。哥伦比亚是一个法制国家，政府要对贩毒分子采取行动，必须要法官的配合。但是，究竟有多少法官不怕死呢？在哥伦比亚，有勇气、有胆量签署毒枭埃斯科瓦尔逮捕令的法官屈指可数。桑切斯是第一位，但他于1988年11月离开了哥伦比亚，前往美国避难，如果呆在哥伦比亚，他将性命不保。鉴于他在反毒斗争中表现出的非凡勇气，美国政府对他提供了可能做到的最好的保护。

接下来是玛丽亚·迪亚士，一个年仅34岁，有一个1岁小孩的母亲。她的运气没有她的前任那样好。在与犯罪分子作对后，1989年6月，她驱车前往麦德林，被毒枭的枪手打得像一块蜂窝煤。

大法官巴伦西亚佩服迪亚士这个女性，因此，在她遇难后，毅然决定，完成女法官的未竟之业。为了一心一意对付埃斯科瓦尔，他把自己的妻、女儿安排到危地马拉，在那里，她们的生命安全可能得到保证。巴伦西亚不愿作无谓的牺牲，因此，身上一直穿着防弹背心，自己每个晚上的住宿地点都要更换。但是，他终究没有逃脱毒枭的毒手。

那个在哥伦比亚欠下无数血债、令哥伦比亚人民切齿痛恨的毒枭到底是

什么模样？哥伦比亚的毒品问题为什么会变得不可收拾？还是让我们来看看毒王其人吧！

“大善人巴勃罗”与“杀人魔王”

哥伦比亚位于拉丁美洲西北部，北濒加勒比海，西临太平洋，东面是委内瑞拉、巴西，西北角与巴拿马接壤，南部是厄瓜多尔、秘鲁。这里气候温暖潮湿，适宜植物生长。60年代，美国的“和平队”来哥伦比亚扶贫，他们看中了哥伦比亚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因此，建议哥伦比亚种植古柯。古柯的叶子经烘干进行化学反应后可以生产出一种粉状物体，这就是可卡因。它有麻醉作用，吃了它人可以飘飘欲仙，进入离魂状态。过去，这种植物一直被印第安人当作药品使用。“和平队”的建议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从此，古柯成了哥伦比亚的主要植物，原先的咖啡被古柯所代替。从70年代起，哥伦比亚种植古柯的面积不断扩大，到80年代后期，古柯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5万公顷，另外还有3万公顷的罂粟，2万公顷的大麻。古柯的产量节节上升，达到3万吨，仅次于玻利维亚和秘鲁。这样，哥伦比亚成了世界上的毒品生产大国。

哥伦比亚不仅种植毒品，还对毒品进行来料加工，全国有大小500处加工点，成了名副其实的毒品工厂。这些毒品经加工提纯后，运往世界各地，主要是美国。据说，在美国的毒品市场上，有70%的可卡因是由哥伦比亚提供的，总金额约50亿美元。毒品生产带来了哥伦比亚的繁荣。在这个国度，每9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与毒品生产有关。埃斯科瓦尔曾说：“在所有行业中，来钱最快、最容易、最多的，只有贩毒。”暴利吸引着千百万谋利的人们。

今天提到哥伦比亚，人们不一定知道它的首都波哥大，但是，却没有多少人不知道麦德林。本来，麦德林在哥伦比亚也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城，虽然这里气候宜人，却不生产毒品，这里遍地都是兰花，全无半点毒品的气息。可是，今天人们提到哥伦比亚，总会想起一个名词：麦德林卡特尔。一个地名，一个机构，奇怪地联系在一起了。

是麦德林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它成了千百万瘾君子向往的地方，也是它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它成了更多的怀有正义感的人们切齿痛恨的地方。

这里四周群山环抱，陆路交通闭塞。而另外一方面，这里的航空业却十分发达，四通八达的航空线把麦德林同哥伦比亚全国乃至整个世界联系起来。因为闭塞，军警不易进出，这里成了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毒品贩子看上了这块宝地，可以在这里进行毒品加工。因为航空业发达，毒品贩子可以从这里把毒品运往世界各地。

麦德林的传统工业是纺织业。70年代开始，纺织业开始衰退，成为夕阳产业，麦德林出现了成千上万的失业大军。这些生活无着的流浪大军，极易为蝇头小利所吸引，加入毒品生产、贩卖的行列。正因为这些条件，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麦德林就出落成世界知名的毒品之都了。

时势造英雄，这句话用来形容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戈维利亚这个著名的毒品大王也同样适用，虽然他不是什么英雄，但却是一个枭雄，一个令世人胆寒的枭雄。

埃斯科瓦尔本来也是一个良家子弟，父亲是本分的农民，母亲是个小学教师。1949年12月1日，他出生于麦德林西南的小镇恩维加多，在三兄弟

中排行老二。由于家道贫寒，埃斯科瓦尔的童年岁月想必不会很幸福。

印度电影《流浪者》的主题是反对血统论，法官的儿子未必是法官，贼的儿子也未必是贼。这个结论在埃斯科瓦尔身上再次得到印证。埃斯科瓦尔的父母还算本分，但埃斯科瓦尔从小却出落成一个无赖、一个泼皮。他从小就喜欢偷鸡摸狗，据说，他还偷过墓碑，盗过自行车，尽管都是些小本生意，却是无本万利的买卖。如果他就这么折腾下去，麦德林最多多一个小贼，说严重一点也就是多了一个强盗头子。

可是今天人们却知道哥伦比亚有一个麦德林，麦德林有一个埃斯科瓦尔。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埃斯科瓦尔生活在一个毒品世界。

有句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无钱只好做推磨鬼。埃斯科瓦尔就做过这种推磨鬼。偷自行车虽然风险很小，但毕竟获利菲薄，不能使埃斯科瓦尔暴富。眼看着周围的人们因毒品生产和贩卖而暴富起来，埃斯科瓦尔的眼也红了。他决定也从事这一本万利的买卖。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枪击训练后，埃斯科瓦尔踏入了这一万劫不复之路。1976年，他带着20公斤的可卡因意外失手。如果在今天，等待他的将是断头台，但当时的麦德林却没有毒品犯罪这一说。因此，埃斯科瓦尔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审判，反而雇人杀死了逮捕他的警察和接手审理此案的法官，最后，竟然一把火把法院烧了，这样，存放着他罪证的材料统统被付诸一炬。由于缺乏证据，法官眼睁睁地看着埃斯科瓦尔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拘留所。此后，他带领农民精心种植古柯，并进行技术革新，原来每年最多收获两次的古柯，在埃斯科瓦尔的调教下，竟然能收获四次。这样，埃斯科瓦尔声名大噪。此后，他不断罗织羽翼，势力不断扩大。

1981年12月2日，一个历史性的日子。这一天，埃斯科瓦尔刚过31岁生日，就被推举为麦德林卡特尔的首领。在他的经营下，麦德林卡特尔规模更加扩大，组织更为健全。大量的毒品工厂有了现代化的设施，卡特尔有了一批精通走私之术的技术专家，更有了一支装备精良的私家军队。埃斯科瓦尔成了世界头号毒王，麦德林卡特尔则成了一个从事毒品生产、贩运的跨国公司，其管理水平足可与世界最杰出的跨国公司比肩。不义之财滚滚而来，埃斯科瓦尔有了自己的飞机，其数量足可让哥伦比亚国家的空军黯然失色。他还在南美几个国家拥有宾馆，在美国拥有200套公寓，在麦德林还有一个动物园，即使是哥伦比亚全国的动物园里的动物数量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他的动物园。埃斯科瓦尔成了这个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富人之一。

富起来的埃斯科瓦尔不忘他童年时期的苦日子。他拿出不少钱来帮助那些没有能富起来的穷兄弟们，他有过一项“宏伟”的计划：消灭麦德林市的贫民窟。从1935年开始，凭藉贩毒带来的雄厚经济实力，他出资收买了麦德林西面的一块丘陵地带，由一位神父经营，在这里修建了600栋设施齐全的单元住房，供麦德林市的贫民居住。这样，世界上最大的贩毒集团首脑就赢得了“大善人巴勃罗”的美称。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了解毒品危害的知识界人士，在埃斯科瓦尔的善举面前，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慈善行为确实拯救了一批贫苦人民。有一位麦德林大学的法律系学生就说：“其实我的父母也是流入麦德林的农民。贩毒集团虽然是一种罪恶的存在，但他们给失业者以救济，给贫民以住房，这都是政府难以做到的。我有时认为这是一场旨在摧毁政府特权的革命，我也许有一天也要参加他们的行列。”至于埃斯科瓦尔自己就更大大言不惭。在他的信念中，贩毒不仅解救了一大批无家可归、失业失

学的贫民，还给国家的财政增加了收入，因此，他是国家的有功之臣。他振振有词地说：“我们的行动是替国家分忧解难，是弥补政府的无能。我们的存在，正是给广大的工人和农民提供机会，带来实质的利益，但现在反而有人要消灭我们！我们对国家、对民族，到底是有罪，还是有功？”

这个问题恐怕是很难用一句话来回答的。在哥伦比亚，可卡因的出口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哥伦比亚有九分之一的国民在从事毒品生产，每年因走私、贩毒带来的外汇收入达到数十亿美元，毒品已经取代咖啡成为哥伦比亚出口的大宗商品。贩毒集团把一部分资金投入哥伦比亚，进入生产领域，为哥伦比亚创造新的国民财富。麦德林和恩维加多有不少建筑是毒品集团兴建的。当年的恩维加多不过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小镇，由于出了埃斯科瓦尔这么一个“善人”，现今的恩维加多已经是一个拥有1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这里建起了32所幼儿园，23所小学，18所中学，6所大学。恩维加多已经消灭了文盲，而哥伦比亚全国尚有13%的人目不识丁。由于埃斯科瓦尔是个体育迷，恩维加多的体育设施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这里有18个网球、足球和旱冰球俱乐部，它还拥有一个甲级足球队，这在哥伦比亚也是绝无仅有的。恩维加多也是全国唯一实行失业和老龄补贴的地方，其公共服务除得到补贴外还惠及99%的居民，这在哥伦比亚也是独一无二的。麦德林市的情况与此类似。有一位参议员曾坦率地说，如果没有毒品利润的注入，麦德林市的失业率将上升到25%。这个数字对广大麦德林市的居民是不可想象的，埃斯科瓦尔赢得“大善人巴勃罗”的美誉并非偶然。普通的百姓评价说：“感谢亲爱的巴勃罗先生，使这里变成了天堂的一部分。”

因此，1982年，埃斯科瓦尔居然步入政界，成为自由党的国会议员候选人。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埃斯科瓦尔致富的源泉不是毒品而是其他什么生意，那么，埃斯科瓦尔理所当然地应当得到人们的尊敬。但是，情况恰恰相反。埃斯科瓦尔是当今世界第一号毒王，是世界上最大的贩毒集团的头子。

美国毒品管制局前局长威廉·尤特对埃斯科瓦尔的组织曾有过这么一个评价：“它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凶恶、最危险、最残暴、最大胆也是最有钱的犯罪组织。与这个集团相比，美国的黑手党就像小学生，日本的山口组织就像教堂里的唱诗班。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危害着全世界人民的健康与幸福。”

这就是世界各国禁止毒品贸易，并将类似埃斯科瓦尔这样的贩毒集团称为犯罪集团的真正缘由。正因为有了埃斯科瓦尔，今天的哥伦比亚成了世界毒品之都，而哥伦比亚政府也成了习惯于对别国事务指手画脚的美国政府的攻击对象。

哥伦比亚也不纯粹是毒品贸易的受惠者，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自有毒品贸易以来，哥伦比亚的谋杀案直线上升，死于毒品的人数也有增无减。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城市，而贩毒之都麦德林则有“杀人城”、“谋杀之都”及“拉丁美洲最危险的城市”之称。在麦德林，发生谋杀事件不是新闻，相反，如果哪一天未发生谋杀事件，那么这条消息完全可以成为各大报刊的头条新闻。更重要的是，毒品已经渗入哥伦比亚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埃斯科瓦尔的私家军队已经控制了哥伦比亚全国十分之一的土地，麦德林市已经成为一个“国中之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哥伦比亚整个国家到处散发着毒品的气息，毒品成为危害哥伦比亚社会稳定

的一个毒瘤。这也是哥伦比亚有识之士誓死禁毒的原因。

“ 革命行动 ”

加兰遇刺迫使哥伦比亚政府向麦德林卡特尔开战，当天夜间，哥伦比亚政府召开全体内阁会议。总统比尔希略·巴尔科·巴尔加斯在会上表示：“我们将致力于清除这种即将摧毁我们整个国家的超级癌症！”随后，他通过电视台向全国发表讲话，宣布：暂时限制公民的行动自由，全国实行戒严，出动军警对贩毒分子进行围捕，军警有权进行非正常理由的搜查，没收犯罪分子的财产，冻结他们的银行帐户，恢复 1979 年签署的引渡毒贩条约，把贩毒分子引渡到美国进行审判。这一措施触动了贩毒集团的神经。因为哥伦比亚已经成了毒品天堂，正常程序根本无法对贩毒分子进行审讯。因此，贩毒分子根本不怕逮捕。但是，如果把他们引渡到美国去，他们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因此，他们拼命反对这项引渡条约。本来，哥伦比亚是执行这项条约的，但是，美国竟然将这项条约看作它有权干涉哥伦比亚事务的证据，提出要派兵到哥伦比亚帮助扫毒，因而遭到哥伦比亚的拒绝，后来这项条约也没有得到执行。现在，巴尔科总统没有办法，只好再次祭起这个利器，向贩毒分子开战。

在政府的部署下，哥伦比亚的军警大批出动，封锁了贩毒分子所有可能的外逃路线，开始了大搜捕。

1989 年 10 月 17 日下午 3 点，哥伦比亚国家安全局局长米盖尔·马萨接到情报：麦德林卡特尔的三大毒枭准备聚会埃斯科瓦尔的“黄金庄园”，召开麦德林卡特尔的“最高级会议。”他认为，这是对麦德林卡特尔难得的一次一网打尽的机会。于是，巴尔科总统立即召集国民军司令、特种部队司令和警察司令到总统府开会。经过两个小时的布置，总统决定，出动 200 名士兵，乘运输机直插“黄金庄园”，同时切断贩毒集团的陆上和海上通道，力争一网打尽。结果，贩毒集团措手不及，交战中，埃斯科瓦尔也受了伤，但乘夜逃脱，100 余贩毒分子被打死。三天时间内，警方共抓获毒品贩子或有贩毒嫌疑的人员 1 万余名，缴获了价值 1000 万美元的黄金、珠宝和武器，没收了 2 亿美元的贩毒分子的财产，封存了 1000 多辆汽车，200 多架飞机。杀害加兰的犯罪分子也在此次搜捕中落网。12 月 15 日，麦德林卡特尔第三号人物加查在交战中毙命。麦德林卡特尔元气大伤。

面对政府的搜捕，贩毒集团也进行了疯狂的反扑。麦德林卡特尔于 8 月 24 日在全国张贴了一份公告，声称要对政府的缉毒行动进行暴力报复，向“政府，向那些工业寡头、向那些攻击和破坏我们生计的新闻记者、向那些向政府出卖我们的法官、向那些签署了引渡条约的行政司法官员、向那些对我们提起公诉并攻击我们的法庭庭长、院长们发动全面的无限制的战争”，政府每引渡一名贩毒分子，他们就要处死 10 名法官。为了表示自己说话算数，麦德林卡特尔用炸弹袭击了自由党和保守党总部。11 月 27 日，一架满载旅客的波音客机在起飞 5 分钟后在波哥大上空爆炸，机上 100 余名乘客遇难。麦德林卡特尔称，制造这起爆炸事件，是为了处死机上的 5 名告密者。面对贩毒集团的报复，哥伦比亚政府又宣布，由陆军接管全国 46 个机场，由空军封锁领空，对飞越禁区、不听调度的飞机可以击落，在波哥大和麦德林实行宵禁，服役期满的军人超期服役。

在政府的严厉打击下，麦德林卡特尔顶不住了，他们提出与政府和谈。为了顺利解决毒品问题，减少人力财力的损失，巴尔科总统也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他表示，只要埃斯科瓦尔自首，政府不会把他引渡到美国受审。1990年4月5日，他在访问法国时再次宣布了这一政策。1990年6月，加维利亚就任总统。他继承了巴尔科总统的策略，对犯罪集团开展攻心战。政府颁布了一项法律，政府将对毒品分子宽大处理，只要他们向政府自首，就不向美国引渡。这项政策对贩毒分子颇有吸引力。1990年底和1991年初，与埃斯科瓦尔同为麦德林卡特尔首脑人物的奥乔亚三兄弟先后向政府自首，政府履行诺言，没有将他们引渡到美国受审。埃斯科瓦尔心动了。

1991年5月22日，在84岁高龄的天主教神父加西亚·赫瑞罗斯的斡旋下，埃斯科瓦尔同意在15天内向政府投降，同时，他要求政府保证他的财产不被没收；惩办侵犯过毒犯及其家属人权的警察；建造一座专门监狱来关押他，用正规部队守卫，以保证他的生命安全。经过反复考虑，政府同意了他的后两个条件，但坚持没收他的几十亿美元的家产。5月30日，埃斯科瓦尔致信新闻界，表示愿意向政府投降，但没提大赦及私有财产合法化的事。

1991年6月19日，哥伦比亚议会通过议案，禁止向外国引渡哥伦比亚人。埃斯科瓦尔终于下定决心，向政府投降。在麦德林市郊，他交出了自己的手枪，带上了手铐。在国家警察总监阿里埃塔、刑事审判局长梅西亚和赫瑞罗斯神父的陪同下，埃斯科瓦尔登上了直升机，前往麦德林市南部60公里处的恩维加多监狱。其时，哥伦比亚全国的空中航线一律停航，为埃斯科瓦尔让路。在两名保镖的陪同下，埃斯科瓦尔步入了监狱的大厅，开始了他的牢狱生涯。一直紧提着一颗心的阿里埃塔总算舒出一口气。他说：“对国家来说，这是件好事，但对我的良心来说，并非如此。”毒王放下武器意味着困扰哥伦比亚的毒品战争已经结束，但是，凶手没有得到惩治，正义没有得到伸张，身为国家警察总监，阿里埃塔心犹不甘。但是，对哥伦比亚来说，这恐怕是最好的结局。

虎脱囚笼

1992年7月22日晚上，人们惊奇地发现，本应飞赴马德里出席伊比利亚美洲首脑会议的加维利亚总统又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是什么大事使得总统放弃这个重要的外事活动，来对国民发表讲话的呢？

加维利亚总统在电视上宣布，囚禁已经有一年时间的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已经于21日夜间越狱，虽经严密搜查，但至今下落不明。总统在讲话中重申，政府决不会让毒犯重新作恶。不过，他在讲话中又表示，只要埃斯科瓦尔重新自首，政府将保证其生命安全，并进行公正的审判。

哥伦比亚舆论哗然。重兵看守之中的囚犯竟然会越狱？这简直是不可思议。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恩维加多监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还是让我们回到一年前，去追溯一下这件事的前因吧！

恩维加多监狱坐落在离麦德林市20公里、海拔2600米的群山之中，占地6000平方米。前面我们已经说到，恩维加多是埃斯科瓦尔的故乡，埃斯科瓦尔在这里乐善好施，颇有一些名声。哥伦比亚政府将埃斯科瓦尔囚禁于此，恐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监狱的四周没有人烟，但这里群山环抱，郁郁葱葱。如果不是周围铁丝网、电网密布，岗哨林立，这里无疑是休假的最好处所。

为了看管埃斯科瓦尔，哥伦比亚政府动员了 200 名经验丰富的看守，可以说，哥伦比亚最忠于职守的看守恐怕都已在恩维加多监狱齐集。另外，哥伦比亚政府还在监狱外边部署了一个团的特种部队。恩维加多监狱本身所处地理位置险要，整个监狱只有一条盘山公路与外界相连。如果堵住这条公路，那么上山、下山的道路都会被封死，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哥伦比亚政府在这里设立了两个哨卡，戒备森严。用监狱长的话说，埃斯科瓦尔关在这里，可以说是万无一失。埃斯科瓦尔不用担心仇家前来寻仇，哥伦比亚政府也不用担心囚犯越狱。双方皆大欢喜。

埃斯科瓦尔囚禁的地方，如果没有一个监狱的名称和密布的岗哨，倒像是一座庄园。这也难怪，这里本来就是一座牧场。据说，埃斯科瓦尔得势后在这里大兴土木，把这里改建成一座豪华的五星级宾馆。埃斯科瓦尔的囚室决不是常人可以想象的。里面有豪华的套房，有大屏幕的电视机，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此外，埃斯科瓦尔在监狱里还有自己的办公室、一个足球场，以及其他一些娱乐设施。除了不能随便外出，埃斯科瓦尔可以在这里与外界通电话，接待来访者，还可以与应召女郎厮混，解决他的生理需要。这种局面当然不是哥伦比亚当局的本来意愿，但是，在这个世界上，钱能通神。埃斯科瓦尔有的是钱，而那些看守，除了一颗忠心外，最缺乏的恐怕就是金钱了。为了获得金钱，他们只有出卖一点忠心了。因此，埃斯科瓦尔在监狱里得以极尽奢华，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最初一段时间，他生活在这里还是无忧无虑，甚至“乐不思蜀”了。麦德林集团的事务已经交由加莱亚诺和蒙哥达两兄弟掌管。两兄弟答应，每月支付埃斯科瓦尔一亿美元的损失费。坐在监狱里还有一亿美元的月收入，埃斯科瓦尔何乐而不为？如果不是麦德林卡特尔集团内部出现变故，埃斯科瓦尔恐怕愿意把牢底坐穿。

但是，埃斯科瓦尔的如意算盘打得太好了，加莱亚诺兄弟也不是傻瓜。他们俩在麦德林卡特尔能混到这种地步，肯定也有一些过人的手段，否则不会受到埃斯科瓦尔赏识。钱是个好东西，这一点，埃斯科瓦尔自无异议，而加莱亚诺兄弟俩也不会持反对意见。他们在监狱外边拼死拼活地挣钱，冒着生命危险，而埃斯科瓦尔舒舒服服地住在监狱里还坐享其成，这是绝对不公平的。因此，加莱亚诺兄弟也不打算把这一亿美元如数送出。这可惹恼了埃斯科瓦尔。老子好心把生意交给你们兄弟掌管，让你们也发发财，谁想到你们竟然见利忘义，想架空我，没门！因此，埃斯科瓦尔就向自己的亲信如此这般地吩咐了一下。于是，加莱亚诺兄弟俩保险箱里的钱就少了 1000 万，算是给他们的一个警告。加莱亚诺兄弟自然也不是省油的灯。有谁敢到老虎头上抓虱子，这件事是谁干的，不是明摆着的嘛！加莱亚诺兄弟气不过，偷偷进入监狱与埃斯科瓦尔理论。双方互不相让，发生了争吵。加莱亚诺兄弟威胁要放弃毒品生意，埃斯科瓦尔置之不理。当下无话，但加莱亚诺兄弟不知道，埃斯科瓦尔已动了杀心。犯上作乱，这还了得。杀！一声令下，加莱亚诺兄弟人头落地。据说，埃斯科瓦尔曾指派手下在监狱外边绑架了 22 人，其中有 8 人被带进监狱面见埃斯科瓦尔，接受毒王的审讯，后被抛尸野外，作为对叛徒的一点惩戒。

埃斯科瓦尔一时兴起，杀了加莱亚诺兄弟。但是，加莱亚诺兄弟手下也有一帮人，见主子被杀，他们也要向埃斯科瓦尔复仇。于是，接二连三的事件就出现了。首先是埃斯科瓦尔母亲的农场被炸，接着他妻子和岳母的住宅前也发生了爆炸事件。这几起事件虽然没有给埃斯科瓦尔家族造成什么人身

伤亡，但已经向埃斯科瓦尔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警告：你已经触犯众怒，结下仇人了！一个自称为“受埃斯科瓦尔迫害者”的组织在报上发表声明：“我们要为彻底消灭埃斯科瓦尔及其亲信、合伙人而奋斗！”埃斯科瓦尔的日子难过了。

毒品集团的内证惊动了政府。政府怎么也想不明白，身陷囹圄的埃斯科瓦尔竟然还能生出这么多事来。自埃斯科瓦尔放下武器以来，麦德林卡特尔的军事组织已经解散，怎么可能还会发生这些暗杀事件呢？再说，处于重重监视之下的埃斯科瓦尔是如何操纵这些暗杀事件的？7月21日上午10点，哥伦比亚政府又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哥伦比亚总统加维利亚、内政部长、国防部长、总检察长、司法部长及警察总监。会上，总检察长汇报了埃斯科瓦尔在监狱里继续作恶的情况。他说埃斯科瓦尔在监狱里操纵了这些暗杀事件，埃犯在监狱里极为自由，有一辆夹层汽车，可以带着人在监狱里进进出出，这些罪行就是这样犯下的。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埃斯科瓦尔存在越狱的可能，固若金汤的恩维加多监狱并不保险。总统当即决定，拨款400万美元，加强恩维加多监狱的警卫，同时将埃斯科瓦尔等案犯转移到一座军营中。为防止走漏风声，总统当场决定，立即进行转移。

21日中午12点，哥伦比亚三军代司令穆里喀接到将埃斯科瓦尔转移到军营的命令，立即通知驻守在麦德林的第四旅旅长帕尔多加强恩维加多监狱的保安措施，控制整个监狱。下午1点半，帕尔多带领400名士兵来到山上，发现监狱的电网有缺口，当即下令补上。随即，他发现有两辆吉普车进入监狱，连忙追问这是谁的车子。监狱警卫回答说，这是埃斯科瓦尔律师的汽车，进入监狱与埃斯科瓦尔详谈。帕尔多意识到，在他接到命令前，消息也已传到埃斯科瓦尔耳中，否则，律师的行动决不可能如此迅速。帕尔多要求进入监狱，但被监狱警卫拒之门外。

3点钟，哥伦比亚国家安全委员会命令，由军队接管监狱，负责监狱内外的安全保卫工作。4点半，命令传达到帕尔多旅长。穆里喀命令帕尔多亲自到恩维加多监狱，替换下监狱的警卫，承担起监狱内外的全部责任。

7点50分，此时已经是晚上，不知何故，军队到现在还没有采取行动。从首都乘飞机赶来的司法部副部长爱德华多·门多萨、国家监狱局局长纳瓦斯·鲁维奥及恩维加多监狱的监狱长罗德里格斯来到监狱门前。鲁维奥和罗德里格斯进入监狱通知埃斯科瓦尔政府将他转移的决定。看守人员首先不同意，鲁维奥等人费尽口舌还是无济于事，只得出来请门多萨亲自进去向看守人员解释。10点50分，门多萨进入监狱内部，向看守人员和埃斯科瓦尔解释政府的决定。埃斯科瓦尔气急败坏，大骂政府不守信用，更换监狱，使他无法享受特殊待遇，生命安全也无法得到保证。他说：“要我们从这里搬走，就意味着死亡！”此时，当军队要进入监狱时，监狱警卫鸣枪制止。门多萨等人见势不对，准备起身告辞。埃斯科瓦尔一声令下，他的保镖扣住了门多萨等人，并从看守手里夺过枪支，随后，他们把门多萨等人带进了监狱长办公室。一个罪犯用无线电与潜伏在外边的歹徒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一个小时后，埃斯科瓦尔等人带上了防毒面具，匆匆离开了监狱，只留下5名案犯与军队周旋。这样，原本准备接管监狱的军队变成了解救人质的军队。此外，哥伦比亚政府还向恩维加多监狱派出特种部队。但是，哥伦比亚军队平素训练不严、作战力不强的缺点此时暴露无遗。原来规定用两架飞机送特种

部队成员空降，但只有一架飞机作好了准备，另外一架就是起飞不了，部队的集结时间大大延长。第二天凌晨6点多钟，哥伦比亚特种部队向监狱发起进攻，一阵交战后，军队控制了监狱，5名案犯束手就擒，人质也获得解救，但是，埃斯科瓦尔等9名案犯却不知下落。

埃斯科瓦尔跑到哪里去了呢？如果他跑掉，这次行动等于失败。因此，哥伦比亚政府命令，挖地三尺，也要找到埃斯科瓦尔。有人说，埃斯科瓦尔在逃跑前带上了防毒面具，因此可能是从暗道里逃走了，司法部副部长门多萨就如此估计，因为他看到了埃斯科瓦尔带上了防毒面具。埃斯科瓦尔的一个侄子也说，埃斯科瓦尔正躲在一个有自卫能力的地道中，那里面储藏了大量的生活必需品，埃斯科瓦尔在那里躲几个月没问题。但是，特种部队对监狱内外进行了仔细检查，这条地道还是没有找到。

军方对这件事另有说法。负责接管监狱的第四旅认为，埃斯科瓦尔等人在凌晨1点化装成农妇、看守人员，在一个军官和10名士兵的配合下，逃出了军队的包围圈。有一个士兵甚至说，其中有一个女人打扮，穿着很讲究，戴着假发，很像埃斯科瓦尔。哥伦比亚政府后来发表公告说，当时曾断电三分钟，埃斯科瓦尔很可能就是这个时候逃掉的。很明显，他的逃跑得到了看守的配合。但是，这些人是如何混过检查，那些军人属于哪个部队却又不得其详。不过，此种说法后来得到一个监狱看守的证实。看守达科塔说，埃斯科瓦尔早在突击队进攻前就作好了逃跑准备，他向看守行贿100万美元，因此得以从大门逃出。另外有一支70人的队伍在外面接应。所谓防毒面具和留下的5个人，都是埃斯科瓦尔有意安排的障眼法。

埃斯科瓦尔的出逃在哥伦比亚引起强烈震动。贩毒分子越狱在哥伦比亚已非首次。早在埃斯科瓦尔前自首的奥乔亚就是通过越狱逃跑的。1988年12月30日，这位号称四大毒王之一的奥乔亚就用金钱开道，以42万美元向律师行贿，腐蚀监狱长、大法官，拿到了释放令，最后逃之夭夭，至今不知下落。后来发现，这些律师、法官总共得到了150万美元。从奥乔亚一案，人们不难想到埃斯科瓦尔的手腕。毒品经济对哥伦比亚的危害再次得到了证实，钱能通神，哥伦比亚还有不受腐蚀的净土吗？人们对政府的忠诚持怀疑态度。加维利亚总统也表示震惊，下令追查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监狱长罗德里格斯、国家监狱局局长纳瓦斯·鲁维奥及司法部副部长门多萨、第四旅旅长帕尔多被解除职务，空军副司令因直升机姗姗来迟也递交了辞呈。最后，与埃斯科瓦尔越狱有关的31人被捕，其中大多数是恩维加多监狱的看守。哥伦比亚内政部长说，恩维加多监狱已经被埃斯科瓦尔用金钱征服了。

最后的调查显示，埃斯科瓦尔在越狱时确实得到了军人和看守的帮助。22日零点，埃斯科瓦尔与值班的军士长菲利韦托·霍亚商量，请霍亚网开一面，放他们一条生路。埃斯科瓦尔的酬报是，放走他的人将会是一个百万富翁。霍亚不能抵挡这个诱惑，因为他在这高山上看一辈子监狱也不会成为百万富翁。在重利引诱之下，他动心了。埃斯科瓦尔见此情景，立即捧出100多万美元，霍亚当即分给了自己的士兵。埃斯科瓦尔等人就开始行动。霍亚对他的士兵要求：“即使被挖去双眼，或废掉男人的家伙，也不能说出去！”就这样，埃斯科瓦尔不慌不忙地作好了准备。2点钟，霍亚对接班的卫兵说：“平安无事。”埃斯科瓦尔就这样逃离了法网。等特种部队的士兵冲进监狱时，他们面对的只有5名人犯，此外就是这空荡荡的监狱。

法律对罪恶的胜利

哥伦比亚再次向埃斯科瓦尔宣战。加维利亚总统命令军警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埃斯科瓦尔。哥伦比亚的邻国也进行配合，委内瑞拉的国民警卫队已经作好准备，防止埃斯科瓦尔窜入本国。美国也一反过去对哥伦比亚的批评态度，积极支持哥伦比亚向埃斯科瓦尔宣战。大批高新技术仪器运入哥伦比亚，帮助缉毒大军侦查埃斯科瓦尔的踪迹。哥伦比亚对埃斯科瓦尔悬赏 140 万美元，后来又追加到 600 多万美元，再加上美国原先许诺的 200 多万美元，埃斯科瓦尔项上人头的价格已经达到 800 多万美元，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值钱的一颗脑袋。但是，搜捕的军警连埃斯科瓦尔的影子也没有见到。

说埃斯科瓦尔全然不见踪影当然是不完全符合事实。事实上，哥伦比亚人处处感受到了埃斯科瓦尔的存在。7 月 22 日上午 10 点钟，埃斯科瓦尔通过麦德林的一家广播电台向人们宣告：埃斯科瓦尔又出来了。他在一盘录音带中宣称，他不会投降，也不打算离开监狱，而要与哥伦比亚政府誓死周旋。23 日，他又宣布，目前他呆在哥伦比亚西北部某处丛林中，暂时不会采取暴力行动。他向哥伦比亚政府传递信息：只有让他重回恩维加多监狱，由多国部队看守，他才打算自首。看来，毒王迷上了故乡的山水。

对于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犯罪集团首脑来说，光靠录音带向世人传递信息未免太斯文了。因此，几个月后，埃斯科瓦尔故态复萌。1992 年 10 月 28 日，数十名缉毒人员盯住了麦德林卡特尔的头号杀手、贩毒集团非法军事组织头目布朗斯·穆尼奥斯。经过激烈的枪战，穆尼奥斯毙命。这对埃斯科瓦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穆尼奥斯追随埃斯科瓦尔几十年，枪林弹雨中几十进几十出，对埃斯科瓦尔忠心耿耿，是埃斯科瓦尔的左膀右臂。埃斯科瓦尔发誓要为穆尼奥斯复仇。29 日，贩毒集团雇佣一批杀手从出租车上向四名特工开火，当场打死三名。当天晚上，又有六名警察受伤。

更大的报复还在后面。12 月 30 日，波哥大一条繁华的商业街上人头攒动，人们正在忙着购买年货。谁也没想到，恐怖分子把目光盯住了忙于过年的人们。傍晚时分，一辆停在商业大楼前的汽车爆炸了。巨大的爆炸声震天动地，人群倒下了一大片。这次大爆炸共有 20 人死亡，60 余人受伤。这是近年来少见的大爆炸。事后调查发现，炸弹是事先安装在汽车上，由恐怖分子遥控引爆的。警方认为，这次大爆炸具有典型的埃斯科瓦尔特征。第二天早上，波哥大的救援人员还没来得及歇一口气，麦德林又发生了两起爆炸事件，巨大的爆炸掀翻了五幢建筑物，幸喜这次无人死亡。这些爆炸炸得加维利亚总统坐立不安。埃斯科瓦尔还通过不同途径向政府提出他自首的新条件，如由海军、空军或联合国部队对他进行看管，麦德林卡特尔的人员必须集中关押，不得进行隔离，服刑地点由他自己选择，麦德林的警察部队必须进行改组，指挥官要撤掉，等等。他还声称，如果不同意他的要求，他将绑架驻哥伦比亚的外交官，用炸弹袭击哥伦比亚的执法机构和新闻单位，使哥伦比亚国无宁日。

面对埃斯科瓦尔咄咄逼人的反扑，政府采取了更严厉的打击措施。1992 年 11 月 8 日，加维利亚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1993 年 1 月 27 日，总统亲临贩毒集团的老巢麦德林，召开特别安全委员会会议。他宣布，政府将向麦德林增派 1600 名军警，组成一个新的战斗营，以加强打击力度。他重申，政府绝不会屈服于贩毒集团的压力，绝不同埃斯科瓦尔讨论自首的条件。

军警在麦德林、恩维加多等地区不断进行拉网式搜查，为埃斯科瓦尔布下了天罗地网。因此，一段时间内，有人竟然谣传埃斯科瓦尔已经死了，只是这个大毒梟的母亲时不时地出来辟谣，说她的儿子一直藏身于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

警方进行的 9000 次搜捕都没有发现埃斯科瓦尔的踪影，埃斯科瓦尔到哪里去了？莫非他还真能上天入地？实际上，他一直藏身于他的家乡恩维加多。埃斯科瓦尔本质上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乡土观念极重，麦德林和恩维加多是他发迹的地方，是他福星高照之地，他怎么会轻易离开这块宝地呢？因此，恩维加多的居民发现，被政府缉拿的大毒梟，他们的大好人巴勃罗一直与他们在一起，他们经常可以看到他在恩维加多的大街上散步。这并不是说恩维加多所有人都被埃斯科瓦尔毒化了。但实际上，警察确实没有得到举报，尽管赏金高达几百万美元。大街上遍布埃斯科瓦尔的打手，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你也许真的可以通过举报拿到政府的赏金，但是，在埃斯科瓦尔打手遍地的情况下，政府能保证你的安全吗？也许你只能当一天百万富翁，然后就要准备极其奢华的葬礼，这种买卖是不会有人做的。

不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随着埃斯科瓦尔的项上人头越来越值钱，很多人看上了这笔致富的买卖。很多人心存侥幸，万一能逃过埃斯科瓦尔的毒手，岂不是可以独享这 800 多万美元！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通风报信者的行列。八个月时间内，警方收到 8.6 万个举报电话，1 万封举报信件。警方根据这些举报频频出动，先后逮捕了 1300 名嫌疑分子，击毙了 48 名毒品贩子。埃斯科瓦尔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更厉害的一招还在后面。政府记起 1992 年埃斯科瓦尔越狱前毒品集团的内讧，决定对麦德林卡特尔采取分化策略，即对一般的毒品贩子网开一面，重点打击埃斯科瓦尔，让他们自己去狗咬狗。这一招果然见效。警方如影随形的追踪使埃斯科瓦尔觉得内部出了叛徒，因此不断对下属进行清洗。只要埃斯科瓦尔觉得谁不可靠，那么，他的死期也就到了。1992 年 12 月，埃斯科瓦尔就处死了 30 名保安人员。渐渐地，埃斯科瓦尔身边的亲信越来越少了，剩下的几个人也不知道哪一天轮到自己，因此，为谋生路，他们纷纷向政府自首。与埃斯科瓦尔一起越狱的九个亲信，有七个向政府自首了。哥伦比亚一位法官说：“埃斯科瓦尔的手下人为了金钱出卖他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1993 年 2 月 17 日，埃斯科瓦尔的卫队长、政府悬赏 13 万美元通缉的卡洛斯·阿尔萨特投降。几天之后，麦德林卡特尔手枪队队长希奥万尼·洛佩拉也放下了武器。3 月 5 日，与埃斯科瓦尔一起越狱的弗雷迪·冈萨雷斯也向政府自首。埃斯科瓦尔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他到这时才明白，他过去在麦德林卡特尔树立起来的权威在政府的攻心术前竟是如此不堪一击。现在，除了几个贴身卫士和自己的亲属外，他几乎连一个说话的人也找不到，这下子，他真正尝到了被政府追捕的滋味了。他只能像一只老鼠似的，隐伏在黑洞里，靠自己的亲人送饭。生命无法得到保障，一切娱乐活动都无法进行了，连胡子也没法刮。这种日子与当年在恩维加多监狱的生活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哥伦比亚政府为了追捕一个埃斯科瓦尔，出动了大批军警在麦德林地区反复清剿，但就是不见埃斯科瓦尔的踪影。最后还是借助美国的先进仪器，才抓到了埃斯科瓦尔的尾巴。1993 年 11 月 28 日，由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不再保证埃斯科瓦尔亲属的生命安全，埃斯科瓦尔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害怕埃斯

科瓦尔的敌人前来寻仇，不得不离开哥伦比亚，前往德国避难。但是，鉴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德国政府竟然不许他们入境。无奈，他们只得随机返回。埃斯科瓦尔闻讯大怒，先把妻儿安慰一番，然后又打电话给一家电台，请它代己发言，将德国政府痛斥一顿，指责德国政府“不人道”，这才稍解心头之恨。不料，哥伦比亚的情报部门却监听到这个电话，从而初步确定了他的藏身之地。包围圈在一点一点地缩小。

12月1日，埃斯科瓦尔度过了自己44岁的生日。第二天下午，他按捺不住心中的寂寞，又向自己的妻子打了一个电话。几乎在电话接通的同时，哥伦比亚警方也确定了他的藏身之处。一声令下，由17名军警组成的突击队包围了埃斯科瓦尔藏身的麦德林市拉阿梅里卡区79大街的一幢两层小楼。

2点40分，埃斯科瓦尔的侄子按响了小楼的门铃，他来给埃斯科瓦尔送饭。就在这时，埋伏在四周的突击队员一跃而起，埃斯科瓦尔的侄子发出一声惨叫。正在室内的埃斯科瓦尔一听声音不对，立即反应过来。毕竟是枪林弹雨里闯出来的，埃斯科瓦尔的身手确实不凡。他鞋子没穿，爬上了屋顶上的平台。与此同时，与他同时作出反应的贴身保镖阿古德洛和埃斯科瓦尔的内弟马里奥·埃璠与突击队员交上了火。

埃斯科瓦尔被抓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每次他都是在间不容发之际逃遁。因此，这一次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再逃出法网。突击队员不想抓到一个活的埃斯科瓦尔向政府献俘，埃斯科瓦尔一生作恶甚多，他的死期也该到了。因此，不容分说，突击队员向负隅顽抗者开火，管他是谁，只要他不放下武器，就要击毙他！

20分钟的枪战后，平台上已经血迹斑斑。突击队员发现，已经没有人抵抗了，于是进行搜查。平台上留下了三具尸体，这里面是否有埃斯科瓦尔，不得而知。法医紧急赶到，经鉴定，那个小个子男人就是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他身中数弹，但手里还握着手枪，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天空，似乎在问老天，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击毙埃斯科瓦尔的消息在全国传开后，哥伦比亚人民的反应是不同的。大部分国民都对这个消息感到兴奋。这是政府对毒品宣战以来取得的一个决定性的胜利，在哥伦比亚的毒品史上，它至少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长期生活在毒品阴影下的老百姓终于可以安下心来过几天安稳日子了。哥伦比亚政府更是松了一口气。埃斯科瓦尔的击毙，标志着哥伦比亚“国中之国”的消失，哥伦比亚终于可以统一了，政令、法令从此将会贯彻下去，政府的威信得以恢复，哥伦比亚的国际声誉也会恢复，这是加维利亚总统及他的前任孜孜以求的目标，现在目标实现了，他们可以放心了，自己的宝座也坐稳了。加维利亚总统将以禁毒总统载入史册。难怪，他在对国民的广播讲话中，将击毙埃斯科瓦尔说成是哥伦比亚反毒品斗争中的决定性事件，足可以载入世界禁毒史册。他兴奋地告诉他的人民：“我们向全世界宣布，任何罪犯，不管他有多么强大，都不能摧毁一个勇敢的民族的意志。”哥伦比亚自由党总统候选人桑佩尔也说，近10年来，埃斯科瓦尔针对哥伦比亚人的生存发起了一场最残酷的战争，它夺去了许多优秀公民的生命。击毙埃斯科瓦尔标志着哥伦比亚现代史上最痛苦的一页已经结束。保守党总统候选人帕斯特拉纳也说，这是法律对罪恶的胜利。

但是，也有很多人并不这么看，这在埃斯科瓦尔的家乡麦德林尤其如此。埃斯科瓦尔毙命24小时后就被安葬在麦德林城南一座小山上的公墓里，埃斯

科瓦尔的母亲、妻子和女儿参加了他的葬礼。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麦德林市竟然有2万市民自发地参加了葬礼。在麦德林市，有三个埃斯科瓦尔出资兴建的贫民区，居住在这里的贫民都把埃斯科瓦尔当作恩人。因此，他们自发地举行了悼念活动，口中念叨着埃斯科瓦尔的名字。其情景，活像在追悼一个见义勇为的英雄。埃斯科瓦尔的母亲也不愿人们知道自己的儿子是被政府击毙的，尽管这是一个世人皆知的事实，但她还是不断地告诉人们，埃斯科瓦尔是在被政府军包围后，自忖无法脱身，这才开枪自尽，似乎自尽比击毙要光荣一点。她说：“埃斯科瓦尔自己在信中说，他永远不会让他们击毙或抓住，他不会给他们这种快感。”埃斯科瓦尔的儿子先是发誓要向击毙他父亲的凶手复仇，在得知奶奶这一表态后也改口向人们道歉，说自己是一时冲动，并呼吁麦德林集团的残部不要采取任何报复行动。

战斗没有穷期……

埃斯科瓦尔死了，但哥伦比亚的毒品问题、世界的毒品问题并未随着他的死而带到棺材里去。美国毒品管理局又传出另一条信息：在哥伦比亚还存在另外一个贩毒集团，这就是所谓卡利集团。

卡利集团的总部在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卡利。据说，这个集团最初是由一个外号叫“猫”的军官策划组织的。这个集团与埃斯科瓦尔的麦德林卡特有些不同。在麦德林卡特，埃斯科瓦尔是一统天下，集团内部无人能与他争雄，但是，卡利集团却是由四大家族控制的。这四大家族是：赛特克那兹家族、罗德里格斯家族、卡拜勒鲁家族、犹尔地诺拉家族。在这四大家族的控制下，卡利集团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它既有生产企业，也有金融机构；既有国内据点，也有海外市场。与麦德林卡特一样，卡利集团生产的可卡因也大部分销往美国。不过，卡利集团在可卡因生产上是趁着麦德林卡特受挫后才发展起来的，是典型的后来者居上。卡利集团在经营毒品上也含而不露，不像麦德林卡特那样咄咄逼人，最终成为众矢之的、过街老鼠。卡利集团一般不从事暴力活动，当麦德林卡特覆灭后，卡利集团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扩展良机，它迅速填补了由于麦德林卡特覆灭后而出现的毒品真空地带。它垄断了美欧80%的可卡因市场，每年获得的利润在30亿美元以上。罗德里格斯兄弟每年的非法收入更在50亿美元以上，堂而皇之地进入了《福布斯》杂志的富豪排行榜。为了毒品贸易方便，他们开始大肆向公职人员行贿，获取毒品交易的保护伞。因此，哥伦比亚政府和人民任重道远。继剿灭埃斯科瓦尔后，哥伦比亚政府再接再厉，继续向毒品犯罪发动进攻。仅1995年，哥伦比亚的军队、警察和缉毒部队一起出动，共采取了2964次缉毒行动，缴获了可卡因42亿包，捣毁了2.5亿公顷古柯，4000多公顷罂粟，摧毁了500余家毒品加工厂，没收运送毒品的飞机30余架，汽车几百辆，抓获毒品贩子2634名。6月，哥伦比亚在剿毒战争中又取得了另一个决定性的胜利。9日，政府军在接到匿名举报后，直捣卡利集团的老巢——卡利市圣莫里卡区。在一座破旧的公寓里，缉毒人员无意中发现了一间密室。面对缉毒人员的枪口，卡利集团的头号人物希尔伯特·罗德里格斯说了句“枪下留情”就束手就擒。8月6日，他的弟弟米格尔也在梦中被擒。这样，卡利集团的大头目只有一人在逃，桑佩尔总统说，这一成果意味着卡利集团的末日和哥伦比亚新时代的开始。

在麦德林卡特尔覆灭后，记者曾采访了卡利集团的财务总监吉尔伯特。在问及可卡因贸易的未来趋势时，吉尔伯特所说的一段话发人深思。他说，经济活动有其自身的规律，即供给是由需求决定的，什么时候毒品的消费停止了，什么时候毒品的生产也就停止了。

但是，毒品的消费能停止吗？

据统计，哥伦比亚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毒品生产基地，而当今世界最大的毒品消费国就是美国。据说，哥伦比亚每年加工的毒品，大部分都流入了美国。在美国，卷入贩毒与吸毒的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美国政府曾发表过一份《1938 年全美家庭滥用药物的调查报告》，内称一生中至少用过一次毒品的美国人已经达到 8700 万之巨！

据科学家研究，毒品之所以称为毒品，是因为它一经吸食，即容易上瘾，而一经上瘾就很难戒除。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看到有哪一个瘾君子真正在戒毒所的帮助下彻底戒除了毒瘾。这就意味着，在这为数众多的毒品吸食者中，已经有不少成为必须终身与毒品为伴的瘾君子，因此，客观上存在一个广大的毒品市场。这是毒品屡禁不止的真正原因。吸食毒品一天不止，哥伦比亚将一天国无宁日。正如巴尔科总统在会见美国记者时所说，只有美国政府采取更有效的禁毒措施，根除本国的毒品市场，这场毒品战才可能最终取得胜利。“只有当人们都理解，可卡因不仅仅是哥伦比亚的问题，同时也是所有受到它影响的国家的问题时，我们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